

第三卷

第十三章 罗马强国的衰亡

一、罗马强国的形成

公元前 2 世纪后半期，罗马两次战胜迦太基，征服马其顿和希腊，取代希腊一跃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强国，独霸一方。但是，罗马并没有彻底消灭迦太基，迦太基在实力上仍然对罗马构成威胁。

1. 第三次布匿战争

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的政治与军事遭受严重的创伤，但在经济上仍有相当潜力。迦太基经济的恢复，引起了罗马统治者的担心，所以总想寻找借口消灭迦太基。努米底亚王玛西撒仰仗罗马人的支持，企图吞并迦太基的一部分领土。罗马借口迦太基违反公元前 201 年的条约，对迦太基宣战。于是，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148 ~ 前 146 年）爆发了。

战争初期，迦太基忍辱求和，罗马趁机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先是要求交出显贵家族的 300 名儿童作为人质，交出所有武装和船只。条件实现后，又提出还要铲平迦太基城，其城民迁到距海 15 公里的内地。这种蛮横要求引起迦太基

人的无比愤怒，第三次布匿战争成为迦太基城的保卫战。迦太基全民奋起保卫祖国，他们将所有金属都铸成武器，妇女剪断头发制作弓弦，甚至释放一批奴隶编入军队。

战争进行了两年多，公元前 147 年，斯奇庇奥·埃米里亚努斯·阿莫利加的养孙担任司令官。他重整军队纪律，完全封锁了迦太基城。公元前 146 年春天，开始总攻击。连续打了一星期，才攻下迦太基的中央要塞——比尔撒。

罗马军队纵火焚烧迦太基城，一直烧了 16 天，然后在被毁的城址上耕出一条犁沟，表示这是该诅咒的地方。迦太基领土并入楞伽河非利加省。

但是，罗马人在消灭了迦太基之后，又面临着一项复杂的任务：即如何进入迦太基过去的海外领地西班牙。在那里，罗马人同迦太基军队及当地部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罗马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并不顺利。公元前 197 年、公元前 154 年，西班牙边疆爆发了两次大规模起义。西班牙境内的路西塔尼亚人、阿列瓦克人、克勒特伊比利亚人等部落都参加到了反侵略统治的战争中来。约在公元前 147 年，路西塔尼亚部落出现一位天才领袖——维里亚图斯，在他的带领下西班牙起义开展得如火如荼。他曾一度挫败罗马，但维里亚图斯被暗杀后，起义运动也衰落下去。公元前 143 年，西班牙北部以努曼提亚城为中心又掀起一次起义。公元前 137 年，起义武装将罗马执政官曼尼努斯重重包围，迫使他同努

曼提亚人签订了战败和约。公元前 133 年，曾战胜迦太基的斯奇庇奥·埃米里亚努斯经过 15 个月的围攻，占领了努曼提亚，起义被镇压下去。

经过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征服了西班牙，又将拍加摩斯王国变成罗马的亚细亚省，于是地中海地区世界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帝国形成了。

2. 罗马对行省的统治和社会矛盾

罗马占领意大利后，如何实行管理便成为罗马帝国国家机构面对的首要问题。在这之前，罗马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公社联盟。其中，罗马依靠武力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当罗马将更多的国家转变为它的行省之后，罗马的管理制度更加鲜明地暴露出其治理各行省方法的杂乱无章和过于简陋。

公元前 2 世纪中期，罗马帝国包括 9 个行省：西方的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南阿尔卑斯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东方的伊利里亚、马其顿和亚细亚。在这些行省中，各城市的权利地位并不一致，它们中多数是纳税的附属公社。除此之外，有的享受完全自治权，有的甚至是免税的“自由公社”，而有些公社的权利由专门的条约作出规定，称为条约公社。由此可见，罗马对行省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

各行省的管理制度也是自发形成的，没有共同法律规定。新的行省总督上任时，常要颁发告示，发表他治理行省的大政方针。

罗马人最初派行政长官，后来派罗马任期届满的执政官去当行省的统治者，即总督。总督任期通常为一年，在这一年内，他不但拥有该省军事、民政和司法大权，而且他的活动实际上对罗马政权不负任何责任。总督在行省里的活动是不受监督的，只有当他卸任之后，行省的居民才能提出控诉，但这种控诉很少奏效。

在自由民中，大土地所有者与小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争夺日益激烈。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地主贵族（新贵阶级）和新兴的商业高利贷贵族（骑士阶级）之间也存在斗争。骑士阶级企图控制国家政权，他们在与大权独揽的新贵作斗争时，先后与乡村平民和城市平民在一定程度上结成同盟。这时的城市平民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它虽然还不能强大，但作为别人的盟友或敌人，却足以左右斗争的发展方向。

由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发展，罗马社会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极度尖锐，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最初只是一些零星的暴动事件，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奴隶起义；拉提乌姆的奴隶起义；公元前 196 年埃特鲁里亚的奴隶起义。但是后来，这些起义发展成为“奴隶战争”：西西里

的大规模起义和斯巴达克所领导的伟大的奴隶起义。

二、奴隶起义和格拉古兄弟改革

1. 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

在罗马独自称霸地中海地区的过程中，罗马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除此之外，还有贫民和富豪的矛盾，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整个社会阶级斗争十分激烈。

公元前 138 年，达莫费洛的奴隶发生暴动，杀死主人，烧毁农庄，占领了恩那城，选举叙利亚奴隶攸努斯为首领。与此同时，在西南部的阿格里根特，在小亚细亚奴隶克里昂的率领之下，也掀起了奴隶起义。不久，两支起义队伍汇合在一起，他们选举攸努斯为王，克里昂为副手，宣布建立“新叙利亚王国”，并设立由“智者”组成的议事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尝试着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起义军转战各地，打击奴隶主，破坏他们的农庄。他们不伤害小农，所以起义军获得奴隶和贫民的广泛支持，队伍发展到 20 万人。罗马曾派 8000 官兵来镇压，被英勇的奴隶军打败。随后派来的军队也遭失败。统治者大为惊恐，派遣执政官路庇里乌斯率大军去对付奴隶。他集中围攻起义者的两大城市——陶

洛美尼乌姆和恩那城。奴隶们英勇奋战，但由于饥饿和奴隶阵营中出现了叛变分子，两座城市失陷。公元前 132 年，克里昂阵亡，攸努斯被俘后死于狱中，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处以死刑，起义被镇压下去。

与西西里起义有所不同，小亚细亚奴隶起义与贫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以及小亚细亚人民反罗马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充分暴露了罗马奴隶制统治下的各种矛盾。公元前 133 年，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国王阿塔勒三世在遗嘱中将王国拱手送给罗马，这种屈服引起了他的同族兄弟阿里斯托尼库的反对。阿里斯托尼库以“自由、平等”为口号，集合了大批奴隶和贫民，奋起反抗罗马及当地贵族的统治，并建立新的政权“太阳国”。起义者占领帕加马大部分地区，击毙罗马派来清剿的执政官。公元前 129 年，罗马以重兵围困，起义遭到失败。阿里斯托尼库被俘，死于罗马。罗马国家在帕加马地区设置了“亚细亚行省”。这次起义既是一场阶级斗争，又是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斗争。

除了西西里和帕加摩斯外，奴隶起义还席卷了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在意大利的明图伦和西努厄萨城，阿提克和马其顿的矿山，以及最大的奴隶市场提洛岛，都发生了奴隶起义。

2. 格拉古兄弟改革

西西里奴隶起义中大量贫民的参加震动了罗马统治阶

级。土地集中和农民的破产不仅给罗马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而且直接影响了罗马的兵源。在古代罗马城邦里，绝大多数公民平时是农民，战时是战士。罗马的兵源主要来自于罗马自由民。而随着罗马连年对外作战和领土的空前扩大，罗马要求更多的军队去出征、去驻守。但征服的同时，奴隶制大地主把越来越多的农民赶出了土地，沦为赤贫的公民。当罗马急需扩军时，能够入伍的人数却日渐减少，因此兵源问题成为罗马能否继续下去的重大问题。

这一问题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与思考。

以斯奇庇奥·埃米里亚努斯为中心的一个贵族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罗马必须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恢复农民土地所有制，争取农民，从而振兴军队。罗马除了私有土地之外，仍然存在着广大的“公田”。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些土地大部分被那些利用大批奴隶劳动的新贵所侵占。斯奇庇奥集团建议重新分配这些土地。他们主张收回一部分大地主的土地，由国家把这些土地划成小块，分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

斯奇庇奥和提贝里乌斯·格拉古，领导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斗争。

公元前134年，提贝里乌斯当选为保民官。就职后，他在李锡尼——塞克斯图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法案，即规

定土地限额，收回多余土地，重新分给少地和无地的罗马公民。根据这一法案：每一家长占有国家土地不得超过 500 犹格，每个成年儿子可占 250 犹格，但每家占有国家土地的总数不得超过 1000 犹格（约合 250 公顷）。凡超过限量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每 30 犹格分成一块，分配给贫穷的农民，可以永久使用，但不准出卖或转让。分配土地的工作由每年选举的“三人委员会”负责。这一法案侵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既得利益，他们竭力抵制法案的实施。

提贝里乌斯的法案赢得了平民的热烈支持。提贝里乌斯法案变成了一面旗帜，小土地所有者聚集到它的周围，展开了反大地主与奴隶主的斗争。农民从意大利各个角落来到罗马，参加投票。提贝里乌斯原本只想维护罗马的军事威力，而形势的演变却使他成为一场人民运动的领袖。

在土地改革中，意大利人的问题被十分迫切地提出来。根据提贝里乌斯法案，罗马的意大利联盟者的国有土地同样要被没收，但是意大利人却得不到罗马公民 30 犹格的份地。这一点反映了提贝里乌斯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意大利人跟罗马公民一样参加了罗马的一切战争，却不能享受与罗马公民相同的权利。有钱的意大利人竭力取得罗马公民权，以便有同等的权利参加到罗马的统治阶层中去；贫困的意大利人也希望取得罗马公民权，以便领到份地，还能得到罗马政府的一点庇护。

公元前 125 年，提贝里乌斯改革运动的拥护者——执政官弗拉库斯建议把罗马公民权给予意大利人作为补偿。这个建议遭到元老院激烈的反对，弗拉库斯甚至不敢付诸表决。费拉库斯法案的失败引起意大利弗列该莱城和阿斯库伦城的起义。

盖乌斯·格拉古同提贝里乌斯·格拉古一样才能出众，且刚正果敢。公元前 124 年，他当选保民官，之后又连任。

吸取哥哥的经验，他决定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来对付元老院，以巩固改革运动的政治基础。于是他决心拉拢农民、军队、劳工以及商人等四个阶级的人民。首先他革新土地法，把土地法推广到罗马各省，恢复土地委员会，以此赢得农民的普遍拥护。他又在卡普阿、他林敦、迦太基等处建立新殖民地，并设法使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商业中心来满足中产阶级的野心。在军队改革上，他通过由国家统一配给衣服的法案。最后他又在城市中推行粮食法。这样既减少了谷贩对市民的敲诈，又绝不会给国家带来损失。这些措施使罗马的自由贫民由支持贵族政治转而成为格拉古兄弟的追随者。

在改革选举制度方面，结束贵族在百人会议上的优先投票权，改由抽签来决定投票顺序。同时，在政权中盖乌斯增加了联盟者的人数与权利。商人给以担任处理各军政区渎职事件的陪审员的权利。他又给他们征收所有小亚细亚的赋税的 $1/10$ 的权利，并以在意大利各地筑路的计划使工程承包

商收入大增，同时也降低失业率。

盖乌斯的改革显然赢得了多数人支持，于是他轻易地连任两届保民官。但就在此时，对立分子为了“笼络”元老院，在原来 300 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由议会从商界选出的 300 席的席位。他又建议罗马自由民享有充分的选举权，其他意大利的自由市民享有部分选举权。他这个迈向自由民主大道的大胆建议，在当时却有些曲高和寡。盖乌斯大刀阔斧的改革深深地冒犯了元老院，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拔掉这个眼中钉。当盖乌斯到迦太基建立殖民地时，元老院趁机建议一名叫李维犹斯·杜路苏斯的保民官采取措施破坏盖乌斯的政策：（一）向元老院建议取消《格拉胡斯法》中有关向农民征收土地税之法案；（二）立即建议在意大利新建 12 个新殖民地，向每个殖民地移民 3000 罗马人，借以取悦劳动阶级。元老院马上通过这两个法案。等盖乌斯回到罗马时，发现自己的领导地位正受着严重的挑战——他已不如杜路苏斯那么受人欢迎。这位改革者试图在竞选第三任保民官时力挽狂澜，但由于改革自身的弊病以及反对者的投机与舞弊，他落选了。从此结束了他辉煌的政治生涯。

翌年，元老院计划放弃迦太基殖民地。这是废止《格拉胡斯法》的第一个行动。盖乌斯的拥护者企图用武力维护改革法案，但被元老院的武装所镇压。盖乌斯的支持者有 250 名死于暴乱，还有 3000 人被处死。盖乌斯本人也在这场斗

争中遇害，他的家中被搜刮一空。

3. 优古尔塔战争

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中，不像政党斗争那样一般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甚至没有稳定的阶级构成。平民派领袖多数是贵族阶级出身，他们常常转到贵族派立场，而贵族派有时也会转到平民的一方去。这一切都是罗马社会各种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利益造成的。

阿非利加事件使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化。罗马和意大利的佃户、商人和高利贷者涌到阿非利加省和邻近的努米底亚，他们肆无忌惮，激起当地居民的仇恨。努米底亚国王优古尔塔占领了兹尔塔城以后，对该城内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进行大肆屠杀。这一事件使得罗马平民派对支持优古尔塔政权的元老院和罗马政府十分不满，并强烈攻击。在平民派的压力下，罗马向优古尔塔宣战，这次战争延续了6年之久（公元前111～前105年）。

这次战争暴露了罗马国家制度和军事制度开始衰败的迹象。司令官接受优古尔塔的贿赂，视作战任务如儿戏。士兵们把战利品又卖给优古尔塔的军队。军纪荡然无存，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事情屡见不鲜。罗马失去了号召力和威慑力，优古尔塔宣称要解放阿非利加，格吐里亚游牧民族和毛里塔尼亚王波库斯也加入了优古尔塔方面。

公元前 119 年，盖乌斯·马留当选为保民官。马留出身于阿尔披努姆城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轻视希腊文化，认为那是“奴隶们教导的东西”。马留曾作为罗马军队的一员副将参加优古尔塔战争，在战争中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领导风格，深得将士信任。罗马人认为他是执政官和罗马驻阿非利加军队司令官的最适宜的候选人，因此不管新贵阶级怎样反对，马留于公元前 107 年当选为执政官，并任阿非利加罗马军队的统帅。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表明传统的向农民征兵的制度已难于继续下去。而公元前 2 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奴隶起义和对外战争的形势更趋紧张，保证必要的兵源和加强武装力量的任务更为迫切。实行军事改革的任务势在必行，这个任务便落在马留的身上。马留主要是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改农民兵为雇佣兵。从前公民按财产等级服兵役，无产者原则上不在服役人选之列。实行募兵制后，公民皆可加入军队，大大扩充了兵源。服役期限一般定为 16 年，由国家供给兵员薪饷和武装。老兵退役后，分给土地。为了提高战斗效率，马留对军团的编制也作了相应改革。他重组军团，军团下设 10 个大队，每个大队包括 3 个中队，并大力加强步兵的武器装备。在军队中，马留实行铁的纪律，并注重培养士兵吃苦耐劳的精神。

元老院低估了马留的改革，他们认为“庶民”不愿当

兵，马留必遭失败，所以没有反对。但薪饷、土地、战利品等吸引了广大的贫民，罗马和意大利的下层群众都踊跃地参加了马留的军队。

马留的军队到了阿非利加后，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优古尔塔吃了几次败仗，格吐里亚和波库斯也背离了优古尔塔而与罗马军队联合在一起。罗马军队终于俘获了优古尔塔。

优古尔塔战争后，罗马又遇到与克勒特日耳曼部落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的战争。日耳曼人以几十万军队大举向意大利北部推进，占领了高卢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公元前 105 年，在那尔波高卢的阿劳西昂城下，罗马的两个军团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损失达 8 万人。马留从阿非利加回来以后，又投入到与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的战争中。他所招募的军队在战争中显示出了非常强的战斗力。公元前 102 年和前 101 年，在阿克·塞克斯替（那尔波高卢）、非尔泽里（南阿尔卑斯高卢）的两次战役中，马留的军队击溃了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俘虏将近 8 万人，并把他们卖为奴隶。马留凯旋而归，荣誉达到顶峰。

三、反对罗马统治的群众运动

1. 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撒图尔尼乌斯运动

公元前 104 年，西西里又爆发了新的奴隶起义，这次起

义的导火线与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的进攻有直接的关系。面对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的进攻，罗马兵力显得有些不足。为解决兵源，元老院准许马留向行省招募军队。但有的行省以可服兵役者大都被包税商变成债务奴隶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元老院下令将“非法”纳为奴籍的奴隶释放。西西里地区这样的奴隶不在少数。然而，当西西里总督奈尔发释放了 800 名奴隶之后，却由于接受奴隶主的贿赂而中止释放。这一事件激怒了当地的奴隶，愤怒的奴隶们立即掀起暴动。他们在山上筑起营寨，袭击奴隶主庄园，解放其他奴隶。奴隶们从四面八方前来投奔。不久以后，起义者组成有 20000 名步兵和 2,000 名骑兵的军队。他们拥戴奴隶撒尔维优斯为王。撒尔维优斯更名特里丰，组织才能突出的奴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时，在利里拜乌姆城附近，奴隶阿铁尼奥也组织了 10000 人的起义军队，其中多数是作战能力很强的奴隶。阿铁尼奥还注意建设后备力量，他安排其余的奴隶夺取奴隶主的农场，维持农场里的秩序，并要求他们像爱护自己财产一样爱护农场。由他们供给起义者粮食、牲畜和马匹。在特里奥卡拉城，两支起义军队汇合到了一起。阿铁尼奥任总司令官，拥护特里丰为王。起义者的团结使心怀叵测的奴隶主大失所望。起义队伍声势浩大，贫苦的自由民也参加了奴隶的队伍。

罗马派行政长官路克优斯来镇压这次起义，他率领 1.

7 万名士兵围攻起义奴隶所在的特里奥卡拉城。起义奴隶早在该城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路克优斯被击溃，被召回罗马。他的后任行政长官塞尔维里乌斯也同样以失败告终。公元前 101 年，罗马派执政官阿克维里乌斯去镇压奴隶。这时起义军的领袖特里丰已经牺牲，阿铁尼奥继承了他的事业。起义军和罗马军队在墨萨那城下展开会战。会战中，阿铁尼奥军被击溃，余部被迫投降。罗马人谎称将释放他们，但是出尔反尔，把他们送到罗马角斗场，他们因不愿供罗马人取乐而集体自杀。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便这样结束了。同时，在希腊和黑海北岸等地也都发生了奴隶起义。围绕着分配土地和降低粮食价格，罗马平民又一次展开如火如荼的斗争。与以前不同的是，一支新生力量——打算以服兵役换取份地的马留的士兵也参加了这次斗争。

为维护自己军队的地位与成就，在与元老院的斗争中，马留与平民的领袖——撒图尔尼乌斯和格劳提乌斯结成联盟。公元前 100 年，马留第六次任执政官，撒图尔尼乌斯任保民官，格劳提乌斯任行政长官。撒图尔尼乌斯打算实行土地法与粮食法，把土地分给贫农和马留的士兵，对最贫困的城市平民进一步降低粮食价格。但是，意大利境内可供分配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民众对土地的需求。因此撒图尔尼乌斯建议将阿非利加、高卢、亚该亚和马其顿各行省的土地也作为份地，把土地分成一百犹格路姆一块，交给平民私有，不

收他们的赋税。但是，撒图尔尼乌斯的法案不但触犯了抵制马留势力的新贵阶级的利益，而且对骑士们也形成了威胁，因为骑士在各行省拥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因为国有土地的很多收入可以帮助城市平民能够买到廉价的粮食，把土地分给农村平民和马留军队里占主要数量的意大利人，则会影响罗马市民，因此罗马大部分居民也反对撒图尔尼乌斯的法案。尽管有如此多的反对意见，《撒图尔尼乌斯法案》因赢得来到罗马的大批农民和马留的士兵们的欢迎而取得胜利。人民大会不但通过这项法案，还吸取了格拉古改革的教训，补充了很重要的一条：要求元老们宣誓，决不反对实施所通过的法律。元老们不敢不服从人民大会通过的法律，在罗马史上第一次被迫宣誓忠实执行大会的决议。

当撒图尔尼乌斯竞选公元前 99 年的保民官时，所有敌对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他。马留被授权担任镇压这两个同盟者的任务。马留为了不和支持他的骑士断绝关系，背叛了他从前的支持者和盟友。他集结兵力，包围了撒图尔尼乌斯一派坚守的卡庇托里乌姆山。撒图尔尼乌斯被迫率部投降，但依然遭到了全部被杀的命运。撒图尔尼乌斯的法律被废止，马留也离开了罗马，隐退到亚细亚。

2. 同盟战争

土地问题还引发了罗马与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矛盾。在

撒图尔尼乌斯运动被镇压后，土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罗马跟意大利同盟者的关系呈现复杂化。罗马统治者打算把意大利剩余国有土地分给罗马贫苦公民，遭到意大利人的反对。

公元前 91 年，保民官李维优斯·杜路苏斯（其父曾是格拉古的对头）试图复兴以新贵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共和国，粉碎骑士队伍，并保证贵族派得到罗马平民的支持。他主张：（1）在元老院中补充 300 名最富裕的骑士，但是把法庭从骑士手中收回，交给元老，这也就是取消盖乌斯·格拉古当年实行的法律。（2）把意大利的国有土地尽量分给贫民。（3）实施粮食法，即再度降低城市平民购买粮食的价格。（4）给予意大利人以公民权，从而增加许多罗马公民。

杜路苏斯把这些提议合并成一个法案提交给人民大会，他认为这些提议符合各个阶层的利益，在人民大会上可以多数通过。但是，他没有料到他的法案遭到来自骑士和元老两方的激烈反对，而且元老们又拉拢了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的大地主。杜路苏斯只赢得了意大利农民阶级的支持。杜路苏斯遭到元老院的反对之后，与当年提贝里乌斯·格拉古一样，与贵族阶级断绝了关系，并与他们进行斗争。杜路苏斯的政敌采取毒辣的手段，在元老院否决人民大会所通过的法案不久，就把杜路苏斯刺杀了。

杜路苏斯的死使意大利同盟者放弃了依据合法斗争维护权益的幻想，他们忍无可忍，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同盟战

争”起义。

通过同盟战争，意大利人逐渐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在这次战争中，意大利奴隶主和罗马奴隶主彻底结合为一个统治阶级。另一方面，罗马的霸权进一步得到认可与巩固。意大利同盟者所获得的权利事实上仍是不平等的：新的罗马公民只能另外组成 8 个特里布斯（根据另一史料，为 10 个特里布斯）。因此，在人民大会进行投票时，他们比起旧公民来，永远只占少数。这又造成了意大利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新的冲突。

战争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使首都的形势十分困难。罗马元老院不得不作出让步。公元前 90 年末，通过执政官优里乌斯·凯撒的法律，凡效忠罗马的意大利人都可以成为罗马公民。公元前 88 年初，保民官普劳提乌斯和帕披里乌斯施行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授予凡在 60 天以内放下武器的意大利起义者以罗马公民权。这项法律分裂了同盟者的队伍。埃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部落都开始脱离意大利联盟。路卡尼亚人和萨姆尼乌姆人的残余力量被击溃了。罗马人虽然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满足起义者所提出的一些要求。

3. 苏拉派和马留派的斗争

公元前 1 世纪 80 年代，罗马的政治斗争特别尖锐。骑

士、新公民、城市平民和马留的老兵，结成一个松散的反对元老院寡头政治的联盟。这个同盟的形成以保民官苏尔皮克优斯·卢福斯和马留的协定为基础。马留是三级骑士，曾被推举为讨伐本都国王密司立对提的总司令官。苏尔皮克优斯·卢福斯提议把新公民（意大利人和被释奴隶）一律公配到 35 个特布斯里去，以赢得人民大会。卢福斯粉碎了贵族派的种种阴谋，他依靠马留的老兵（他们希望获得丰富战利品）通过了自己的提议，并且否决了元老院对苏拉指挥对密司立对提战争的授权。

此时苏拉已经出发，他在军队驻地诸拉城接到了调令。苏拉没有服从人民大会的决议而轻易交出兵权，他召集不愿放弃战利品的士兵，怂恿并率领他们进军罗马，这样的反击在罗马历史上还不曾有过。马留逃往非洲，他和他的支持者被宣布为“罗马人民的公敌”，财产全部充公。他的法律也随之宣告无效。在公元前 88 年选举执政官时期，广大居民阶层对苏拉持反对的立场。因此不管苏拉如何竞争，他的政敌秦纳还是当选为执政官之一。苏拉不得不离开罗马政界，率罗马军队东进。公元前 87 年，苏拉继续出发东征。苏拉出发以后，秦纳领导的反苏拉集团马上展开了斗争。他们允许意大利人权利平等，并在坎佩尼亚开始建立由意大利人编成的武装部队。退隐在阿非利加的马留，听说秦纳成功，便返回意大利，参加了秦纳的运动。马留在伊达拉里亚集结了

6000 人的军队，攻陷罗马城。流血冲突进行了五昼夜，大批苏拉党人被杀，其中包括另一执政官屋大维。苏拉被宣布为“公敌”，财产予以没收。公元前 86 年，马留第七次任执政官，成了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元老院从苏拉的拥护者中间补充了 300 名成员，并取得预先核定法案的权利，从此，任何法案只有经过元老院批准，才得提到人民大会。人民大会也不再按特里布斯投票，而要按百人团投票，这就使最富裕的公民占有不同地优势。保民官的权力也因此受到严格限制，退化为个人辩护者。

马留重新执政之后，恢复了苏尔皮克优斯·卢福斯的法律，并开始残酷地迫害政敌，宣布政敌不受法律保护。马留的高压政策使曾与罗马贵族有某种关系的市民们感到既不满又恐慌。不久因其部下野蛮屠杀奴隶一事，使其政权失掉了奴隶的支持。这些事件发生不久，马留死了，接着秦纳也被哗变的士兵杀死。

4. 本都王国的崛起

当罗马集中兵力镇压西西里第二次奴隶起义，后来又与意大利同盟者进行斗争时，东方的本都王国迅速崛起，并成为罗马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上的新的威胁。本都王国在密司立对提六世·优帕托尔在位期间（公元前 111 ~ 前 63 年）强盛起来。

密司立对提在位初期，本都王国在黑海北岸的国家中确立了地位，他跟奥尔比亚和赫尔松涅斯结为同盟，获得统治博斯普鲁的王权。他又跟黑海北部的许多部落缔结同盟，使自己的国家大大富强起来。

除比提尼亚王国之外，密司立对提成了黑海一带所有部落和民族的统治者或同盟者。他还与阿尔明尼亚王和安息王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两个国王一直在寻找机会消灭罗马在小亚细亚的统治。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密司立对提于公元前 105 年与比提尼亚王尼科美德斯二世结为同盟，侵占了介于两国之间的帕法拉戈尼亚和加拉太。不过，由于尼科美德斯二世企图独吞帕法拉戈尼亚，引起密司立对提的不满，两国发生冲突，同盟瓦解。在公元前 90 年代末，密司立对提又跟埃及和叙利亚进行谈判。密司立对提甚至不惜利用在爱琴海的海盗力量。

面对本都王国在亚细亚对罗马构成的威胁，罗马元老院强迫两国把他们侵占的小亚细亚地区让出来。之后，罗马人宣布帕法拉戈尼亚自由，并将阿里奥巴赞立为傀儡国王。密司立对提与阿尔明尼亚王提格拉涅斯密商进攻帕法拉戈尼亚。公元前 93 年，提格拉涅斯侵入帕法拉戈尼亚，赶跑阿里奥巴赞。密司立对提则在一旁密切观望事态的发展。

公元前 89 年，密司立对提趁罗马与意大利同盟作战之时，派兵进占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当地居民苦于罗马人的压

榨，将本都王看作是他们的“救星”。爱琴海及希腊的一些地区也纷纷响应。密司立对提宣布取消债务、释放奴隶和分配土地，赢得了当地多数人的支持。在军事上，他态度强硬。他下令屠杀罗马官吏、商人高利贷者以及普通意大利移民，据说达 8 万之多，密司立对提还宣称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市可获独立。

密司立对提不仅帮助地方人民对罗马人报仇雪恨，而且基本上消灭了在每个城市与他为敌的罗马公民，从而巩固了他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地位。

到公元前 88 年夏，密司立对提统治了整个小亚细亚、希腊和黑海沿岸，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确立了统治地位。不过，密司立对提的政权有不少隐患，并不能真正与罗马相抗衡。首先，本都王国的军队成分复杂，在战斗能力上与罗马的职业军队相比逊色得多。本都王国的内部情况也极复杂，本都取代了罗马在亚细亚的统治后，居民所受的压迫和灾难并没有减轻。各族人民大失所望，日久天长，他们的不满情绪越发增强了。

公元前 87 年，苏拉率军在希腊登陆。密司立对提的军队对罗马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多以失败告终。公元前 86 年，苏拉占领了拜里厄司和雅典。同年秋，苏拉又在比奥细亚的俄尔荷门附近，歼灭了密司立对提的 8 万大军。

失败使密司立对提不得不开始与苏拉媾和。罗马军队的

到来及本都的几次失败，使本都王国内部的各种矛盾组合发生了变化。亲罗马分子积极活动，小亚细亚的许多城市公开地叛离本都国王。

密司立对提为了缓和局势，宣布给予希腊各城市自由。同时，密司立对提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革：豁免欠债，平分土地，给外邦人公民权，释放大批奴隶。但是，这些措施引起了各城市的上层居民对密司立对提的反感，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密司立对提不得不接受苏拉提出的媾和条件。公元前 85 年，双方签订了《达尔丹诺斯和约》。依据这个条约，密司立对提退出他在小亚细亚占领的一切地区，支付 2000 塔兰同赔款，将舰队交给苏拉。

四、赛尔托里乌斯战争和斯巴达克起义

1. 赛尔托里乌斯战争

正在这时，罗马发生了马留派反击苏拉派的争斗。苏拉来不及彻底结束与密司立对提的战争，便迅速班师。苏拉率领 4 万大军在布戎狄西翁登陆，拥护他的人开始聚集到这里来。双方开始了战斗，意大利变成血流成河的战场。最后，苏拉得胜，进入罗马，对城内的异己分子开始了新一轮的屠杀。

苏拉宣布将处死 40 个元老院议员和 2600 个商人。为了

捉拿这些死刑犯，他承诺活捉或击毙一个死刑可获得 1.2 万个银币。

苏拉还颁布《可尼连法》，以建立一个稳固的贵族政体。他将大量的亲信安插到议会中，并再次下令行政措施除非经过元老院的同意，不得呈给议会。为了防止穷苦的意大利人涌向罗马，他停止分配谷类给贫民。为了防止连任，法令规定执政期满后，10 年后才可竞选连任。法令限制保民官的否决权，并规定做过保民官的人不得再任高职。苏拉不准商界人士加入陪审团，规定高等法院陪审团的特权只限于元老院。税收由承包改为直接向国库缴纳。苏拉加强了对法庭的控制，不仅增加了法庭的数目和时效，而且具体规定了各法庭的职责和权利范围。在格拉古兄弟革命以前，元老院所享有的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特权，仍继续享有。因为苏拉知道：只有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才能有效地统治罗马帝国。为了补充元老院的名额，他允许部族议会增加 300 个名额到元老院中去。苏拉又以解散军团和命令意大利不准有军队存在，来显示他全面革新的信心。从公元前 82 年末到前 79 年，是苏拉任独裁官的两年。

公元前 78 年，苏拉去世，他的政敌又开始展开斗争。苏拉以前的拥护者——公元前 78 年的执政官列底都斯，首先出来反对苏拉所实行的各种制度。列底都斯提出恢复粮食法和保民官权利等口号，招募一切心怀不满的人，并把他们

武装起来。

在两军会战时，列庇都斯被击溃，逃至撒丁乌，死在那里。后来，苏拉派和反苏拉派在西班牙又展开斗争。在那里，行省居民第一次被卷入罗马内部的派别斗争。

在西班牙，马留派曾在苏拉去世时在这里成立政府，建立以克温图斯·赛尔托里乌斯为首的军队。列庇都斯死亡以后，他的残部都逃到这里。

西班牙各部落由于罗马征兵、驻兵、租税，以及高官显宦和金银矿承租人的专横暴虐，已经苦不堪言。西班牙的东南部盛产粮食、葡萄、鱼类、羊毛和亚麻的地区，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越来越发达，氏族显贵也来此经营，从他们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竭力扩大自己权利的地方奴隶主阶级。反罗马人的时机在此时已经完全成熟。

赛尔托里乌斯在这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路西塔尼亚人和住在厄布罗河以北的伊比利亚人和克勒特伊比利亚人都归附他，再加上逃到这里来的马留派，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赛尔托里乌斯是个卓越的战略家、军事家。罗马派来对付他的军队屡战屡败。但是，赛尔托里乌斯在西班牙活动 8 年（公元前 80 ~ 前 72 年）之后，拥护他的集团之间发生了矛盾，而且愈发尖锐化起来。一部分罗马人因赛尔托里乌斯善意对待“蛮族”而感到受辱。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借机刺杀

了赛尔托里乌斯。赛尔托里乌斯的势力在西班牙逐渐衰退，被罗马派来征讨的统帅庞培轻而易举地击溃了。

2. 斯巴达克起义

斯巴达克是古代历史上一个英雄的名字。他领导的奴隶大军两年间驰骋于意大利，使空前强大的罗马帝国，遭到了一次严重的“震撼和打击”。

斯巴达克是色雷斯人，他在一次反抗罗马的战争中被俘。因他体魄强健、勇武过人，被送入加普亚角斗士训练所，充当一名剑斗奴隶，承受着非人的折磨。惨酷的处境激励了斯巴达克的斗志，斯巴达克曾向同伴们号召：与其在角斗场里供奴隶主取乐而丧命，不如在战场上为争取自由而死，角斗士奴隶们随时准备摆脱悲惨命运。公元前 73 年春夏之间，奴隶们密谋起事，不料事情泄露，有七十多人在斯巴达克率领下逃上附近的维苏威山（火山尚未爆发）。起义者推举斯巴达克为领袖，以克里克苏和恩诺玛伊为辅弼，将自己武装起来，一些逃亡奴隶和贫苦农民也投奔到这里来。起义最初并没有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注意，因为罗马把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对赛尔托里乌斯和密司立对提的战争上了，在意大利，奴隶逃亡乃是常事。直到起义军战胜了当地前来镇压的军队，罗马才派来一支由司令官带领的 3000 人的队伍，企图围歼起义者。勇敢机智的奴隶们用山间的野葡萄藤编成

一道“长梯”，从陡峭的悬崖攀援而下，绕到敌后，出其不意地猛袭罗马军队，击溃了罗马派来的军队，并获得大批武器装备。起义者声威大振，队伍迅速壮大，这才引起了罗马奴隶主的恐惧。

随着起义队伍的壮大，起义者内部在作战方略上发生了分歧。斯巴达克主张向北意大利进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色雷斯，而克里克苏不同意，好多参加起义的破产农民也不愿意离开意大利乡土。结果克里克苏率领 3 万人的队伍脱离了起义军主力。公元前 72 年，在阿普里亚境内的加尔干诺山附近，克里克苏的队伍被罗马执政官打败，克里克苏本人阵亡。斯巴达克的队伍已达 12 万人。他继续向北挺进，在皮塞努姆境内再次击溃两个执政官的军队。起义军直达距波河不远的莫德纳。可是起义者并没有翻越阿尔卑斯山，而是转过头来向南进发。元老院任命大财阀克拉苏为司令官，给予他相当于独裁官的权力连两个执政官的军队都归他指挥。克拉苏恢复了古老的《十一抽杀律》，强迫一些败兵与起义军作战。斯巴达克南征北战，或许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罗马人还是有力量的），所以没有直捣罗马城，而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半岛南端的布鲁提伊城。斯巴达克和他的起义队伍曾尝试从这里渡海到西西里岛。然而因为海盗的背信弃义，起义队伍没有获得必要的船只，渡海计划无法实现。正在这时，克拉苏的军队已经围了上来，因为忌惮起义军的战斗

力，克拉苏没有轻率地发起进攻，妄图把起义者困死在这个孤立无援的小岛上。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斯巴达克率领奴隶军冲破了克拉苏防线，欲突然袭击萨莫奈地区。这时义军连续艰苦作战，已经有些疲惫。而一部分人因意见不和，又分裂了出去。分裂出去的队伍很快便被克拉苏消灭了。斯巴达克带着剩余的队伍经过卢卡尼亚向卡拉布里亚沿海的布伦迪辛港进发，准备从那里渡海去希腊。不料在这里义军遇到了一支卢库鲁率领的刚刚登陆的罗马军队。而克拉苏那里又得到了罗马统治者派来的庞培的增援。斯巴达克毫不畏惧，率领他的队伍英勇奋战，与敌人巧妙周旋。公元前 71 年春，在阿普里亚一战中，奴隶军英勇战斗，前赴后继，使罗马人付出了很大代价。斯巴达克被敌人的长矛刺中了大腿，但他毫不退缩，持盾牌奋勇还击敌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起义失败了。

五、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到公元前 1 世纪中叶，罗马还保持着殖民强国的地位。罗马在国外的殖民地，是意大利本土面积的 5 倍。罗马省和本属国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

1. 前三头同盟

① 庞培的兴起及第三次密司立对提战争

苏拉倒台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苏拉的部将格涅乌斯·庞

培。他的政治影响和势力是在镇压反苏拉运动的过程中日益增强的。

苏拉的死激发了社会上长久积累的不满情绪。公元前 78 年，执政官雷必达提出恢复保民官的权力以及粮食法，但没有成功。雷必达借伊达拉里瓦地区要求从苏拉老兵那里收回土地的暴动，向罗马挑战，结果被庞培的军队打败。在意大利境外，各省人民也展开了反对苏拉残余势力的斗争。其中以塞多留在西班牙领导的运动最为突出。塞多留也是马留运动的支持者，曾任西班牙总督。苏拉当权时他逃亡非洲，这时他又返回西班牙。塞多留凭借他在西班牙的社会影响，在当地组织了军队，建立了元老院等政权机构，并为到此的罗马人提供了避难所。塞多留的力量逐渐强大，引起了罗马的警觉。罗马派庞培率军征讨而遭到失败，庞培险些被俘。塞多留势力的发展与壮大，是和西班牙人民对罗马的憎恨与反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元前 72 年，塞多留被叛徒刺死后，庞培才乘机把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在镇压反苏拉运动的同时，庞培的势力在帮助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过程中更加壮大了。

然而反苏拉制度的势力也一直在扩展。公元前 70 年左右，罗马出现了恢复共和制的局势。以西塞罗为首的共和派势力占据上风，他们从元老院中清除大批苏拉分子，恢复了人民大会和保民党的权力，按时选举高级长官。庞培见形势

对苏拉派越来越不利，为了收买民心，他自称是反苏者。

在庞培建立自己的军政地位的过程中，两次为罗马而战的军事行动起了关键的作用。一次是应罗马平民的需求而采取的清剿海盗的行动。公元前 67 年，罗马又发生粮荒，社会上再次掀起了驱逐海盗的呼声。经保民官伽比尼乌斯提议，公民大会授予庞培 3 年非常权力来消灭海盗。庞培率重兵分而剿之，3 个月使必要的海上交通畅通无阻，半年后完全肃清了海盗。而在这之后不久，本都王国遭到罗马军队的报复。罗马派库鲁斯率军入侵，占领了王国的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在这次入侵中密司立对提的军队几乎被完全摧垮。

很快，本都王国全部地区都遭到了罗马军队的蹂躏。罗马并未善罢甘休，竟然收买了密司立对提的儿子博斯普鲁领主玛卡列斯，共同攻打阿尔明尼亚。战争在公元前 69 至前 68 年间进行。密司立对提指挥在阿尔明尼区招募的军队，与提格拉涅斯奋起反击入侵者。战争中，密司立对提率领的 8000 军队迂回潜返王国境内，很快击败了留在本都的罗马军。

但是，局势依然对本都不利。在王国内部，由于罗马军队的入侵与践踏，原先富饶的土地变得一片荒芜。而连年的战争对王国的人力、财力损耗很严重。博斯普鲁叛离之后，本都王国的领地大为减少。在国外，由于罗马人占领了阿米索斯、西诺帕和赫拉克利亚等地，里海的控制权落到罗马舰

队手里。本都王国失去了在里海地区的影响，由里海地区其它部落运往本都的货物、粮食、军队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另外，地中海地区海盗被罗马消灭，密司立对提失去了海盗的支持。

② 庞培在东方的统治

此时，庞培的势力发展得相当迅速，在对密司立对提战争时，公元前 66 年，保民官玛尼里乌斯建议授予他无限权力。虽然元老院害怕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无法控制的恶果，但平民和骑士的联合支持还是迫使大会通过了法案。

公元前 66 年春，格涅乌斯·庞培率领 6 万大军进入本都王国。而密司立对提只征得 33000 名士兵，而且他的军队缺乏足够的粮食。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阿尔明尼亚达斯提尔村附近的交锋中，本都军队全军覆没，密司立对提只身而逃。

庞培占领了本都，在打败了密司立对提和提格拉涅斯之后，他又向叙利亚进发，于公元前 63 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于是，罗马共和国又新增加了本都和比提尼亚行省以及叙利亚行省。

在这些行省中，庞培的权力无所不至。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旨任意分配土地。他还可以决定各地统治者的任命，通过强权解决各国王位的争端，而把自己信赖的人安置于帕法拉戈尼亚、亚加拉太、卡帕多客亚和犹太的王位上，从而为

自己培植起在行省的政治势力，并从他们身上捞取丰厚的财富。对于那些经济并不发达、原始公社制度还有相当残余的地区，庞培用新任国王来推行罗马的统治政策。对于受希腊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庞培则致力于扶持一个傀儡负责城市的发展，使这些城市成为罗马统治的依附国。

在国外，庞培在争取当地权贵者支持的同时，也试图缓和与骑士的矛盾。为了取悦骑士，庞培废除了对他们税收的限制。但是他又同意当地官僚把税包给当地富豪。罗马人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他们从亚细亚地区掳掠来大批奴隶，以致于一个女奴隶的平均价格由 500 迪纳里降到 4 迪纳里。庞培取得胜利以后，罗马国库的收入从 1500 万迪纳里增加到 8500 万迪纳里。

对此，骑士们对罗马今后的政局深感担忧，他们不愿意看到极端强大的庞培与贵族结合在一起。为了平衡力量对此，以骑士为主的庞培的政治反对派也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们积极提议并努力促成出兵埃及的计划，主动要求组织这次出征，并决定由相同利益的克拉苏率领这支军队。当时，凯撒是公认的平民派领袖，他是庞培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之一。公元前 65 年，凯撒当选为罗马市政官，为了取悦民众，他在罗马大量兴办供权贵消遣的竞技场和娱乐活动。公元前 63 年，凯撒又以绝对多数票数当选大司祭。

元老院已经敏锐地嗅出了罗马内部的火药味，他们清楚地知道，出征埃及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罗马内政中的矛盾。元老院试图阻止此次出征。庞培的即将返回，使罗马政治空气更加紧张。

元老院无法判断庞培真实的政治立场与态度，他们需要树立一个贵族派领袖来领导这场即将来临的政治风云。他们曾寄希望于已免职的路库鲁斯复出。这时，一个名叫西塞罗的执政官出现在贵族派的阵营里，他是马留的同乡，出身并不高贵，以前曾是平民派的支持者。

公元前 64 年，西塞罗竞选执政官。他的主要对手是苏拉的信徒——一个破落贵族卡提里那。这时，西塞罗的政治思想逐步形成。他的政治纲领的核心是“阶层调和”。这种政治思想实质上是企图消除不同阶层之间的利害冲突，促使各阶层联合起来。

③前三头同盟形成

虽然竞选的结果是西塞罗当选执政官，但他所提倡的“阶级调和”理论是不现实的，在当时根本无法得到实现。罗马的土地争夺问题，以及大量的负债问题使矛盾越来越尖锐，罗马人民的生活不断恶化。

公元前 64 年，保民官塞尔维里乌斯·儒路斯提出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他的基本主张是由国家从私人手里买得土地分配给贫穷的公民，进行买卖的资金和土地主要来自于被占

领的行省，包括名种税款、战利品等。甚至将坎佩尼亚国的国有土地也作了分配。儒路斯还主张保护罗马土地私有者的权益，认为苏拉所宣告的公敌的土地，既已归某人所有，就应成为占有者的合法财产。按照当时罗马法案规定，这项改革应由一个享有广泛权力的十人委员会来执行。因组成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住在罗马，庞培此时还在东方行省，因此不能入选委员会。委员会事实上由克拉苏和凯撒两派控制。

卡提里那提出彻底取消债务，为此他竭尽全力。他取得了流氓无产者的拥护与支持，包括破落贫穷的元老、负债累累的贵族子弟、日益穷困的退伍军人等。卡提里那一面免除税务，一面准备秘密政变，武装夺取政权。公元前 65 年，计划流产。公元前 64 年，卡提里那与西塞罗之间为竞选执政官而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由于势力薄弱，无法与有上流阶层支持的西塞罗抗衡，卡提里那落选。

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卡提里那集团的楞图鲁斯和凯铁古斯继续领导他们的拥护者准备起事。但是，他们的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楞图鲁斯写给阿洛勃罗格人计划起义的秘函被截获，楞图鲁斯、凯铁古斯和其他阴谋者被西塞罗和元老院送上了断头台。在埃特鲁里亚，卡提里那也重新征募军队发动了对罗马军队的战争。双方在波斯托里亚城附近展开一场残酷战斗，卡提里那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阵亡。随后，与罗马卡提里那集团联盟的阿洛勃罗格人的运动也被镇压下

去。平民派的斗争失败了，西塞罗赢得了罗马人的热情赞誉。

共和国末期，军人政治的形势正在形成。

公元前 62 年，庞培胜利返回罗马。人们把鲜花、美誉与崇敬献给他。一时间，庞培势力倾城。在罗马，庞培必须妥善安置他的军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仍然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向元老院提出一些有关措施如分给士兵土地等。但庞培势力的扩张令罗马其它政治势力深为惊恐，他们想方设法来削弱庞培的力量。克拉苏即是其中之一。这时凯撒也从西班牙回到罗马，他希望能在平民中建立他的政治基础。由于三人力量相当，分别又面临着士兵、骑士和平民问题，为了避免这些人联合起来行动，在凯撒的斡旋下，庞培、克拉苏暂弃前嫌，三人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而联合起来。

凯撒出身贵族，他是马留的内侄，因为在权力与财力上无法与庞培和克拉苏抗衡，他更侧重于换取民心，凯撒把平民作为他主要联合的力量，与平民阶层往来密切，并在平民中建立了声望。公元前 62 年，凯撒任大法官。公元前 61 年，他又出任西班牙总督，并得到克拉苏的资助。公元前 60 年，凯撒返回罗马。这一年，他和庞培、克拉苏结成秘密同盟，即所谓“前三头同盟”。

④凯撒征服高卢

公元前 58 年春，凯撒正式接受高卢总督职位。他到高

卢时，高卢各部落之间几乎不断发生斗争。早在公元前 71 年，斯威维人的领袖阿里奥维斯图斯趁高卢某部落乞求他入境平乱之机，占领了高卢地区的一些部落。公元前 61 年，高卢地区的埃督伊人请求罗马派兵驱逐斯威维人的军队。罗马一面派 12 万军队进入高卢地区，一面却与阿里奥维斯图斯勾结起来。阿里奥维斯图斯再无顾虑，更坚定了他征服高卢的决心。从公元前 1 世纪起，居住在美国河与莱茵河上游地带的克勒特部落海尔维第人，不断地经过高卢地区迁移到法国西南部。庞大的迁徙队伍引起罗马统治者的不安。凯撒奉命保护高卢的安宁。

凯撒向阿里奥维斯图斯摆出联合的姿态，但阿里奥维斯图斯并不买账。于是凯撒同时向斯威维人和海尔维第人宣战。凯撒获得胜利，他同意了海尔维第人退居瑞士故土，但同时也把他们纳入到罗马的统治中来。公元前 58 年，凯撒的军队在莱茵河附近几乎将斯威维人的部队全部歼灭。阿里奥维斯图斯在不久后死亡。

在凯撒任职高卢期间，罗马政治派系的斗争也在不断地深化。凯撒的代理人克洛狄乌斯在平民的支持下通过几项法律，法律规定：罗马 32 万公民可以无偿获得粮食，恢复曾被西塞罗解散的公会，放逐西塞罗军队等。克洛狄乌斯还从城市居民的下层群众和奴隶中建立了武装。而贵族派则依靠收买角斗士和手工业者组成军队，与克洛狄乌斯武力相对。

很显然，这些武装都缺乏明确的目的和稳定的立场。对于平民派而言，他们所依靠的平民已经丧失了在国家政权中的独立地位，没有什么政治权力。而自由贫民和奴隶的参加，只是因憎恨不公平的统治而已，他们不可能提出更革命的主张。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斗争使罗马陷入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公元前 56 年，三头同盟领导人在路卡会晤，根据他们的协定，下一年度的执政官由克拉苏和庞培担任。并对其他的权力与势力重新进行了分配。庞培获得了西班牙和阿非利加行省的治理权，克拉苏则可以把战争扩展到安息，凯撒在高卢的任期又延长了五年。

⑤前三头同盟的瓦解

公元前 53 年，克拉苏在对安息人的征战中阵亡。第二年，凯撒在罗马的代理人克洛狄乌斯也在一次武装冲突中被杀死。这次冲突引发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奴隶和平民一起战斗，他们破坏贵族的房屋，砸毁他们的财物。贵族派不得不在罗马政治势力中寻找其他援助。以西塞罗为代表的贵族选择了与凯撒面同心异的庞培作为同盟，于是庞培被立为执政官。执政官只有一个人，这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庞培率领军队进入罗马，开始镇压凯撒派，罗马开始进入独裁政治。

这时，在高卢地区又爆发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阿尔维

恩人部落的人民派领袖维尔琴盖托里克斯。这次起义吸引了广大的不满罗马统治的人们，他们参加到反抗入侵者的洪流中来，决心将他们赶出高卢。起义军声势浩大，屡屡进攻，凯撒在格尔哥维亚附近遭到惨败，形势对义军很有利。但是，起义队伍中因意见不统一而发生内讧，致使起义力量受到削弱。罗马军队趁机反扑。凯撒的军队把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围困在阿列吉亚城，并阻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维尔琴盖托里克斯最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被押往罗马，判处了死刑。凯撒对高卢地区的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乎把高卢的反抗者捕杀殆尽。高卢地区的斗争陷入低谷。同时，凯撒又加强了对高卢上层社会的拉拢。他授予拥护者罗马公民权，赐给他们大片领地，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行政职务，高卢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凯撒对高卢的征服，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能力，在高卢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军团及各种辅助军队。另一方面，对高卢的征服大大扩大了罗马国家的版图。罗马奴隶制扩展到了高卢的各个地区，来自东方、高卢和不列颠的数以万计的奴隶，为罗马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力量。

2. 凯撒独裁

① 庞培与凯撒的权力之争

在罗马，庞培也加强了独裁的脚步。他借口凯撒没有解

散军队而禁止他竞选执政官，庞培和凯撒的矛盾日益公开化，战争的阴霾越来越近。凯撒奠定了他在高卢的统治地位后，开始问鼎罗马政治。他准备竞选公元前 49 年的执政官，向庞培和贵族派提出挑战。凯撒取得了保民官库里奥和安托尼乌斯的拥护与支持。当这两位保民官因与元老院意见龃龉而被逐出元老院后，凯撒借口人民代表受到侵犯而积极备战。凯撒渡过高卢和意大利的界河——卢比康河，挥师罗马。内战终于爆发了。凯撒很快占领了阿里米努姆城，威势大振。

战争中，庞培的军队节节败退。他常常无法及时征到新兵来补充兵力，而新兵在战斗中不是潜逃，就是倒戈。凯撒的势力长驱直入。庞培被迫退到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待纠集兵力，重振旗鼓。凯撒占据了意大利，宣布废除苏拉所推行的恐怖政策，不再树立“人民公敌”和对其进行折磨。凯撒宣称要实行仁慈的政策。这种政治态度赢得了土地所有者、富豪等权贵的好感。

争夺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凯撒乘胜追击，又与庞培展开了对各行省的争夺。在各行省中，高卢、伊利里克、达尔马提亚、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的许多城市都是凯撒的拥护者。他们对罗马的寡头政治十分反感。庞培与行省及各属国的国王和权贵的结盟取得了成效。东方色雷斯国王派辅助军队协助庞培。努米底亚国王优巴也同庞培缔结了盟约，而成为罗

马的朋友与同盟者。达尔马提亚和伊利里克的部落首领们，因为反对给予下层社会更多的利益与权利，而与庞培派亲近起来。此外，克勒特伊比利亚人中的贵族以及大城市中的富豪，也都将庞培视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者而予以支持。

而在庞培控制的东方各行省中，也有凯撒的拥护者，庞培派和凯撒派之间的斗争在各行省的城市里也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庞培派一方面残酷地镇压各行省中的异己势力，一方面积极笼络各属国的显贵。庞培的恐怖手段给他带来十分严重的影响，他从当地征募来的军队因不满庞培的倒行逆施而脱离他，有的则投奔了凯撒。

凯撒首先在西方行省中开始了行动。在西班牙驻扎的庞培的 7 个军团，全部被凯撒歼灭。肃清了庞培在这里的军事力量后，凯撒在政治上也进行了重新布置。他扶持了一批仇视当地贵族的部落与城市，撤消了庞培在这里派给居民的军税，归还被庞培派没收的土地，给予加底斯居民罗马公民权等等。以此确立了他在西班牙的统治。凯撒放心大胆地去打击庞培在东方的势力。

从军事力量上讲，庞培的势力也在逐渐扩张，他拥有 9 个军团以及东方各行省和王国派来的增援部队。但是庞培在政治上却是失败的。他加派给各省居民的军税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支持他的贵族派又趁机提高高利贷；而他的军队则四处抢劫。庞培大大伤害了行省与属国人民的感情，他们企

盼庞培能得到惩罚。因此，当凯撒在伊庇鲁斯登陆时，伊庇鲁斯、马其顿、挨陀利亚、帕撒利亚等许多城市的公民都去欢迎他。双方在第拉希城附近第一次交锋，结果凯撒战败。但庞培竟然没有趁机追击，使他失去一次难得的致胜的机会。这时，庞培军队的问题接连不断，士兵逃亡现象屡禁不止。公元前 48 年，在帕撒利亚城市法塞拉斯附近的一场决战性的战争中，庞培最为依赖的骑兵临阵逃散，使庞培的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军事上的失败使得原先支持庞培的贵族也对他失去了信心，许多人渐渐叛离庞培，而与凯撒相好。

庞培率军退到埃及，希望在这里建立据点，积蓄力量。但凯撒的威名与铁蹄震撼了整个埃及，为了使埃及不卷入罗马政敌之间的战争，埃及上层杀死了庞培。凯撒进入埃及后，废除了当时尚且年幼的国王托勒密二世，立托勒密的妹妹克里奥帕特拉为埃及国王。凯撒又从埃及进军小亚细亚，击败了胁迫父亲密司立对提而取得王位的法尔那克。在亚细亚各省，凯撒减免赋税，并在政治上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② 凯撒改革

在孟达城附近一战以后，凯撒掌握了国家的大权。凯撒所面临的意大利，是一个貌似繁荣，实际上混乱不堪的社会。断断续续地进行了 100 年左右的战争，以及罗马元老政治的腐败，使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资金的盲目使用使全国资本运转不畅，土地管理与使用漏洞百

出。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或者在军队中被供养，或者沦为无产者而成为依附权贵的门客。在政治上，不满与反对凯撒的贵族处处与他敌对，并阴谋政变。

面对如此局面，凯撒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维护战争的胜利成果，改革首先在政权领域进行。在政治上，凯撒坚持了独裁者的绝对权威。公元前 44 年，他集政治、财政、法律等大权于一身。既控制着国库，又可以制定法律；既是人民的最高代表，又享有监督元老院的权利。虽然议会还有一些自主权，但议会基本上由凯撒的人把持着。所以凯撒同时具有执政官、保民官和都察官职务的权限。

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元老院已不再是罗马最高的权力机构。它的议席新增了 300 个，会员的身份也十分广泛，包括商人、市民、军人，甚至包括奴隶，这样元老院便成为集中民意的场所，元老院的地位相当于一个顾问机构。

凯撒把专制的触角伸到行政部門的各种关键权力上去，他把他的朋友临时安排到一些要害职位上去。市行政官只有一半由议会选举，而另一半全由凯撒来推荐。他可以否决其他保民官和执政官的决定。他任意增加副职，据说是为了提高主办速度。他甚至对市政也严加过问，不仅在其中暗设眼线，向他反映情况；还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以避免渎职行为。委员会是重要的政治场所，为避免节外生枝，凯撒撤消

了委员会。凯撒对法律也严加控制。他限制了陪审团的范围，对于重大案件则自己亲自处理。他曾力图修一个罗马法典，但这个计划随着他的去世而终止。

在经济上，凯撒推行了新的土地法，他把土地分配给退伍军人和贫民。他规定土地使用 20 年之前不得出卖，以防止土地集中。他又规定农场至少应有 $1/3$ 是自由工，以此来限制奴隶制的发展。为解决罗马的失业问题，他让一些无产者进入军队，把 8 万市民迁徙到迦太基、科林斯等地开拓新产业。同时还大兴土木搞建设，一方面改善罗马的城市面貌，另一方面提供就业机会。

凯撒为了保证赋税的征收与行政的便利，在意大利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为了弥补罗马公民在战火中的死亡名额，凯撒赋予意大利的医生、教师等身份的大众以罗马公民权。公元前 59 年，凯撒曾通过分配土地的优先权来鼓励罗马家庭的生育，这条规定在凯撒独裁后依旧实行，同时他又对逾期不育的妇女予以一定的惩罚，借此来增加罗马人口。在凯撒任职期间，罗马修建了不少闻名后世的建筑与工程，如奠定大戏院的基础，建立公共图书馆，填湖为耕地，高筑台伯河河坝，疏通河道，建筑横跨意大利中部的道路，开凿运河。

凯撒不仅在罗马广泛赏赐公民权，还在其它地方赏赐罗马公民权。这是一件相当引人非议的事情。公元前 49 年，

他把高卢百姓提到与罗马市民等同的地位。公元前 44 年，他起草的市政宪章中赋予意大利其它城市公民权利。后来从直布罗陀至里海一带的居民也获取罗马公民权。

随着凯撒政策的不断深入，凯撒的统治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凯撒曾经把政治建立在平民支持的基础上，而平民对他的信赖与追随是他能够最终走上独裁者的主要原因。但他成功之后，对平民的依赖渐渐被权贵所取代，他对平民的关心越来越少。平民要求取消全部债务，凯撒政权只能做到减免 $1/4$ 。不仅如此，凯撒在各地的政治代表还残酷地镇压起义。罗马的平民公会也被凯撒解散。凯撒减少了享受免费粮食的人数，给士兵分配土地的诺言也迟迟没有实现。凯撒政权只是少数人的政权，他和以前的寡头统治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尤其是凯撒赦免贵族派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凯撒在统治中的妥协与调和措施，使他逐渐失去过去拥护他的广泛的平民阶层的支持。在社会大众的埋怨声中，一些觊觎政权的阴谋分子趁机向凯撒布下了陷阱，内战期间曾投靠凯撒的贵族派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组织了谋杀。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凯撒被刺死。

3. 后三头同盟与共和国的倾覆

① 贵族派与凯撒派

凯撒的死使罗马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并陷入慌乱。有一

部分元老企图把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颁布为“杀暴君的人”和“解放者”，来使谋杀合理征。但罗马大众，包括平民、退伍军人等识破了元老院的企图。他们还记得凯撒带给他们的利益，而有很多人聚集在罗马等待分配土地，他们自发起来参加凯撒的葬礼，同时还组织了示威运动。他们尊凯撒为神，准备为他报仇，杀尽贵族。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不得不躲藏起来。比较温和的凯撒派认为双方都不能占优势，需要元老派出面达成协议。结果，根据西塞罗的建议，通过了一项折中的决议：不宣布凯撒为暴君，也不惩治凶手。但对于平民暴动，安托尼乌斯进行了残酷地镇压，并处死了参加暴动的奴隶。

但凯撒派的让步并没有使他们的政敌停下夺权的脚步。安托尼乌斯窃取了凯撒的文件，假托凯撒的文件在元老院中安插自己的党羽，并收买属国国王。此外，他还征集了一支由 6000 名精锐军团士兵组成的私人卫队。这些举动一方面引起共和派的警觉，他们怀疑他打算独裁，也开始秣马厉兵。另一方面，由于安托尼乌斯对凶手的放纵，又由于他实际上中断了凯撒分配土地给退伍士兵的土地法的实行，他也遭到许多凯撒派、平民和退伍军人的背弃。他们决定重树领袖。

屋大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了罗马政治舞台的。屋大维是已故独裁者凯撒的侄孙，他已经被凯撒定为自己的继承

人。当凯撒被杀的消息传到伊利里亚时，屋大维决定结束学业，回到罗马。屋大维改名为盖乌斯·优里乌斯·凯撒·屋大维。屋大维一出现，就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平民、退伍军人、士兵的拥戴。他们希望屋大维能继续凯撒的维护平民与士兵利益的政策与法案。屋大维由于凯撒的声望而迅速形成自己的势力，他的出现加深了凯撒派的分裂。出身于意大利各城市的土地所有者，深恐丧失自己的土地，而逐渐脱离凯撒派，愿意与共和派妥协。安托尼乌斯占有了凯撒的金库，拖延分发金钱的时间。他以冷淡的态度接待屋大维，并拒绝给他分配其义父的财产。

安托尼乌斯和屋大维的个人才能相比，屋大维似乎更有优势。安托尼乌斯的年龄比屋大维大一倍，他在军事上经验丰富，才能突出，但政治谋略与手段却显得很不成熟。屋大维虽然不像凯撒那样有才华，且军事上神勇多谋，充满个人魅力，但他十分擅长审时度势、任贤用能以及充分利用优势。因此，尽管他涉政不久，但很快便表现得老练主动。

这时，西塞罗又成为贵族派的代表。在权衡当时的政治形势之后，西塞罗不顾当时策划谋杀凯撒的布鲁图斯的反对，决定与屋大维联合共同对付安托里乌斯。安托尼乌斯在攫取罗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权力的同时，又试图夺取高卢的统治权。凯撒的经历，证明高卢在罗马共和国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安托尼乌斯对高卢的注意，使人们怀疑他想图

谋不轨。因此，西塞罗认为，共和国当前最重要的敌人是安托尼乌斯，而不是屋大维。与屋大维妥协并联合，是保证罗马贵族掌握统治权的必要手段。

屋大维迎合了西塞罗等贵族派的要求，同意与他们结盟。而私下里，屋大维向平民及退伍军人解释说，这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麻痹西塞罗等人，同时为了反对安托尼乌斯。屋大维因此从元老院得到不少资助，他沿着凯撒的踪迹到各个行省及属国调查、游说，同时征募到一支军队。在安托尼乌斯方面，由于他克扣军饷，并且对士兵监视得很紧，一旦发现有军心动摇的情况，就进行残酷镇压，因此许多士兵心怀不满，有的则寻找机会从军中逃亡。西塞罗则大造舆论声势，一方面唾弃安托尼乌斯及其拥护者，认为他占有政权后会洗劫有钱人；另一方面称赞屋大维是挽救共和国的一位了不起的领导者。

屋大维与安托尼乌斯之间的冲突是在高卢地区爆发的，安托尼乌斯因此被迫退居南阿尔卑斯高卢。经过摩萨那城一战后，安托尼乌斯战败，又退入那尔波高卢。在这里，驻扎着一位显要的骑兵长官，同时也是大司祭的列庇都斯及其军队。屋大维还与统帅西方各行省军队的重要的凯撒派人物结为联盟。与此同时，在罗马的东方各行省，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也对当地的凯撒派展开了夺权斗争。

②后三头同盟的形成和腓力城附近的会战

在摩萨那战争之后，元老院以为他们对安托尼乌斯的战

争已占据了上风，对屋大维的支持也应该适可而止。他们利用屋大维的阴谋，成为屋大维与之分裂并准备反击的适当理由。同时，屋大维的士兵中也提出了与安托尼乌斯和解并联合的要求。

公元前 43 年，安托尼乌斯、列庇都斯和屋大维在意大利北部的彼诺尼亚城结成同盟，历史上称谓“后三头”同盟。三头宣称：五年内将由他们治理罗马国家，并胁迫元老院与人民大会通过。他们各自占有西方行省的一部分，并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宣战。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摧毁敌对力量，以“为凯撒报仇”为由重新实行了“公敌宣告”制度。这些公敌中包括谋杀凯撒的凶手，有后三头各自的私敌。他们以自由与公民权来奖励那些杀死公敌的人。

西塞罗以及其他 300 名元老与 2000 名骑士、富豪被杀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用于军民建设。除了地产少于退伍士兵的份地的地主之外，其他多余的土地都要被收归国有，再行分配给士兵。

后三头的整顿大大地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并给意大利的土地所有制以沉重的打击。

意大利的土地所有制中，除了大地主之外，还有不少中等地产。在中等地产的土地上，劳动者主要是门客、佃户、债户等，他们通过租用地主的小块土地来生活。事实上，这些中等地产在意大利的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后三头

实行公敌宣告之后，在这些中等地产的所有者及其土地上的劳动者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他们必须承受沉重的军税，还经常受到军队的抢劫与欺压，生活朝不保夕。另一方面，公敌宣告中的奖励政策吸引并激发了奴隶及其他劳动者的反抗精神，他们揭发地主，极大地冲击了奴隶制。而且，他们还利用四处混乱的机会，成群结队地逃跑。公敌宣告时期，恐怖的社会环境和混乱的局面，使得罗马境外的庞培派与其他势力坐收渔翁之利。一部分被后三头搜捕的公敌，以及一些逃亡奴隶渡海投奔在西西里河的庞培的儿子赛克斯图斯，他正蓄意发展势力，愿意收纳奴隶编制军队与舰队，还有一部分则投靠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是后三头以外的另一股政治势力。他们在挫败了东方行省的凯撒势力后，便向后三头宣战。他们仍然实行庞培的政策，他们的高额税收使所在行省的居民不堪重负之中酝酿着一个接一个的暴动。其中有奇里乞亚的统治者克勒翁组织大量兵力，参与了反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斗争。其中一些隶属国，安息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东方行省的反抗运动。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队中，有不少士兵出于生计才投奔他们，这些士兵原来与凯撒部队有关，并不是真正效忠谋杀凯撒的凶手。

后三头的军队由安托尼乌斯统率，双方在马其顿的腓力城附近相遇。因为赛克斯图斯·庞培和贵族派多米提乌斯·阿

介诺巴尔布斯的舰队作梗，后三头军队的粮草通道被切断，他们在腓力城一战中陷入困境。但经过两次战役之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军队终于被击溃，他们二人绝望自杀。

腓力城一战之后，后三头又重新瓜分了罗马的各行省。列庇都斯分得阿非利加后不久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屋大维则返回意大利。安托尼乌斯治理东方诸行省与属国，并向它们勒索巨额罚金。在此期间，安托尼乌斯和克里奥帕特拉亲近起来。安托尼乌斯因出征安息的计划的需要而看中富庶的埃及，而克里奥帕特拉则在凯撒被杀之后需要重找靠山，来巩固自己的王位，并希望借助安托尼乌斯扩大自己的王国。

③屋大维与赛克斯图斯的斗争

屋大维在意大利的土地政策触犯了土地所有者。他们被驱逐出土地，土地、奴隶、牲畜和农具都被剥夺并分给退伍军人。赛克斯图斯·庞培的舰队和海盗的重新出现破坏了罗马的粮食运输，罗马城陷入饥荒。安托尼乌斯的妻子富尔维亚和他的弟弟路克优斯担心屋大维会排挤并损害安托尼乌斯，于是借罗马混乱与屋大维树敌的机会煽动地主反对屋大维。他们纠集了埃特鲁里亚、翁布里亚和萨宾地区被剥夺地产的地主，招募军队，以埃特鲁里亚城市拍卢齐亚为中心向屋大维发起军事攻击。屋大维很快便镇压了这次行动。屋大维与安托尼乌斯的关系一度决裂，但由于军事上的压力，安托尼乌斯和屋大维在布戎狄西翁和解，安托尼乌斯迎娶了屋

大维的妹妹屋大维亚（富尔维亚已死），表示双方的诚意与联合。意大利的土地所有者的反抗也因此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中有一些沦为佃户，有的迁居到其他行省。那些在意大利还保留有土地的人，渴望国内局势安定，使他们能继续经营自己的农庄，拥有财产和奴隶；分得份地的退伍军人也希望战争过后能够安居乐业；平民则要求解决粮食价格问题。

面对这种社会局势，屋大维和安托尼乌斯不得不与赛克斯图斯·庞培妥协，要求他不要再接纳逃亡奴隶，并能为意大利的粮食商道着想。同时，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赛克斯图斯·庞培享有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治理权，他的奴隶也都被承认为自由民，投奔他的贵族也既往不咎。但是，不久以后，赛克斯图斯便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协定，再次接纳到他那里去避难的逃亡奴隶。他的失信使屋大维再次对赛克斯图斯发动战争，宣称是对逃亡奴隶的战争，因此，这次战争赢得了意大利奴隶主的支持。赛克斯图斯显然并不是奴隶利益的代表。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以奴隶为名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他利用自己父亲的声誉，集结了残余的共和派，并不得不像克洛狄乌斯、米洛和老庞培那样，通过武装奴隶来扩大军队。

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最后屋大维的统帅阿格里帕赢得了胜利，这为他提高在政界中的地位提供了条件。阿格里帕的胜利，加速了赛克斯图斯舰队与军队的溃败。司令麦诺

多尔背离了赛克斯图斯，一些奴隶出身的士兵则投向屋大维，因为屋大维允诺他们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编入他的军队。可是，由于地主的压力，屋大维出尔反尔，他秘密命令将编入各部队的 3 万名奴隶押送原主人；无主户的奴隶有数千名被处死。屋大维的行为果然赢得地主的欢心，他在他们的拥护声中地位愈加显赫。

从这时候起，屋大维开始转向与贵族亲近。他和最著名的贵族李维优斯·杜路苏斯的女儿，即同样著名的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前妻李维亚结婚，另外宣布“公敌宣告”结束，并豁免了有钱人欠缴的军用税款。最后，屋大维发誓，准备在后三头新延长 5 年的无限权力期满和安托尼乌斯回国后，恢复共和国。

《布戎狄西翁协定》之后，安托尼乌斯就东征安息去了。这时安息几乎占领了整个叙利亚，只有安条克、阿帕麦亚和推罗等一些受希腊影响较深的商业大城市还在罗马的控制中。总的说来，安托尼乌斯的军事行动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他的军队虽然把安息人驱逐出叙利亚，但是，他一直没能侵入隶属于安息的阿特罗巴特那人的领土。

公元前 37 年，安托尼乌斯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结婚，罗马法不认可这种婚姻。同时，他秘密将利比亚、叙利亚等罗马地区转到女王和她的子女名下，并有心要把首都迁到亚历山大港。这意味着罗马的政治中心将要被转移到当时

的属国去，而罗马和意大利则将变成属国。屋大维通过偷窃安托尼乌斯的遗嘱，向元老院揭发了安托尼乌斯的自私与背叛。公元前 32 年，屋大维宣称：为保护意大利的独立，向克里奥帕特拉发动战争。

为了取得日后向安托尼乌斯宣战的合理性，屋大维利用这次对埃及女王的战争提前制造舆论。他声称此次战争是罗马与东方蛮族的战争，是光明的阿波罗与埃及恶神的斗争。这种口号对于那些依赖罗马社会，以罗马为荣的意大利统治阶层，非常具有鼓动性。在为罗马而战的号召与屋大维权势的威慑之下，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相当一部分行省居民宣誓要效忠屋大维，而安托尼乌斯阵营中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人要求他断绝与埃及女王的关系，以平息战争。但安托尼乌斯此时已失去了判断力。

战争爆发了，公元前 31 年 9 月 2 日，在伊庇鲁斯的亚克兴角附近发生的海战成为决定性战役。在这次战争中，安托尼乌斯和克里奥帕特拉的海军被击败。在这之后的一年里，屋大维没有再次兴师动众去侵扰居住在埃及的失败的英雄安托尼乌斯。他利用这段时期来整顿后方，接纳并妥善处置归降的安托尼乌斯的臣民与军队。用国家的资金购买土地并分配给意大利的士兵。在亚细亚，他取消居民的债务，废掉支援安托尼乌斯的各小国王，并将罗马公民权和各种特权赏赐给自己的拥护者和在他的海陆军队里服役的亚细亚各省

的居民。公元前 30 年夏天，屋大维来到埃及。安托尼乌斯和克里奥帕特拉毫无抵抗能力，最后，两人绝望自尽。于是，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并由皇帝亲自治理，屋大维自称为托勒密的继承者。

后三头之间的争夺至此结束，屋大维运用智谋与远见挫败另外两位政治对手，取得了罗马的独裁权。

六、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文化

1. 哲学与科学

公元前 2 ~ 前 1 世纪，一些罗马人对希腊哲学的引进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西塞罗在普及哲学方面作了很多的工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各种哲学体系的原理作了叙述，浅显易懂，同时他还规范了拉丁文的哲学术语。卢克莱修（公元前 98 ~ 前 55 年）是这时最著名的古代哲学家之一。他在自己的诗作《物性论》里发展并宣传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学说，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揭开宗教迷信的神秘面纱，从而建立生活的信念和勇气。关于卢克莱修，除了这部六卷的著作《物性论》外，我们所知甚少，卢克莱修以叙事诗的体裁讨论伊壁鸠鲁的哲学和伦理。他的学说是想从根本上启迪人类的思想，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获得自由。卢克莱修否认神能创作并左右人类的生活，他用自然原理来解释宇宙和人

类的起源和发展。根据自然界的形成是各样的、永恒的，一切形式是由不能分割的“本原”即原子组成的。原子不能由任何人创造或消灭。它们具有一定的形式、重量并且能够运动。原子在它们周围空间运动，和阳光下浮动的灰尘一样，并自然地偏离直线方向，卢克莱修在与宿命论作斗争时也用这种脱离现象来解释偶然性和人类意志的来源，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而形成万物——从星球到人的灵魂。卢克莱修认为：灵魂也是物质，因而随着躯体同时灭亡。原子的不断分离与结合就产生了新的事物。因此，宇宙中的事物便显得无穷无尽。

根据自然界的形成原理，卢克莱修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卢克莱修认为，既然自然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有生有灭，那么，人的灵魂也由物质构成，躯壳死亡灵魂也必然随之死亡。因此，世界上是不存在神创造人的，人也不必惧怕死后灵魂遭到折磨。世界的形成是这样的：首先出现了地球，在地球的湿润条件中，产生了植物，然后又产生了动物，最后产生了人。最初，人类和野兽一样野蛮。后来他们逐渐学会了取火、筑房和耕地。亲近的人们组成家族，而家族间的彼此来往又组成社会。接着，语言、科学、艺术、手工业以及法权和正义等也相应出现了。但是，国王出现后，强者掠夺、欺压弱者，于是产生了私有制和贪欲，战争与罪恶也就接连不断地出现了。

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卢克莱修的学说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但他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对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机械唯物论也发生了很大影响，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学说成为他们和教会斗争的武器。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罗马人取得了许多成就。例如，塞尔苏斯在论医学的著作中总结了希腊医学的成就，提起了罗马人对医学的关注与重视。埃及天文学家索吉盖涅斯参加了凯撒时期罗马历法改革的计算记录。除了这些外国人为罗马科学所作的贡献外，罗马也诞生了一批罗马人自己的优秀科学家。玛尔库斯·铁伦提乌斯·瓦罗（公元前 116 ~ 前 28 年）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编纂了《百科全书》，撰述了有关古代罗马习俗和宗教、罗马戏剧、拉丁语言、天文学和许多其他学科的论文。此外，还有以讽刺文闻名的瓦罗，他对当时罗马社会恶劣的社会风尚进行辛辣的嘲讽，甚至讥笑前三头政治是“三头妖怪”。

2. 叙事诗与喜剧

早期的罗马诗通常以罗马为题材，但是他们喜欢追求希腊文学的古典风格。李维优斯·安德罗尼库斯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罗马诗人。他出身于一个希腊家庭，于公元前 272 年作为俘虏来到罗马。他用萨图尔尼乌斯诗体将《奥德赛》翻

译成拉丁文。与他同处一个时代但稍后一些的诗人格涅乌斯·涅维优斯（公元前约 274 ~ 前 204 年）是另一个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著作有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叙事诗和许多悲剧。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出现了卓越的恩尼乌斯（公元前 239 ~ 前 169 年）。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年代记》，这是他在罗马文学中初次用六步韵律法写成的诗作。

公元前 3 世纪后半叶，罗马喜剧界出现了几位卓越的人物。翁布里亚人提图斯·玛克优斯·普劳托斯（公元前约 254 ~ 前 184 年）是其中之一。他写有许多喜剧。

普劳托斯的喜剧用通俗的诗歌语言写成，在韵律与内容方面则受希腊文字的影响。这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拉丁喜剧有所不同。在古希腊的《十二铜表法》中有一条法律规定，艺术作品中不能有任何猥亵现代社会的地方，否则艺术家要被处死。这个法令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文化恐怖。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许多剧作家为了避讳，而把作品中涉及的人、事或物都尽量保留它们的原型，不敢有所夸张，而在普劳托斯所生活的罗马社会，法律不限制对现实生活的夸张，却限制照搬生活，当然世俗的粗词鄙语就更不容许登大雅之堂。但普劳托斯的作品，却以诙谐幽默、逼真生动、通俗平易的风格赢得了罗马观众的欢迎。普劳托斯的喜剧流传至今的有 21 部，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安披特律欧》、《钱罐》和《喜欢吹牛的战士》。

另一个闻名的喜剧作家是阿非利加人普布里乌斯·泰伦提乌斯（公元前约 190 ~ 前 159 年）。他是来自迦太基的一个释放奴隶。他写了 6 部喜剧，其中以《来自安德洛斯岛的姑娘》、《宦官》和《自惩者》最为著名。这些作品主要是写给有文化修养的阶层看的。还有一个喜剧作家是盖乌斯·路奇里乌斯（公元前 180 ~ 前 102 年），他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文体，即讽刺体。

3. 杂技与戏剧

杂技在罗马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早在公元前 254 年，罗马社会中就出现了角斗竞技。公元前 2 世纪中叶起，角斗竞技成为罗马人的一种主要的娱乐活动。为了满足上层社会享受的需要。罗马国家常常不惜花费巨资来修建角斗场所，举办各种竞技和杂技表演。有的市政长官和行政长官出于政治活动的目的，当国家用于此项的专款耗尽之后，甚至愿意动用私产来举办娱乐活动，以博得社会的支持。如优里乌斯·凯撒就曾因此弄得负债累累。

在罗马，戏剧主要由政府举办，用于一些隆重盛大的场合，如宗教活动举办的节目，或一些显贵的葬礼仪式。以普劳托斯与泰伦提乌斯的戏剧为例。通常用木料架起一个烘托气氛的背景。前面是一队圆形的管弦乐队或跳舞平台，后部为剧台。这种简易的结构，便于随时拆装，观众露天观看。

有的自己带个小凳子，有的蹲在地上。公元前 145 年罗马修筑的一座戏院，仍旧用木材架成，仿效希腊的半圆式戏院，有了固定的座位。看戏不收费；奴隶可随主人入场，但不许坐；女人则只许坐在后面。这个时期的戏院，气氛是轻松自如的，观众们常常随意交谈，纵情欢笑。而剧组则不得不常常迁就观众的意愿，有的节目因被嘈杂声或其它事情打断而被要求重演。

罗马舞台上的演员，主角通常由剧团负责人自己担任，他是一个自由人；其他演员多是希腊奴隶。演员往往得不到尊重，直到伏尔泰——18 世纪法国悲剧家出现后才有所改变。女性角色由男人扮演，这时的演员不戴面具，只需在脸部化装或戴假发。约在公元前 100 年，为辨别剧中角色，面具便成为必要而不可缺少的东西。悲剧演员穿的是高鞋子或厚底靴，喜剧演员则穿平底或软鞋。演员唱歌时，由一支笛子伴奏；有时候，由一些歌手代唱，演员只是做相应的动作。

第十四章 中国统一 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一、秦王朝统一中国

1. 战国七雄

由于各国的争战和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公元前 5 ~ 前 4 世纪，中国出现了 7 个强大的诸侯国，即齐、魏、赵、韩、楚、秦和燕。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期。

齐国建都临淄，公元前 386 年，齐卿田和取代姜姓侯王成为国君，齐国进入历史上的强盛时期。齐国南依泰山，与楚、鲁、宋相邻；北隔渤海与燕相望；西与赵国分跨清河两岸；东则濒临大海。齐宣王招贤纳士，给予优厚的待遇，成百上千的饱学之士从各地闻声而来，聚居在都城稷门（西门）外自由讲学，称“稷下先生”。齐宣王以后历代嗣君，也都非常重视养士。当时，各种学派都汇集齐国，因此临淄成为战国时期文化发达的都城之一。得天独厚的文化基础对齐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田氏占齐之后，齐国进行了重要的军事、行政和财政改革。齐国重新规划了行政地区，通过税制改革降低了农民的纳税数量，确立了国家

盐、铁的专利权，使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晋国曾一度强盛，由于大贵族之间的斗争，公元前 403 年，晋国灭亡，在晋田的土地上分裂出魏、赵、韩三国。魏、赵、韩三地人口最为稠密，魏国位于肥沃的平原，人口众多，人口密度是当时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韩、赵、魏三国地下矿藏丰富，尤其富含铁矿。根据《左传》的记载，最早开采和冶炼铁矿的地方即在晋国。战国时期，这里有最大的冶铁中心，韩国的铁制兵器驰名天下。三国中以赵国实力最强。

从公元前 6 世纪初开始，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 4 世纪，楚国成为七國中号令天下的大国。楚国位于黄河和长江流域，面积占当时中国土地的 $1/3$ 左右，是领土最大的一个国家。楚国的森林、锡矿、铜矿和金矿资源丰富。从近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楚国的冶铁、铸铜、木工、漆器及其他手工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战国时代是楚国文化繁荣的时期，它对于整个中国南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秦国位于中国西北部，领土广袤，几乎和楚国不相上下，它处于蛮荒之地，人烟稀少。秦国最初只是周朝的一个邻国，后来秦君封为诸侯后，还一度受到晋、楚的制约，在很长时期里，秦国因国势微弱，只能在西北部戎族地区发展势力。公元前 5 世纪，秦国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疆域。其中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邻国晋正处于大夫权利争夺之中，所以对秦国的西部扩张没有引起警惕。公元前 4 世纪中叶，秦国坚决地推行了商鞅变法，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秦国的社会、经济及军事的发展，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公元前 4 世纪末，秦国在力量和威望方面已经能跟楚国相抗衡了。

燕国地处东北，它的地理位置使燕国具有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燕建都蓟（北京市），又有下都（河北易县）。东周时期燕国弱小，常为山戎所攻掠。燕昭王招募贤士，出兵破齐，燕逐渐成为北方强国。燕东北的辽东地区与朝鲜为邻，北以长城与东胡、林胡、楼烦为界，西部的云中、九原地区与赵为邻，南面与齐以长城为界。燕国主要致力于对辽河流域的开发，这对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有重要的意义。

因地势偏远，战国时代燕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它只跟齐国进行过激战。公元前 4 世纪末，齐国趁燕国发生内乱，不断进攻燕国。

七国土地，楚最大，秦赵次之，齐、魏、燕又次之，韩最小。人口则楚魏最多。楚兵一百万，按每五人中出一个兵来计算，楚大约有五百万。魏兵七十万，人口大约有三四百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万，秦、赵两国人口不过五六百万。齐国七十余城，公元前 279，仅计墨城有壮士五千人，计墨全境男女老少当有四五万人。以此为均数计，齐国大约有三四百万人左右。韩兵三十万，燕与韩相似，两国当

共有人口三百万，七国人口总数约计在二千万左右。众多的人口是秦建立统一大帝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2. 秦统一六国

① 商鞅变法

秦国的强盛有两个原因。一则在公元前 4 世纪以前，秦没有参加中原各国的混战，因此，国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秦国实行了改革，这使得秦国从秦孝公当政（公元前 361 ~ 前 338 年）时起，开始迅速强盛起来。

秦国东部的黄河天险与崇山峻岭，是秦国抵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秦国地处渭河、泾河和洛河流域，土地肥沃。公元前 3 世纪中叶，秦国兴修郑国渠，又对沼泽地排水育田，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农业产量。进行水利建设之后，关中成为古代中国另一处肥沃的地区。秦国还积极与中亚细亚各部落之间进行通商活动。秦国的主要输出产品为铁器、盐和丝，以此从西北部落中换回羊毛、兽皮和奴隶。在西南方，秦国跟巴、蜀地区的居民贸易。巴、蜀的肥沃土地和丰富矿藏成为秦国扩张的主要目标之一。

公元前 4 世纪中叶，秦国在商鞅的领导下进行了经济、军事、政治的改革。商鞅是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改革代表新兴封建地主的利益，目的在于摧毁奴隶制关系，为秦国出现的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商鞅又对秦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秦国长期对西北地区征战的军事经验的法律化。秦国军队新增了骑兵。战车因笨重不灵活而被取消了。以铁制兵器代替了青铜兵器。兵士的长衣改为游牧民族一样的短上衣，便于移动和战斗。军事按连保制分为伍和什。自从商鞅实行军事改革以后，秦国的军队变得锐不可当。

商鞅建立了军功制。每俘敌或斩敌一人，赐爵一级。并规定：“宗室非功论不得为属籍。”爵级起初只赐给有军功的，但是后来开始出售了。

商鞅的变法对世袭贵族无疑是有力的打击。贵族们对商鞅的改革活动强烈不满。孝公死后，商鞅被仇恨他的贵族车裂而死。但是商鞅改革的法制措施却被保留了下来。

②统一六国

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进行变法，使秦国由落后走向强大，商鞅又制定策略攻打魏国，迫使魏国向东迁移，秦国在黄河、函谷关这两道天然屏障的保护下，出兵攻打崤山以东的各个国家，以进一步统一天下。秦国的历代君王都为此而连年征战，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孝公之前，天下国势最强的是魏国。魏都安邑距秦很近，故商鞅把魏国视为秦国的头号敌人，两国势不两立。公元前 340 年，商鞅带军打败魏国军队，迫使魏惠王将都城由安邑迁到大梁。公元前 332 年，魏把阴晋（陕西华阴县）割

给秦国。公元前 331 年，秦国军队与魏军再次交战，魏死伤八万余人，被迫于第二年割让黄河西岸。公元前 329 年，秦军渡过江河攻下魏城汾阳（山西荣河县北）和皮氏（山西河津县西）。公元前 328 年，魏国又将上郡十五县割于秦让。至此，河西一带全部被秦获得。秦国完全取得共河这条天然屏障。从这以后，秦军主力从函谷关攻打韩国，并派兵从魏赵两国夺取黄河以东的土地。

面对秦和魏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山东各国渐生惧心，担忧无法抗拒秦军入侵。洛阳策士苏秦因此提出合纵。公元前 334 年，文侯面见苏秦，听取了他对合纵优点的分析，赐他许多财物，并且派他去各国游说，赵、魏、韩、齐、楚都接受了苏秦合纵说，纷纷将本国相印交给苏秦，并议定由赵王为合纵长。苏秦合纵说是用以防备秦国的。他把北方的燕国到南方的楚国连成一条竖线，合纵具体规定：

如果秦攻打楚，那么齐魏派兵援救，韩切断秦军粮道，燕赵则声援楚。如果秦攻打韩魏，那么由楚攻打秦军后路，由齐派兵援楚，燕赵仍作声援。如果秦攻打齐国，那么由楚攻打秦军后路，由韩坚守成皋，魏沿途堵住秦军，由燕派兵援齐，赵作声援。如果秦攻打赵，那么韩坚守宜阳，楚驻军武关，魏驻军黄河南岸，齐渡过清河，燕派军援赵。对秦而言，苏秦合纵说非常不利。因为山东六个国家的疆域是秦国的六倍，兵力多十余倍，六国信守合纵说，那么秦国统一中

原，必然困难重重。但是，六国之间有很多冲突，各国都想从别国得到好处，因而合纵约定危机四伏，三年后，合纵不攻自破。此后，六国又曾合纵过几次，但并不能对秦的入侵有所抵抗。

连横是秦用以对付合纵的办法，主张联合大国之一，结成一条横线以进攻其他国家。《韩非子·五蠹篇》解释纵横，纵是联合弱小的六国攻打强秦，横是投靠秦国以攻打弱小的国家。战国时期，策士四处游说，都离不开纵与横这两种说法。而七个国家或战或和，反复无常，其原因也是因纵横问题。秦昭王时，臣相范雎制定“远交进攻”的外交政策，使合纵失势而连横居上，但是秦仍疑心各国会合纵，既使在大局已定的战国末年，为防合纵，秦一直坚持连横，而且为贯彻执行，还任命山东策士为臣相。秦军在击败楚之后，全力进攻北方大国赵。公元前 270 年，赵国大将赵奢在阏与大败秦军，这是秦国遇到的绝少的失败之一。秦军转而攻打韩国，占领韩国大片土地。公元前 262 年，韩野王被秦大将白起俘虏，并使上党孤立无援，上党投降赵国。公元前 260 年，秦军再次攻打上党，赵国将军廉颇把军队驻扎在长平修筑防御系统，固守长平，秦军上前挑战，也无法迫使赵军出营。于是秦国派间谍贿赂赵国的大臣向赵王进言，秦惧的不是廉颇，而是赵奢之子赵括，并散布说廉颇会降秦。赵奢虽然辩才不及儿子，但他深知赵括只会纸上谈兵，作战必然失

利。但赵王听信谗言，让赵括取代廉颇领兵。秦听说后，悄悄将白起换作大将军。赵括领兵攻打秦军，不知秦军败退是计，一直追击到壁下，秦军驻扎在壁下顽守，将赵军引来，又派军截断了赵军的退路。赵军被迫修筑壁垒，等待援军解围，得知赵军粮道被截，秦昭王亲自到河北征兵，凡 15 岁以上男子都到长平参战，阻止援兵救赵。赵军断粮四十余天，甚至发生吃人事件。赵括把军队分为四支，连续攻打秦军，但无法突破包围，赵括自己领精锐部队上阵进攻，结果，被敌军射死。没有了主帅，赵军全部向秦国投降。为防赵军犯上作乱，白起在长平坑杀全部降兵。纸上谈兵的赵括将四十多万赵国人送上死路。这场战争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场，赵国损失了四十余万人，秦军死伤大半。到公元前 258 年，赵都邯郸已被秦围攻了一年多，直到魏国公子信陵君和楚国的援兵来救，打败秦军才解了邯郸之围。长平之战后，秦国接连对韩、赵、魏用兵。公元前 230 年，韩国被灭；公元前 238 年赵国被灭；公元前 225 年，韩国被灭；公元前 223 年楚国被灭；公元前 222 年，燕国被灭；公元前 221 年，齐国被灭。至此，中原六国都被秦国消灭。一个统一的帝国开始建立。

3. 战国时期的文化

①百家争鸣

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孔子将学说传于曾参，曾参又传

给孙子子思，子思再传孟子，孟子学说所以称得上是孔子真传。孟子带着车子数十乘、侍从百人，游说齐、魏等国王，虽然他的学说被国王们看作“迂阔而疏于事情”（不合时宜），但给当时思想界以巨大的影响。晚年著书七篇，又给以后世思想界极大的影响。孟子的确是孔子以后最大的儒学大师。

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七篇，充分发挥了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大体说来，作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义学说，表现在他反对非儒家学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三个方面。

老子与庄周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德经》传说是老子所著。《道德经》创作于战国时期，共有五千多字。《史记·老子列传》记载，《道德经》的作者是李耳，他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就是现在河南鹿邑县。李耳的儿子李宗是魏国的大将，封地在段干。公元前 227 年，秦国大将白起打败了李宗，魏国让李宗将南阳献给秦以求讲和。可以肯定，李宗是战国后期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李耳所处的时代。李宗的独生子叫李注，李注的独生子名宫，李宫的玄孙名假。汉文帝时李假曾做过官。李假的儿子叫李解，他是胶西的太傅，他就定居于齐。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推崇黄老思想，《史记》的《老子列传》记录了李耳家族的情况，在《乐毅列传》后面记载道家的传承情况，体例和《孔子世家》

与《仲尼弟子列传》相近。《史记》明确地记载李耳的故乡、宗族和思想传承的情况，是有依据的，值得相信。

老子是一位伟大的富有智慧的哲学家，他仔细研究自然界万事万物以及天与地的变化状况，同时又留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历史、政治、人事的成败，生存和死亡，灾祸和福分，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其他关系。和古代所有的哲学家相比，他对事物之间的矛盾看得非常透彻，也非常全面。老子把这种矛盾命名为道和德，道是存在于所有具体和事物中的自然规律。《老子》书中大多用“一”来代表道，“一”里面存在着正反两个对立面。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是指有了对立面，事物才会有变化。他所说的“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是指事物的反面一般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转变成强大的一面，从而取代正面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正反两面会相互转化，这正是老子说的，“福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王弼解释《道德经》，认为德是由个别的德共同构成的，又由具体个别的德来体现。有道才会有德，而没有道德，就不存在。在《解老篇》中，韩非子认为德是实实在在的，道是由所有的德合成的，离不开德。庄子认为道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中，道离不开事物。老子在谈论治国的方法以及个体的人怎样在社会中生存的方法时，运用的方式是这些朴素的辩证法，而且道的基本思想贯穿始终。

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是他发现了关于矛盾的一些重要规律，尤其是正反两面相互转化的规律。

儒家和道家是被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同等看重，不可或缺的两个学说。统治者表面上推行儒家思想，因为它维护的是严格划分贵贱的等级制度，能保证统治者的尊贵荣耀；实际上推行的是道家思想，它讲究的是治理大臣百姓的权术，使统治者的权力更加稳固。秦汉以后的各代君主中，那些擅长外儒内道、运用霸王之道的君主使国家昌盛兴旺，而不善于这样治理国家的人，国家多衰亡。儒道两家的著作是古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源头，被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所用。因此，孔子和老子开创的两大学派，一外一里被贯彻在社会统治、文化统治的方方面面。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名周，宋国蒙人，他大约活动在公元前 369 年至前 286 年，跟梁惠王、齐宣王处在同一个时代。庄子的学识非常渊博，他研究分析过当时各家学派，他出众的才学很被楚成王赏识。楚成王派使者带着丰厚的礼品去拜见庄子，请他作相国，庄子对来自楚国的使者笑道：“礼物是丰厚的，相国是地位极高的，可是你看那用作牺牲品的牛被好好地喂上几年后，就被披上织有花纹的锦，拉到太庙作祭祀祖先的供品，一旦到了这一步，它想当不会被宰杀的小猪也不办不到了。我永远也不会做官，让我自由愉快地活着吧！”

庄子病危，他的弟子们想要为他办隆重的葬礼，庄子没有答应，他认为自己死后，天地就是棺材，日月星辰都是他的和陪葬物，这样看来，自己的陪葬品十分丰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弟子害怕乌鸦、老鹰吃庄子的尸体，庄子说埋在地下也会被蝼蚁吃掉，何必定要偏心地给地下的，而不给地面的。

从这些故事之中可以看出庄子的思想和为人。

庄子思想主要体现在庄子的书中。《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子》有五十二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人认为庄子只写了内篇，至少这七篇是他的思想，而其他各篇大多是他的弟子或后代人写的。

庄子和老子一样，也认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是“道”。他发展了老子的部分思想，由客观唯心主义发展为主观唯心主义。

孔子主张仁义礼乐制度而墨子则反对礼乐，赞同兼爱。孟子支持孔子的观点，反对杨朱和墨子。老子、庄子反对仁义、礼乐，提倡无为，顺应自然。除了礼乐仁义，荀子反对以上名家的观点。荀子的弟子韩非，吸收荀子、老子、名教、法家的各种观点，形成了系统的法家学说。孟子有力地发展了孔子的仁义学说，同时又借鉴了阴阳五行学说，自成一派。荀子对孔子的礼乐学说进行了一些恰到好处的改

动，这套学说又被韩非吸收进其思想和名教、法家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大的派别。在儒家学派中，荀子和孟子有着同样高的地位，即使在诸子百家中，他也同孟子很像，长于对别家别派的评价和批判以及对儒学的彰显。因而他是继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大师。虽然韩非继承了荀子的学说，但却不再属于儒学，他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切合现实的伟大的思想家。

墨家学派的创立人是墨子，此派是个集组织性、政治性与宗教性于一体的团体。这派的人生活十分困苦。《庄子·天下》提到墨家，说他们活着的时候十分勤劳，死后如此单薄，墨子的学说也太苛刻了。墨家的首领称巨子，一般由上一代的巨子来指定下一代的巨子。

墨家学派的巨子举荐弟子去各国做官，有官位的墨家学派成员仍然要信奉本派的学说，如果不能实行墨家的理论，就要有放弃俸禄、一心求义的精神，主动辞去官位。墨子就曾称赞弟子高石子，但卫国国君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高石子辞掉了俸禄很高的官位。另一个名叫胜绰的弟子在齐国做官，顺从齐将项子牛的领导，三次攻打鲁国，他的行为遭到了墨子的批评，认为他爱俸禄胜过义，并因此使齐国冷落胜绰。

后期墨家的重要支派就是墨家辩者，简称墨辩。这一支派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逻辑学方面颇有建树，他们的思想

主要体现于《墨经》之中，包托《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

②天文学与地理学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于农业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产生得很早。远古时期，中国的天文学家就能够计算冬至和夏至、日蚀和月蚀的时间。战国时期，阴阳合历在中国开始盛行，按照这种历法计算，一年约为 365.25 天，一月约为 29.63 天。因为阴历年和阳历年之间存在差别，所以历法中插入了闰月，差不多 19 年就有 7 个闰月。

古代中国的编年史中保留有对天文观测的记录，其中许多已被现代天文学证实。例如，从公元前 240 年起，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就开始观测哈雷彗星并准确记录每次的时间。战国时期，天文学家把天体划分为许多星座。他们初步认识了银河，测定了很多行星的位置和形状，确定了最明亮的星星的名称。公元前 4 世纪，天文学家石申，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绘制了 800 个星星的星空图。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之所以研究星球的运行状况，主要是希望能够凭借它们位置的变化推测天气和气候的变化。

西周早期的中国主要是黄河以北的商国，也就是《禹贡》所说的冀州，到战国时期中国疆域逐渐扩大。只要有

华夏文化的地方，都被叫做中国或海内，中国以外叫做四夷或海外，华夏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叫做诸夷。中国疆域的扩大，使人们的地理知识日益丰富。同时，中国同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使地理、民俗、特产、神话等方面的传说更加丰富。例如墨子《节葬篇》记载，越国东面的硃洙国有一种风俗：长子出世就会被杀死吃掉，父亲死了，子女认为母亲是鬼妻，把她赶出家不再赡养。楚国南有炎人国，儿女在父母死后，把他们的皮肉割掉，只埋葬骸骨，这样的话才会被认为是孝子。秦国西面的仪渠国，人死了之后，都会被火化，俗称登天。荀子曾讲过，氐羌不怕被抓去作奴隶，却怕死后不能被火葬。这些逸闻应该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像《山海经·海外经》有贯胸三首、三身、一臂等国，听国名就引人怀疑，并不可信。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家根据各种已有的地理知识以及各类传说、逸闻写了一些书，大致有两种。一种书记载的地理状况比较详实，这类书主要包括：《山海经》的《山经》，《周礼》的《职方氏》，《尚方》的《禹贡》，其中记录最确实的是《禹贡》。第二种书的内容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而且虚伪的东西多过事实，例如，《穆天子传》假托周穆王游西方的事，《逸周书》假托周成王接受四方诸族的贡品的《王会解》，《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等。《穆天子传》、《逸周书》这两部书在西晋初年才被世人发现，因而书中内容多少被晋人增删了一些，但绝

不是伪书。《穆天子传》反映了当年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上的往来。《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奇闻异事。有些内容是关于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古老的神话传说，以及他们祖先的故事。这种书有些是古代残存的巫书。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推知：北狄犬戎出自黄帝族，苗民出自颛顼族，瑶族出自帝舜族，氐羌出自伯夷父族，巴人出自太皞族。炎黄子孙与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汉族，而其他民族中也有炎黄子孙，因而各个民族传说中的始祖也就是各民族共有的祖先。

③文学

战国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诗歌方面，地处中国南部的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楚辞。这一诗歌体裁与民间文学有很多渊源。楚辞创作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屈原（公元前 340 ~ 前 278 年），他的诗歌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诗歌的发展。继《诗经》之后，屈原是推动文学大力发展的又一动力，他的创作使文学作品更加丰硕。巫文化是楚国的传统文化，巫风盛行于楚国的民间，在祭祀鬼神的活动中都要唱巫歌。《九歌》就是供巫师祭神时演唱的歌曲。当时巫师施法术时，所唱的禁咒辞的句尾多用些字，民间所唱的歌词多以兮字作尾。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在对民间音乐进行创新的时候，吸收楚国方言，创作了《离骚》、《九歌》以及《招魂》。《吕氏春秋·侈乐篇》

曾说楚国的衰败，成就了巫文学，可见巫文化的一个显著代表就是楚辞，它的特点是想像瑰丽，与《诗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战国时期，北方的史传文学与南方的巫文化都走向成熟，这两种文化以楚辞为交汇点，逐渐融合。西汉时期，楚辞在全国的影响都很大，辞赋文学更是得到了发展。古代诗歌的源头是民间歌谣和颂歌的合集《诗经》，这也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诗歌作品，而《楚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过渡。

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诗坛第一人，他的诗歌创作成就极高，而他本人也深受后世人尊敬。战国时期，散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北方炎黄子孙中掌管文化的人称为史，南方苗黎族掌管文化的人称为巫，炎黄子孙与一些苗黎人逐渐融合，形成了华族，使得巫文化与史文化共同存在，相互影响斗争。传说颛顼曾经禁止巫文化的传播。《墨子·非乐篇》记载，商汤曾严禁巫风，贵族触犯禁条要罚二殍丝，百姓则加倍。可见巫文化和史文化之间发生过不少冲突，史文化看重人事，擅长写实，巫文化倍奉鬼神，擅长想象。商朝人好相信鬼的存在，使巫风盛行，祭祀也极多，他们为了降鬼神就唱歌跳舞，本来有过许多诗歌，但都不曾流传下来，史官大多用甲骨文字来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保存到现在的有《商书·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这些作品基本上保留了以当时辞句记

叙的商史遗文，十分珍贵，从这些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商朝的散文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而且诗歌的水平也很高，与西周初期的诗歌不相上下。

周朝不看重巫文化，而看重史文化，史官既记录大事，又创作诗歌，像《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就出自史官之手，史官是世代相传的职业，东西周史官所收藏的典籍后来成为儒家经书的底本。孔子把东周和西周的散文及诗歌修订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形成经学。这些经儒者的传承，世代相传，或用于讲解经义，或用来进行训诂研究，已经不是文学作品了，文学的主流诗歌，逐渐被奉为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以致儒生即使会背三百篇古诗，也不能独立创作一首诗，继孔子之后，知识分子从贵族手中接过学术，兴起许多派别，各讲各的，这些人的作品恰巧促成了散文的发展。墨子堪称第一人，他用质言体写书，将古语用民间口语表达出来。

除了墨家其他各家都用文言体写书。战国时孟子、庆子以及《战国策》记载的那些说客的言辞，议论十分精采，文采、内容都很精当。荀子、韩非子精于说理并不重视文采，各家文章的风格并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可以称作出众的散文大师。

二、秦王朝的扩张和衰亡

1. 南征北战

① 征服南越

当时人所称呼的越南占据了南部的大片土地。除越南外，这一带还有越东海国，闽越国和南越。南越的土地十分广大，包括现在的云南省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以及印度的一部分。早在那时候，这些国家就同中原国家相互来往，尤其是楚国和吴国。公元前 5 ~ 前 4 世纪时，吴国曾经侵占一部分本属于越国的土地，但很快，越南灭了吴国，此后越南进攻越南，吞并了原是吴国的土地以及越南的部分土地。秦朝统一全国后，派兵渡过长江，南打至越南，迫使越南以北的整片土地上的人民成为秦国的附庸。

公元前 213 年，秦朝已完成了对南越和西瓯地区的统一，秦朝将五十万犯人迁往五岭地区，和越人住在一起，一边戍守此地，一边和当地人一起开发南部地区，同年，秦朝又开通了四条与岭南相连的道路，以进一步控制岭南，同时增强此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这四条道路都是以南郡也就是现在湖北的江陵为起点，过了长江后往南方发展，但四条具体路径不同，第一条顺长江而下，自豫章（今江西南昌），逆

余干水，河谷而上，进入武夷山区顺闽江而下，向东到达闽中部，向北到达东瓯。第二条是从南郡顺江水而下，过彭蠡湖，逆着赣水边的平地而上，经南野跨过横浦关即今广东、江西交界处大庾岭山口的梅关，沿湓水也就是北江南下，越湟溪关也就是广东英德，到达番禺；第三条是顺自湘江谷地上溯至九嶷山，南下越过阳山关也就是广东阳山东北骑田岭山口，顺湟水经湟溪关到达番禺；第四条是顺湘水南下，过灵渠后，由陆路向南行，到达现在的广西南部地区。这几条路都是经过扩建原有的过岭通路而形成的。它连接了南北水道，以水路为主，辅以陆路。

当时把这些道路叫作“新道”。

由此秦朝完成了对东南和南方的统一。

在西南方，也就是云南、贵州、四川地区，当时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世人称他们为“西南夷”，在今贵州境内，众少数民族中以夜郎为春中最大的一个，他们主要住在今贵州的遵义、铜梓一带。今云南境内，当时最大的少数民族是滇，他们主要定居在云南昆明地区。有一部分人住在今云南大理、昆明等地。今四川境内当年主要有笮都、冉𪔐等部落，笮都位在今四川、汉源地区，冉𪔐位于茂县汶州一带，这些部落大多是羌族或氏族的分支。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主要是越族人经营农业生产，生活比较安定。部分羌族与氏族人过着安定的生活，另一部分过着游牧生活，随牧畜四处迁

移。

秦朝远在吞并六国之前不仅拥有今四川地区，而且秦国的疆域已到达今云南北部和贵州境内。秦国在攻打六国之前，曾命蜀郡太守李冰修筑了一条道路——碛道，以有助于对西南地区的管理，碛道从今四川宜宾南下，经夜郎到味县即今云南曲靖，全长两千多里。全国统一之后，在碛道的基础上，常安碛奉命修建通往云贵的道路。路经之地山势十分险恶，因而道路只有五尺宽，世称五尺道。这条道路的完成，促进了西南地区 and 中原的交往，为了使西南一带完全成为秦国的势力范围，朝廷在此地设郡县，又派官员上任。五尺道修成后，方便和加强了西南地区 and 中原的联系。西南夷真正的处于了秦的统治之下。

②出兵匈奴

在北方地区，匈奴是当时最强大的民族。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匈奴的历史十分久远。公元前2世纪，匈奴已开始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匈奴人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的家往往坐落在有肥美草场与甘甜水源的地方。因此，匈奴人不建城池，不修宫室，也不耕田种地。匈奴人为了适应游牧生活很小时就开始在羊背上学习骑术，并且拉弓射箭，通过射击小动物来提高射击水平。再大点就自己养活自己，以狐兔等动物为食。游牧生活将匈奴人锻炼得生性勇猛强悍，推崇勇力，而且极富有集体主义和献

身精神，他们首领的一句命令能让他们飞身上马，提着弓箭火速赶到。这个民族吃的是野兽的肉，穿的是皮革，每个人都会射箭，骑术高明，善长攻城掠地，因而他们常常入侵从事农业生产且地大物博的中原。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埋头于战争，对别事无力问津，于是匈奴乘机南下，将河套地区据为己有，河套地区就是今内蒙和宁夏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秦朝统一全国后，匈奴占据的河套地区成为秦朝背后最有威胁的存在，当时，国内也一直在谣传灭秦的必是匈奴。所以一面派兵统一南方地区，一面派兵攻打匈奴。公元前 215 年，秦始皇亲自到北部边境视察，安排打击匈奴的具体事宜。他返回都城咸阳后，任命长子扶苏为监军，遣三十万军队由将军蒙恬率领，攻打匈奴。蒙恬家世代出将才，他的祖父蒙骜曾在秦国攻打韩、赵、魏等国的过程中建立许多功劳，蒙恬的父亲蒙武更是一员猛将，公元前 223 年他率军攻克楚国。因此，秦始皇非常信任蒙家的人。此次攻打匈奴，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长驱直入，迅速夺回了河套地区。第二年蒙恬又渡过黄河，陆续从匈奴手中夺回了许多地方，包括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地区）、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大青山以西地区）。匈奴被蒙恬的一次次进军打击得如丧家之犬。秦朝将这些被收复的失地划分为四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了九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公元前

211 年，秦国将三万多户百姓迁移到北河、梅中一带开垦那里的土地。朝廷大举移民，一方面杜绝了匈奴的入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开发边境地区，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秦朝结束了对匈奴的用兵后，开始修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主要是杜绝游牧民族骚扰秦国北部的边境，也就是北起辽东，西到甘肃一带，早在公元前 4 世纪，燕国、赵国、秦国就已经在国家的边界上修建了边墙，以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入境骚扰。当时这些边墙并没有连接起来，因而实际作用并不大。

③修筑万里长城

公元前 215 年，秦朝开始修建长城，以原长城为基础，同时利用本国原已修好的边墙，以及黄河这道天险，而且又新建了许多城墙，使之连结成首尾绵延一万多里的屏障。这次竣工的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长城防线。秦朝修筑长城主要以土石为材料。整个工程分为关隘、城墙、城台、烽燧四部分。关隘一般建在崇山峻岭的险要处以及山谷的隘口，占据有利地势；城墙是长城的主体，一般根据地势的起伏修筑；城台是依着城墙建筑又高了墙体的建筑，主要用于站岗放哨以及隐藏军队；烽燧，大部分在山顶及长城拐弯处建造，一般用于传送军事情报，信号是白天燃烟，夜晚点火。蒙恬率众修建长城时，所使用的工具十分粗

糙简单，交通也很不方便，以军队士兵、守边战士和行刑犯人组成的大军能够建成这么大的工程，可以说是历尽了千难万险。汉代的司马迁在登上秦长城的遗址时，感慨万分地说道：“我看蒙恬给秦修筑的长城，沿途开山辟谷……对百姓的驱使也太过分了！”一提起长城，就不由地想到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孟姜女哭长城”。事实上，孟姜女哭的长城和秦长城没有什么瓜葛，这个传说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汉代之后趋于成熟，唐代时正式定型，到明朝后广泛流传，孟姜女哭长城所要传达的是古代劳动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征用民夫、兴修工程的控诉和憎恶。

秦朝修筑长城在当时有着不容忽视的实用价值，主要是它使北方游牧民族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敢南下，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的安定生活，而到了现今，长城已是中国悠久历史和古代文明的见证，也体现了华夏儿女坚毅顽强的铮铮傲骨。

秦朝统一天下后，向南开通五岭，又与西南加强联系，向北驱赶匈奴，逐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疆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它的国土范围向东直达海边，又与朝鲜接壤，向西到达临洮羌中，向南到达北向户，北方则从黄河为要塞，将阴山与辽东连成一线，因而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国。

大约有二百万民夫参与修建长城的工作，据史书记载，很多人因为过度劳累而惨死在边境线上，长城的土里埋葬了

许多这些人的尸骨。

万里长城全用土方、砖石和花岗石块建造而成，它是世界上都屈指可数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全长 4000 多公里。在整个长城中，每隔 60 ~ 100 米筑一座碉楼。长城城墙高达十米，宽可容五、六人并骑而过。有些地方建有门道，戒备森严。万里长城，作为一项防御工事，还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那就是有效地协调了中国与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游牧部落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商业贸易。

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稳固国内的统治。

2. 加强中央集权

① 建立中央集权制度

中央集权制带来的是皇帝政权上的独裁，就连皇帝称呼自己所说的“朕”，也是惟我独尊的象征。国家的事情不分轻重缓急，只能交由皇帝一人决断，各地奏章多如牛毛，以至秦始皇自定，一天只有批完一百二十斤竹简，才能休息，因为古时奏章多写在竹简上。

秦朝设置郡县，将全国各地划分为三十六个郡。使百越臣服之后，又增加了四个郡，包括闽中、南海、桂林、象郡。朝廷在闽中的机关设在冶县，即今福建神州市，南海的在番禺，即今广东广州市，象郡还包括广东雷州半岛等地。

秦朝彼此拥有郡四十个，每个郡分管一些县，朝廷派遣官吏去当郡守和县令，并且随时都可以进行调动，秦朝的法律规定，凭借杀敌的数量，建立军功的人可以当或大或小的官，韩非子认为这样做没什么可取之处，因为在战场上善于拼杀的人未必是个合格的医生和木匠，秦始皇执政时，有很多有功之臣、一介武夫担任地方官。这些人当权后一般手腕比较残酷，对执政者而言，这是好的作用，但是对于那些被统治的中原人民而言，他们忍无可忍。

秦朝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制，其中左右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国政，御史大夫辅佐丞相，太尉管理全国的军机要事，还有将军、廷尉、法外郎等，少府管全国各地的税务，并提供皇帝的日常用度，还有博士，供廷询之用，相当于今天的顾问。另有一套地方官制，设各种官员，其中郡守管理全郡的事务、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令长管理全县的事务，当时一个县大约方圆一百里，其中居户有一万户以上的称县令，不到一万的叫县长。县以下乡官有三老、嗇夫、游徼和亭长，十里一亭，设亭长主管抓捕盗贼，十亭为一乡，由三老对乡民进行教育，而嗇夫管理赋税和刑事案件，游徼专管抓捕盗贼。

②统一文字

战国时期，诸侯国并立，导致田地的平均单位亩，大小各不相同，马车和道路宽度不一，服装帽子做法不同，语言

也是各有地方差异，连文字的书写也有很大不同。秦统一后，逐渐将这些不同之处废除，使之趋向同一。周朝的文字叫作大篆，又称为籀文，书写时笔画极多，战国时期齐国和鲁国的文化比较发达，使用的文字书写起来比较简省方便，汉代人把这种文字称作古文，蝌蚪文，还有叫孔壁古文的。李斯对文字进行了统一，他根据籀文古文，把各种字体进行统一，减少笔画，同时使书写时少费周折，这以后统一的文字被称作秦篆，又叫小篆。同时出现了几本用小篆写成的教育小孩的课本，包括李斯写的《苍颉篇》，赵高写的《爰历篇》，胡毋敬写的《博学篇》，既教授字体，还讲解语法。传说狱吏程邈，因为犯法被抓进监狱，他创造了一种比小篆还简洁方便的文字，称为隶书。隶书的字体偏向方形，利于书写，到汉代时被广泛使用。秦朝虽统一全国，但是各地语言并不相同，文字上取得一致后，各地方言造成的麻烦就小了，而朝廷屡次大举迁移百姓，使方言不再那么有局限性。

③划定疆界和统一货币

秦朝的疆域十分辽阔，东到大海，南与号称五岭的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相连。西北至东北一线上修筑了秦、赵、燕旧有的长城为基础的万里长城，用以抵御匈奴等游牧民族入中原侵扰。至此基本上确定了中国的疆域，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是汉族人。秦朝之后，各朝各代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拓疆土的。

统一货币，度量衡及其它器具尺寸。秦始皇命令全国统一使用秦国旧有的度量衡。公元前 221 年，正式颁布诏书进行统一，规定所有新制作出来的度量器具，都要刻上诏书的那四十来字的正文，但是陶器上无法刻字，就用刻有字体的十个木戳在陶器上印出一篇诏书。隋朝时，出土了秦始皇时的秤权，上面刻有丞样隗状、王绾两人的名字，可以推知，当时只允许官府按诏书监造度量衡器，而禁止民间私造。战国时期，各国马车的车轨尺寸并不相同，秦朝规定车轨一律宽六尺，使得马车可以在全国通行。战国时期货币制度比较混乱，秦朝将货币规定为两个等级：黄金称上币，重二十两；铜钱称下币，重半两。战国时期，田地的单位——亩也大小不一，秦朝将一亩统一为二百四十方步，秦亩制被后人继承了下去，没再改动。

3. 大兴土木

秦始皇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做完所有想做的事，这样他的子孙后代就可以世世做皇帝，无穷无尽，他毕生惟一的心愿就是自己能做好一切事情，让后代只要遵循他的做法就可以了。他在骊山为自己大修特修墓穴，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终究是会死的，但是他又怀疑自己是否可以长生不老，于是他请来方士求仙拜神，不惜花费巨额财物求取长生不老药，例如他派徐市乘船去仙山求药，在石头上刻了二百丈长的鯨

鱼，方士装神弄鬼，劝秦始皇藏到连大臣也不知道的地方居住。秦始皇在方士的连欺带哄下，相继建造了许多宫室，修筑长城，因为方士骗他灭秦国的一定是匈奴，所以秦始皇派兵攻打匈奴，而且筑长城抵御匈奴。他所建的皇宫和坟墓，宏伟壮观，无可比拟。这些建筑，尤其是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建筑宫室——秦始皇灭六国，图绘各国宫室，在咸阳北照样建筑，共有宫室一百四十五处，藏美女一万人以上。他还以为小，在长安西南造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以坐一万人，殿中可以树立五丈高的大旗。宫前立十二个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这是初并天下时，收集民间兵器，销毁改铸的。用磁石制作大门，防有人藏铁兵器入宫。征发所谓的罪人七十余万人，分工营造，北山的石料，楚蜀的木材，都运输到关中。计关中共有宫室三百所，关外四百余所。这样巨大的工程还没有完毕，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续兴修。

华丽宏伟的阿房宫被入关推翻秦朝的项羽用一把火烧了三个多月，完全毁坏了。

修造坟墓——秦始皇即位之初开始在骊山造坟墓。吞并六国后，他征调了七十多万犯人到骊山劳动。坟墓五十多丈高，方圆五里多，深入地下，而且注入了铜液，墓里建有宫室和各等级官员的位次，放置无数的金银珠宝。还用水银仿

造江河大海，水银会随着机械的运转流入其中。由工匠制成一种自动的弓弩，会自动射杀那些闯入墓穴的人。秦始皇的尸体下葬时，宫中没有子女的宫女全成了牺牲品，而且把工匠们一并关在墓中，将他们活埋了。

秦时全中国大约有二千万人，被征调造宫室坟墓的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率领三十万防御匈奴，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共动用三百余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秦朝这样高密度高频率地征用民力，使百姓不堪重负。虽然表面上依法不征调农民，但是残暴的刑法使很多农民被定为犯人，仍要去做各种苦工，这样的做法，跟征用农民没什么区别。秦始皇晚年，农民起义的烽火点燃了。

4. 焚书坑儒

秦国政治一直处在法家的指导之下，君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法律以残酷、严厉著称，难怪中原六国都把秦国视为虎狼之国，这并不过分。秦始皇、秦二世两代皇帝都十分看重韩非子的学说，秦朝的政治在商鞅与韩非子的影响下，残暴到了极点。秦始皇执政时期，法家那一套治理之道有力地促成了割据势力的瓦解，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但是到了秦二世继位，法家政治学说发挥的全是消极作用，已经从强秦的学说转变为加速秦朝崩溃的学说。

李斯上奏给秦二世的《行督责书》完全是在法家学说的影响下写成的。

李斯这些恶毒狠辣的思想，完全与孔孟正统儒家提倡的王道背道而驰。秦国平定天下后，儒家的正统派与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些影响力，但是，仍然敌不过以李斯为首的儒家的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但正统派与他们的争斗仍旧比较激烈。

荀子学派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正统派之间的冲突，在代表着地主政治的中央集权与领主政治的分封诸侯的争论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出来，最终导致了两者正式宣告决裂的历史事件——焚书坑儒。公元前 221 年，统一政权刚确立，大臣们在丞相王绾的带动下一致主张将诸皇子封到远离秦的燕、齐、楚地为王，只有廷尉李斯坚决反对分封诸皇子，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把全国分为郡县来治理。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宴请大臣，博士淳于越建议效法古代，将皇子和有功之臣封为诸侯。于是丞相李斯大骂儒生只知复古却不学习现今；只推崇自己的学说，诋毁国家政权，使老百姓人心动摇。他提出将私人办学禁止。具体措施是只保留史官手中的秦国的史书，其他国家的历史书全都得毁掉，烧掉全国各地由个人收藏的书。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没有把所藏的书籍交到官府的人，罚他修四年长城，凡是聚在一起讨论诗书的人都要砍头，指责现在肯定古代的人要诛灭九族，

所有书籍中只有关于医药、卜筮、农作的书不禁毁。老百姓要读书只能拜官吏为老师。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了焚书法令。公元前 211 年，方士因为求神仙没有成功怕被砍头逃往他方，这激怒了秦始皇，他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生。但是，焚书坑儒，不但没有消除各个派别的差异，还加快了秦朝的垮台。秦始皇实行的是李斯的建议，但是皇位继承人，他的大儿子扶苏却在为儒生求情说好话。此举激怒了秦始皇，他把扶苏派到上郡，也就是现在陕西绥德县去监督蒙恬军队。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去全国视察，中途病死，李斯害怕扶苏称帝后，会对自己不利，就与信奉韩非子法学的宦官赵高一起设计，假造了遗诏，将扶苏和蒙恬赐死，把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胡亥推上皇位，即秦二世。不久，李斯又被胡亥与赵高杀死，比起这二人，扶苏还是比较受百姓欢迎的，而蒙恬也很有威信。但是政权被胡亥、赵高掌握了。秦二世比秦始皇还残暴，刑法更苛刻严厉，绝对算是个暴君，使得秦朝又多了一条灭亡的理由。

5. 秦朝灭亡

秦始皇与秦二世，极度耗费民力，秦二世甚至将农民和残弱百姓也征调到阿房宫去役使，徭役如此沉重，赋税，尤其是田租上涨到收成的 $\frac{2}{3}$ ，使农民无法负担，他们为了寻找生存之道只能选择起义。公元前 201 年，秦二世元年，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史书上记载，陈胜和吴广以及许多贫苦的百姓被朝廷征调到北疆戍边，他们在行进的路上遇到许多困难，无法如期到达指定的地点，秦朝法律规定，这种行为按秦法全都要被处以死刑，为了活命，陈胜劝告大家将监军杀死，发起起义。很快，全国许多地方都积极响应，起义的百姓攻占城市，夺取许多郡县，把那里的官员杀死。公元前 208 年冬天，由陈胜率领的一支强大的起义军来到咸阳城外，都城内部乱成一团，由于受到朝廷军队的保护，没有被攻陷，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不久，陈胜被杀死，而吴广在他之前也因被人中伤而遭杀害，但是，这都没有阻止起义的发展，全国各地继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也纷纷发动起义，他们共同要求推翻秦朝的政权，大多数起义队伍中的领导者都是坚决反抗秦国的志士。但是，他们不仅与秦帝国为敌，而且还不遗余力地镇压人民运动。

帝国军队节节败退，公元前 207 年末，起义军攻陷了都城，秦朝灭亡了。这时，旧贵族所率领的队伍收买了起义者中的一部分，他们分裂起义，人民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了。统治阶级各武装力量之间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流血斗争。

三、西汉王朝的兴衰

1. 楚汉之争

公元前 206 年，在全国众多武装力量之中，出现了两支

最强大的队伍。一支是由贵族出身的项羽率领，另一支是由当过小乡亭长的刘邦率领。楚名将项燕有一子名项梁，陈胜反秦的消息传来后，就同他的侄子项羽杀秦会稽郡（治吴，江苏吴县）守，在吴起事，精兵八千任其调遣。项梁采纳谋士范增的计策，立楚怀王孙心做楚王，仍以楚怀王为号，自己引兵到定陶（山东定陶县）。几次出战告捷后，项梁便骄傲起来，起了轻敌之心，结果秦将章邯集中兵力，使得楚军大败，项梁被杀。章邯打败项梁以后，也骄傲起来，看不起楚军，率大军渡河攻赵，围钜鹿（河北平乡县）。公元前207年，项羽救钜鹿，遇秦军大战九次，楚军拼死一战，以一当十，杀声震天。当时各国来救赵的有十多支军队，却都吓得面无人色，不敢出战，对楚秦交锋只作壁上观。项羽大破秦军以后，各国兵都归服于他，项羽自号“诸侯上将军”。楚军继续推进，不久章邯率全军投降。起初山东人民被征到关中服徭役，受到秦官吏的百般虐待，这时候对秦降兵报复，激起秦兵的愤恨。项羽引兵攻秦，怕降兵和关内秦兵里应外合，在新安（河南渑池县）城南将秦兵二十万人全都活埋。秦主力军到这时已被全部歼灭。钜鹿大战成为灭亡秦朝决定性的一战。若没有这一次大胜，起义者会受到很大打击。但大量惨杀秦兵，使关中秦民恼恨项羽残暴的同时，更坚决地拥护刘邦，所以说虽然项羽军事上大胜，政治上却大败了。陈胜、吴广开始起义的两个月后，刘邦在江苏也举起

义旗。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208 年，刘邦受命押送役夫去修筑皇陵。途中遇到大雨，道路泥泞有许多人逃跑了。刘邦畏罪，与残余者商量举事，暂时藏身在附近山中。附近百姓马上纷纷加入，起义的规模渐渐庞大。起初，这个起义显然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但是不久以后，刘邦不信赖自己的力量，而与贵族所率领的强大军队结成同盟。刘邦是个圆滑谨慎的人，既善于拉拢人民群众，又和贵族将领打成一片。刘邦率军所到之处就与民约法三章，宣布免除赋税和徭役，废除秦法，释放因“罪”沦为奴隶的犯人，结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同时，刘邦又极力笼络贵族代表人物。这种两手政策保证了他的成功。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在今陕西和四川两省立住脚后，与项羽争夺帝位。经过四年的紧张争斗后，刘邦巧妙地利用项羽营中的矛盾，拉拢最有能力的将领。公元前 202 年，刘邦终于大败项羽，自立为帝，定都长安。

刘邦在战胜项羽前曾据有汉地因此所建朝代以“汉”为名。史称前汉或者西汉（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5 年）。虽然实际上刘邦于公元前 202 年自立为帝，但史书都以公元前 206 年为西汉开始年，因为秦二世是在公元前 207 年末投降刘邦的。

刘邦夺权以后，立即下令，解散一切私人武装。他号召居民重操旧业，官吏恢复旧职。所有的百姓要回到自己的土

地上去。另外，刘邦还下令修理和恢复遭受破坏的灌溉工程。

在这样复杂和紧张的情况下，汉高帝刘邦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在位七年，一直努力为与民休息准备各种条件。为了与民休息，刘邦采取了以下措施：

建立汉制——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孙通定礼仪，汉朝制度基本上沿袭了秦制，很快建立起来。相国萧何提倡节俭，完全按照律令处理政事。老百姓都称赞他“萧何为法，较（时）若画一”。秦项大乱使得人民饱受战祸，穷苦已极，汉建立律令后，生活安定有了保障，人人自安，政权得到了巩固。

打击商贾——秦时徭役沉重，商贾趁机重利盘剥穷苦百姓，收买田宅子女。被征之人或者服苦役而死，或者被商贾索债逼死，苦不堪言，因此当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汉高帝亲自看到这一点。战争期间，商贾操纵物价，任意上涨，米一石要卖五千钱或一万钱，马一匹要一百金，老百姓没钱买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况，饿死无数。商贾之祸甚至猛于战祸，这又是汉高亲自看到的。因此，他登上帝位以后，禁止商贾穿丝织衣服，禁止携带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禁止做官，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要无罪释放，算赋比常人加倍。这种强制性的法令，使富商大贾受到沉重打击。结果有些商贾因为破产而铤而走险掀起叛乱。但另一方面商

贾受罚，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

汉帝国取法秦朝，实行郡县制，县下再设乡。一乡大概有一百个里（村）。不过，这种行政划分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2. 七王之乱

汉高帝及其子孙的统治主要是依靠土地贵族阶级。而对于秦始皇时代在社会上占有特权地位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则大力地打击抑制：规定他们不得穿着绸缎、携带兵器、乘车乘马，并且他们本人或是他们的子孙，都不得当官。对商人征的税也高于社会其他成员。在对秦朝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先秦的贵族人物就和刘邦联合起来。刘邦为了讨取这些贵族的欢心，恢复两个被秦始皇废除的古代高级贵族称号——王和侯，对自己以前的部下和部属实行分封，也就是说除了王和侯的称号外，皇帝还赐给他们世袭领地。

刘邦本人也意识到王侯的威胁，他不信任封爵贵族，并恐怕他们的势力增大，他逐渐杀死了几乎所有异姓贵族。汉高祖刘邦采用各种方式，数年间把统一的障碍全部扫除殆尽。楚王韩信被废时曾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国当烹。”刘邦的这种杀功臣的方式是顺应历史的，正如韩信知道的那样。汉高祖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陆续分封同姓子侄：封儿子刘肥为

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又封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的重要官吏要由汉朝廷派遣，法令也由汉朝廷制定，诸王在分封的时候还都是孩子，所操纵的权力也远不如异姓王那样大，朝廷因此有时间来发展壮大自己的统治力量，这些半割据的同姓王国尚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继刘邦之后的几个继位者执政时期，有几个同姓王的势力渐渐强大。加上匈奴开始经常进犯北方边界，他们的势力和独立趋势逐渐威胁到朝廷。公元前 177 年，匈奴渡过黄河，重新侵入并占领了鄂尔多斯台地。从此，匈奴不断入侵中原腹地。由于外来的危险，帝国内部分裂势力的肃清问题已迫在眉睫。

政府竭力削弱诸王的力量。许多诸侯王因违犯法纪，政府便趁机将其土地收回。有时诸王死后没有直接继承人，他们的领地便被分为若干更小的部分。政府不失时机地任命国家官吏担任诸王封地上的高级官职。在刘启在位（景帝，在位时间：公元前 156 ~ 141 年）时，他的近臣晁错将削弱诸王的政策坚决执行下去。

晁错首先对刘邦的侄子刘濞开刀，他是诸同姓王中力量最强的一个。刘濞封地在现今的江苏、浙江两省境内。汉高祖时期废除了秦币（公元前 205 年），自由铸钱得到允许。刘濞因所在封地盛产铜，大量铸钱，司马迁在《史记》中记

载，他的钱“布天下”，他本人则“富埒天子”。除此之外，刘濞还煮海盐。经济实力的壮大，使刘濞渐渐专横起来，他拒绝进行诸王每年应该做的朝覲纳贡。最终刘濞的所做所为遭到了晁错的弹劾，其他几个势力稍大的王也遭到了弹劾，晁错以其“不忠于君”的罪名，要求皇帝收回给他们的封地。为了保全自己，以刘濞为首的封爵贵族在公元前 154 年掀起叛乱，即历史上的“七王之乱”。

七王暗中勾结匈奴，要求匈奴在他们起义时进犯汉王朝的边境，并以此为要挟，要求“诛晁错，清君侧”。皇帝为了恢复国内和平，诛杀了晁错。然而这样做不仅没有使叛乱者安静下来，反而使他们得寸进尺。刘濞甚至公开“僭号称帝”。朝廷费尽心思，经过数月的努力，终于把叛乱平定下来。叛王一部分被诛，一部分自尽，他们的家属亲眷一概沦为奴隶。

“七王之乱”平定以后，政府加大了削弱诸王权力和夺取他们领地的力度。以前诸王死后，由长子继承他的封地和爵位，现在每个儿子都要继承封地。诸王的行政权被撤消了，由中央政府任命官吏管理封国。在汉武帝刘彻（公元前 140 ~ 前 87 年）统治时期，诸王的兵力和权力就被彻底地剥夺了。

3. 汉武帝改革及对外扩张

西汉王朝巩固内部和对外加紧扩张的时期，是在武帝

(公元前 140 ~ 前 87 年) 的统治时代。

① 汉武帝强化皇权

公元前 154 年“七王之乱”被平定以后，又实行了许多合理的措施，到武帝统治初期，汉王朝出现了安定的强盛局面。但是，拥有封爵的土地贵族仍然拥有很大势力，朝廷对他们深感不安。武帝即位后，转而依靠中层地主和高利贷商人，而这些人支持国家政权强大的，这样武帝就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和确立皇帝的独裁专制。

武帝强化皇权的第一步，是削弱相权。西汉初年，丞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丞相是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首长，既可以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也有权决定国策方针，另外荐任官吏、诛杀犯官，甚至是谏止帝命、不执行皇帝的诏命都是法律许可的。丞相位高权重，可以佩剑上殿，朝觐不必行三拜九叩之礼；丞相进见皇帝，皇帝要起身致意；皇帝在路上遇到丞相，要为之下车；丞相有病，皇帝要亲自驱车探问……相权渐渐凌驾于皇权之上，就必然要和君权发生冲突。汉初的几位丞相由于有军功在身，名望又高，而且多能小心谨慎，明哲保身，所以矛盾是比较缓和的。汉武帝用人为相很有见地，他曾以唯唯诺诺的人物为相。不过伴君如伴虎，加之武帝对丞相要求严格，稍不如意，便当廷训斥，动辄处死。武帝在位五十年，先后有十三人任丞相之职，其中有五人因过自杀或被杀，三人因过被免职，只有石庆等少数几人保全了

身家性命。因此，武帝时，大臣们不敢接受丞相这一任命。如公元前 103 年，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顿首涕泣不肯接受，最后在武帝严辞相加之下才接受。退朝后，公孙贺仍喃喃道：“我的死期到了！”最后公孙贺果然在公元前 91 年下狱而死。

武帝一面加紧对相权的削弱，一面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的人以及现任的一些低级官吏中，选拔贤能，在他们的本职以外，任命他们兼任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这些人就成为皇帝身边近臣。他们可随意出入宫闱，随时侍候左右，出谋献策参与政事。尚书的职权被扩大了，成为皇帝的有力助手。尚书，原本只是为宫廷理财的少府属下的一个小官，负责帮助皇帝、丞相向彼此传递文件。汉武帝初年任命宦官为中书，尚书还在其下。这样，侍中、常侍、给事中、中书等慢慢变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中朝”或“内朝”。相对于“中朝”来说，以丞相为首的朝臣就成为“外朝”，只负责处理和执行一般政务。皇帝为打击相权，加强皇权，依仗中朝。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

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武帝需要有力的思想武器。

公元前 140 年，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从此占据了思想意识的主流，成为统治思想。

儒家思想为什么会成为统治思想，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着独尊的地位呢？究其原因在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实行君主专制，统治者重视等级和名分，强调君主的皇权天授，惟我独尊。而在诸子百家中，尤其是在影响最大的儒、墨、道、法四大学派思想中，道家主张无名、无为，墨家提倡兼爱、尚贤。两者都无法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法家提出君主要树立权威，但它过分强调苛令刑杀，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和长久。只有儒家，讲求长幼尊卑的等级名分，讲求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适应了统治者统治天下的需要。况且在发展过程中，儒家学说也吸收了阴阳家、法家、道家对维护统治，加强专制有用的内容，成为新儒家。

儒家能居于独尊地位并被改造成新儒家，董仲舒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董仲舒学说是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核心的。他认为上天创造了宇宙万物，人世间的一切都由天来主宰。上天刻意地安排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国家兴衰、王朝的更替。人更是天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的形象来自于天的形象，“发，像星辰也；耳目戾戾，像日月也；鼻口呼吸，像风气也；胸中达知，像神明也；腹胞实虚，像万物也”。董仲舒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假造了一些证据，如认为天有十二个月，所以人体有十二个大骨节。天有 360

天，所以人有 360 个小骨节。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人只有 206 块骨骼。董仲舒进一步论证在人被天有意识地创造出来以后，为了使天人能互相沟通，天还设置了皇帝，即所谓天子。董仲舒从王字的构造来阐述人君的作用。他说：“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他认为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即“君权神授”，所以，皇帝统治的好坏将由上天以凤凰来朝、灵芝等祥瑞和日食、地震等灾异来示警。

董仲舒在当时提出“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不仅使封建统治理论系统化了，也把儒学神学化、宗教化了。

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取得，社会上掀起了传播研究和整理儒家经典的高潮。今古文经之争也随之出现。所谓“今文经”，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太学中所教授的大都为今文经；“古文经”是用汉以前的小篆写成的，于武帝末年被发现。今古文经由于书写文字不同，加之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经师在传授和讲解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两种自然相背的思想体系和派别，二者之间不断争辩，即今古文经之争。今文经学派，为了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而古文经学派则视儒家经典为古史材料，他们从字面上进行释经训诂的工作，以实际来阐明儒家的道理，提倡复兴古典儒学；今文经学派自汉武帝起，一直得到官方

的支持。

③征讨匈奴

捍卫帝国、免受匈奴部落的不断的侵扰的任务，是汉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

匈奴从殷周以来，一直骚扰汉北方边境，成为朝廷的隐患，秦末到汉初三、四年间，匈奴族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它向东横扫东胡，占有内兴安岭辽河上流地区；向北荡平浑碯、屈射、丁零诸部，匈奴的铁骑甚至到达贝加尔湖；向西赶走大月氏，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俯首称臣，祁连山、天山一带都成为它的统治区域；向南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威胁到了西汉北边郡县。亚洲东部沙漠草原也成了匈奴之物，匈奴将辽阔的统治区在行政上划分为东、西、中三部：中部由单于直接统治，东西两部各设左右贤王分治。单于所在地被称为龙廷，是匈奴的政治中心。匈奴的政权是一个庞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拥有三十万骑兵，中原汉地对它而言是块肥肉。冒顿单于曾对汉文帝表示：“诸引弓（游牧骑射）之民，并为一家。”如此明显的觊觎之心，可见匈奴实在是个大威胁，大隐患。

西汉前期，因国力尚弱，朝廷对匈奴持忍让态度，采取和亲政策，希望以此安抚匈奴。然而自匈奴强盛以来，愈发骄横，连年入侵边境，威胁到边民的生命财物安全。

公元前 133 年，汉武帝对匈奴正式开始进行讨伐战争，

汉武帝制订了详细周密的作战策略，他的计划是：在西方，切断匈奴与青海羌族的联系（到汉宣帝时，名将赵充国用屯田法招抚了羌族，从而切断了羌族与匈奴的联系），与此同时派使者出使西域，寻求同盟国（张骞完成这项任务），以夹击匈奴；在东方，切断匈奴与傒族的联系（公元前 128 年苍海郡的设置实现了这一目标）；在陇西代郡（治广昌——河北涞源县北）一带集中汉朝优势兵力，正面进攻匈奴。汉政府在这个战略计划下开始了对匈奴的长期战事。

战争之初，武帝只不过想保卫国土的完整和安全，而到了后来不能说武帝没有产生扩张疆域的想法。公元前 127 年，匈奴又被逐出鄂尔多斯台地，退守河套沿岸。之后西汉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在公元前 124 和前 123 年两次出征，终于把他们赶出北部边境。在这数次出征中武帝开始努力地将各地纳入汉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此后武帝在北方和西北方的用兵就明显带有这种目的。

④张骞出使西域

在对匈奴的用兵过程中，汉政府认识到：可以跟从前中国所不知道的西域各国通商。公元前 138 年，汉中人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拘禁了十年，逃脱后，越过葱岭、大宛（苏联乌兹别克工共和国费尔干）、康居（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的一带地方），抵达大月氏。其时大月氏在妫水（阿姆河）北岸建立王朝，并击败妫水南

的大夏国，已经过了游牧时代，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安乐稳定，不愿东来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那里停留了一年，无法劝服大月氏，只好回国。归途中又被匈奴囚禁一年多。恰逢公元前 126 年，匈奴内乱，张骞才得以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开始出使时随从有常邑父等一百余人，经过 13 年的时间后，只剩下张骞、常邑父两个人回到长安。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但却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带来了有关远西诸国的信息，如各国的地理物产风俗的情况等。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出使西域，是人类外交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张骞在出使过程中了解到许多国家的情况，比如身毒（印度），还有更远的西方的一些国家，其中包括安息（阿尔沙克王朝的帕尔提亚）。由于张骞的出使，中国才开始知道西方国家愿意跟中国通商。从这时起，对汉来说，开辟中国通往西域各国的商路并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就具有重要意义了。

出于对这一点的考虑，西汉政府对匈奴的用兵路线随之改动了一些。从前出征匈奴时，是从山西北部出发的，而自公元前 121 年起，出发点转为甘肃。从这时候起，武帝对西北用兵已经开始以夺取整个甘肃地区为目标了，这样有名的“丝绸之路”就出现了，与西方通商因此具备了可能性。由于公元前 121 年霍去病几次出征的胜利，匈奴被赶出甘肃，断绝了与西藏高原各联盟部落的联系。在公元前 119 年的战

争中，匈奴大败，不得不更向北撤退。这些征伐捕捉了大批战俘，使匈奴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从匈奴手中夺取甘肃地区后，政府在金城到敦煌之间建筑起一条坚固的防御工事线，并在那里设置了军屯和民屯。甘肃分置数郡，“丝绸之路”就从这里开始通往西方。

这条道路以长安为起点，西经甘肃境内，通往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通往疏勒。南路沿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经过和阗和莎车；北路经过吐鲁番、龟兹和姑墨。从疏勒起，商路又分叉各自通往大宛和大夏，经由大夏又通往安息和印度。中国人对甘肃的控制力加强以后，许多中国的商队都取道甘肃。

为了巩固中国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征伐塔里木流域的敌对势力。这次出征的胜利保证了“丝绸之路”南线支路的安全，也为武帝所计划的大规模出征大宛创造了便利条件。

⑤李广出征大宛

大宛盛产宝马大宛马，中国人称之为“天马”。汉政府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量马匹，战马的缺乏影响了军队作战，出兵大宛掠夺大宛马也就成为出兵目的之一。

公元前104年，汉朝名将李广远征大宛，历时两年，无功而返，当时汉朝军队很顺利地到达罗布泊，但粮草的匮乏使继续前进成为一大难题。李广军经过塔里木盆地，当地居

民拒绝供给汉军粮食，汉朝军队只好围攻城池，以取得粮食。当时就此事李广上书皇帝，“士卒不患战而患饥”。士兵也因此饿死大半，不得不引军东返，连大宛首都贵山城都没有到。这一支军队只有 1/3 到达敦煌，其余都死于路上。

皇帝听到这次失败大为震怒，下令第二次出征。公元前 102 年，经过两年的准备，李广率领六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再度远征。这支军队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大宛的首都。军队先断绝了贵山的水源，然后围攻城池。大宛王在城中混乱之中被杀。大宛国答应只要军队不进城，就把几千匹宝马进献汉廷。李广害怕强大的康居军队前来增援大宛，就同意了他们的条件，罢兵解围，带着大宛马，回到了国都。这次出征的胜利使大宛承认自己是中国的属国，也巩固了中国人在东土尔克勒坦的霸主地位。汉朝在战胜大宛以后，立即在敦煌以西的整个“丝绸之路”上修筑碉堡，设立商站。在军事要地，都派汉朝军队驻扎和屯田。

⑥出兵南方和东北

早在开始夺取“丝绸之路”之前，武帝就曾打算控制西南边陲的商路，同时使中国南部领土完全臣服于汉。

越地内部并不稳定，诸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公元前 138 年，汉干预南部各国之间的斗争，并且使越乐海国俯首称臣。此后，武帝立即准备对南越的用兵。在此之前，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方情况，武帝于公元前 135 年派富有经验的唐

蒙前去南越，唐蒙发现了当时中国人还不知道的一条水路，由四川沿西江至番禺。几年以后，汉军就是通过这条水路到达的。

公元前 110 年大败匈奴以后，征服南方各国的计划又重新提上日程。统一西南各郡以后，正如史家班固所指出的那样，武帝打算把汉帝国与大夏连接起来。但是，由于西南各部落还有未平息的顽抗势力，中国始终没有打通通往印度和大夏的南方商路。

南方用兵告一段落后，武帝立即对东北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攻打位于朝鲜北部的朝鲜国（卫氏朝鲜）。如前所述，在汉朝建立以前，就有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向这些地区迁移。在北朝鲜境内，有许多居民是从东北迁去的。公元前 2 世纪初，此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就是朝鲜。朝鲜统治者与汉朝友好相处，但是同时又保持着相对独立，偶尔进犯中国的辽东地区。

因为这一点，武帝很早就想进军朝鲜，不过，由于西北和南方牵制着大部分兵力，所以暂时没有行动。公元前 109 年，武帝以朝鲜王杀死汉使为借口，派“讨伐队”征朝鲜北路，由海陆两面夹击朝鲜国都，汉朝军队围城数月毫无进展。到公元前 108 年夏季，由于内讧，朝鲜王被杀，朝鲜才投降，战争结束。朝鲜领土并入汉帝国，置四郡，由中央任命汉官进行统治。自此，中国和朝鲜北部的贸易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在古乐浪（现今平壤）境内的考古学发掘证明，汉帝国极遥远地区的物产都曾传到这里。乐浪海外的倭人（在日本），分立百余小国，正是由于中朝关系的发展，使他们得以通过乐浪与中国有所联系，汉文化才开始传播到日本。朝鲜臣服后，汉与南朝鲜各国展开贸易和政治关系的条件具备了，一部分中国人也开始向这个地区迁移。

4. 王莽改制与“绿林”、“赤眉”起义

①王莽改制

这时的汉朝廷由外戚专权。幼帝继位时的辅政之一是外戚，大司马王莽。此人早有意于皇位，是个极负政治野心的人，他在短期内便赢得了一部分朝廷显贵的支持，公元8年，他发动宫廷政变，取得了政权。公元9年，王莽宣布自己是“新”朝第一代皇帝，并且立即宣布他要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实行改革政策。

王莽的改制得到了儒家学者在思想上的极大支持。儒家的乌托邦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迅速发展，它提倡恢复古制，回到似乎无富无贫、国家大同的“黄金时代”。王莽宣布说，他的改革目的就是要恢复古代儒学经典所记载的、远古“天下”存在过的秩序。他屡次引用《周礼》上的话作为根据，这部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保存下来，现为一个儒家学者发现。事实上，新的王莽政权正在给改制寻找

理论依据，当时的儒生对《周礼》的阐释迎合了这一要求。

公元 9 年，王莽下诏禁止土地和私属的买卖。他宣布一切土地都是“王田”，是朝廷的财产，私人不得买卖。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多田的人应把田分给少田或无田的人，国家有权这样支配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而田超过九百亩，应将多余的田地分给当地没有田的人，按男子的口数每口给田一百亩。

私属即家奴、私奴、奴婢（区别于朝廷所有的官奴婢），家主不得随意买卖。

买卖王田和私属将处以重罪，重则处死，轻则流放边疆服役。

另外，王莽又宣布恢复了儒生所倡导的古代土地制度，即“井田制”。按照这种制度，每家所有土地均在百亩以内（约 2 公顷）。诏令中说：“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但是，在当时这一条根本无从实行，只能是一纸空文。王莽的改制本意并不在于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土地。他只不过是减缓土地兼并及大量自由民沦为奴婢或私属的速度。

王莽之所以限制商贾的土地兼并，主要是要分享商贾的利益，保证国家的税收。公元 10 年，五均六管法开始颁布实行，一直到新朝灭亡时才停止。

王莽的改革并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好过一点，他的改革没能使农民从破产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也未能对商贾高利贷的

债务盘剥有所抑制。地方官吏的不合作及阳奉阴违和贪赃舞弊只能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受到另外一种方式的盘剥压榨。

由于各项改革都需要资金来支持，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和征伐匈奴也需要消耗国家收入，在王莽执政时期，人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地加重了，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其中由于扩大国家专营事业而征收的间接税成为尤其沉重的负担。在重新对匈奴展开战争以后，兵役也加重了，到这时候服兵役的年龄提前到了十五岁。农民交的田赋率上升了。对手工业者和一些有某种职业者增加了沉重的货币税。即便是养蚕、狩猎和捕鱼的人们也要上税了。

② “绿林”、“赤眉”起义

王莽的改革使得平民百姓民不聊生，同时也引起地主和贵族的强烈不满，阶级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激化了。其结果是，农民大起义很快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

公元 17 年，荆州地区的饥民推举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为“渠帅”，聚众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发动起义，因此史称“绿林军”。不久，马武、王常、王丹等也率队伍加入，几个月间起义军壮大到八千人。绿林军在王匡的领导下打击地主豪强，深得贫苦农民的支持和爱戴。王莽也曾派人前往招抚，但走投无路的农民，只能铤而走险，所以收效不大。公元 18 年，王莽任命大司马费兴为荆州牧，

令他平定绿林军。临行前，王莽问及费兴镇乱之策，费兴主张取消“六管”，令流民返回家园，由政府贷给他们耕牛、种子，减轻赋税，如此便可平定民乱。结果王莽听后大怒，撤掉了费兴的官职。公元 21 年，王莽又派兵二万进攻绿林军，被王匡击于云杜（今湖北京山），大败，数千人被杀，辎重尽失。绿林军乘胜推进，势力达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北）等地，当起义军再聚众绿林山时，已有五万之众，王莽的州郡政权对他们也无能为力。然而第二年，绿林山爆发了一场流行疾疫，起义军损失大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绿林军兵分两路各自发展：一路是王匡、王凤率领的“新市兵”，北入南阳；一路是由王常、王丹领导的“下江兵”，西入南郡。公元 22 年七月，平林（今湖北随县）人陈牧等聚众数千，号“平林兵”，加入“新市兵”，刘秀和其兄刘彊也率宗族、宾客七八千人于舂陵（今湖北枣阳）起兵，称“舂陵兵”。这两支军队的加入使起义军的力量大大壮大了。

起义的第二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也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举起义旗，并得到青州、徐州广大地区灾民的支持和拥护，在一年时间内起义军发展到万余人。樊崇领导的这一支起义军以泰山为根据地，在淮河、黄河流域和官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樊崇的军队发展了一整套组织纪律规则。义军没有设置文书、旌旗、号令。在义军内

部，首领被称为“三老”，往下依次是“从事”，“卒史”，起义军之间互称“巨人”。义军口头上规定纪律进行约束，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口号。义军兴起的淮、黄流域，是王莽政权的经济中心之一，因此，王莽惊恐万分，下令各地方州县立即剿灭乱军，官吏“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冀平太守田况率军镇压，大败于姑幕（今山东安丘南），损失一万余人。樊崇义军声势日大，震怒了王莽，公元 21 年，王莽派太师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前来镇压，但樊崇用兵灵活，不仅使官军一无所获，而且还杀了太师景尚。义军战斗力日益加强，实力日渐壮大，旬日之间发展到十余万人。王莽在败后第二年又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康丹率领十余万大军，准备荡平义军，他们迅速攻占了索卢恢率领的义军所占领的无盐（今山东东平南）。在消灭了索卢恢的一万多义军后，王匡又挥军南下，兵锋直指樊崇义军的董宪部。面对强敌，樊崇让义军把自己的眉毛染红，从此，樊崇的义军人称赤眉军。部署完毕后，赤眉军在无盐的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南）投入全部兵力与王匡决一死战，结果大败官兵，歼敌万人，杀康丹及其属下二十余名将领，只有王匡逃脱。无盐之战后，赤眉军还攻莒县，辗转东海，进军楚、沛、汝南、颍川，还入陈留、攻鲁城、进濮阳，其势如破竹，在黄、淮平原上所向无敌，很快发展到三十余万人。赤眉军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

活动在中原的绿林军。

绿林军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于公元 23 年二月，拥立汉宗室刘玄为帝，依然以“汉”作为国号，建元“更始”，历史上称这支义军政权为更始政权。

看到官军节节败退，王莽深知大势将去，他千方百计想挽回败局。他先是颁行新历，妄想通过改行新历来“销解群盗”，或者自己升天成仙。然后又建九庙，希望得到祖宗的保佑，化险为夷。

公元 23 年九月，绿林军取道宣平门进入长安，在城内百姓的支持下，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在了渐台，人民对王莽痛恨到了极点，其尸被肢解，甚至连舌头也被人们分食。

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消灭王莽的同时，北上的绿林军也攻克了洛阳。这样刘玄迁都洛阳。公元 24 年二月，刘玄将长安定为都城。定都后，刘玄认为天下已定，志得意满，便大封宗室，重用原先的权贵。渐渐地生活变得奢侈腐化，对臣子的建议也接受不了，甚至还将其下狱问罪，并杀害了农民将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人，他的行为终于使更始政权失去民心，一些农民军将领辞官离朝。

另一方面，赤眉军在刘玄迁都洛阳时正在濮阳一带作战，刘玄招抚赤眉军后，却只是封樊崇等人为侯，不给国邑领地，也不加以重用。刘玄也因此失去了樊崇的支持，不久樊崇离开刘玄，举义旗倒戈，连创刘玄军队。公元 25 年，

樊崇进攻长安，十五岁的宗室后裔刘盆子被拥立为帝，自号建世元年。这年九月，长安被攻克，刘玄被处死，更始政权亡。绿林军余众转投入赤眉军。

5. 西汉时期的文化

① 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等于找到了认识西汉今文经学本质的钥匙，下面要讲的就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发展盛况，从中不难看出其本质。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随着五经的分化《易》分四家，《诗》、《书》各分三家，《仪礼》及《春秋》各分两家，共十四家。

今文经指博士教授弟子用的，以汉朝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而掺杂着阴阳五行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繁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朝廷把它当作士人至仕的必读书，无疑可以有效地控制士人，让他们头脑昏胀空洞，在利禄路上一辈一辈地追求下去。

古文经是用战国及秦代通行的篆文书写的经书，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就是古文经学。其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二）极少迷信甚至排斥迷信。此点与今文经学讲究阴阳五行的趋向不同。（三）少

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今文经学又明显有别。但缺乏进步思想则是两种经学的共同特点。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他们二人的无神论思想正是吸收古文经学的思想发展而成的。

②史学

司马迁之父司马炎，为武帝时的太史。他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周易》及黄老之学。他以黄老学说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司马迁自幼习耕种和放牧；十岁始读古文典籍；二十岁之后走遍全国各地并注重收集当地的遗闻佚事。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匱（宫中藏书处）时所藏之书。除继承其父之家学以外，司马迁还兼通今古文经学，尤其是董仲舒的《公羊》学说，但同时又不受其束缚，不拘于学说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公元前 99 年，由于替叛将李陵辩护触怒了武帝而被施以残暴的宫刑，这对他简直是奇耻大辱。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史记》，希传诸“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不为阿世，不为个人谋取私利，故敢于秉笔直书且态度极其认真严谨。他著《史记》只为“成一家之言”，与经传一比高下，故竭尽其平生所学于《史记》一书的写作之中。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

年的时间写成《史记》。原篇一百三十，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元年，是一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巨著，但凡当时存在的史料，全部被综合在《史记》里面。

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那么班固的《汉书》则开了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汉书》虽叙事详实严密，但却缺乏《史记》中相对自由的思想。此后被称为正史的各代纪传体史书，虽比不上《史记》、《汉书》，但仍在各类史书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之后的大学问家刘向、刘歆父子，相继完成《七略》，对总结整理古代文化有突出贡献。

《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特别是战国的文化遗产，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诸多程序后成书，并给予学术上的总论、分论，是一部结构完整，内容详实的宏篇巨著。它不仅是目录学、校勘学的源头，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史记》、《七略》在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③文学

北方文士从屈原的楚辞那里得到启发，创造了赋这种新的文学体裁。战国人荀卿曾作赋，秦代也流传有杂赋九篇。汉赋主要源于楚辞。西汉流传有赋一千多篇，赋既是西汉文

学的代名词也成为当时文学家的专业。枚乘、贾谊是西汉前期写赋的著名代表人物。西汉中期赋发展到极盛阶段，此时的杰出代表司马相如成为汉代最大的辞赋家。西汉后期汉赋大家扬雄的作品以构思深沉、用辞精准著称于世。由此可见他作赋构思之精深，因此尽管他的赋篇篇皆有模仿他人之痕迹，难免落入俗套，但由于构思独特仍自成一家。人们说到汉赋代表人物时往往扬、马称，原因也在于扬雄的模拟有其独到之处，远非一般庸才的陈陈相因。

赋曾在从西汉至六朝的时期里独领风骚。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擅长用优美的韵语细腻而生动客观地描述各种事物，而新事物又不断涌现，因此好的文士总能作成新赋。所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说的就是赋在文学上的作用。

无论乐府诗歌（五言古诗）的形式如何变化，它始终是主流文学之一。

汉武帝效法周朝到民间采诗的制度，专设乐府以广泛采集民间的诗歌，并任命大音乐家李延年为乐府的最高长官——协律都尉，音乐家张仲春协助其工作。协律的乐器是由丘仲所制造的笛子。乐府所采集创作的诗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朝廷所专用，诗作者多为司马相如等著名的文学家，有时甚至多至数十人，主要作品如《汉书·礼乐志》所载之《郊礼歌》十九章等；民间诗歌则是乐府诗歌中的另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

西汉前期，散文的言语、文辞并无明显的分别。如用楚语写成的汉高祖诏书与用齐语著的《春秋公羊传》二者除个别言词，与普通文辞并无分别。到汉武帝时期，二者开始显著地分离开来。

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如下：（一）由于当时儒学独尊，朝廷诏书多用古语古字。（二）辞赋发达，文士们开始写作骈体文。不过，西汉时期，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西汉散文还继承着战国诸子生动自然的文风。西汉散文的巅峰之作首推司马迁的《史记》，被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之外的，像贾谊、晁错、董仲舒、贾捐之、刘向等人的议论政治的文章也是散文中的名篇。唐以后说起的古文是指西汉以及汉以前的文体，而《史记》一般是古文家摹习的主要蓝本。

骈文即每句字数一样，积骈句成一篇称为骈文。很早的《诗》三百以及楚辞，作文讲究韵法，句法都很整齐，可算最早的骈文。经传诸子等散体文中也经常用到骈句或韵文。其实汉字本是单音文字，骈句骈文的出现是极自然的，非人为强求所致。西汉时期开始有文士开始有意识地写作骈体文，在散体文中加入了过多的整齐的句法，使形式更加整齐，文章也更加具有美感。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等篇，代表了西汉一代骈体文的发展水平。此后骈文在发展过程中完全成为辞藻的堆砌，内容与形式愈趋分

离，东汉以后的文辞，不再口语化，也不再容易理解。从此骈文过多地追求形式上的美观，而脱离了活生生的民间语言，表达思想的作用却愈变愈少，最后成为华而不实、不堪实用的文体。

四、从统一走向分裂的东汉

1. 光武帝建东汉

①刘秀称帝

地主阶级窃取了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后，就集中全力开始镇压农民义军了。远在更始被杀以前，地主阶级代表“萧王”刘秀的势力就很强大，现在成为了镇压义军的主力。

公元 25 年，刘秀改元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在加强了洛阳城防以后，募军进军长安，长安饥民遍野。“赤眉军”困在城中一年有余，最后弃城退往西北方向，企图得到别处义军的支援。结果没有成功，又受到刘秀的追击，只好折回长安，但没有支撑多久，就往山东方向撤退。公元 27 年末，他们几次在河南遭到刘秀的重创。经过宜阳城（长安和洛阳之间）一次大会战后，起义军的失败已不可避免。这时，其他各地的起义力量也已经被消灭。刘秀在镇压起义的同时，还颁布了部分奴隶被释、废除王莽的认令和减轻赋税的文告，这些文告动摇了部分起义者的决心。公元

29 年，“赤眉”起义宣告失败。

刘秀之所以可以迅速成功地镇压了起义，起义者内部组织性、纪律性都比较差是其原因之一。起义尽管覆盖的面比较大，但是各地的起义是分散的，缺乏统一的领导，带有自发的性质。这样他们的目的就不明确：或者只抢夺些粮食，或者只杀死官吏和富豪，释放奴隶，都没有提出统一的目标。起义者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只是在统治阶级的口号——恢复刘姓政权的口号下进行斗争的。

②光武帝重振汉室

在历史上以“光武中兴”而著称的光武帝刘秀（公元 25 ~ 57 年）是个有作为的君主，即位之后宣布天下太平，自己将效法高祖刘邦来治理国家。当时，起义的残余势力还尚未消灭，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刘秀一方面坚决而残酷地镇压起义，一方面颁布与民休息、减轻徭赋的诏令。

汉光武帝称帝的第二年，即公元 26 年，刘秀下诏令要求民间释放奴婢。从公元 26 ~ 38 年，关于释放官私奴婢的诏书共下达了七次。诏书特别强调扣留不放的家主以拐卖人口论罪，这就减少了诏书执行的阻力。他又给那些被父母出卖为奴婢的人制定了专门法律，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公元 35 年，连下三次诏书：（一）家主杀奴婢不得减罪；（二）家主以炙灼虐待奴婢，按法治罪，被炙灼者可免为庶民；（三）废除奴婢射伤人处以死刑的法律。这些法律禁止了家

主对奴婢的虐杀行为，允许奴婢有自卫权，使奴婢的生命安全有了法律保护，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护。

光武帝统治时期，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来调整国家经济，朝廷派官吏劝勉农桑，嘉奖勤劳垦田的人。国家将破产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人。对于外来移民，免去几年赋税和徭役。此外，光武帝还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一些地方豪族势力趁战乱时期积蓄实力，割据一方，中央政权受到威胁；经过光武帝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帝国的内政终于得到了巩固，打击了地方势力。

光武帝统治时期，东汉帝国开始强大起来，从而自公元 1 世纪中叶起，又开始实行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

公元 1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东汉政权的西南和越南北部一带出现了叛乱，当地的汉朝官吏被杀，在几年内当地脱离了汉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公元 43 年，东汉政府派将军马援率兵南征，平定了叛乱，此后越南北部（北圻）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汉王朝的臣服。

不久以后，汉政府对西北地区派驻了军队。如前所述，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由于匈奴控制西域，“丝绸之路”的贸易被迫中断。公元 73 年，东汉大将窦固出军远征匈奴，以恢复中国在西域的统治权，重新夺得中国对“丝绸之路”

的控制权，恢复和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由于东汉将领远征取得胜利，匈奴被赶出了东土尔克斯坦，“丝绸之路”在中断 65 年之后，又重新为汉政府所有。

中国政府不断东土尔克斯坦推进，这渐渐引起了它和西方贵霜帝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公元 90 年，贵霜帝国出军东土尔克斯坦东部，途中被班超的人马击败，贵霜王迦腻色迦被迫正式承认臣服于中国。《后汉书》记载了这件事：“月氏（即贵霜）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之后，皇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负责西域全境的事务。班超不仅是个出色的军事家，也是个好的地方行政官员。他守护西域 25 年以上，外交策略十分高明。他派人出使西方，跟各国建立通商和外交关系，其中还有人到达过波斯湾沿岸。

2. “黄巾”起义和东汉灭亡

① 统治阶级的腐朽

东汉统治阶级极端腐朽。汉是主张“以孝治国”的，光武帝时期，孝廉被视为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到东汉末年，孝道变成了人们沽名钓誉的工具，只做些表面文章。有一个叫赵宣的人，在双亲死后，为表示自己是个至孝之人，一直住在墓道中守灵。依制度，守丧三年即为孝，但赵宣二十多年一直不出墓道，所以被当地称为至孝。具有讽刺

意味的是，这个公认的“孝子”在服丧期间还与其妻生育了五个儿子。官吏不谙孝廉之道，就是贪残之官。东汉末年的官吏就是如此，对百姓犹如狼虎，盘剥榨取数不胜数。

当然，聚敛私财、吸食国家人民血肉的还是那些外戚、宦官出身的新贵们。例如外戚梁冀，控制朝政后贪财成性。一次，扶风富豪孙备因少给梁冀“贷钱”二千万，结果被打入大牢，重刑之下冤死狱中，事后梁冀吞并其资产七万。梁冀被诛后，查收其家产，达三十余万万，是当是国家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可见其贪婪。灵帝时一小县令杨觉，凭其父为中常侍，恃其势贪污，事发后查收其赃物无数。东汉后期以昏庸腐朽最为著称的还是桓、灵二帝。

在东汉的君主中，桓帝是最荒淫无耻的，他在位期间广纳民女充实后宫，达五千人之多，终日沉迷于酒色之中，因纵欲过度，三十六岁就死了。

灵帝与桓帝一样，也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君主，后宫储妃数千人。并且比桓帝还更爱聚敛财富，挥金如土。灵帝在继位前为解渎亭侯，家境贫困，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大张旗鼓地聚敛私财。为聚私财，他下令它国在进贡之时首先选出精品贵物交到管理皇帝私财的机构，这部分贡品称为“导引费”。就连宦官对灵帝这种行为也看不下去了，中常侍吕强曾对他说：“普天之下的财富，无不生于阴阳，都归陛下所有，为什么还要有公私之分呢？”灵帝对此充耳不闻，依然

如故。为了中饱私囊，灵帝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灵帝竟专设卖官机构——“西邸”，按官位高低明码标价，比如二千石的官位值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值四百万钱，其中德行好的可以少出一半钱，至少出 $2/3$ 。有钱的人可先交钱，没钱的也可到任后加倍补交。由于地区有富庶贫困的分别，所以大小相同的官职在不同地区价格也就不同，有的是肥缺，价格自然也就很高，灵帝对这些都有不同的规定。灵帝还给大臣分派了卖官的任务指标，即公每人要卖得一千万钱，卿要完成五百万钱。灵帝把卖官收入交给宦官保管，私财还用来开店铺，由宫女们当小贩，自己则换上商人的服装，驾驶驴车，在园内乱跑。

在朝廷中以皇帝为首卖官卖爵，在地方上各级官吏上行下效，盘剥百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饥不敢食，寒不敢衣”。在中国古代，天灾与人祸形影相随，已成规律。仅在公元 168 年到公元 178 年的十年时间，就先后发生了三起水灾，三起蝗灾，两次旱灾，四次地震，以至于古人以为这是上天示警，是天谴之告。这些天灾人祸对人们本来就很艰难的日子来说是雪上加霜，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② 东汉灭亡

在政权没落、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一次由自耕农、依附民及奴婢参加的大规模起义，即黄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

张角，巨鹿人氏，起义之前是太平道教的首领。太平道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信奉黄帝、老子，教义是《太平经》，又称《太平清领书》。据考证，原书应是甘忠进献成帝的《天官历色元太平经》，后来被东汉人干吉（或作于吉）演绎而成《太平清领书》，先后由弟子宫崇、襄楷两度献书于顺、桓二帝，都被以“妖妄不经”之罪而没收了。张角在宫崇献书时偶然得到此书。《太平经》的主要内容是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类。这本现存一百余卷的巨著中，尽管多是避谷食气、符诀神咒、鬼魂邪怪、求神成仙之类的迷信思想，也提到了一些对社会的改造建议和对太平社会的美好设想。这些建议，有反对严刑酷法的，有要求均贫富的。对于太平社会的设想是无刑而自治、财富为天下人所共有、人无贵贱皆天所生。书中所表现出的反剥削反压迫思想正是当时广大农民心中所想的。所以张角利用《太平经》创立了太平道教后，立即得到了大量劳苦民众的信奉和支持。

张角创教后，以“大贤良师”自封。他不仅传道，收纳教徒，还以符水咒语救病济世。由于张角颇有医道，病者在痊愈后对他敬若神明，纷纷入教。到后来，势力迅速发展，连朝廷也开始注意到，并恐慌起来，然而因为宦官控制时局，又有党锢之祸。朝廷混乱之际，并未采取措施对付张角的太平教。

趁朝廷无暇旁顾之时，张角有计划地向全国发展其教

众。他在全国各地分派了弟子传教，不到十年，太平教拥有教众数十万，太平教的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各州，即今天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山西、湖北、安徽诸省，张角在这些教众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把全国教众分成三十六方，教众万余人以上称大方，不足万人为小方，各有首领。

起义时机到来后，张角提出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组织和动员教众起事。所谓“苍天”是指东汉朝廷；“黄天”是太平道的至上神，也叫黄神，代表太平道教；“甲子”年就是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选定甲子年起事，原因是他认为甲子是干支之首，“岁在甲子”表示从甲子年始，大吉时代开始，要改天换地，改朝换代。

张角计划，在甲子年（即公元184年）正式举事。起事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国内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街头巷尾都在传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传言。在京城、地方郡县的门墙上，随处可见用白土写着的“甲子”二字，这是太平道教号召人民举事的暗号。

张角派出他的得力助手马元义去洛阳联络那里的教众，商讨最后举事日期。在举事正式开始之前，张角及教徒的准备工作是极秘密的，但随着这一组织的扩大、教众的增加及举事时间的接近，事情败露了。皇帝接到了暗探的密报，举

事领导者的名单被发现，起义的时间也被朝廷知道了，当时正在洛阳的马元义立即被逮捕处斩，京城开始搜捕太平教众。

消息传到张角那里，他飞书各地立即举事，起义者为了便于识别敌友，都以黄巾包头，张角自封开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黄巾”起义于公元 184 年 2 月开始了。张曼成率领南方义军，活动在南阳为中心的地区。波才、彭脱率领东方的主力活动在颍川、汝南一带，起义军兵分三路，从北、东、南三方向洛阳推进。义军所到之处攻城掠地，杀贪官、烧官衙，打开粮仓救济贫困，抢夺富家，分割田地，开监牢放囚犯。许多官员和贵族富户都逃走了。

张角所率领的冀州义军主力自起义开始，所向无敌，攻克了广阳（今北京房山）、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还斩了冀州刺史和广阳郡守。但与卢植的官军交战初期遇到了挫折，张角和张梁退守广宗，张宝固守下曲阳，两军成呼应之势。卢植因此集中兵力攻打广宗，他筑长墙，挖壕沟，先是使广宗外援无法接近，然后加紧制造攻城用的云梯，攻克广宗只是时间问题。正在关键时刻，卢植得罪了奉灵帝之命前来视察军队的宦官左丰，左丰回到洛阳后，向灵帝诬陷卢植钉敌不力，久围广宗而三月未下，是故意拖延战机，灵帝听信了宦官的话，卢植被押解回洛阳。

董卓代替卢植之职，攻城三月，仍无功而返。

就在颍川、南阳战事紧张之时，张角突然病逝，起义军由新任统帅张梁领导。八月，黄巾军在南阳和颍川的主力被消灭后，皇甫嵩被调到广宗，接替董卓对付冀州黄巾军，但皇甫嵩对此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时机。不久之后，黄巾军因为战胜了卢植、董卓和皇甫嵩，开始出现轻敌骄纵情绪。伺机而动的皇甫嵩立即于十月的某一深夜，出兵袭击黄巾军营盘，结果义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败，全军覆灭，主将张梁战死，其余五万将士赴河就义，没有一个人投降。

皇甫嵩消灭广宗义军后，对张角“剖棺戮尸，传首京师”。继而，曲阳又被攻下，张宝及其率领的十万义军全部战死，皇甫嵩以十万义军的尸体搭成高台，堆于城南，号称“京观”，以炫耀他的战绩。

就这样，规模宏大的黄巾大起义，在几个月的艰苦战斗后因为实力不够而宣告失败。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是这次农民起义给本已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以致命性的痛击，并且黄巾军的精神一直存在于民众中，各地的农民武装仍坚持斗争，长达二十余年，而各地官员豪强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也发展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力量，割据一方，与中央对抗。东汉政权因此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名存实亡。

公元2世纪末的“黄巾军”和其他的起义，表明汉帝国在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方面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起义镇压

者、“豪家”的首脑人物和汉朝的将领，集结大量的军队以后，便完全把失掉一切作用和威信的皇帝抛到一边。他们把人民起义运动血腥地镇压下去以后，就开始了残酷的争夺政权的混战。在斗争中最强大的势力是积极参加镇压人民起义的曹操、孙权和刘备。

曹操和他的劲敌进行了多年的血战以后，占领了中国北部的领土，杀死了汉帝，创建了魏国。孙权偏安东南一隅，建立了吴国。刘备在四川建立了蜀国。

起义使汉帝国受到致命的打击，终被灭亡，中国分裂成三个独立的国家。

3. 东汉时期的文化

①天文学

汉代许多星球、星座的位置都被当时的中国人确定，并编绘了天象图。当时的天文学家分天为 28 星座，并且认为它们都排列在北极星的周围。在他们看来，东、南、西、北四方各有 7 个星座。第一个观测太阳黑子的记录是汉代天文学家于公元前 28 年作出的。

张衡发明、发现了许多东西。反映天体运动的浑天仪就是他在世界上第一个创造出来的。他还经常进行实地的天文观测，并经计算后认为天上共有 2500 个恒星。他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地动仪。因为中国常发生地震，人们很想探索

能预测这种可怕天灾的方法。张衡对此也进行了多年研究，最终他发明了测试地震的仪器——地动仪。据史书记载，发生于当时甘肃的一次大地震被张衡的地动仪十分精确地预测到了。地动仪本身是一个空心球形的铜制容器，里面安装有垂直的摆，另有 8 根弹簧杆与之相接触，弹簧杆的另一端向外。而在每个外露的弹簧杆端上，各装有一个铜制的龙头，口含小铜球。摆在地震的作用下向一边倾斜时，弹簧杆受到挤压，杠杆随之就会移动，这时，小球便从里面滑落到蟾蜍的口里，根据吐出小球的龙头所对的方向就可判断出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

②文字

两汉时期，文字有了进步。从公元前 3 世纪起，人们开始在帛上书写文字，而摒弃以前使用削尖的短棒蘸漆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的方法，史书记载，由蒙恬发明的毛笔已经成为人们惯用的书写工具。在公元前后，用于书写的墨也发明了。到西汉末年，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石墨写字。此外，公元 1 世纪时，西汉劳动人民发明了纸。用树皮和旧渔网造纸的方法，传统上认为是由东汉人蔡伦发明的。从公元 2 世纪起，纸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很快代替了最古的书写材料——竹片。除了纸以外，人们还仍然用帛写字，但是帛处于次要地位，因为纸更经济、更方便。纸书的形式和帛书完全一样，把纸张竖行从右至左用毛笔和石墨写满，粘成一个长

达 10 公尺的长条。这个长条，和帛的用法一样，卷在一根木轴或玉轴上。这种书是纸卷状的，必须放在一个专用的套子里面。

现有字典中最古老的是“尔雅”，这本字典编成于公元前后。这本书上所有的字，遵循按字义分类的原则进行编排。公元 1 世纪末到 2 世纪初，许慎按照部首编排法，编成了“说文”。许慎把象形的部首分为若干类，凡是部首相同的象形文字都归为一类。许慎总共定出了 540 种部首，按照部首，把所有的象形文字加以分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编排方法日益简化了。到十七世纪初，部首减少到 214 个，到现在，所有按部首编排法编著的字典里，部首的数目都是 214 个。

公元初年左右，字的数目大大增加了。李斯（公元前 3 世纪）所列的字数为 3300 个，但在公元 1 ~ 2 世纪的字典“说文”中，字数共约 10500 个，而在公元 3 世纪初的字典“广雅”中字数已经有 18000 多。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而且在文字中没有字母，因此编著字典的人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按一定次序排列象形文字，才能迅速地查到所要查的字。为此产生了对于各种不同的字典编排方法的研究。

两汉文字基本沿用秦文字，除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东汉末，张芝作今草（章草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刘德升作行书（草书兼真书），字体有些改革外，其余的并

无新创。但两汉尤其是东汉，不少文士以“工书”著名，有些竟以字为专业，这大大促进了文字书写艺术的发展。经汉灵帝提倡后，书法在艺术中的地位更加显著。

蔡邕写石经后，两汉书法艺术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尤为精工。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6 年），蔡邕用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太学讲堂前。这就是流传后世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总结了两汉的书法成就。

③文学

东汉文学比西汉文学内容更加丰富。《后汉书》专门为此写作了《文苑传》，因为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读书人爱好的专业。东汉文学作品流行辞赋与五言诗。东汉辞赋继承了西汉辞赋，五言诗发展了西汉五言诗。到了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一部分赋有了新的意境，五言诗则达到古诗的最高峰。

两汉时期，楚辞和古赋比较盛行。《汉书·艺文志》的《屈原赋》类，有三百六十一篇赋，如果加上东汉人所作，篇数可能还要更多。东汉王逸把两汉人所作的赋（主要是西汉人，东汉仅王逸一人）与屈原宋玉的赋合成一书，并作叙和注释，称为《楚辞章句》。王逸所选汉人楚辞，除了《招

隐士篇》有楚人风格外，其余都是模拟之作，只不过形似罢了，创意并不是很多。《远游篇》剽袭司马相如《大人赋》，而王逸却说是屈原所作；《惜誓篇》剽袭贾谊《吊屈原赋》，而王逸取《惜誓》不取《吊屈原赋》，由此可见，《楚辞章句》的选篇并不严格、精准。不过，王逸作章句还有益于后人的。楚辞的音和义，是两汉的一种专门的学问，经王逸采集后流传开来，使后人读屈宋文有所依据。东汉的古赋作者比西汉还要多，但多数人模仿西汉人体制，陈陈相因，没有什么创新。大赋比较有特色，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和《南都赋》等，取材广博，按事类排比，因为当时类书尚未出现，这种大赋实际上起着类书的作用，所以文学价值虽不高，却流传广泛。

东汉末年，有些富有创造性的作者摒弃陈腐已极的赋体，另创新体赋。这种新体赋的特色是抒发情感，篇体较小，词旨明确，少用典故。赵壹作《穷鸟赋》、《刺世疾邪赋》，一篇的文字不过一二百。在赵壹之后，王粲作《登楼赋》，祢衡作《鹦鹉赋》，魏初曹植作《洛神赋》，情致深远，文境比东汉的更加高远。自从有了新体赋，东汉抄袭、剽窃的文风渐渐消除了，赋又重新兴盛起来。魏晋人所作赋，不论它的体制大小，其情趣大都清新可喜，在汉赋外别开新境界。

赋体句法使用整句的较多，对散体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时散体文渐变为骈体文，它反过来又使赋的句法发生了改变，整句渐变为俪句（对偶句）。班固《两都赋》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等句，张衡《东京赋》有“声与风翔，泽从云游”等句，这种对偶句都是有意识地创作的，用对偶句来增加词句的感染力。

④ 史学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作通史体巨著《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共有三千年的历史。此后，褚先生、刘歆等多人补撰史事，积累了不少的西汉史材料。东汉初年班彪作《史记后传》，有纪传共数十篇。后来，班彪的儿子班固，继承其父遗业，专心精研，经历二十余年，修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内有纪、表、志、传一百篇。《汉书》前半部很多取材于《史记》，后半部是根据《后传》创作而成，班固的用力处在于博采群书所长，考核精确，首尾洽通，创立了断代纪事的新体例。《汉书》叙事详备周密，在封建社会的正史体历史书中，《史记》、《汉书》是最成熟的两部巨著，后世用纪传体编写的正史，其价值都不及这两部巨著。司马迁、班固是继孔子、左丘明之后的杰出的历史学者。他们都能不拘泥于旧传统，开创新体裁，在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周秦史书的基础上，把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汉书》精华部分在十志。《史记》八书取法于儒经，十志又取法于八书。《汉书》十志规模宏大，记事比《史记》

的八书丰富。《律历志》合并《史记》的《律》和《历》两书，《礼乐志》合并《史记》的《礼》和《乐》两书，《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郊祀志》补充《史记》的《封禅书》，《天文志》补充《史记》的《天官书》，《沟洫志》补充《史记》的《河渠书》，此外《汉书》中增设《史记》中缺少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显然十志比八书要详备。后世正史虽然多有志书，但都是在十志的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至唐杜佑作《通典》，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志书体得到极大发展。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通过志书得以保存，八书十志而成对后世史书的发展意义重大。

东汉末年，荀悦根据《春秋》和《左传》的体裁，撰西汉一朝编年史——《汉纪》。这种新的史书写作体裁经北宋司马光扩充，成为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

东汉会稽郡人赵晔写作了《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这两本书专门记载了吴越地方典故，开方志的先例。此后历朝文士多作方志（如晋常璩作《华阳国志》），这种方志体例沿袭至明清，出现了更多的方志，使其构成史书中很大的一部分。

两汉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重大创新之处，对后世影响深远。

⑤ 哲学

王充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大约死在汉

和帝永元八年（公元 96 年）前后。早年曾到太学读书，并是大史学家班彪的学生。他的家庭是“细族孤门”，再加上他好“谏争”，不合时宜，一生只做了几年州郡吏，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教书，专力著书，写成《论衡》85 篇，20 余万字。他在《自纪篇》中曾写到，“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放纵），居贫苦而志不倦，淫（多）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王充是一个反对流俗并且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物。这种性格使他不愿为朝廷卖命，甘愿处贫苦，为考论真伪而生活。他严厉地批判流俗，诚心训导广大人民。《自纪篇》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明显）文……言无不可晓（懂），指（意）无不可睹”，又说“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一致），何为犹当隐蔽指意”。王充的《论衡》用当时接近口语的文体写成，意欲通过有书馆文化程度的人宣传自己的观点，使朝廷提倡的“世书俗说”失去欺骗的对象。

王充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为方法来“考论实虚”。这种方法的意思是，实际存在的物体和行事是可靠的事物，凡不可捉摸和不可实现的事物都是不可靠的东西。从不可靠的东西出发的言和行，必然也是不可靠的，检验它们的尺度就是实际存在的事物。王充使用这个方法从而认定天与地一样是“自然无为”的物。《自然篇》中谈到，为什么知道天

是自然无为的物？因为天没有口目（感官）。只有有口目才有嗜欲（意识），有嗜欲才会有所行动。既然天没有口目，那就不会有嗜欲，因而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更不会起作用。怎么就知道天没有口目？因为地没有口目。王充又谈到人的死，《论死篇》说，一般人都以为死人变成了鬼，有知能害人。按照物类来考验，可以断定死人不会变成鬼，无知不能害人。证据在呢？物可以作证。人是物，人以外的物当然也是物，人以外的物死了变不成鬼，人死为什么就会变成鬼？人之所以活着，因为有精气，人死了精气也没有了。精气存在的原因是血脉，人死则血脉枯竭。血脉枯竭因而精气也就没有了，精气消灭因而形体腐朽，而后化为土壤，从哪里来的鬼呢！《订鬼篇》说，鬼不是人死后的精神变成的，它不过是人幻化出来的。产生幻想的原因是疾病。一切迷信妖妄的言行，主要是因为相信有神论，即天有知有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把这两个虚妄根据从根本上打倒了，重新解释了自然现象（如《谈天》、《说日》等篇）和社会现象（如《薄葬》、《卡筮》等篇）。东汉时期谶纬盛行，《论衡》无疑就是当时的一盏明灯。

圣贤和经传是两个主要虚妄根据以外的一个重要根据。王充用“引事以验其言行”的方法，去质问圣贤和经传，作《问孔》、《刺孟》、《书虚》、《儒增》、《艺增》等篇。在儒学盛行的东汉有勇气去质问孔孟，质疑经典，实在是勇气非同

一般之人。他这种批判的精神，给那些拘执师法、死守章句的今文经学派以沉重打击，同时也超越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文经学派。故反对今文经学的王充不是东汉古文经师，而是伟大的思想家。

第十六章 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亚洲诸国

一、朝鲜

公元前 195 年，趁“七国之乱”，西汉异姓诸侯王燕王卢绾造反，兵败逃到匈奴，卫满是燕王的手下，依靠秦汉之际中原战乱时逃到朝鲜的，移民数万人，于公元前 194 年发起叛变，推翻箕氏朝鲜，建立政权——“卫氏朝鲜”。它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史书没有记载，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根据来判明卫氏朝鲜的社会性质。《史记·朝鲜传》只记录了它的兴亡过程及与汉朝的关系。

卫氏朝鲜南方和东方的一些部族的君长纷纷与汉朝交往结好，有些小部族自愿归顺西汉政府管辖，西汉政府禁止卫氏朝鲜干涉，但是，由于卫氏朝鲜势力扩大而“拥阂不通”。公元前 128 年，西汉政府在朝鲜岛设置沧海郡，由于卫满的孙子卫右渠阻挠，两年后沧海郡撤废。公元前 109 年（元封二年），汉武帝派使臣招安卫右渠，他不但不听，反而进攻辽东，因此，汉武帝派遣水陆大军攻灭了卫氏政权。翌年，将汉朝的郡县制地方行政体制推广到朝鲜，设置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临屯（在今朝鲜江原道）、真番（在今朝鲜黄

海道、韩国京畿道一带)，玄菟（在今朝鲜咸镜道）四郡，合称“汉四郡”，四郡之下设县。乐浪郡朝鲜县设在王俭城，成了西汉政府在朝鲜半岛的行政中心。公元前 82 年，西汉政府把临屯、真番两郡的属县并于乐浪郡，并撤销这两个郡，同时将玄菟撤到辽东。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古代南部的居民，分为马韩、辰韩、弁韩三支，被称韩人，分别有若干部落（国）。马韩在西，势力最大，“凡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辰韩又叫做秦韩，位于马韩岛，包括 12 个部落，弁韩称弁辰，在辰韩南边，也有 12 个部落。辰韩与韩的部落比马韩小，“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

韩人建立了最早的国家辰国，统治者称辰王，由马韩人世代担任，治马韩月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国中的官职设置分臣智、俭侧、樊祗、杀奚、邑借。韩人地区“土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辰韩的铁在古代东亚十分闻名，并用铁为交易手段。“国出铁，韩、秽、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乐浪、带方）二郡”。

史书没有记载，辰国在什么时候灭亡的。东汉末年，公孙氏雄据辽东，为了抵制韩人势力向北发展，在乐浪郡屯有县（今朝鲜黄海道黄州）以南地方设置了带方郡。乐浪、带

方两郡所需的铁来自辰国，说明东汉末年时辰国还没有灭亡。此后，随着三韩各自势力的发展，相继建立了新罗、百济、金官（伽耶或加罗）三国，辰国最终被三国取代。

二、日本

1. 早期日本的社会状况

日本是一个岛国，位于亚洲东北部，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和几百个小岛，日本国土原来和东亚大陆东部相连。由于地壳变动，现今和日本海区域本来是大陆，由于地壳运动而陷落，日本国土逐渐同大陆分离，到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日本岛才逐步形成。

日本列岛山地很多，约占全国面积 76%。河流短促，水势湍急，水资源也很多，但不利于航行。列岛四周海线曲折，港湾较多，海外交通比较发达。由于受热带太平洋暖流的影响，日本列岛气候温和湿润，沿海有小平原和山间河谷适于农业，是古代日本居民较易定居之地。

新石器时代，古代日本出现了。第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是到日本从事科学研究的美国动物学家摩尔斯于 1877 年在今天东京一带发现的大森贝冢。这种文化证明，日本古代居民已经能够磨制石器和黑色陶器。它是新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工手捏制的，外部带有草绳花纹，摩尔斯称为“索纹陶器”，

一般称为“贝冢陶器”，后来又把这种陶器称为“绳文陶器”。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被称为“绳文式文化”。

1884 年，在今日本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向冈，一件正圆形陶器发掘出土了，它不同于绳文式陶器。此后十年，这类陶器出土于日本各地。1920 年，日本考古学界按其最初发现的地点，把这种陶器称做“弥生式陶器”。这种陶器的特点是褐色陶器，规格一样，陶器又薄又硬，使用陶钧。使用弥生式陶器的古代居民已从事农业生活，而且进入到金石并用时代。日本考古学把这一时期称为弥生式文化时代，大约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300 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即弥生式文化时代的中期和后期，关于金属制造的技术传到日本。首先传入的是青铜镜、青铜剑的铸造方法。冶铁术在 1 世纪以后逐步引进。金属文化的传入，有利于日本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2. 氏族制度

在公元初期，日本居民并不是居住在日本全部岛屿，而只是本州的中部和西南部，以及九州的北部。虾夷人住在本州北部，熊袭人住在本州南部。这时候日本还在父系氏族阶段。氏族是基本的经济单位。氏族首领是由选举产生的，主要领导农业工作和某些祭司职务。氏族部落吸引大量移民和俘虏，这些人成为氏族的有充分权利的成员。积极吸纳朝鲜

和中国的手工业移民。在公元 2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氏族的扩大、大小氏族的划分、个别集团向全国各地的迁居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都对氏族间和部落间的关系起了巩固的作用。这种形势加上反对周围各个非日本部落的斗争，形成了建立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的趋势。这种联盟不是通过和平的道路形成的，而是通过各个氏族间的残酷斗争过程实现的。在斗争中，较弱的氏族被较强的氏族吞并了。

这一时期氏族内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公社——又可称为村，公社是由若干包含着 15 ~ 30 人的血族集团联合组成的。这些血族集团逐渐从“村”的成员中分化而出，成为特殊的家族公社。

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 1、2 世纪时，日本列岛上有一百多个小国，到曹魏时有 30 国同中国通使交往，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是由卑弥呼女王统治的邪马台国，从中国设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带方郡去邪马台国，要途经以下几个国家：对马国、末卢国、伊都国、奴国、不弥国和投马国。今天日本学者经过考察推断出，对马国在今天的对马岛，末卢国在今天的北九州佐贺县松浦郡，伊都国在今天的北九州福冈县系岛郡（旧称怡土郡），奴国在今天北九州志贺岛对面，这一点，可以拿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分布于这一片地区的弥生式文化时代中后期的墓葬遗址作为佐证。

虽然日本位于海岛上，它也经常受到较发达的中国和朝

鲜文化的影响，有具体记载的日本和中国的往来是在公元 1 世纪时开始的。到公元 3 世纪时，日本和中国有时互派使节。日本和中国，特别是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这个时期日本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印度支那

1. 早期的社会状况

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社会就开始其发展进程了。

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以前，半岛上住的几乎全是到处游荡的猎人和采集者的部落。他们不懂得农业，也不知道驯养家畜。

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期（公元前 10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这些部落就在最肥沃的地区（伊落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和红河的谷地和三角洲、金边湖地区）发展到灌溉农业阶段（开始时，利用河水泛滥时被水淹没的田地，后来就开始开渠筑坝）。

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到第一千纪初期，古印度尼西亚人集团的诸部落出现在印度支那东部的土地上。其中有一部分定居在红河谷地，杂处于当地的澳亚语系诸部落之中；另一部分则分散地居住在直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沿海地区，但是却没

有占领三角洲。

青铜器发达的时代（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大约与印度支那境内最后一次种族集团大迁移（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处于同一时期。这次迁移主要是来自于西北方的藏——缅集团和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原始泰国人和原始越南人集团的部落迁移。我们有根据这样说：这两个集团的部落在迁移以前，就已达到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阶级关系萌芽的阶段了。半岛上最发达地区的本地居民也达到了同一阶段，他们这时与印度支那西北部和东北部的的外围移民混居在了一起。

移民和当地诸部落的融合，形成了印度支那东北部（现在在北圻境）青铜器时代的独立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作东山文化，它的标志性特征是青铜鼓、特殊形状的斧和短剑，独特的衣着和头饰以及特型小舟。这种文化的代表就是骆越种族集团，它是由交趾诸部落（来自中国东南部）和当地澳亚语系的居民混居而形成的。越南研究者认为这一种族集团是越南人的直接祖先。

2. 奴隶制国家的兴起

最早提到居住在北圻境的各部落的史料从中国的编年史中可以见到，提到的时期是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中国编年史中记载，北圻地区的使节来到了周朝时期的中

国，宫廷以优礼相待，并在他返回时赠送了很多厚礼。

公元前 258 年，在骆越诸部落结成部落联盟之时，文郎被并入早期奴隶制国家——瓯骆的版图，瓯骆的领土包括红河的三角洲和中游，以及同红河南岸毗连的地区。瓯骆的政权是由当地的蜀王朝掌握的。

在公元前 3 世纪末叶，秦始皇曾发动了两次南征。只是在第二次远征后，中国军队才击溃了瓯骆军队的顽强抵抗，逐渐征服了红河下游和中游地区（公元前 207 年以前）。秦朝灭亡之后，在中国的南面形成了独立的南粤国（南越），它的版图包括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东北部。此时瓯骆被并入了南粤的版图，并在将近一百年（207 年至 111 年）内，承认中国南部王朝的统治，即当地人称为赵氏王朝的最高政权。在治理国家方面，瓯骆采用的是中国的制度，但是在其他方面，中国的影响并不显著。

公元前 2 世纪时，骆越人移民北圻南部地区，开垦新的耕地。艺术（艺术铸造品、石刻和金属雕刻、乐器和仪典用品的制造）达到兴盛，出现了新的城市中心（永城等），和中国（首先是中国南部）的关系加强了，并且开始了同印度的初步联系。

在公元 2 世纪的前 20 年，中国汉朝的历代皇帝对南越进行了征伐。随着接连三次血战的发生，南越为汉朝中国吞并，从那时候起，骆越人居住的南越南部开始称为“交州”

(中国史料里称为交趾)。

公元前 1 世纪期间，中国南越的统治权开始衰落，当地文化兴盛起来。人们掌握了玻璃制造的技术，出现了原始的铁器和铁兵器，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公元 1 世纪初叶，中国对交州在文化方面和经济、政治生活方面的影响加强了。政府加征新的赋税，中国行政机关开始干涉当地以大奴隶主为主导的氏族的内政，企图把全部政权集中到中国官吏的手中。中国移民开始向红河三角洲上的最好土地迁居。王莽派遣到交州去的新太守对当地骆越人的自治权多加限制，处决了最积极地反对中国政策的反抗分子。

这一切激起了反对中国统治的人民起义，领导起义的是不满外国统治的骆越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这次起义在历史上被称为“二徵起义”（公元 40 ~ 43 年），因为根据传说，这次起义开始是由一个被太守处死刑的大奴隶主的妻子以及她的妹妹发动的。起义波及整个交州，中国戍军和行政当局被屠杀。从原来居住的城市和乡村逃到荒凉的山麓地区。在起义被镇压后，中国在现在的北圻省境更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势力。中国的移民进一步迁到三角洲和三角洲以南地区去居住，中国的物品也进入骆越人的普通家庭，统治阶级开始采用汉字。佛教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传播。

从公元 1 世纪中叶到 5 世纪，交州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与

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这种关系以及交州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现象当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元 2 世纪至 4 世纪期间，交州的封建剥削形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印度支那中部的泰人、掸人等部落继续南移。这些民族的国家形成得较晚。

3. 印度支那的其他民族

约在公元前 1000 ~ 前 2000 年之间，位于西藏南部的藏缅集团诸部落开始向印度支那西北部迁移，他们在最初几世纪在缅甸中北部定居，有的部落和当地的孟—高棉部落融合了，有的部落则排挤孟—高棉部落。

最发达的集团定居在平原上，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而且铁器、制铜等手工业技术发达。公元初，在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谬国崛起了，也可以称做卑谬部落联盟，首都也叫卑谬，在这以前，那里是面积比较小的印度殖民地。在公元 1 世纪末到 2 世纪初卑谬国最后形成。在印度的影响下，形成了宗教、文字和建筑。公社是缅甸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奴隶制不是很发达，但有宗法性质。

卑谬国与伊洛瓦底江下游孟人的白古国进行斗争，并且在公元 2 ~ 4 世纪不断战争，但并没有改变印度支那西部的

力量对比。

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白古国建立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最西部，印度编年史称为罗摩那帝沙。白古的居民是由孟族诸部落组成的，他们利用下游各地肥沃的土壤，发展了农业。印度东南部移民不断迁入，积极发展与白古的商业和文化关系，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在公元头几个世纪，白古国奴隶制十分发达。印度人开始定居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和典那沙冷海岸。印度势力占据上风，在勘要孟国一个港口发现中国、伊朗和罗马制造的用品。经考古发掘证明了白古国商业很发达。

四世纪史书中，有了湄南河三角洲上孟——高棉族的德瓦拉瓦提国的最初记载，据印度和高棉编年史记载，这里的居民开始从事灌溉农业。德瓦拉瓦提继续发展与印度的亲密关系，居民的文化和宗教受到印度较大影响。德瓦拉瓦提在政治上受到印度支那东南部高棉国的强烈影响，古蔑国吞并了德瓦拉提。

孟—高集团各民族最早的国家在中国编年史中有纪录，它占有湄公河三角洲的沼泽低地和到现在桔井为止的湄公河上游沿岸。在几个世纪里，扶南土地有时扩大，有时缩小，但总不出现在高棉南部（柬埔寨）和南圻西部（早行称为交趾支那）的范围。

高棉部落住在扶南。最早提到扶南的是公元二世纪的文

献史料，但有些史料也有公元一世纪的情况，容易引起误解。扶南的历史可以划为两个时期，从一世纪至三世纪初叶，印度人并未在政治上占居优势。高棉人力量较大。国家由当地王朝统治，王朝的名称失传。这时候，扶南在外交上并不很活跃，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扶南和印度、中国、伊朗及罗马诸国之间都存在着贸易关系。

公元 3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是扶南经济和文化的极盛时期。新首都发雅达浦拉（现在的安哥·博里）附近建设发展起来。这时，印度的影响力显著加强了，扶南人采用了印度的年历和称号，并仿照南印度的字母创制了本地的文字。同时，也同中国建立了政治和贸易关系。这时候扶南田地出现了一个新王朝，据传说，这个王朝是以印度婆罗门教教徒碓陈如建立的，新王朝执行了促使扶南大力向北扩展的积极外交政策。

到了公元 5 世纪，扶南逐渐衰落了。从史料中难以看出它衰落的原因。不知什么原因，从公元 5 世纪开始，以前称为扶南的地区，这时开始被称为水真腊了，而从公元 6 世纪开始，扶南被并入陆真腊（金边湖和湖东地区），成为统一的吉蔑国（高棉人的自称）版图的一部分。

四、锡兰

1. 有关古代锡兰的史料

在锡兰的全部历史时期里，都与印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古代印度史诗是关于锡兰最早的记载，史诗里把锡兰称做楞伽（岛屿）。显然，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左右，锡兰居民的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印度居民。在物质发展水平方面，他们仍停留在石器时代阶段；在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水平方面，他们停留在原始公社水平上。

2. 早期的发现

根据历史传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大批的移民从北印度渡过海峡来到锡兰。移民在岛上定居下来之后，他们的领袖毗闍耶成为锡兰第一代国王（公元前 483 ~ 445 年）。他属于被称为“僧伽罗”的氏族（或部落）。后来，这个岛和岛上的主要居民（现在的僧伽罗人）的名称就是由此得来的。僧伽罗的古代语言与印欧语系相近，而不与达罗毗荼语相近。

关于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期的锡兰政治史，我们几乎什么也不知道。锡兰编年史（公元四世纪左右编写的“古史”和公元五世纪左右编写的“大史”）的资料非常模糊，因而很不可靠。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在锡兰出现了两个最大的国家——北部的比悉提（以阿毘罗陀补罗为首都）和南部的卢胡那（以摩加摩为首都）。现在经济上最发达、人口最稠

密的锡兰岛西部平原，在当时还布满了丛林。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锡兰的国家已经很巩固、很强大，当地的执政者对南印度历代国王想要征服他们的企图都坚决加以抵抗。锡兰争取完全独立的意图特别反映在锡兰佛教保持它的早期形式（小乘）和坚决反对佛教的大乘形式的传播这些事实上。

五、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的海岛区域内，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之国，它是由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 13000 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海岸线长 3.5 万公里，陆地面积 19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有 1.8 亿（1989 年），是东南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关口，连接亚、澳两洲的桥梁。

印度尼西亚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在爪哇岛上发现的特里尼尔、莫克托和桑吉兰的爪哇直立猿人和甘东的尼安德塔人可以证实以上观点。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迹相当丰富。

印度尼西亚这一国家民族成分多而复杂，有 300 个不同的民族集团，250 ~ 400 种语言。按人种学分类，这些民族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马来系，少数属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尼格利陀系等族属。印尼的尼格利陀人由于和另一些文明

程度较高的迁来的种族混血而被融合，或因受外来种族的排挤，而退回到深山僻壤之中。现今这一种族在印尼幸存下来的只有苏门答腊的奥腊阿基特人和爪哇的巴兑人。

到了公元初期，印度尼西亚人的发展水平较前进步了很多。在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他们开始使用青铜器，这就加快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他们的经济基础除了农业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渔业。在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西部广阔海面上的岛屿迁居的过程中，印度尼西亚人对自己的船只进行了改进——发明了带平衡木的独木舟，有时还装有帆。由于乘这种船不怕风浪，印度尼西亚的海员、渔夫和商人遍布邻近的海域，很早就开始和邻邦通商。输出品中有木头和低级宝石制成的细工制品。

母权制残余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的重要特点。神话里保留有母权氏族制度的遗迹。思想方面还处相当原始的状况，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很流行。在苏门答腊南部发现的史前巨石古迹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遗迹。在帕塞姆高原上发现了大量的长石、人物和动物的遗迹。

印度尼西亚领土辽阔，岛屿众多，但是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公元前几个世纪，大多数地区仍停留在新石器时代。但到公元的头几个世纪，爪哇、苏门答腊等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开始产生了国家。15 世纪以前，印度尼西亚群岛出现了众多的古国。在爪哇岛，公元 4 世纪有多

罗摩，我国史籍称之为耶婆提；公元 5 世纪有阇婆；公元 7 世纪有诃陵；公元 7 世纪以后有夏连特拉王国，在苏门答腊岛；公元 6 世纪有干陀利，公元 7 世纪有末罗游、巴邻旁；公元 7 世纪以后有逝利佛逝、三佛齐等海上帝国。当时印尼的这些古代国家，都和中国遣使通好。然而，这些古国都未曾使用过印度尼西亚这个名称。

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印度尼西亚东部由于与主要的古代文化中心距离较远，因而还保持着更加原始的社会关系。同亚洲南部的其他国家联系密切的印度尼西亚西部则发展较快。

印度尼西亚人不只是商业的中间媒介，他们也有大量的香料输出，特别是胡椒和干丁香花芽。爪哇和南印度东海岸之间具有经常性的联系。印度尼西亚人的贸易扩展到较远的地区，例如中亚细亚。

在这几个世纪里，还有一部分印度尼西亚人移居到马达加斯加岛，并在那里形成了马达加斯加部族，这一部族在起源、语言和文化方面都与马来西亚人十分相似。

第十七章 公元前 6 ~ 前 2 世纪的印度

一、孔雀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 6 ~ 前 4 世纪出现的列国时代，是印度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东移，城市和国家再度普遍地兴起。当时，印度次大陆的大多数部落已发展到国家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统一的趋势。此时，恒河流域还出现了第二次城市化的高潮；随着大城市的出现、商品货币经济的迅猛发展，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此外，随着文化中心的东移、各阶级力量的消长，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以前不曾出现过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状况；特别是后来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兴起，成为这一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以致历史学家们常常把佛陀所生活的公元前 6 ~ 前 5 世纪称为佛陀时代。

1. 列国混战

公元前 6 世纪初期，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部落已发展到国家阶段，较大的有十六个国家，佛教文献把它们称为“十六大国”。据佛典《长阿含经》记载，这“十六大国”是：

鸯伽、摩揭陀、迦尸、居萨罗、跋祇、末罗、支提、跋沙、居楼、般礞罗、阿湿波、阿般提、婆蹉、苏罗婆、乾陀罗、剑浮沙。所谓的“十六大国”只是一个习惯的说法，实际上要多于这个数目，总共有二三十个之多。佛典所提出的这十六国只是当时一些主要的国家，而且佛典记录的时期较早。除这十六大国外，当时还出现过一些较小的共和国或自治族，例如释迦国、毛利耶国等。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国家中，君主政体还是居主流的。

由于奴隶占有关系的巩固，与这一过程相关的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形成较大的政治联盟变成一种需要。因此，公元前 6 ~ 前 4 世纪间，北印度各国之间争夺政治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各国间连年攻战，结果礞萨罗和摩揭陀两国兴盛起来。礞萨罗王征服了迦尸和瓦特萨，把喜马拉雅山麓各地区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公元前 6 世纪时，摩揭陀国为频毗沙罗王所统治（约公元前 544 年至公元前 493 年），都城是王舍城。频毗沙罗是佛陀的同时代人，非常信奉佛教。他奉行睦邻政策，通过政治联姻同许多国家和平相处，包括强大的居萨罗国。后来，他的儿子阿礞世杀害了他。阿礞世（约公元前 493 年至公元前 462 年）杀父为王后，同居萨罗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双方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战争。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以和解告终。阿礞世积极对外扩张。摩揭陀同北邻跋祇共和国，只以恒河水相隔。恒河

是交通和商业贸易的要路，可能为了争夺控制这一水域，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 16 年的战争。战前双方都积极为之准备。跋祇共和国为了对抗摩揭陀，同末罗共和国和迦尸——居萨罗王国结成了同盟。阿朮世积极地为之筹划准备。战争已呈剑拔弩张之势，最后终于爆发。战争的详情很少报道，结果是以跋祇为首的东印度联盟被击溃。阿朮世王胜利后，成为东印度的霸主。

阿朮世王的继承者们在摩揭陀统治了约一百年。这一时期的情况，现在不太清楚。有根据可以推断，摩揭陀一直在继续扩张其领土；根据佛教文献资料，在迦罗什迦在位时摩揭陀开始领土扩张（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时，摩揭陀王的统治权扩展到整个东北印度和中印度。迦罗什迦（约在 364 年）以后，出身于首陀罗瓦尔那的宫廷理发师——玛哈帕德马·难陀夺取了摩揭陀的政权，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难陀王朝。他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又是一个军人，他大概征服了整个恒河流域，以及恒河以南的中印度各国。

2. 亚历山大入侵

从公元前 6 世纪起，印度开始与中亚细亚和伊朗各族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公元前 518 年，位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侵入印度，占领印度河流域，这一地区成了它的一个行

省。至公元前 327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灭亡波斯帝国后，进一步侵入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地区，并征服了这一地区。这时，东方的恒河流域已经在摩揭陀的难陀王朝的统治下基本统一起来。亚历山大还妄想渡过上流最东一条支流——贝阿斯河，再向恒河流域入侵，但由于其士兵十分厌战和东方难陀王朝非常强大，不得不于公元前 325 年沿印度河往回走，回到了巴比伦。他离开印度后，将西北印度交给两个傀儡管理，由另外设立的总督和马其顿的驻军监管。

这时，北印度的政局开始出现动荡，人民暴动到处发生。据希腊史学家查士丁的记载，有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人想僭夺王位，他“从各地招募盗贼，挑唆印度人起来改变统治”，显然他是乘北印度到处兴起的人民大暴动之机崛起的。大约在公元前 324 年，旃陀罗笈多在西北印度自称为王，而后带兵东下很快占领了摩揭陀的首都——华氏城，推翻了难陀王朝的统治。公元前 317 年，马其顿希腊的驻军全部从印度撤出。

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北印度在旃陀罗笈多的统治下完成了统一。蔓延于北印度各地的人民起义达到了削弱难陀王朝的效果，旃陀罗笈多（月护王）利用人民的力量建立了新的王朝。因其出身于孔雀宗族，故此王朝被称为孔雀王朝（公元前 324 年至公元前 187 年）。他所开创的帝国同样通常被称为孔雀帝国（又称摩揭陀帝国），其首都为华氏城。

3. 孔雀帝国的建立

公元前 305 年，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即条支）大举侵犯印度。战争的详情不太清楚，最后根据和约，塞琉古把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和俾路支一带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印度，而印度给塞琉古王国 500 头战象以作补偿。孔雀王朝传至阿育王时代（或称无忧王，约公元前 272 年至前 232 年），开始大规模地对南印度地行征讨。据铭文记载，在阿育王征服羯陵伽时，曾俘虏了 15 万人，杀死 10 万人，此外因战争死亡的人还是这个数目的几倍。从这一夸张的数字可以想像当时的战争进行得多么激烈。羯陵伽被征服后，南印度除极南端的一部分（至迈索尔）外，其他部分都被归入孔雀帝国的版图。至此，孔雀帝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

旃陀罗笈多大概死于公元前 298 年左右。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宾头沙罗，不仅保持了自己的领土，甚至还吞并了南印度剩下的一些国家，大大地扩大了孔雀王朝的版图。宾头沙罗的绰号——阿弥多罗伽多（意思是“歼敌者”），可能就是因为他积极从事侵略活动的缘故。

阿育王统治时期可以说是孔雀帝国的极盛时代。但这一庞大的帝国不存在统一的基础，帝国境内的各个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还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这个靠武力统一起来的帝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

即出现分裂。约公元前 187 年，孔雀帝国的最后一个帝王被其将军杀害，孔雀帝国也随之瓦解了。

二、孔雀王朝的社会状况

1.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到孔雀王朝建立其帝国的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铁制劳动工具在印度已经非常普遍，可以说，铁彻底排挤了其他金属。

农业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耕作业已经很明显地跃居主导地位，畜牧业变成副业。这时除了大田作物——稻、小麦、大麦，以及黍、豆类、甘蔗、棉花、胡麻等的栽培以外，果园业和菜园业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耕作业在河水泛滥不到的地区和雨量稀少的地区也发展起来，因此，凭借渠、井、塘来进行的人工灌溉越来越普遍了，不过还是很少兴修特别大的水利工程。在一块土地上每年收获两次，成了非常常见的现象。

这一时期，手工业继续发展，并且明显地改善了。从这时起，以及在以后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各个时期，对其他国家来说，印度成为手工业品尤其是高级棉织品的首要供应者。印度的手工业者在冶金，金属冷加工，石、木材和骨的加工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印度人能修建水坝、制

造汲水车、修建需要复杂建筑术的房屋。当时印度还有制造内河和航海船舶的王室造船厂，以及制造帆船、缆绳、索具等的作坊，兵器作坊，造币厂等等。

在列国时代，印度已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工商业城市。至帝国时代，后起的华氏城跃居众城市的首位。据麦伽斯梯尼所记，这一城市宏伟壮观，在其木筑的城墙上有 570 个塔楼和 64 个大门。华氏城不仅是帝国政治统治的中心，而且工商业也很发达。在这座城市里政府有六个局：即手工业管理局、商业管理局、商务条例监督局、商品售价什一税征收局、外侨接待局和生死登记局。在这六个局中，大部分的局与工商业有关。从以上华氏城的管理机构可以看出，在古代印度城市中，商业是很发达的。当时，城市的手工业者按行业组成同业公会，分别在城内的各个街道居住。当时的纺织业最负盛名，不仅能生产精制的棉织品，而且能生产出高级的丝织品。商业贸易主要是为社会上层阶级服务的。王公贵族所需要的贵重的纺织品、宝石、装饰品和香料等是最通常的贸易商品。矿产品和盐、酒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由国王专卖。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不仅在帝国内陆很活跃，在海外也很发达。麦伽斯梯尼曾提到内陆贸易有一条很长的皇路，这条皇路自西北部的边境通过首都华氏城直达东方，它在内陆贸易中非常重要。在海外，印度与期里兰卡、缅甸、西亚、埃及以及中国等也都有贸易来往。在《政事论》中曾提到

“支那帕塔”，意思就是指中国的丝。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在孔雀帝国时代，中国的丝织品已输出到印度。

2. 奴隶制

当时的佛典在形容某一富贵之家的财产时，总是出现这样一类的套语：金银财宝，象马猪羊，奴婢仆从，不可称计。这表明，奴婢仆从对于富贵之家来说是很多的；同时，奴婢仆从同象马猪羊排列在一起也表明，奴隶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当时，家庭奴婢被应用到各个方面，有酿酒、做饭、打水、推磨、捣米、脱稻米壳、看守仓库等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还有乳媪、侍从、按摩者、舞女、歌手、奏乐者等供主人生活和享乐用的奴隶。列国时代的家庭奴隶制虽很发达，但从事工农业劳动的生产奴隶却不常见。在佛典中偶尔有关于家庭奴仆从事耕耘的迹象，但数量很少，而且记载一般含糊不清。

至帝国时代，奴隶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一时期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已有些奴隶被应用到生产领域。例如在《政事论》中所提到的王室农庄、牧场和作坊里面，劳动者中就有一部分是奴隶。在王室农庄中，据《政事论》（Ⅱ·24）记载有三种人劳动，这三种人就是奴隶、雇工和罪犯。在这三种人中，前者和后者都是奴隶。在王室纺织作坊中劳动的女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女奴隶。据《政事论》（Ⅱ·

23) 记载，这些女奴在天一放亮的时候就被迫进入工场，不许随便谈话，以免影响劳动。如果领了报酬而未完成任务或浪费了原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都要受到割去大拇指的惩罚。在月光明亮的夜晚，监督们还要把她们赶进工场，在月光下进行劳动。但有关这类生产奴隶的记载，仍然非常少见。

3. 土地所有制

古代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国家和国王土地所有制；另一种是公社土地所有制；还有一种是私人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国王土地所有制，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是很难分开的。但这两者在性质上却有所不同。国王的土地是指其直接从中收益的王庄，它在本质上是属于王室的私人经济；而国家的土地是指国土之内所有未开垦的或无人占有的荒地、森林、水源等。前者的收益属于王室，而后者的收益归入国库。在《政事论》（II·1）中所提到的移民村，可能是作者的一种理想和建议。假如这种移民村确实是当时农村组织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将是古代世界中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典型。从人员到布局都是按计划安排的。这里的土地不能转让和买卖。人对土地只具有占有权或使用权。

公社土地所有制，在古代印度较为长久而牢固地保存下

来。这与生产力的低下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有很大的关系，古印度的城市商业贸易主要是为上层服务的，其商品大多是贵重的织物和奢侈品。商品货币关系的主要在城市中发展，而农村有自己的手工业（例如纺织、冶铁、制陶等），它是与城市几乎很少来往的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地带，因而商品货币关系在农村里很少见，这是古老的公社经济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土地是归公社所有的，再由公社分配给各个家族使用。在少数落后的地区，甚至还保留有共耕制。公社农民必须向国王缴纳其收获的六分之一作为赋税。

公社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太一样的。在大多数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公社土地共同占有制被保存下来。在少数经济发达、社会分化比较剧烈的地区，私人土地占有制已经开始出现。在《政事论》（Ⅲ·9）中曾出现过一些有关于土地买卖规定的记载。在《高达摩法典》中说：“人通过继承、购买、分配、侵占或发现成为所有者”。（Ⅹ·39）一直到更晚一些的《那罗陀法典》时代，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更加明显地增强了。法典规定：“三代相继据有的土地……不能靠强占使之脱离（其合法主人）”。（Ⅺ·27）但在私人土地所有制比较发达的地方，公共财富仍是归公社所有的，例如荒地、牧场、丛林、池塘以及一些公共设施。

4. 政治制度

如上所述，早在孔雀王朝把印度各国统一起来之前，在大多数的印度国家里，国家政权已带有东方专制政治的一些属性。在孔雀王朝的帝国中，这种国家专制政治的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极力提倡要崇敬国王，并且传播王权神授的学说。但是，宫廷的倾轧、政变、内讧等现象，一直是古代印度最常见的现象，对国王个人的神化并没有减少这些现象的发生。

国王下面有御前会议（被称作帕利沙德），会议由奴隶主贵族中最显贵的家族的代表组成。帕利沙德只有咨议的职能。为了管理庞大的国家，国王设立了为数众多的庞杂的机构，这些机构负责掌管国王的办公厅、税收机关、军事机关、造币厂、王室农庄等等。当时设立的高官有：领导王室行政机关的主任曼特林，军队的司令犀那帕提，总祭司普罗希多，诉讼程序问题和解释法律的主要权威达磨迭克沙，占星官等等。此外，密探在国家的管理方面也起着很大的，他们是直接隶属于国王的。国王的官吏都有薪俸，政府或是发给他们现金，或是发给他们实物，但发给实物的情况更多一些。

国家的基本行政单位是村——格拉玛。比格拉玛大的地

区单位是十村，再往上两个十村结成一个二十村，五个二十村为百村，十个百村为千村。所有这些行政区划（除格拉玛以外），都是由领薪俸的国家官吏来掌管的。其中掌管千村的高级官吏，是由国王直接领导的。孔雀王朝的整个国土里，除了摩揭陀由国王本人直接管理以外，被分为若干个州。各州的首领，都是王族或国王所亲信的人。但他们不是统治者，而是监督者，因为孔雀王朝的国家是由许多原业的国家 and 部落组成的复杂的综合体，这些国家和部落的统治者，处于不同的从属地位；这些处于依附和从属地位的国家 and 部落的内部行政都是自主的。

在陆军的编制中，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的兵种——步兵、骑兵、战车兵、象军，而且在作战时战象是主要的冲锋力量。四个兵种中的每一个兵种，都有自己的指挥部门和管理制度。此外，还设有舰队管理机关，以及掌管军需和供应的机关。印度军队的武装是各式各样的，但各兵种的主要兵器是弓箭。

要维持庞大的国家机构，就需要大量的资财。农业公社的社员是按收获的一定份额交纳赋税的，这种赋税被称为“跋伽”；根据史料上的记载，赋税的传统定额是征收收获物的六分之一，但沙陀跋伽（六分之一）这个词，可能只是历代沿袭的名称。牲畜、果园等等都需要交纳实物税。此外，自由的农民在一年中必须空出若干天专门来做公共工程中的

建筑工作（毗什提——徭役）。手工业者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王，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给国王做其他的工作；史料上提到，手工业者每月必须给国王工作一天。一些个别专业的手工业者（例如兵器工）必须向国家交纳其全部产品。此外，国王国库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间接税。对于商业交易，国家收以项目繁多的商业税（输伽），这种税由组织周密的税收机构征收；对于逃避商业税所施的惩罚，非常严厉，有时甚至用到死刑。

三、宗教

1. 佛教

公元前 6 世纪，作为一种新兴的宗教，佛教出现在印度的历史舞台上。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的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亦称佛或佛陀，意思是“觉悟者”；又被尊称为大雄，言佛有大力，能降伏四魔。释迦牟尼的名字叫悉达多，姓乔答摩（或译瞿县）。但他的本名一般讳而不用，通常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或佛陀。释迦牟尼出生在释迦国的迦毗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是净饭王的儿子，属刹帝利种姓，29 岁出家，35 岁得道成佛。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目前有很多说法。我国学者一般认为，佛陀生于公元前 565 年，死于公元前 485 年，享年 80 岁。这是根

据《众圣点记》而推算出的年代，是比较可信的，大体上与中国的孔子处于同一个时代。

佛教的教理很多，它的主要教义是四谛说。所谓“四谛”，就是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讲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即所谓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前四苦是人生必须经过的生命变异之苦。第五、六苦是由于人世变化而引起的痛苦。求不得苦是由于永远也满足不了的欲望而产生的痛苦。五蕴盛苦即五蕴（人是由色、受、想、行、识组成的）旺盛三界轮回永远不止所产生的痛苦。佛教的四谛说是以人生多苦观为基础的。

而广大劳动人民，无力改变当前的苦难处境的，希望能够在宗教领域里找到一条出路，寻求一点精神安慰。佛教的某些学说能够满足他们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因而在劳苦大众中佛教也有相当多的信徒。

2. 耆那教

许多史学家认为这个宗教的创始人是改革者大雄，传说中，耆那教创始人的一生近似于佛陀。同样出身贵族，年届成人遁入宗教。由于他在 13 年苦修后才成为了胜利者耆那，所以该教取名为耆那教。

耆那教提倡苦修，虽然多数印度派都有如此提倡，但和耆那教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正因如此，佛教文献将他

们称之为“裸形外道”，因为他们并不赞成这样的苦行主义。在《长阿含经》中，就有佛陀对这种苦修明显的非难。虽是非难，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耆那信徒不仅减少饭量，有的甚至一周一顿，而且以野果、糠麻、牛粪代替食物。由于强烈的“苦行尽得至涅槃”的信仰，他们风餐露宿，衣不遮体，过着天为庐地为席的生活。

四、阿育王时期的孔雀王朝

关于孔雀王朝帝国的国内生活，我们知道得很少。根据间接资料判断，在阿育王时期，上文所述的行政制度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对于研究阿育王朝来看那，些刻在岩壁和石柱上的铭文是不可多得资料。这些基本上纯粹符合佛教道德精神的训条，至今有三十多处被保存下来。为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这些铭文还告诫人们要服从上级——官府、国王的仆从、父母和长者的命令。以达磨曼特林为首的一批官吏负责监督这些训条的履行情况，所谓达磨曼特林即是指替国王掌管达磨的人，佛教徒一般把他们的宗教称作“正法”，而达磨就是正法的意思。

阿育王时期奉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叙利亚、埃及、昔兰尼、伊庇鲁斯等希腊化的国家都和孔雀王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孔雀王朝发动并支持教徒赴国外说法，并借此加强其政

治影响。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佛教开始向外传播，先是锡兰岛，后来又传入了缅甸、暹罗和印度尼西亚。

虽然阿育王在巩固自己的国家方面作了一切努力，但是他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印度各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相差太大，印度的部落也太庞杂。阿育王死后（卒于 236 年）不久，孔雀王朝帝国便开始瓦解；大概是阿育王的几个儿子就已经开始把印度瓜分。公元前 187 年，巽加族将军补沙弥多罗杀死孔雀帝国的末帝大本王，建立巽加王朝。公元前 75 年，巽加王朝发生宫廷政变。伐苏迪跋趁机篡夺了王位，并建立甘婆王朝。复杂的宫廷内乱后建立的新王朝摇摇欲坠，45 年间换了四个国王，并最终于公元前 30 年为南印度的安达罗所灭。安达罗本来源于南印度，虽然强大，但对北方的统治时间也并不长，并且不久就衰落了。从甘婆王朝灭亡后直到公元 4 世纪初笈多帝国兴起，300 多年的摩揭陀历史至今已无法详尽考证。德米特里和他的后嗣不仅掠夺了与印度相邻的各地区，甚至在钱币上还铸上“印度之王”的称号。

和安达罗一起称雄南印度的还有羯陵伽，公元前 1 世纪，羯陵伽的卡罗维拉国王曾两次进攻北印度，迫使摩揭陀臣服，他还征服过南方的潘地亚国，但他之后的情况就已经无从考证了。

孔雀帝国灭亡之后，西北印度不断有外族入侵，先是中

亚的大夏王国，而后又有安息和塞种人。公元 1 世纪，中亚的贵霜兴起，在侵入并占领了西北印度以后，建立起一个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大帝国。从公元 1 世纪到公元 4 世纪东印度的笈多帝国兴起，这个帝国曾盛极一时，但从公元 2 世纪时开始衰落，公元 3 世纪分裂为若干小公国，最终处于笈多帝国的统治之下。

五、贵霜王朝的兴起

贵霜是公元前 2 世纪初生活在中国的西部敦煌与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的一支，大月氏随牲畜迁徙，与匈奴同俗，势力很强。在公元前 165 年为匈奴征服后，西经天山北路，至锡尔河北岸，据传大月氏败后会遭受残忍的对待，首领的头颅甚至都被匈奴的老上单于当作喝水的器具。大月氏先是赶走了塞族人，后来又被乌孙人赶走，不得不迁至阿姆河，在这里征服了大夏，控制了整个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建都阿姆河以北的粟特地方。大夏地区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不仅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而且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商业也很繁荣。大月氏人迁居大夏后，逐渐放弃游牧生活，改为农业为主，社会制度从原有的原始社会制度也逐渐过渡到奴隶制。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西域时会到达此地。这时大月氏的辖境“五部翕侯”，即分为五个侯国，贵霜是其中之一。约在公元 15 ~ 65 年在位的贵霜翕侯丘就□（也称作库久拉·

卡德斐塞斯) 在公元 1 世纪初打败了其他四部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标志着大月氏的统一。贵霜王国建立后，不断向外扩张，曾经入侵安息，攻占高附（即喀布尔）、濮达（也称乾陀罗）和犍宾（在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公元 65 年，丘就□驾崩，其子阎膏珍（即维马·卡德斐塞斯）即位，直到公元 75 年。在他统治期间，贵霜进一步侵入印度，占领了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势力所到之处，不断吞并大夏、希腊人、安息人和塞种人统治的小国，并日益强大起来。

约公元 78 ~ 101 年或 102 年，迦腻色伽统治下的贵霜达到他的全盛期，传说迦腻色伽曾远征沙祇城和华氏城，可见其势力已达到恒河中游地区。通过迦腻色伽多年的对外扩张，贵霜辖阔中亚的锡尔河与阿姆河直到波罗奈以西的北印度大部分地区，纵贯中亚和南亚，与罗马、安息、东汉四足并立。由于帝国首都由中亚南移至今天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的富楼沙，这里迅速成为周围达四十余里，“城郭端直，民户殷多”的大城市。

六、笈多王朝时期的印度

1. 笈多王朝及南印度各国

婆苏提婆死后，贵霜政权日益衰落。公元 3 世纪时分裂为若干小的公国，具体年代和历史不甚明了。此时西亚的萨

珊波斯兴起，并开始向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扩张。公元 4 世纪，东印度的笈多帝国再次统一北印度。并控制西北印度贵霜诸王公的残余势力。在大夏故地的大月氏人仍保持独立，直到公元 5 世纪不断受到□咄（白匈奴）的侵犯，并于公元 425 年被□咄吞并。

公元 4 世纪前半期，笈多王朝在摩揭陀兴起。象波斯萨珊王朝一样，笈多王朝自称是代表本国的民族传统，坚决驱逐外来占领者。所以笈多王朝虽然未能将贵霜势力完全驱逐，但笈多王朝却通过多次战争取得了印度西部的一些地区。四世纪后期至五世纪前期，笈多王朝处于它的鼎盛期。

在塞建陀笈多时期（公元 455 ~ 467 年），国家还能保持领土的统一，击退了匈奴□咄人各次零星侵袭。但是塞建陀笈多死后，笈多王朝的国家因不胜长期的军事紧张局面，开始土崩瓦解。

到五世纪末，只有摩揭陀和其东、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仍处于笈多王朝的统治之下。此时，南印度的政治历史发展与北印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关系。公元之初，印度南部各国，包括珠利耶、般荼和鸡罗一片富庶繁荣。这些地方生产名贵的珍珠和绿松石，辛香物和香料。据史料记载，成千的奴隶为公共工程和采珠工作服务，这些生产经由以科尔迦为代表的各大港口运抵印度的其他地方和相邻各国。珠利耶首都卡维里帕提那姆、般荼首都马都拉，鸡罗首都提鲁迦是定居在这

里的坦密耳族和马拉雅拉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卡维里帕提那姆同时还是南印度最大的城市。但是，从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中，我们大致可以得知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锡兰之间战争不断。

四世纪初，在珠利耶北部建国的帕拉瓦成为南印度首屈一指的强国。它定都建志，以克利希那河以北为中心，并在某种程度上全部控制了南印度诸国。但是帕拉瓦的国家仍没逃脱惨遭三谟陀罗笈多大军蹂躏的命运。最终分裂成三个国家：德干高原西北部的迦檀跋，其中部的伐卡塔卡塔斯国和□伽国。

以极南部族为代表的印度南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和印度北部不相上下了。

2. 笈多王朝时期印度的社会发展

除了内陆贸易，笈多王朝与斯里兰卡和缅甸的海外贸易也非常活跃。佛教文献中常有这种关于航海贸易风险的记述。如在《增一阿含经》中曾提到一位叫普富的波罗奈城富翁，带领 500 名商人入海采宝，结果被暴风吹到今天斯里兰卡所在地，当时传说罗刹居住在岛上，并且都被杀害。印度用本地出产的织物、香料、药草和金银宝石加工品交换国外的金银、宝石、珊瑚和金银宝石加工品。而在内陆，商队担当贸易的主要使者，在各地交换织物、油、谷物、香料、金

银珠宝制品等这种商队中，大的有时能拥有几百辆货车。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金属货币也发展起来。金制、银制和铜制货币各都有不同单位的名称。与此同时，金钱借贷即高利贷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金、银或人身都可以用作抵押货款。如无力偿还就只能卖身为奴。金钱关系在这一时代已日益上升为主宰性社会关系。

奴隶制在笈多王朝的城市中呈现最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公元六世纪。这些城市不仅由于宫廷和奴隶主贵族宅邸的存在而成为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手工制造、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因而形成丰富的城市文化。除了宗教教育之外，非宗教的学校教育也逐步开始推广。

公元前四至二世纪的孔雀王朝，通过联合全印度国家的方式，稍稍拉平了帝国内大量部落和部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由于部落间缺乏经济联系，因而在帝国瓦解后，各部落的发展水平相差巨大。

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六世纪，印度的封建制关系缓慢形成，直到中世纪甚至近代，奴隶制仍未完全从印度大地上消失。

封建化导致公社社会的强烈反抗，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印度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直接导致印度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各国内部便开始频繁动荡，而对外来侵略手足无措。由于史料贫乏，即使是关于各国王和各王朝的

资料也完全不足以阐明当时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全貌。

3. 种姓制度的确立

伴随着印度封建关系的形成，种姓制度也逐渐定型。

公元前后，种姓制已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并最终于早期中世纪形成。由于它与瓦尔那表面相似，并随社会分工的缓慢发展而逐渐形成，因此，古印度法律汇编的编纂人便错误地认为，种姓是由于不同的瓦尔那通婚所致，从瓦尔那中分离出来的。

事实上，瓦尔那是社会不平等发展的结果，而种姓是劳动分工的发展结果；瓦尔那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它们对奴隶制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差别，而种姓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各种姓的社会地位也是不同的，形成之初社会不平等现象已经存在，瓦尔那已经存在了。当然，最初形成的种姓是在吠陀和首陀罗那部分从事生产工作的居民内部形成的。在婆罗门和刹帝利中，种姓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婆罗门被认为是统一的种姓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有关种姓和种姓制度的各种规章和命令，直到印度的奴隶占有关系衰落时期才在法律汇编中定下来。

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不同职业的集团出现，并受瓦尔那影响而独立为具有职业世袭化特点，并实行内婚制的独立集团，印度人称其为“迦提”(Jāti)。另外，

如旃荼罗部落的落后居民，也在瓦尔那制的影响下形成这样的迦提集团。作为瓦尔那制的发展，迦提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作“种姓”，有时也叫杂姓。这种迦提在《摩奴法典》中记有五十余种，地位高低不同。其中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的旃荼罗就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接触的人。

四种姓间被规定了严格的区分和界限，是为了维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利益。就宗教生活来说，在四种姓间有严格而繁琐的区分。特别是首陀罗，连听一听或看一看雅利安的圣书《吠陀》也不被允许，更不用说参加由前三种姓组成的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了。例如《高达摩法典》规定：假如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或蜡（Ⅶ·4）；假若他诵读《吠陀》，须割去他的舌头（Ⅶ·5）。法律上的权利更明显地体现出种姓间的不平等关系。如犯了侮辱、伤害、通奸、盗窃和杀人等刑事罪，四种姓的惩罚是不一样的，尤其对于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罗来说更为严厉。仅以侮辱罪来说，《摩奴法典》规定：婆罗门侮辱了首陀罗只罚款几个钱，但是，如果首陀罗辱骂雅利安人的话，要割掉他的舌头。《摩奴法典》的（Ⅷ·177）这一规定保证了高级种姓的地位，不会因为债务沦落为奴隶。

七、古代印度的思想和文化

1. 哲学

古印度各族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复杂的生产形式和社会生活促使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真理产生浓厚的兴趣。古代印度哲学的发展，性质复杂，有的甚至彼此矛盾。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扶植宗教，力图使神话和宗教信仰系统化，因而它们与哲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古印度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也正是与婆罗门教与佛教神学密切联系的唯心主义哲学。

婆罗门教哲学是以关于宇宙精神和关于第一性的本体的学说，是性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学说和观点的复杂混合体。它认为作为宇宙精神的梵天，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神和物质世界。而佛教哲学则认为只有主体是实际存在的，客体世界都是幻觉（摩耶）。

唯物主义哲学也同样存在，自由公社社员和城市下层民众利用这种观点与官方思想体系相对立，斫婆伽学说就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种。这种学说大概起源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它的信徒否定了吠陀的权威，认为世界由物质组成，知识来源于感觉感官，并为感觉感官所证实。灵魂独立于肉体

而存在，具有不灭和转生的特征。许多其他的唯物主义学说如那色提迦、路迦耶多等，都借鉴了斫婆伽学说观点，认为人的感官能感受到一切的现实，从而奠定了唯物论的基础，否定彼岸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唯物主义学说的拥护者，从这些观点出发对婆罗门教的仪典、祭祀和迷信嗤之以鼻。

在奴隶占有制开始衰落和封建关系开始形成的时期，加强了对反对派学说的排斥，并形成了许多哲学体系——以吠檀多派、瑜珈派、弥曼差派为代表的坦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胜论派和正理派为代表的唯理论的唯心主义和以僧伽派为代表的二元论体系。其中，以吠陀为基础的吠檀多派是唯心主义学派中最积极的、完全为神学服务的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把吠陀看成是绝对的权威，认为吠陀，即神的启示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真理是对梵天的认识的统一，宇宙是梵天的派生，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是梵天的创造物。只有依靠对吠陀的神性的认识，人们才能脱离邪恶和痛苦。吠檀多派在封建社会的印度成为印度教的哲学基础。按照是否包含吠陀的基本原理为标准，以上六个唯心主义哲学体分被认为是正统的，而佛教和耆那哲学则被认为是非正统的。

2. 自然科学

古代印度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古代印度人民很早就能比较精确地观察二十八星宿。为适应农

业发展的需要，他们还制定了准确的历法，把一年分为 12 个月，每个月为 30 天，每隔五年用一个闰月来调整岁差。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古印度对季节的划分有三分、四分和六分法。土地的丈量，祭坛的建筑，促进了数学知识的产生，几何、三角、代数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数学的发展，需要方便的数字符号，十个数字符号的发明，肇端于这一时代。到笈多帝国时代这种符号始臻于完善，特别是以“0”的符号代替以前的黑点表示缺位（开始时只是黑点）。这十个数字经由阿拉伯人略加修改传至欧洲，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事实上这是古代印度人民对人类文化的一个卓越贡献。

古代印度人民在医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不少医学知识被保存在《吠陀》和佛经中。我国的《隋书·经籍志》中就曾记有《龙树菩萨药方》等。一些大的医学家，也随医学的发展而不断涌出。传说是迦腻色伽御医的礪罗迦曾著有《礪罗迦本集》一书，内容涉及八种主要疾病及饮食、医药、病理学、解剖学和胚胎学等问题。这一著作早在 8 世纪时就译成了阿拉伯文而广为流传。1890 年在我国新疆发现的以发现者英国人鲍威尔命名的“鲍威尔手稿”中，载有公元 4 世纪的梵文医学残卷。其中论及大蒜的特性、外敷和内服的药方、长生不老药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此外，古代印度人民在土壤的选择与分类、轮种制、选

种、施肥、饲养牲畜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3. 语言和文字

阿育王铭文向我们证明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已经有了很发达和很完善的文字。这些铭文全部用梵字书写，后来在梵字基础上出现了提婆那伽书写体。这种书写体因其简单方便广泛传播。由于古代印度主要是神学教育，因此，梵文知识就成了个人文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标志。

佛教的说教者和传教师，用摩揭陀口语为基础并与东印度口语相似的巴利语写经，从而试图打破梵文的垄断。但是由于佛教的文献后来也被尊为经典，巴利语也同样变成只存在于佛教文献和佛教僧侣中的死语言。现在在佛教盛行的锡兰、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巴利语仍然起着这种作用。

4. 文学和艺术

《吠陀》是雅利安人最早的文学作品。自公元前 5、4 世纪以后，史诗和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开始出现，两部伟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又译作《腊玛廷那》的《罗摩衍那》完全有资格列入古代世界伟大的文学作品之列，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两部巨著皆源自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口头相传。《摩诃婆罗多》的核心内容形成于公元前 5 世纪或公元前 4 世纪，最终定型于公元 4 世纪，而《罗摩衍那》的核心内容形成于公元

前 4 世纪或公元前 3 世纪，最终定型于公元 2 世纪末。

《五卷书》、《益言佳言集》和《佛本生经》等作品中保存了大部分的古印度民间文学作品。其中《佛本生经》最为流行。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被附会成佛陀，情节也被佛教徒增删润色。尽管如此，它仍保留了民间憎恶强暴，伸张正义；鄙视奸邪，歌颂善良的本色，而且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全书有 547 篇故事，大部分韵文的编成年代，恐怕不早于公元前 3 世纪，而多数的散文大约在公元后编成。

古代印度的塑造、艺术装饰品、石刻、象牙雕刻、木刻等艺术手工业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公元前二世纪至七世纪之间，在海得拉巴省的阿旃陀山岩上开凿的许多石窟所组成的佛寺中，就保存了许多异常精美的古印度壁画。

第十八章 公元前 第一千纪时期的欧亚部落

奴隶制文明发展的同时，欧洲、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的游牧、半游牧和定居的部族文明也同时在发展着。

在古代，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极不平衡。与高度的奴隶制文明相比，人类的大多数还处在原始公社阶段或原始公社解体阶段。由于并非同时到达阶级社会或形成国家，直到公元开始甚至最初几世纪时，克勒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才进入原始公社解体时期。而黑海沿岸、南高加索的某些部落，这个阶段早在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就已结束了。

一、西欧和东南欧诸部落

1. 伊比利亚人

从米利都人赫卡泰俄斯（古希腊散文历史家，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时代起，出现了伊比利亚这个名称，它指的是伊比利亚部落聚居的西班牙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半岛的整个其余部分叫做克勒提卡，并认为它是克勒特人的国家（即高卢）的直接继续。从罗马开始强大时期起，整个

半岛开始叫做西班牙。这个名称的起源至今还不清楚。

比利牛斯半岛气候温和。许多记述西班牙的古代作家，都提到西班牙有很多森林，谷类这种作物在经济生活中也起着重大的作用。西班牙的矿产特别丰富。在这里产金、铁、铜、锡，但银矿是西班牙的主要财富。

比利牛斯半岛是欧洲人最早的居住地之一。在西班牙的铁器时代，腓尼基和迦太基开始向这里的海岸地带殖民，后来希腊人也去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伊比利亚部落的独特文化。从希腊、罗马作家的列举落名称来看，古代西班牙居民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例如，据老普利尼的统计，西班牙大量的部落联盟是这一时期伊比利亚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城镇一方面是周围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一方面也是有战争危险时的藏身之所。例如史书中提到的努曼提亚、谢冈提亚、康特列比亚、比里比里斯等等，都是古代西班牙较大的中心城市。希腊史书中称之为“王”的军事首领管理伊比利亚部落和城市公社。而希腊、罗马历史学家一再提到的长老会议，则给他当顾问，发挥巨大作用。作为联盟中心和防御体系的城市的扩大，部落首领和公社管理机构地位的上升，都证明原始的公社关系此时已开始解体。古代伊比利亚人在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6 世纪虽然已开始出现氏族制解体的萌芽，但仍停留在氏族阶段。

大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腓尼基和迦太基开始觊觎并侵

略这里。传说，腓尼基是西班牙海岸最初的殖民者，继其之后的是马拉加、塞克西和阿布得刺。此后腓尼基人在西班牙的殖民发展就遇到了迦太基这个大国的竞争。公元前 3 世纪后半期，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迦太基人开始有计划地征服比利牛斯半岛地区。

2. 克勒特人

到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期，莱茵河、塞纳河、罗亚尔河流域和多瑙河上游地区居住着克勒特诸部落。在公元前 6 ~ 前 3 世纪期间，克勒特人的势力范围达到现代西班牙、不列颠、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捷克、匈牙利的一部分。克勒特人的早期历史主要从考古资料中得知。克勒特人的名字得益于“拉登文化”的传播。“拉登文化”因大量克勒特武器是在瑞士纽沙德尔湖的拉登湾而得名，并于公元前 6 世纪中期代替了哈尔斯塔特文化，由克勒特人创造的“拉登文化”留下了大量的遗物。“拉登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 6 世纪中叶 ~ 前 5 世纪末。这一时期克勒特人已有水平相当高的手工艺，这一点可从大量的剑、匕首、青铜物及金饰物的遗物上得到证明。从具有艺术装饰的食器来看，他们的艺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大量的希腊物品经过马西里亚，沿着罗尼河和索恩河传到克勒特人那里，

并对克勒特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很多坟墓中，都有希腊物品被发现。但是，当地匠师也并非完全遵循希腊艺术规则，而是根据当地的趣味和传统适当加以改变。这个时候，豪华的巨冢开始在莱茵河中游和马恩河畔等地区出现，里边埋的显然是氏族的长老和部落的首领。

第二阶段：公元前 5 ~ 前 3 世纪。此时“拉登文化”逐渐传至欧洲其他地区。克勒特人的手工艺品开始脱离希腊的影响而逐步完善起来。克勒特人的釉瓷器在西方出现，用陶轮制作的陶器流行起来。农业也达到高度的水平。克勒特人发明的带刀具的重犁，耕地的深度要比当时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所用的轻犁大得多。三区轮作制的方式保证了农产品的产量。克勒特地区所出磨粉和面粉之细，在意大利十分驰名。

克勒特的比利其部落从莱茵河左岸地区西下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大迁移，并最终在高卢北部和日耳曼莱茵河流域某些地区定居下来。

第三阶段：公元前 2 ~ 前 1 世纪。罗马著名统帅、政治家和作家优里乌斯·凯撒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此阶段有趣的记载，他曾在“高卢战纪”中专门提到住在高卢的克勒特人。另外在克勒特人城市——阿法利克、比勃腊克塔、法国的阿列吉亚、斯特拉多尼茨、阿列吉亚所发掘的这一时期材料，加之前面提到的材料都证明了公元前 2 世纪末，原始公社制度已在克勒特人中走到了它的末期。部落显贵占有大片

土地和充当仆役的奴隶。许多普通公社社员由于依附显贵，而不得不付佃租耕种显贵的土地，参加必须为首领打仗的义勇队。

克勒特各部落呈锯齿状发展。虽然离意大利较远的北方各部落，特别是比利其人和不列颠的克勒特人，还过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生活，但当罗马人企图侵犯他们时，遭到了他们强烈的抵抗。南高卢的部落，特别是埃督伊人情况就完全相反，那儿已经处在向阶级社会和国家过渡的边缘。他们为了抵抗同族人和其他部落而向罗马求援，结果引狼入室，使高卢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3. 日耳曼人

古希腊罗马作家常把日耳曼人和克勒特人混为一谈，事实上，日耳曼人居住在克勒特人的近邻——南斯堪的纳维亚、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沿岸地区。在公元前 6 ~ 前 1 世纪，他们逐渐南移，以莱茵河为中心，占据了现代德国领土。在跨过莱茵河安居的部落中，特瑞维累人后来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斯威维人、马尔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分布在德国南部，魁代人与克勒特人关系最密切，有一部分被克勒特人同化。

根据考古资料推断，当时日耳曼人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克勒特人。直到公元前 4 世纪初，他们还从克勒特人地区输

入铁器，后来他们才发展自己的冶金业。从公元前 1 世纪起，罗马的酒和贵重器皿等商品才开始传到日耳曼人那里，并为极少数的氏族显贵所拥有。和平时期，氏族长老解决氏族成员的争论；战争时期，他们被推选为指挥官。虽然日耳曼人的氏族已经是父权制的氏族，但妇女很受尊敬，势力很大，这证明他们还保有母权制的残余。

日耳曼人以畜牧业为主，很容易离开自己的住地，去寻找新的安居场所。公元前 120 年左右，由于洪水的肆虐，条顿人及其邻居基姆布利人离开了日德兰半岛前往西班牙、高卢和多瑙河流域。他们联合当时跟罗马作战的斯科尔迪卡人。他们的残余散居高卢的麦士河、马恩河和尼喀河等河的内滨。日耳曼人在迁移时，和克勒特人一样也是以整个氏族或部落为单位的。他们共同作战，共同占用长老分配给他们的一部分夺来的土地。

可见公元前 1 世纪中期，日耳曼部落的原始公社制度还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中欧与东北欧诸部落

1. 中欧与东北欧诸部落概况

早期希腊作家希罗多德曾列举过这一地区的部落，如涅夫尔人、安德罗法基人、麦兰赫连人、布金人等等。在希罗

多德以后的古代史籍中，很久没有像他那样详细的关于伊斯特尔河北欧洲地区的记述。从公元 1 世纪起，古代作家才提供一些比较正确的报道。

严寒的气候，茂密的森林，不能通行的沼泽，使中欧和东北欧各部落生活的自然环境远落后于斯奇提亚人、萨尔马泰人，更别提希腊人了。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定居部落生活困难，也对中欧和东北欧各部落的历史产生一些影响，当然，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例如，自然条件使这些部落生产力发展缓慢。

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欧和东北欧的人种分布并未完全弄清，在从奥得河和维斯拉河流域直到德聂伯河中游左岸的区域内，居住着现代斯拉夫人的祖先——古斯拉夫诸部落。这些部落以北，在涅曼河流域居住着波罗的海诸部落，东方的芬兰—乌果尔诸部落占据了从奥卡河与伏尔加河间地区直到北冰洋沿岸的土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波罗的海诸部落同化了。

在公元前 1 世纪中叶以前的古希腊、罗马作家只字未提斯奇提亚人西北的广大地区上，自古就有人居住。虽然希罗多德对于遥远的北方，以及对于克勒特人所居住的西方土地有一些了解，但他认为没有人了解色雷斯以北（即多瑙河以北）的地区。与其他部族一样，斯拉夫诸部族的部落血缘构成并不一定相同，但是，原来的斯拉夫部落——斯拉夫语言

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为斯拉夫民族的形成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斯拉夫或前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维斯拉河以东及中上游流域，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学和语言文献材料中得到证明。远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和第一千纪，古希腊、罗马作家所说的维涅德人就产生了拥有独特卢日文化的农业——畜牧部落。

为了掌握古代斯拉夫诸部落生产和社会关系发展的全貌，进而对他们的居住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卢日文化创造者的各巨大氏族村相距很近，有的只隔 10 至 15 公里，而且并非所有的村庄都设有防御工事。为了尽可能地利用天然保卫条件，这种居住地常设在河畔湖滨。在居住地内部，有的住宅排成圆圈靠着城墙，有的散在整个居住地上，杂乱无章。在发掘居住地时，发现了许多器皿碎片、锄、铁镰、斧、磨石和各种烧焦的小麦、黑麦、大麦、豌豆和亚麻粒，以及家畜骨、包括粘土制纺锤在内的小型劳动工具。

他们从事农业，也饲养牛、羊和猪，捕鱼狩猎占次要地位，在主要森林地区采取刀耕火耨来耕种土地，在稍南地区可能实行休耕。虽然没有考古学的直接资料，但据推测，他们的饲养野蜂业也很发达。

公元前第一千纪上半期，就整个古斯拉夫部落而言，由于铁矿在中欧广泛分布，促进了铁器的迅速推广，最终铁制工具代替了青铜工具。但是，目前对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古斯拉夫部落历史的了解并不多。从中欧地区考古遗物的散布情

况来看，公元前 9 ~ 前 7 世纪，有些部落由维斯拉河上游地区向布格河和沃伦河流域，以及更东的地区迁移。这一点在希罗多德所述涅夫尔部落向布金人居住地区迁移的故事中也有反映，也有些居民群由波罗的海沿岸向维斯拉河中游地区迁移。在以后的几百年间，古斯拉夫部落开始跟邻近的克勒特人、色雷斯人、斯奇提亚人和日耳曼人不断接触。约在公元前 5 世纪，克勒特人由捷克南部进入捷克北部，从而影响到这里及邻近地区的斯拉夫部落以及波伊人为首的克勒特部落。

在东方，分属不同民族的古斯拉夫人与斯奇提亚人曾有正面接触。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奇提亚人曾多次西征，但这种偶然的远征，对于住在维斯拉河流域的古代部落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整个后半期，斯拉夫部落都在与斯奇提亚人和萨尔马泰人作斗争，但这种斗争对维斯拉河流域和德聂伯上游大多数部落的发展也没有重大的影响。

2. 波罗的海东岸诸部落

古斯拉夫人在北方紧邻盛产欧洲著名装饰品琥珀的波罗的海南岸部落，这里与欧洲所有地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曾有记载说，佩带野猪象的爱沙人部落能从海岸上采集

到不经加工就能出售的琥珀。波罗的海沿岸缺乏铜矿，这就阻碍了当地部落大力进行青铜器的生产，而从外地运来的青铜，主要用于制作漂亮的武器或装饰品。因此，在这里，至少是在远离海岸的地区，石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

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期，在用砂土或石头堆成的巨冢里，常常埋葬几十个死人，有时埋葬几百个死人。从氏族集体埋葬风俗的持久性来看，氏族内部关系还是十分牢固的。

当时在波罗的海东岸地区还正处于复杂的民族发展阶段，远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拉脱维亚—立陶宛诸部落的祖先就从维斯拉河和奥得河流迁移到这里来，并与当地的芬兰乌果尔诸部落融合。住在西德维纳河以北的波罗的海人，被芬兰同化，奠定了现代爱沙尼亚居民的基础。在西德维纳河以南地区，当地芬兰居民融合在波罗的海诸部落之中。

3. 芬兰—乌果尔诸部落

公元前第一千纪住在伏尔加—奥卡河和卡马河流域的各部落具有相当独特的历史。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布金人、蒂萨格特人和伊尔基人居住在这一带的森林中。他在区分他们和斯奇提亚以及萨夫罗马泰人时，指出他们依靠狩猎获得食物和衣料。希罗多德特别指出：伊尔基人善于在猎狗的辅助下乘马打猎。考古学资料证实了这位古代历史家的记载，狩猎的确是上述部落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但是，伏尔加—

奥卡河和卡马河流域的居民，并不只限于希罗多德所提到的那些部落，他仅仅列举了斯奇提亚人和萨夫罗马泰人的近邻部落中的南方各部落。到公元元年前后，古典史籍中才对这些部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以这些记载为依据，塔西佗称他们作芬人。

芬兰—乌果尔部落的西南邻居——斯拉夫人，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期间，大规模向芬兰部落聚居地迁移。从俄罗斯欧洲部分中的大量河流拥有芬兰名称这一事实来看，这种迁移引起了一部分芬兰——乌果尔部落的移动。由于这种缓慢的迁移并未破坏芬兰部族的文化传统，所以可以从俄罗斯编年史和其它文献中所记载的芬兰——乌果尔部落与局部考古文化中得知，大概默里亚人和穆罗姆人的部落是基雅科沃部落的后裔，莫尔多瓦人是戈罗捷茨文化部落的后裔，而编年史上所记载的车累米西人和楚德人，则是创造阿南尼诺考古文化的部落的后裔。

伏尔加—奥卡河和卡马河流域的居民，跟波罗的海北岸、西西伯利亚、高加索和斯奇提亚都有联系。通过斯奇提亚人和萨尔马泰人，他们甚至能得到遥远地方的产品，在楚索瓦雅河和卡马河畔发掘的居住地里，就曾发现过埃及亚蒙神小雕像。芬兰人某些铁刀、骨箭镞和许多器皿，看样子是模仿斯奇提亚人和萨尔马泰人的同类制品。从公元前 6 ~ 前 4 世纪起，伏尔加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就与斯奇提亚和萨尔马

泰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到了公元前第一千纪末时，就更加频繁了。

4. 东北欧诸部落

希罗多德只记载了严寒的冬季的北方地区，他推测这里因为气候严寒，因而无人居住。

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公元前一千纪初期，欧洲东北边缘的居民大概主要从伏尔加—奥卡河和卡马河流域迁来。

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上半期，北方各部落以狩猎和捕鱼为主。末期养鹿业也发展起来，畜牧业开始出现。但是，由于资料有限和研究尚未完成，这些关于当地居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描述还有待深入。

从对公元前第一千纪住在中欧和东北欧地区的许多部落的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些部落的生产和生活在遥远的古代已经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了。这些部落跟北方色雷斯人、斯基提亚人和萨尔马泰人一起，共同构成了独立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之外，有自己独特发展轨迹的世界。这些部落直到公元前第一千纪下半期，氏族关系才开始解体。没有发达的商业贸易，贸易关系并没有强烈地刺激各部族的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蜕变。

三、黑海北部主要部落

从希人那里，我们能得知黑海北岸地区与奴隶制世界接

壤，及对黑海沿岸模糊的表述。在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中，自从公元前 6 世纪希腊殖民者在黑海北岸定居下来，并开始与当地部落有了交流后，关于这个地方的记载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希腊文献中，希腊人对黑海北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这个地方的描述在希罗多德的著作里占了很大篇幅。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到过这里。后美里亚人是黑海北岸的远古居民，他们同时也是黑海北岸最早的部落，只是他们当时被称为“古米来人”。

1. 斯奇提亚人部落

希罗多德对同时代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奇提亚人部落有十分详尽的记载。斯奇提亚人居住在从多瑙河口、下布格河和德聂伯河到亚速夫海和顿河的整个黑海北部。虽然这片地区物质文化各不相同，但还是可以发现这片地区有共同类型的特征。这种共同类型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到处流行的斯奇提亚陶器的样式上，也表现在武器和马具的小装饰品的样式以及葬礼的特点上。

根据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斯奇提亚人可以分为定居的农业部落和游徙的牲畜部落。

斯奇提亚大多数部落已经达到较高的经济水平。阿拉藏人播种，除了种谷物外，还种葱、蒜、兵豆和黍。耕作者不仅为满足自己需要播种谷物，而且还通过希腊商人转手出

售。根据当时的许多斯奇提亚古城遗址，特别是尼科坡里附近大卡明斯克古城遗址发掘的材料推断，斯奇提亚人是用铁镰割庄稼，用磨碾谷，而且通常用犍牛拉犁耕地。发掘时获得一些动物骨头，这可以证明那些古城的居民曾经饲养牛、羊、马和家禽。古城遗址的残余窑洞和粘土建筑物，结构与斯奇提亚人的大致相同。

畜牧者斯奇提亚人和被希罗多德认为是最坚强善战的“为王的”斯奇提亚人，居住在德聂伯河以东直到亚速夫海的广大草原地区，也包括克里米亚草原在内。希罗多德强调说，这些部落逐牧而居，不是以农业，而是以畜牧业为生。与希罗多德同代的一位不知名的作家更详细地记述了他们游牧生活的特点。他也注意到斯奇提亚人“……住在篷车里，篷车四周都盖着毡子，像房子一样，雨、雪、风都透不进去，有的隔成两间，有的隔成三间。每辆篷车套两对或三对无角犍牛，最少是四轮，也有的是六轮。妇女坐在车里，男人骑马行走。”畜牧者斯奇提亚人的畜牧业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他们在公元前5～前4世纪就拥有庞大的牛群和马群。但这些牲畜在同族人中的分配并不均匀。

斯奇提亚巨冢以葬物的丰富而震惊后人。由于部落显贵与希腊殖民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巨冢里，除当地所产物品外，也常常见到由第一流的希腊匠师所制造的艺术品。

事实上，斯奇提亚的部落联盟也和这个时代的其他部落

联盟一样有名无实。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并不固定，这一点当然也影响到部落酋长们的政权性质。

公元前 4 世纪后半期，黑海北岸出现的以斯奇提亚王阿泰为首的巨大部落联盟才具有国家联盟的性质。虽然阿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兼并了邻近的许多色雷斯部落和黑海西岸的希腊人城市。但是，这一联盟没有存在多久，当阿泰被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军队击溃后，这个联盟立即瓦解。

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可以了解斯奇提亚人的宗教。他们没有神庙和特殊祭司阶段，也没有作为人形出现的神。例如，斯奇提亚人将插入地中的铁剑作为神而贡献祭品。从殡仪的情况可以看出，斯奇提亚人相信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希罗多德在列举斯奇提亚神名时，曾试图把它们译成希腊诸神的名字，但由于斯奇提亚人的宗教几乎与希腊完全不同，因而他做得并不很成功。

根据那些大半是希腊人制造的金银器皿和其他艺术品上的图画上可以了解到斯奇提亚人的外貌和服装，这些器皿和艺术品是在刻赤（库尔—奥巴）、切尔托姆雷克以及德聂伯河下游的索洛哈那些著名的巨冢，以及其他许多巨冢里所发现的。在以斯奇提亚为主题的作品里，希腊的艺术匠师们用惊人的写实手法刻画了斯奇提亚人的日常生活和战斗形象。虽然后来随着定居的发展，出现了斯奇提亚步兵，但主要还是骑马作战。希罗多德十分详尽而生动地叙述了斯奇提亚人

的作战习惯，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他们的尚武精神。

虽然斯奇提亚人与希腊人比邻而居，贸易频繁，但如果认为他们的文化极大地受希腊文化影响，那就错了。受影响的主要是斯奇提亚贵族，由于贸易的缘故，比起其他阶层来，他们与希腊殖民城市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与希腊城市距离较近的部落受到的影响远大于较远的部落。同时，希腊移民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因而在黑海北岸出现明显的文化同化和混合现象。

2. 萨尔马泰人部落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以顿河为界，西面是斯奇提亚人居住，以东是与他们同宗，并拥有相近的语言文化，后来被称为萨尔马泰人的萨夫罗马泰人的游牧部落。萨夫罗马泰人以南是居住在亚速夫海东岸地区、塔曼半岛和库班河流域的统称为密俄提人的部落。妇女在萨夫罗马泰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点所有的古希腊、罗马作家都有记载。

妇女墓穴在萨夫罗马泰人的墓穴群中占中央位置。妇女墓穴中的武器、石祭盘、人马祭品痕迹等都证明妇女不仅是战士和氏族首领，而且是祭司。随着时间的发展，男性战士逐渐能与女子并排埋葬，而后女子的地位逐渐降低。由此可见，萨夫罗马泰人与黑海北岸其他部落相比，母权制遗风存留了更长时间。由此可见，贸易并未对萨尔马泰人的社会制

度造成很大影响。他们在遥远草原上放牧畜群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长期保持古代母权制。

3. 密俄提人部落

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记载和博斯普鲁铭文上可以得知部分密俄提人部落的名称，这些部落中有一部分是定居的，从事农业，有一部分过游牧生活。与萨尔马泰人不同，居住在塔曼半岛和库班河下游邻近地区的密俄提部落，很早就受希腊殖民城市和博斯普鲁王国的影响。公元前 4 世纪时，他们中的许多部落加入了博斯普鲁王国。

第十九章 罗马帝国

一、元首制的确立

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以整整一个世纪的罗马国内战争而结束。无论这一时期罗马的历史事件多么繁多，如西西里的奴隶起义、革拉古运动、苏拉的独裁、斯巴达克领导的伟大的奴隶起义、凯撒帝国的形成和国内战争，其斗争的一般倾向和阶级意义都是十分明显的。随着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在地中海强国罗马领土内的确立和普及，以及其矛盾的尖锐化所导致的奴隶起义和人民运动发展，地中海的奴隶主阶级终于达成空前未有的团结。

国内战争结束后，政府马上面临着一系列的重要任务。首先必须组织一个强有力且灵活的国家政权，它不仅要巩固在国内战争中被动摇了的奴隶所有制社会的基础和整顿各行省，同时还要满足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上层社会居民的要求。其次还必须解决作为帝国物质支柱的军队及随之而来的对外政策问题。最后，还必须强化人们对帝国的信仰，因为它能使人们普遍地相信“虽然不需要这个或那个皇帝，但是以军事统治为基础的皇帝政权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政敌被一一打倒，屋大维实际上成为帝国的第一个

皇帝。但是，由于共和制的影响和维护共和制的传统势力仍然存在，所以他并未立即采用“君主”的名义，而是采用“元首”或“普林斯”这一称号，意即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以完成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这种“元首政治”，一直保持到早期帝国结束。

1. 奥古斯都巩固元首制

①元老

元老都是大奴隶主地主，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特权，享有各种政治和社会荣誉。不少元老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有的甚至拥有 4000 余名奴隶。

以夸耀财产、势力和自己祖先为荣的元老们，愈来愈认为自己是民族的精华和世界的统治者，这种信仰并未随共和制的解体而烟消云散，反而与日俱增。他们愿意承认屋大维的统一政权，甚至放弃一部分政治上的特权，但不放弃社会上的特权。屋大维在战胜安托尼乌斯后获得“奥古斯都”称号，他在巩固自己的权力时，就认识到必须重视元老院。凯撒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②骑士

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仅次于元老的第二个等级是骑士，人们需要支付 40 万塞斯退斯才能获得一个骑士称号。骑士等级虽然已经有了帝国时代的新特点，但仍保留了大量

的共和国时代的特征。

骑士等级几经演变，公元前 2 世纪前，他们是充当骑兵的富有奴隶主，公元前 2 世纪后则逐步演变为商业高利贷贵族阶层；进入帝国后，还可以通过担任公共工程总监等新设官职领取薪俸。骑士与元老有密切联系，骑士可以候补为元老，元老之子在取得进入元老院的资格以前，则列为骑士。经过一番斗争之后，这两个等级在共和制的废墟上重新联合起来，他们成为元首政治的主要社会基础，大力支持元首政治。

③平民

平民等级中，包括城市平民和乡村平民两种，其范围比较广泛，经济地位也并不完全一致。一部分较富裕的农民和城市经营中小作坊、商店和果菜园的平民属于小奴隶主的范畴，他们是有产平民；而农村中大部分经济上依附于他人甚至濒临破产的农民和破产后流落城市无业为生的流氓无产者则是无产平民。屋大维时，仅流氓无产者就达到 20 余万，可见其数量之巨大。

④奴隶

为满足拥护奥古斯都政权的各级奴隶主的共同愿望，元首制政治将确保奴隶俯首听命放在首位。

2. 《家庭法》

奥古斯都曾经三次重申《家庭法》，甚至接受了“风尚

监护人”的特别全权，以巩固家庭。他规定所有已婚并育子的公民都必须遵守家庭法，凡违法者，不能正常继承遗产和从事各种职业。

这种旨在重建古代家庭的法律在罗马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上层人物的猛烈反对。它一方面要巩固夫权和父权，一方面却准许国家对从来一直封闭着的家庭小天地加以干涉。惩罚犯过失的妻子已经不是丈夫，而是法庭了。经过 3 个世纪以后，国家权力几乎完全代替了家长权力。

妇女们从家庭法中获得了新的权利。不过，由于法律规定妇女不能有独立法律行为，必须受男性的永久监护，所以她们故意装作没有自由。盖尤斯说：“按照我们祖先的习惯，妇女意志薄弱，她们虽已成年，仍须有人保护。”从老加图到康茂德，罗马社会的统治风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沙龙式风范，这是由于共和末期妇女们的魅力、争取及男人的宠爱所导致的对法律依赖性的减低而造成的。奥古斯都从现实出发，规定凡是生育 3 个合法子女的妇女都有自主权。哈德良规定妇女如取得监护人同意可任意处理自己的财产，事实上这种同意很快就失去了意义。到第 2 世纪末期，对年满 25 岁的自由妇女已停止一切强迫监护。

3. 控制军队

在亚克兴角附近的会战，促使奥古斯都特别关心他的军

队。军队保证了他的胜利和专制，同时也可能成为反抗皇权的中坚。

无产平民由于具有自由公民身份，又是雇佣兵的来源之一，所以屋大维对他们实行既镇压又笼络的两手政策：一面镇压平民起义，一面又施以“面包和竞技场”，即发放救济粮、举办娱乐活动和给予各种施舍来收买他们。屋大维执政期间，这种救济粮和金钱补贴曾经发放到 20 万城市平民手中。

政府有时举行有万余名角斗士参加的大规模角斗表演，甚至为海战表演而专门在第伯河边开掘一条长 1800 步、宽 1200 步的大贮水池，可供 30 余艘大型船只和 3000 多名水手同场竞技。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城市平民或者安于依附地位、耽于娱乐，或者充当政客、权贵的门客、党羽，或者参加雇佣兵队伍，已经失去了先前共和国时期的政治作用。

军队是帝国政权的支柱。内战结束后，屋大维即着手整编军队，犒赏士兵。他把原来 70 个左右的军团编为 28 个精锐军团，由罗马公民，主要是意大利居民充任，并辅以各省居民补充的辅助部队。军团兵驻守在行省与边疆。为安置退役士兵及保证他们的土地，屋大维建立了 28 处军事殖民地。此外，还创立 9 个每队千人的近卫军，驻守罗马、意大利并护卫屋大维本人。海军则分驻拉文那和墨西拿港。士兵总数

达 20 万到 30 万人。军队中由极严格的纪律所控制：20 年服役期间不能成家；军中有临阵逃脱者行十一抽杀律；对畏战退却的百人队长处以极刑。屋大维还将罗马军队全部转成常备雇佣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屋大维总揽军权，以强大军队作为对内镇压奴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工具。

4. 元首制成为国家形式

罗马帝国形成时期，各阶级、各社会集团确定了帝国的国家机构。

早在公元前 27 年，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屋大维便宣布：由于他作为三头之一的全权已告终，国家已经太平无事，他决定退隐林泉，过他私人的生活，并建议恢复共和国。这些建议有：承认元老院是最高国家机关，元老院是最高诉讼审级之一，除了埃及、叙利亚、西班牙和高卢，各行省通过屋大维的钦差或行政长官来管辖；历代皇帝都亲自管辖那些需要某种改革并驻有军团的行省；元老院掌管旧国库，掌握着高级官吏——财务官、罗马市长、行政长官、执政官的选举；由元老和骑士组成的特别十人委员会选出高级官吏，公民大会办理批准的手续。

当时，屋大维已经成了罗马公民的最高法官。他建议授予元首以“奥古斯都”称号，后来这个称号和凯撒的名字一样，永远加在帝国的各统治者的名字上。“奥古斯都”已被

译作“神所赞扬的”，事实上从宗教上认可了元首的权力。屋大维开始被称为凯撒神之子、凯撒·奥古斯都皇帝。由于在公元前 12 年，身为三头之一的终身大司祭列底都斯死去的时候，奥古斯都就被选为大司祭，因此，他和他的所有继承者都成了大司祭，并掌握了军事、民政和宗教的全权，所以后来奥古斯都又获得了“国父”的称呼。

形式上的共和国虽然存在，法律上皇帝与元老院也是“两重政权”，可是这种元首制无疑是君主政体。虽然，政体的君主制实质愈来愈露骨，但是，形式上的共和国在将近 300 年间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元首制时期的意大利和行省

1. 社会经济状况

帝国初期，意大利的农业落后于手工业，而整个意大利的经济又落后于行省。行省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帝国社会经济繁荣的主要表现。北方的高卢人一向以手工灵巧著称，自公元前 5 世纪起，即已拥有高超的制造武器、首饰、陶、木和造车的技巧，在帝国时期更得到进一步发展。高卢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各地兴起了金属、纺织、制陶和玻璃行业，产品甚至出口中欧、不列颠和西班牙。地中海东岸和北非的一些古老城市重新兴起奢侈品和传统产品的制造工业。小亚的毛

毯、皮毛，腓尼基的染料、花玻璃器皿，埃及的化妆品、麻纱等在罗马上层社会极受欢迎。采矿业和冶金业则在西欧各地兴起，如西班牙的铅、锡和银矿，高卢的铁矿，不列颠的铅矿和达西亚的金矿等。与此同时，农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埃及扩大了灌溉网和耕地面积，收成足以供应罗马的需要，多瑙河沿岸的潘诺尼亚和米西亚省也成为罗马的新谷仓，爱琴海诸岛的葡萄、橄榄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得到复兴。意大利酒此时受到高卢葡萄酒的威胁。公元前 1 世纪，绝大多数的意大利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一样居于特权地位。还有一些没有公民权的克勒特部落和利古里亚部落的居民，奥古斯都逐渐把他们划归各城市，赐给他们拉丁公民权。仿照罗马的样式，意大利被划分成几个行政区，这也促进了意大利的统一。到奥古斯都时代，通过将其划归各城市的方法，意大利完全“罗马化”了。与此同时，意大利和行省的手工业门类增加，产品种类增多，技术分工更加细密，各地素享盛名的传统手工业也开始复兴。意大利、伊达拉里亚、坎巴尼亚的青铜和炼铁工业、玻璃吹制，阿列提乌姆的陶业，莫德纳的制灯业，都兴盛一时。可从深埋地下的庞贝城中看出当时手工业的兴旺。遗址中有呢绒、珠宝、石工、香料、玻璃、铁器、磨粉、面包等作坊。据载，罗马城的手工业行业达八十余种。当时意大利的城市手工业生产以三五个奴隶和数位雇工的中小作坊为主，但像

阿列提乌姆的制陶作坊那样役使上百奴隶的大作坊也不是不存在。

2. 行政制度

奥古斯都任元首时，西方各行省也和意大利一样开始罗马化，而东方各行省却不同程度地希腊化。

必须指出，“罗马化”并不等于“希腊化”。奴隶制庄园所有者成了自治市生活的支柱。随着各行省的土地被分配给各城市，变为城市土地，当地的农业人口也随之变成了城市公民。罗马化主要表现为行省数量的增加和城市的发展，普通公社社员对部落贵族的依附性减弱，贵族手中的地产分散，古典奴隶制得到发展，罗马文化得到广泛传播。

和凯撒统治时代一样，军人殖民地在各行省纷纷兴起，并把土地分给退伍军人。和其他行省的土地所有制不同，军人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国家。根据奥古斯都的特别敕令，任何殖民地的退伍军人及其直系亲属都可免征赋税。军人殖民地上很快开辟了罗马式农场，住满了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奴隶，从而成为罗马化的基本单位。某些城市获得了自治市的权利，但是大部分的城市仍然不同程度地依附于罗马。当选的地方长官同属各行省中的特权阶层。

东方各行省较多地保留了以前的自治形式，和从前一样，最富有和具有特权的“希腊人”地位最高。虽然审判委

员会中希腊人和罗马公民各占一半，但罗马公民往往独占法庭审判特权。为此，奥古斯都曾从昔兰尼城发出敕令，庇护“希腊人”，防止他们受迫害。奥古斯都允许希腊人直接派遣全权特使到他那里，严禁官吏专横。当然，他口中的“希腊人”只不过是那些久已在东方各商业城市中占首要地位，并在国内战争期间支援过屋大维的富翁、大商人、大作坊主而已。这些人在罗马政权的庇护下，又适逢和平时期，正可以大展拳脚。

三、奥古斯都的对外政策

奥古斯都统治时代，长年内战和各行省的动荡不安，决定了他必须施行小心谨慎的对外政策。当然，在西方，奥古斯都依然极力扩大帝国的疆界，窥伺莱茵河和多瑙河，以武力阻止邻近部落与各行省的帝国反对者结成联盟。他还同邻近部落订立和约，使他们担负起保卫国境的责任。阿非利加的毛里塔尼亚，亚细亚的科巴基那、卡帕多客亚、加拉太、犹太等都是罗马的藩属王国。这些国家名义上拥有独立主权，但是他们不仅要捍卫罗马领土的完整，而且事实上都是臣服于罗马的。奥古斯都确定各国国王的人选，对各国内政外交具有最高决策权，还是各国内政外交的最高仲裁者。

在藩属国和半藩属国中，阿尔明尼亚由于夹在罗马与安息势力之间而显得极为重要。奥古斯都不能与安息开战，只

好通过外交方式来加强自己在阿尔明尼亚和安息的实力。公元前 20 年，安息王使节曾将以前战争中俘获的罗马军旗郑重其事地交给提贝里乌斯，并由他带回罗马。于是罗马统治者告诉人民，这象征着安息的臣服和对罗马最高地位的承认。拥护奥古斯都的人都认为他避免了在东方的冲突，给世界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和平，并在全世界确立了罗马的崇高地位。

奥古斯都统治帝国达 44 年之久。公元前 114 年，他在临死前政治遗嘱，后来这个遗嘱被人加上“神圣奥古斯都的行状”的标题。他对自己的统治作出几项总结。他用枯燥无味的简短言词描绘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以表现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但是从 he 统治末期所出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如自己总结的那么辉煌。

四、罗马帝国早期的文学艺术

远在国内战争时期，东方大地上就流传着救世主降临、普降幸福、使大地恢复和平和丰饶的“黄金时代”的观念。生活于公元前 70 ~ 前 19 年的维吉尔曾在公元前 40 年写成了一部牧歌集，预言将有一个带着“黄金时代”使命的婴儿诞生。生活于公元前 65 ~ 前 8 年的荷拉提乌斯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内容。这种思想被奥古斯都的拥护着广泛利用，用来证明奥古斯都就是这样的神和救世主。虽然罗马和意大利不

把他当成活神，但也宣传他能赐给人新的幸福时代。

文学与社会在这个时期都有了变化。文学及艺术观念发生改变。当代作家的作品成为文学典范，并在街上广为传唱。各种豪华沙龙里聚集了作家、政治家及贵妇人。此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法国兴盛时代。贵族文学化了，文学也贵族化了，它变成了一种纤细的美。作家们不再接近平民，也不再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讲他们的语言；文学终日沉浸在拉丁文的世界中，却完全脱离了生活。艺术形式必须以希腊文本为典范，只能描写希腊传统或宫廷生活。忒奥克里托斯的牧羊人或阿那克里翁的爱情诗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歌唱农事的欢乐、先民的美德、罗马的光辉以及诸神的显赫。文学附属于政治，意图号召人们拥护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时代由于诗文并茂，诗歌尤其繁荣，被称为罗马文艺的“黄金时代”。屋大维给予诗人特权，诗人则为元首、皇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著名诗人有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贺拉丁（公元前65～前8年）、奥维德（公元前43～前17年）。维吉尔生于意大利的小农之家，从小农破产之苦和自然之美中汲取生活养料的他在其作品牧歌十首、田园诗四卷中，生动地描画出意大利的田舍风光和农民的生活情景。因此，他受到屋大维的优待，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在史诗《伊尼阿特》中赞颂罗马，认为屋大维是特洛伊战争中神话英雄伊尼阿斯的后裔，是罗马的典范。维吉

尔是想歌颂屋大维的战斗事迹。他还写了一首描述罗马建国的叙事诗。通过这种象征式的预言，展示了罗马帝国扩张的过程及人民对和平的渴望。诗篇中的英雄被描写得像神一般的可敬，从而希望能使古老的美德广为流传并能与奥古斯都的道德和宗教改革相配合。

贺拉丁是继维吉尔之后的又一著名诗人。他的《颂歌》堪称抒情诗的典范。在诗中，他赞美诗人和爱情，也歌颂奥古斯都的人格及其生平事迹。而他的《讽刺集》和《书简集》则是教谕诗的典范。

奥维德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一位散文作家。他擅长写爱情诗，他的作品《变形记》将恋爱故事巧妙地穿插在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由于他的一些作品违背了屋大维恢复古老习俗的意图，他被放逐至黑海沿岸，在流放中写了《悲歌》和《本都来书》，其中充满对祖国和亲人的怀念之情。

在《悲歌》中，他运用大量优美而简单的语言创造出生动的意境和画面，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以行云流水的语言刻画出人物性格的特征，体现出与其早期诗作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他的诗作仍然缺乏独特魅力，主要着眼于人物爱情的描写，后来又转为对统治者的奉承。

在流放中他屡次向罗马统治者致信，表达悔恨之情，乞求能有一个较为温暖的家。他极度想念他的妻子，希望能在临死前亲吻她。然而事与愿违，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在流放

9年后去世。依他生前所愿，他的尸骨被带到意大利，安葬在首都的附近。

他的名望与维吉尔不相上下，他的《变形记》成了中古时期的传奇；薄伽丘和塔索，乔叟和斯宾塞，都从他的诗中寻找灵感；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也都在他的诗中发掘主题。他是古典时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者。

奥古斯都任元首的时代被称为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罗马文学以希腊诗人的形式和技巧将传达社会主流意识的思想和内容结合起来，对世界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古罗马文学风格的影响。

五、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

1. 皇帝与元老院的矛盾

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的统治阶级成分改变的过程一直在持续。到了1世纪中叶，旧贵族后裔占元老总人数的1/10。帝国时期前期，皇帝与元老院之间仍然有一定的矛盾，虽然元老院的成分经过屋大维时期的改组与清洗已经发生变化。皇帝与元老之间斗争的性质已不完全是帝制与共和制残余势力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代表新兴奴隶主贵族利益与皇权的不断冲突。

意大利最大的奴隶主和地主依然不甘心政权和特权地位旁落他人。他们虽然仍然崇拜共和制和“最后的共和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可是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幻想共和国，只是希望能由元老院选出从属于元老院的元首来执政。

元老院针对当权者的斗争一直在持续，由反对皇帝的匿名小册子和讽刺小曲一直到谋害皇帝性命的阴谋。生活在公元前 120 ~ 前 55 年的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是元老院反对皇帝制度的代表人物。他在第一个皇朝末主死后的几十年，著述了优里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历史。塔西佗凭借手中的官方材料和当时的内幕，再加上他那卓越的写作天分，极为生动巧妙地描绘了罗马帝国宝座上历代暴君的形象。塔西佗的同代人，约生活在公元前 160 ~ 前 70 年的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曾写过一部从优里乌斯·凯撒起的二十凯撒传，本书中详尽地收集了在元老院中间流传的谣言。结果，优里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皇帝们在后人心目中成为专制、残酷、骇人听闻的淫乱暴君的典型。

公元 54 年，亚格里皮娜的前夫之子，17 岁的尼禄登上帝位。他残忍凶暴，耽于淫乐，骄奢无度，醉心于戏剧，甚至自封为“伟大的艺人”，并登台演戏以寻求刺激。尼禄极力用布施和娱乐收买近卫军和流氓无产者以寻求支持，结果使财政日趋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公元 64 年，罗马城发生

大火，城中 14 个区被焚毁了 10 个区，火六天六夜后才熄灭。而尼禄却登楼观火，饮酒作乐。因而有民间传言说尼禄为毁掉民房、建造新宫而故意纵火。为制止流言继续传播，尼禄大肆捕杀嫌疑犯，而且趁机把“纵火案”嫁祸于当时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基督徒，并加以残酷迫害。

尼禄暴政，使得自提比略以来从未停息的反抗运动此时更猛烈地爆发起来，奴隶密谋起义和杀死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公元 61 年，罗马市政官谢恭都斯被家奴杀死。统治阶级根据当时法律——一奴弑主、全体家奴同斩，竟将死者家中的 400 名奴隶全部处死。同年，以“女王”鲍狄卡为首的起义在不列颠爆发，起义者攻占罗马人的据点，杀死罗马殖民者 8 万余人。公元 66 年，巴勒斯坦各地点燃犹太人起义的战火。起义者全歼耶路撒冷的罗马驻军，连连挫败前去镇压的罗马军队。罗马派大将韦帕芻率 5 万军人去镇压也未能奏效。公元 68 年，犹太起义未平，西班牙和高卢起义又起，起义者号召推翻尼禄暴政，取消苛捐杂税。同时，近卫军也背叛尼禄，元老院则宣布尼禄为“祖国之敌”。尼禄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公元 68 年自杀。朱里来·克劳狄王朝随之告终。

尼禄死后，公元 69 年 12 月，东部各省奴隶主和多瑙河军团拥立的皇帝韦帕芻战胜了西部行省和近卫军推举的皇帝，建立起弗拉维王朝。并开始提高行省的地位。

2. 社会经济状况

①大庄园的衰落

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虽然大地产仍然存在甚至有些发展，可是奴隶管理人并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庄园，其中有些变成了供人娱乐的大公园和供人观赏的丛林。畜牧业、葡萄酒酿造业、橄榄种植场、菜园和花园等，即使不是完全排斥谷物等农作物，但也使谷物耕作面积大大缩小。意大利日益陷入依赖进口粮食的境地。

当时著名的农学家科路麦拉的著作揭露了各种矛盾。科路麦拉和他的前辈一样，建议庄园规模不要过大，要利用千百年间积累下来并由当时的农学家总结起来的各种经验精耕细作。同时，他对组织奴隶劳动不满，建议对待奴隶要宽厚，要惩罚分明，以便鼓励他们更好地工作。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还是偶然现象的小规模租佃，到了 1 世纪中叶已颇为常见，科路麦拉这时已经熟知那些被称为隶农的人其实就是世代代守在自己一小块土地上的佃户，他建议把不适于使用奴隶耕作的土地租给他们。自然科学家普利尼认为大庄园经济导致意大利的衰落，他建议放弃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禁止奴隶带上镣铐工作，因为已经绝望的人根本不能很好地工作。他认为应把大农庄拆分为供一家及门客、隶农等几个依附的人耕作的小块田地。普利尼等多人都认为科路麦拉所主

张的那种合理化的农庄，在奴隶劳动的条件下是无法经营的，使用奴隶、放弃土地的精耕细作更合理一些。

②城市生活状况

虽然意大利的奴隶制农庄表现出了最初的衰落象征，可是由退伍军人、发财商人和手工业者补充起来的市元老阶层，势力还很强大，仍有无数人为了地方长官的职位弄得头破血流。拥有几十名奴隶的城郊庄园主在这些城市里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意大利的旧有产者，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发了财的手工业者、商人、高利贷者，还有把资财都投资到土地上的自由民和被释奴隶等是这些庄园的园主。这些人成了自治市的上层人物，甚至有富裕的被释奴隶的子弟加入了市元老阶层。

普提奥里城、奥苏格城的铭文载有，由于收集给一位长官的太太修建雕像的“自愿捐献”时压榨太甚，激起人民骚动。由此可见各地长官剥削居民的程度。各地方长官和市元老也不得不仿效皇帝对待罗马平民的方法来对待居民，以缓和阶层矛盾。各城市虽并没有经常的犒赏，但是市元老却常常举办免费招待人民的宴会并分赠礼物；地方长官还必须举办各种表演，建筑公共建筑物。这增加了供养自由贫民的开支，从而也就加深了对奴隶的剥削，加深了阶级矛盾。

罗马的贵族阶级一面赞扬“淳朴严肃的祖风”，一面榨取奴隶的血汗钱。而得到的大量剩余产品不是用来扩大再生

产，而是用来满足富人的癖好。贵重的家具、珠宝、服装和精美的饮食花去了罗马亿万的金钱。罗马的宫殿、城郊的庄园和那坡利附近拜伊地方的贵族时髦疗养地的别墅的豪华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在罗马风气的带动下，意大利各自治市的贵族也花费了很多钱在建筑城市的住宅和农村的庄园，以及雕像、绘画和艺术器皿上。手腕灵活而又通晓事务的富裕的被释奴隶，占有的财富常常超过那些轻视和仇恨他们的没落贵族家庭后裔。因而，对这些有钱无学的暴发户的讽刺在当时文学中已成了常见的典型。

另一方面，人民却穷困潦倒，住在多层楼房的小屋里面。在意大利各城市，穷人都住在小茅屋里，做小买卖或者受雇到作坊里做工，因受奴隶劳动的影响而工资极低。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自治市的市元老必须经常施舍才能防止可能发生的骚动了。

3. 罗马对行省的管理

公元1世纪上半叶，各行省的管理问题是帝国政府头疼的问题。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和奥古斯都本人一样，为了防止人民起义和财政亏空，极力对各行省进行剥削。提贝里乌斯在这方面制定了一项政府纲领，他说：“善意应当留着剪毛，不应当杀掉。”历代皇帝不仅控制自己的行省，同时还控制了元老院所辖各行省。政府为战略目的而大修道路也有利于

商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各行省经济的活跃。一部分西方各省的部落贵族的领地，以及东方各省的王室土地和神庙土地被没收，转归皇帝之后再开始出租。佃农都按契约租地。

各行省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西班牙西北各地，还有不少地区保留着过去的部落组织，没有城市机构。高卢南部和中部地区由于本来就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部落贵族也急需罗马的支持，所以很快就被罗马化了。而西部和北部地区虽然有两个很大的殖民地——特瑞维累人的奥古斯塔（特列尔）和阿和里披娜殖民地（科隆），但是由于发展程度较差，罗马化进行得很缓慢。这里原始公社关系比较稳固，对罗马的反抗较强。少数古老城市以外的阿非利加和多瑙河沿岸地区发展得更为缓慢。阿非利加绝大多数城市保留着迦太基统治时期的旧结构，并由最高长官来管理。大领地在析伯尔部落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门客、世袭的佃户以及债务人只是依附于领主，共同处于罗马太守和部落首领的统治之下。在多瑙河沿岸各行省，主要是在罗马军队占领的各战略要地产生了城市，并由罗马太守管辖土著各部落。

在优里乌斯·克劳狄乌斯朝，又有三个行省并入罗马帝国内，即色雷斯、毛里塔尼亚和不列颠。色雷斯很早就罗马保护之下。曾经帮助当地国王镇压臣民起义的马其顿总督管理着这个地方。在公元 44 年，色雷斯改为行省。罗马商人很早就移住毛里塔尼亚，这里还建立了退伍军人的殖民

地。历代国王都臣服于罗马。在卡里古拉统治时代，毛里塔尼亚的最后一个国王被召到罗马，传说是被杀死在那里，毛里塔尼亚从此变成了一个行省。

早从凯撒时代起，意大利和不列颠的贸易关系便开始巩固起来，其东南部的财产分化极为严重。贵族当中形成了准备依靠罗马人的势力排解内部纠纷和进行反人民斗争的亲罗马派。例如，不列颠的五个“王国”中曾经有一位被驱逐的王子请求卡里古拉给予援助。罗马人也曾援助过他。亲罗马派和反罗马派即贵族派和人民派之间的斗争也因此日趋尖锐。在当时，不列颠就已经成为督伊德教的中心，所以，成为高卢反罗马统治的人们的避难所和同盟者也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岛上的谷物、牲畜、金属、珍珠等财富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掠夺物。所有这一切成为克劳狄乌斯在公元 43 年大举征战不列颠的主要原因，该岛的一部分也被划为一个行省，获得自治市权利的城市维鲁拉米成为省会。邻近的各地区都在获得“国王和奥古斯都的总督”称号的藩属国王的管辖之内。但是在该岛北部和西部各地区居住的各个部落，还只是刚刚开始使用铁，也没有亲罗马的贵族，因此仍然保持独立。

西方各行省时而消沉、时而重新爆发的反罗马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发生起义的地方的情况都很相似。

罗马对高卢的行省政策和高压统治，在帝国初期曾遭到

包括一些贵族在内的高卢人们的反抗。高卢人民处在本地贵族和罗马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痛恨做被征服的“蛮族”。部分贵族也不甘心屈服于罗马，他们常常号召人民起来参加反罗马的斗争。公元 21 年，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高卢贵族朱利佛洛拉和朱利·萨克罗维尔分别领导德来维里邦和爱杜依邦起义，但不久就被罗马镇压下去了。

公元 1 世纪，高卢境内的反罗马斗争曾使得罗马上层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因为这些起义不仅是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之间的斗争，也兼有农民、城市贫民反抗新老贵族统治的性质。然而这些斗争在帝国境内毕竟只是小范围内的动乱，并没有动摇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却促使统治者更多地采用怀柔绥抚的手段，以获取高卢奴隶主对帝国政权的支持，加速高卢贵族与罗马奴隶主阶级融为一体的过程。此外，罗马政府还给高卢地方政府一些有限的自主权，授予全体高卢居民罗马公民权，以借此使高卢人民与罗马统治者的矛盾得以缓和。通过这些措施，罗马扩大了在高卢的统治基础。

政府在东西各行省中的农业和税收政策，在某些方面相似，取得的效果也基本相同，但是东方各行省与西方毕竟大不相同。西方各行省在被罗马征服之后，逐渐走上了奴隶制发展的道路。而东方各行省的奴隶制关系在许多世纪之前就已产生了。事实上，罗马征服者仍然执行了希腊化国王的政策，在旧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新的城邦，并且把拥有农业

居民的集市也编入新的城邦。相比希腊化时代，私有制在罗马时代已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各领地特别是城市中，奴隶制也得到继续发展。奴隶劳动与自由民劳动配合，在手工业中被广泛使用。但是由于罗马统治还不能深刻触及东方各国家和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所以债务奴隶和卖身奴隶这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奴隶制形式，在罗马统治时期仍然存在。

公元 1 世纪，东方各行省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都非常活跃，海上贸易和商队贸易更加繁荣。叙利亚商人就依靠经营商队贸易发了财。他们把从印度和阿拉伯运来的各种宝石、香料等，在意大利和罗马以高价转卖，从中赚取了大量财富。东方的以弗所、安条克、拍加摩斯、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也都靠这种贸易发了大财，从而以富裕和繁华闻名于世。

这些行省中的城邦机构与意大利或希腊的不一样。小亚细亚许多地区的土著居民仍然过着农业公民生活。这种地区在叙利亚更多，叙利亚的古代东方形式的残余经过希腊化，在帝国时期仍然保存下来。一些藩属王国在叙利亚边境依然存在，不过有时归行省管辖，有时由经过训练且全心全意效忠罗马的国王统治。

罗马直接通过官僚机构施行对埃及的政策，这些官僚机构大部分在托勒密王朝时代就已经创立。罗马政府把埃及作

为罗马的重要谷仓，因此加重了农民的租税和徭役负担。据文献记载，埃及有 50 种实物税和 450 种以上的货币税。除了加在各行省居民身上的修路、运输、供养在省内旅行的官吏等普通徭役之外，从 1 世纪开始，罗马还在埃及实行了强制租种贫瘠地段的徭役。像纳贡一样，整个农业公社要负责耕种这个地段，所以农业公社在埃及保存得特别长久。如果欠交赋税，欠税人及其亲属和同村的人都要受到株连，遭到各种拷问。为了逃避责罚，农民们仍用弃地潜逃的方法对付，就像托勒密时代一样。由此可见，只有大地主和从印度大量运销货物的亚历山大里亚商人从埃及归并于罗马中得到了好处。在这个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成了帝国最大的港口。

4. 克劳狄乌斯王朝的对外政策

整个罗马征服史证明，罗马人要获得胜利，一是要依靠借助罗马援助以反对本族人的地方贵族，另一个是被征服地区的奴隶制和城市生活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容易实行罗马的管理制度。但莱茵河、多瑙河对岸各部落的社会分化还没达到罗马能顺利干涉成功的程度，所以罗马虽然屡次企图把版图扩大到这些界限以外，但始终不能成功。

罗马与安息的关系更加复杂。和从前一样，争执点仍旧是阿尔明尼亚。提贝里乌斯认为最好是采取外交政策。根据

提贝里乌斯的委托，盖尔玛尼库斯立本都王子芝诺为阿尔明尼亚国王。为了防止激怒安息，叙利亚的总督披索根据提贝里乌斯的指示，没有率领罗马军队进驻阿尔明尼亚。尽管元老院反对派费尽心机、诽谤控告他毒死了盖尔玛尼库斯，并因此判了他的刑，但反对派还是希望执行谨慎的外交政策的。相反地，军队司令官、被释奴隶、市侩等，那些指望利用战争的机会升官发财的人都在鼓吹要求远征东方。皇权和元老院任何一方力量的加强，都将改变对外政策。

在尼禄统治的后半期，这种情势表现得尤其显著。克劳狄乌斯死之前，安息人占领了阿尔明尼亚，阿尔沙克王朝的提里塔特当上了阿尔明尼亚的国王。尼禄统治初期，在元老院集团的影响下，贵族所欣赏的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被派到东方。他把提里塔特从阿尔明尼亚赶走，而代之以罗马的傀儡提格拉涅斯。同时，为了削弱敌人的后方，罗马和安息的藩属国希尔加尼亚联盟。尼禄与元老院关系破裂以后，开始施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以征服阿尔明尼亚。

在尼禄的支持下，提格拉涅斯率军侵入了安息的藩属国阿迪亚别那，于是引起了与安息的战争。代表宫廷集团利益的佩特被任命为司令官。科尔布罗作为叙利亚总督本应支援他，但因为科尔布罗不赞成这种政策，所以支援不得力。佩特与安息的主力一接触，便遭到了惨败，所以罗马被迫同意让提里塔特重回阿尔明尼亚。

这时期，在黑海沿岸，罗马的对外政策也非常活跃。本都改成行省。麦西亚总督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前来援救被斯基提亚人包围的赫尔松涅斯，结果该城被罗马军队占领，南克里米亚因此也出现了罗马驻防军。罗马军队本要继续向克里米亚深入，但由于当地部落奋勇反抗，被迫停止。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远征到多瑙河对岸，袭击从伏尔加河流域迁移到此的萨尔马泰部落。多瑙河对岸的十万居民被迫迁往麦西亚省。当时德涅斯特河口上的希腊城提拉斯隶属于罗马，后来归并于麦西亚省。尼禄攻击游牧民族阿兰人，并一直进军到黑海。很明显，尼禄为了反对与占去他们土地的奴隶主进行斗争的当地各部落，极力笼络和支持作为古典奴隶制社会的外国前哨的希腊殖民地。

从黑海沿岸各国和阿尔沙克王朝诸国以南，阿拉伯和东北非洲的几个国家在公元前几世纪的作用相当重要。自埃及和叙利亚被罗马统治之后，这些国家的作用更加重要了。

阿拉伯北部纳巴特伊王国在 1 世纪仍然存在，但是自罗马人侵入叙利亚，巩固了势力之后，这个王国便成为罗马的藩属国。纳巴特伊国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仍然是靠中介商业，王国的首都培特拉，与埃及伯伦尼卡港口遥遥相对的琉凯—科梅港，都是中介商业的主要中心地。按照罗马的政策，各藩属王国逐渐改成行省。公元 106 年，纳巴特伊王国合并到罗马帝国，改成阿拉伯行省，但罗马人企图深入丰岛

南部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六、克劳狄乌斯王朝的末日

1. 犹太人的起义

犹太起义破坏了尼禄所制定的庞大的征服计划。狂热的犹太教徒逃到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他们的反罗马的人民党，得到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的支持。奴隶和赤贫的农民组成了一个坚定、不妥协的短刀党组织，他们发动了对罗马人和当地富人的进攻。结果，狂热的犹太教徒和短刀党人被罗马太守残酷地镇压。狂热的宗教情结和对解放之神的期待，使他们对罗马的仇恨更加深了。

虽然犹太起义破坏了尼禄的征服计划，但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政权。公元 68 年，由于沉重的苛捐杂税，高卢暴动起来，并且很快就得到西班牙的支持，这次暴动才真正威胁到尼禄的统治。

2. 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结束

塔拉哥西班牙的总督伽尔巴得到自己的军队的拥戴，被立为皇帝。尼禄被废黜后，元老院和伽尔巴达成一致，元老院承认伽尔巴为皇帝。伽尔巴也尽力设法恢复元老院的权利，同时也答应绝不辜负支持他的各小贵族。他把罗马公民权赐给西班牙人和高卢人，并把所有支持过他的城市的赋税

减低 $1/4$ 。这些大都是地方贵族起重要作用的城市。但也有些城市直到最后也仍效忠尼禄，比如退伍军人的殖民地。

伽尔巴的亲元老院政策引起了罗马平民与近卫军的不满，他们发动起义，杀死了伽尔巴，把尼禄最亲近的一位朋友奥托立为皇帝。但是奥托统治时期也很短，维铁里乌斯的军队侵入意大利，他在自己的军队被击溃后就自尽了。

当时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觊觎皇帝位置的人——维斯帕西亚努斯。当时犹太战争快要结束，只剩下收复耶路撒冷了。维铁里乌斯在公元 69 年克利摩那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失败了。之后不久被杀，于是维斯帕西亚努斯成了帝国惟一的统治者。

3. 后维里斯领导的运动

高卢巴塔维贵族后维里斯领导的运动，规模非常大。这次运动首先从巴塔维部落招募来的辅助部队开始，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莱茵河地区。起义得到以萨宾、克拉西克、图托尔为首的特瑞维累人、林哥尼人等各高卢部落的响应，后维里斯联合日耳曼各部落组成同盟军，准备与罗马决一死战。萨宾、克拉西克和图托尔原来都是享有罗马公民权的地方贵族，但为了争取高卢的独立，他们放弃了罗马辅助部队中的职务，归附后维里斯，试图宣布高卢是一个独立帝国。包括维铁里乌斯的驻守莱茵河的军团在内的各辅助部队，都站到

起义者这一边。不久，起义者几乎控制了整个莱茵河地区。佩铁里乌斯·凯列阿里斯击败了后维里斯、克拉西克和图托尔领导的起义军，他也最终赦免了高卢的起义者和叛变军团。凯列阿里斯对他们发表演说，宣称罗马人来到高卢绝对不是为了侵略，而只是专程为这个地方送来和平。他还劝告起义者说，现在已经不存在战败者与战胜者之分了，帝国是罗马人的，也是高卢人的。

在此之前，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儿子提图斯通过长期的围困以及和起义者的激烈战斗，最终占领了耶路撒冷。全城遭到破坏，7万名居民全部被卖作奴隶。维斯帕西亚努斯父子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凯旋仪式来为此庆祝。

4. 公元 68 ~ 69 年事件的意义

塔西佗曾经写道：公元 68 ~ 69 年事件揭开的皇权的秘密表明：不仅是罗马，各行省也能宣布拥立皇帝。历次事件证明，各行省统治集团和帝国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它们都希望在帝国的管理中占据适当地位。

罗马政府吸取了这些教训，因此从弗拉维优斯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维斯帕西亚努斯时代起，便开始用新的政策处理罗马与各行省的关系。

七、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

1. 安托尼乌斯王朝

人们普遍认为，维斯帕西亚努斯赢得胜利之后的一百年间，是罗马奴隶制社会最发达的时期，也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疆域面积最广阔的时期。但是，如果说奴隶制在这时已达到极盛，那么在这个时期之末，它已经明显地走下坡路了。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表现为：各行省的日趋“罗马化”和经济的日益繁荣；在帝国社会生活中各行省居民作用的增强；行省中元老、骑士和军人数量的增长。世袭的君主虽然各有特点，但总的说来都在维持一条贯穿罗马帝国历史发展始终的政治路线——支持各行省城市以及贵族，同时竭尽全力挽救日渐衰落的意大利；此外，他们还试图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保护能够供给军团和辅助部队兵源的居民阶层，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目的是防止各行省发生新的起义或者奴隶起义。

在历代帝王中，有许多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弗拉维优斯王朝的奠基者，弗拉维优斯·维斯帕西亚努斯（公元 69 ~ 79 年在位），他本是萨宾的里亚特城一位贫穷

公民的儿子，通过必要的军职和非军职晋升而成为元老。由于他是通过这种手段发展起来的，所以遭到了旧贵族的嫉恨，可是却得到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隶们的拥护。元老院中的许多元老取代罗马旧贵族也都经历了同样的途径。引起元老们不满的主要原因显然是维斯帕西亚努斯打算把政权传给他的儿子提图斯，如果提图斯没有后代便传给第二个儿子多米提亚努斯，而多米提亚努斯是最不受元老院欢迎的。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一部分元老反对世袭的君主政体，在他们看来，交接皇帝应由元老院选举产生。可是，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势力在当时占了上风，弗拉维优斯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死后，提图斯便接替了皇位，不过时间不长就死了。他的弟弟多米提亚努斯又继续掌权。

在多米提亚努斯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它的后期，元老院反对派的呼声又重新高涨，他们甚至企图发起暴动。

在多米提亚努斯严密监视下的各行省总督对其更为不满，几次反叛阴谋被揭穿，又招致残酷的镇压后，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后，被释放的奴隶们杀死了多米提亚努斯，元老院也宣告他是罗马人民的公敌，愤怒的人们推翻了他的雕像，对他的遗迹百般诅咒。

多米提亚努斯死后，旧元老贵族人物涅尔瓦被元老院宣布为元首，他便是安托尼乌斯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从这个王朝开始，便有了最符合元老院利益要求的君主政体形式。政

权不再传给君主的儿子或近亲，而是传给经元老院批准的义子。自涅尔瓦开始，这个王朝的每一位皇帝在加冕即位时都要宣誓；不经元老院批准，不能对元老实施死刑，决不没收元老们的私人财产，也不接受任何侮辱元老个人的密告。只有在皇帝遵守这些条件的前提下，元老院才负有忠实于皇帝的义务。涅尔瓦实行尊崇与宽待元老的政策，但随即遭到行省贵族和军队的反对，而不得不让位于战功卓著的图拉真。

图拉真，西班牙人，是第一位出身于行省贵族的皇帝。他一登上皇位就开始推行扩张政策，进军达西亚并将其置为行省，后来又设立了阿拉伯行省。在对帕提亚的战争中，侵入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直抵波斯湾，而图拉真却在征战中死亡。然而，罗马帝国的疆域至此也扩展到有史以来最广阔的程度：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岛，北临达西亚，南至北非，横跨欧、亚、非三洲。从此以后，罗马的国力盛极而衰，扩张的势头也逐渐成为强弩之末。

危机的征兆在下一代皇帝——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统治的时期变得更加明显。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也是一位有着显著特征的人物，他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是斯多葛学派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冥想录》一直流传至今。在这本著作中，每章都充斥着令人吃惊的极黯淡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

安托尼乌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君王是玛尔库斯·奥列里乌

斯的亲生子——康莫都斯。在他统治的年代所发生的事件，宣告了帝国贵族所谓的“黄金的”安托尼乌斯时代的终结。

2. 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与隶农制

罗马帝国的居民逐渐习惯了为出售而进行专业生产，于是，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在各行省间乃至个别经济部门内部渐渐地发展起来了。例如，在皮革生产部门中就出现了制造各种鞋靴、制造装酒革袋、制造马具、进行皮革初步加工的各种专业工人。各种毛织品包括染色等生产部门在内也都是在内部进行分工。而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各部门专业化程度最高，手工业者分别从事制造凹刻宝石、项链、指环、各种金银器皿、绣金工艺品、金银带或者雕像的眼球等等。手工业大幅度地向前发展了。意大利和各行省的手工业者不仅能够制造高级艺术品，也能造出各种外科医疗器械等复杂物品。

帝国国内、各行省之间的贸易以及和东方各国如阿拉伯、印度、中国等之间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当时的统计，帝国到东方各国交换香料、薰香物、丝绸、珠宝等各种奢侈物品每年要耗费接近 1 亿谢斯提。依靠经营这种贸易，东方各行省的商人都大发其财。但是大批贩卖西班牙葡萄酒、油、高卢麻布和高卢陶器的商团在西方各行省中也出现了。

帝国的繁荣只是表面现象，它本身隐藏着各种非常尖锐

的矛盾。生产力水力仍然十分低下。由于必须建立大量复杂的监督管理机构，所以大种植园中使用大批奴隶劳作的效率很低。因此，在土地很集中的情况下，生产规模依然是比较小的；基本生产部门和大领地的内部都是小农场，它们拥有自己的工具，不和同一庄园主的其他农场并在一起。

在大领地中，领地主人常常分配给被释奴隶必须耕种的土地，而他们必须抽出时间为从前的主人服务。

出租奴隶的风气也更加流行了，奴隶挣来的工资还要分给他们的主人一部分，劈分份产的做法也日益盛行。所谓份产，就是主人交付奴隶使用的一部分财产，包括土地、作坊、店铺和其他奴隶。奴隶经营份产所得的收入一部分自有，另一部分则要上交给主人。所有这一切必然会提高奴隶的劳动积极性，份产最初是由主人任意决定的，可以把它扩大、缩小或者取消，但由于经营份产的奴隶要求保证自己的利益，份产最终成为不可剥夺的奴隶所有物。这一切都是奴隶制产生危机的预兆。

隶农最初指自耕农，即自己种土地的农民或殖民地的移民者。到共和国末期，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耕者耕种，佃耕者中也有奴隶，分为契约租户和世袭佃户两类。这些佃农和以交付定量收获为条件从主人手中获得小块份地的奴隶同属于隶农，这种生产关系就称为隶农制。隶农最初向地主交纳货币地租，后又交占收成 $\frac{1}{3}$ 左右的实

物地租。到帝国初期，破产农民和一部分奴隶逐渐转化为隶农，并且成为隶农的主要来源，隶农制因此逐渐盛行。科路美拉曾在《论农业》中说过：“这些人分为两类：佃农和奴隶，即不带枷锁的和带枷锁的。”

3. 公元 1~2 世纪罗马帝国的行省

① 西方各行省

公元 1~2 世纪，各行省经济曾经一度出现一定程度的高涨，但是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尤其是西方各行省的经济。很快中型地产和城市就开始了衰落，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始衰落，大庄园有了发展。而在其他各行省，也再现着意大利所经历的这条道路。不过每个行省的特征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它们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帝国整个历史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在西方行省中，不列颠是罗马化程度最低的一个。虽然这里也曾出现一些罗马式的奴隶主庄园，但主要集中在该省的东南部。其余地区占绝大多数的仍然是土著部落乡村，他们依然过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生活。地方生产很不发达，制造克勒特式物品的小型作坊居多。商品主要是靠从高卢和西班牙输入。鲍狄卡起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列颠都没有屈服。罗马军团把顽抗的土著部落逐步赶向北方和西方。

高卢紧靠意大利半岛，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每年向罗马交纳巨额赋税。凯撒统治时期，高卢的贡税每年达 4000

万塞斯提斯，这对罗马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在高卢建立三个元首行省，即凯尔特行省、比尔及行省、阿基坦行省。元首任命的行政长官兼特使任总督，总督驻地分别为卢格敦、兰斯和桑特。这三个行省加上受元老院治理的纳尔榜行省共管 90 个左右的州，包括几个城镇、一些村庄和庄园。仿效罗马的制度，地方政府可以自己选举行政长官，任期一年，或者罗马派遣官吏来治理，向帝国交纳贡赋，不过在内政事务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高卢中部爱杜依等部族，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在这些部族中，已经出现政府机关、法庭、武装队伍等公共权力。氏族议事会议正式成为统治机构，另外，由贵族组成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殊武装力量骑兵，也普遍存在由社会供养的特罗依僧侣构成的法庭。虽然这些公共权力带有萌芽性质，还不成熟、不完善，但它和除了舆论以外而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的氏族制度已经明显不同。为了维持公共权力，平民都要交纳捐税，有权势的贵族承包税额，征集税款后交给公共权力机关，这是氏族社会中完全没有的。

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高卢的手工业生产具有家庭工业的性质，以小型作坊为主，规模比较小，作坊主一般雇佣一两个奴隶或者小量的自由劳动者从事生产，只有少数的制陶和纺织业中有使用数百个奴隶或被释放的奴隶进行生产的大工场，而且当时的设备也比较简陋。但是高卢由于具有天然

资源丰富、交通网方便和市场广阔等良好条件，所以在进入奴隶社会后取代意大利成为罗马帝国西方诸行省中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

在公元 1 世纪后半期，西班牙是当时奴隶制最发达、城市最多的罗马化行省之一，被划分成塔拉哥西班牙、培提卡以及路西塔尼亚三部分。当时的元老、骑士、作家和诗人有许多都是西班牙出生的，西班牙产的葡萄酒、油类、鱼类、金属制品在罗马帝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尤其是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改革以后，城市生活非常活跃，不过在半岛的某些地方还保留有各部落的领域。但是，从公元 2 世纪中叶起，西班牙商业已经衰落，在帝国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西班牙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参加军队的意大利人也越来越少了。富有的财主虽然为了供应城市需要耗资甚巨，但是城市面临经济破产，已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在阿德里亚努斯时代，西班牙的各城市曾发生过多动乱。在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时代，路西塔尼亚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巴尔干—多瑙河流域的达尔马提亚、诺利克、里西亚、潘诺尼亚、麦西亚和达西亚等省的性质与上述各地区稍有不同。多瑙河沿岸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占有制还没有发展起来，小型庄园仍然是罗马化程度较低的土著居民的村公民占大多数。因此，奴隶制发展程度不高。手工业者也主要是自由民，在多瑙河沿岸诸省的手工业者中，即使是被释奴隶也

很少。

多瑙河各行省同最好战而且又对罗马最危险的部落毗邻，这一情况影响了很大。在公元 2 世纪，罗马人认为莱茵河国境内平安无事，于是减少了这个地区的驻军。相反地，在多瑙河国境却增加了驻军。因此军事因素在多瑙河各省影响重大，这里大多数的城市长官、地主、包括农村的上层人物都是从退伍军人出身的。很大一部分城市是从军事殖民地和军营居住地兴起的。例如，在尼禄的时代，大约公元 63 年，在莱茵河有 7 个军团驻扎，多瑙河有 5 个军团驻扎，而在阿德里亚努斯的继承人安托尼乌斯·披乌斯的统治时代，在莱茵河只剩下了 4 个军团，而在多瑙河已经驻扎了 12 个军团。在这里，作为罗马政策的支柱和传播者的军人的作用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大。他们之中常常出现商业和手工业企业主。而且，军人也经营达西亚的金矿。

② 东方各行省

公元 2 世纪，东方的城市自治制不断地走向衰落，而同时皇帝的行政机关对城市的监督权力却日益增长，从图拉真时代起出现了监督城市财务的监察官。各省总督对地方生活的事情不论大小，全都加以干涉。小普利尼曾经任过提尼亚的总督，他给图拉真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小亚细亚的里奇亚和帕姆非里亚、本都和比提尼亚、加拉太、卡帕多客亚等城市，自治机关通常都由个别巨富公

民来领导，几乎没有召开过人民会议。即使是地方长官，也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几乎没有实权。但由于各城市间竞争日益剧烈，以及惧怕人民起义，他们也被迫捐献巨款以改善城市设备，也对市民做一些施舍。小亚细亚在帝国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当时它已处在极其衰落的境地。

叙利亚比小亚细亚要差得多。在叙利亚，前罗马法律、地方宗教、艺术等，势力都比较强大；农村公社占有叙利亚的大部分土地，而不是划归城市；农民依旧承担着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语言上，阿拉美亚语并没有被拉丁语和希腊语所取代。公元 2 世纪末，军队是叙利亚的一个沉重负担，由 6 个军团和相当数量的辅助部队组成的军队的宿营、供应以及兵差等重重负担，使得大部分叙利亚人家破人亡。在 2 世纪，与东方的过境贸易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愈来愈举足轻重。叙利亚商人依靠过境贸易发了大财，他们不仅在叙利亚各城市，同时在高卢、罗马、达西亚、潘诺尼亚、奥斯提亚和其它行省的城市都有商人协会。由此一来，由于进行商队贸易形成的一个贸易中心——帕尔米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占据了重要地位。

罗马人在埃及极力想榨取一切，所以非常彻底地保持着旧关系。居民中拥有或大或小特权集团的现象仍然存在。埃及人依然是毫无权利可言，他们几乎全部参加到海军中。压在他们身上的是种地、纳税和徭役等非常沉重的负担。农民

破产，大片的土地荒芜，强迫租佃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了，以至于退伍军人等免服徭役的人从公元 2 世纪中叶开始也不得不参加礼拜式和租佃土地。

4. 帝国的衰落

这样，到安托尼乌斯时代的末期，大部分行省的经济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开始走向衰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起义越来越频繁。安托尼乌斯“黄金时代”的太平幸福只是虚假的表面现象，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贵族与豪富享有的幸福。经济和社会基础的不稳定，以及军队力量事实上的衰弱，使得皇帝被迫采取防御政策，以避免战争爆发。

安托尼乌斯王朝末期的一位皇帝哲学家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在与日耳曼、色雷斯和萨尔马泰部落的魁代人、马尔可曼尼人、哥梯尼人、雅齐基人、佩夫金人、巴斯塔尔尼人、以及与斯拉夫人的科斯托保克部落等进行战争时，帝国的衰落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等传记作家的记载，从伊利里克边境到高卢，没有一个民族不曾发动过起义。因为罗马长期干涉他们的内政，不断征集壮丁补充辅助部队，还掠夺他们同部落的人做奴隶，这使他们异常愤怒，纷纷起来战斗。他们把受罗马操纵的国王赶走，换上了决心与罗马帝国战斗的领袖。

这场战争有时激烈，有时沉寂，一直持续了 11 年，帝

国为此遭受了严重损失。千千万万的叛卒和逃兵都投往“蛮族”方面。多瑙河沿岸各行省、色雷斯、马其顿、亚细亚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意大利也受到了威胁，很多人都认为布匿战争的时代来临了。鼠疫、饥饿、关于“关迹”和“征兆”等的谣传更加剧了混乱。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企图在他的敌人内部搞分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虽然是一位战胜者，但是他被迫做出了很多让步，比如他赐给一个部落罗马公民权，免除另一个部落的捐税，答应给第三个部落现金和谷物补助等。

从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统治时代起，国内奴隶制危机日益明显，国内生活开始发生变化，相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各族和部落对帝国边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日耳曼人、萨尔马泰人和其它“蛮族”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士兵和农民，他们与起来反抗帝国贵族和奴隶制国家的广大奴隶、农民、隶农结成了统一战线。

八、公元 1~2 世纪罗马帝国的文化

1. 文化概况

公元 1~2 世纪的文化体现出一些鲜明特征，对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有决定意义。随着帝国各地的上层阶级团结在罗马政府的周围，就形成了统一的希腊—罗马文化。

这种文化逐渐在各行省普及，同时各行省的文化也对它有影响。这时帝国各地区都出现了作家、雄辩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从公元 2 世纪中叶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从东方各行省出生的。在罗马帝国境内，希腊语和拉丁语同等重要。出生于东方各行省的人们撰写了多部有关罗马历史的著作，皇帝哲学家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用希腊语完成了自己的哲学论文。各行省还盛行罗马法、罗马国教和罗马建筑术。另一方面，东方的宗教在罗马、意大利以及西方各地得到传播。各行省的法学家也都参与制定法律。

罗马建筑术最杰出的作品有在图拉真时代建成的横跨多瑙河的大桥、图拉真广场及其记载达西亚战争的用浮雕制成的胜利柱，它们都是大马士革人阿波罗多洛斯设计的。在罗马，马戏场、体育场与圆形剧场非常普遍。罗马有好几个体育场，主要用于运动竞赛、赛马或赛车以及某些激烈的竞争场面。更常用的马戏表演地点，是凯撒在巴勒登丘与 Aven-tine 之间所重建的 Maximus 马戏场。这是一座巨大的椭圆形场地，长 2200 英尺，宽 705 英尺，三面有可容纳 18 万观众的木质座位。图拉真用大理石重修了这些木质座位。

2. 文学

在公元 2 世纪，意大利和西方行省在帝国文化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已不复存在。不过，在公元 1 世纪的文化活动家

中，意大利人还是有不少的，他们的著作都体现出当时政治斗争的状况。

在政治思想上，塔西佗是共和思想的最后代表人物。其传世的作品共有五部：《演说家对话录》、《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日耳曼尼亚志》是记载日耳曼诸部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情况的。《历史》主要叙述韦帕芻（公元 69 ~ 79 年在位）、第度（公元 79 ~ 81 年在位）和图密善（公元 81 ~ 96 年在位）统治时期的历史共 12 卷。《编年史》共 18 卷，记载了从公元 14 年到公元 68 年的史事。这些著作中充分表现出他对于共和制的怀念和对帝制的憎恶，这种思想虽有失偏颇，但却深刻地说明了罗马专制帝制的黑暗。

与塔西佗基本同时代的普鲁塔克也享有盛名。他出生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曾周游各地。他博学多闻，据说曾做过图拉真和哈德良的老师，得到图拉真的恩宠而被授予执政官职位。他的代表作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包括 50 篇传记，大部分是两人合传。其主要思想是把全世界变为统一的城邦，即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保持统一与繁荣。这种思想在各行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有反映。《名人传》材料丰富，但有失严谨，有时罗列传闻之词、谈关之资、遗闻轶事，而未加甄别。在历史观方面，英雄史观表现得非常明显。然而，由于记述了不少史实并保存了不少已散失的史料，所以仍不

失为一部重要著作。

曾担任皇帝金库检查官和埃及总督等要职的阿庇安所写的 24 卷《罗马史》中就记述了从罗马建国始至图拉真统治时期的全部历史。全书按地域、行省、民族、事件分卷叙述，对历次重大战争，尤其是内战史记载详尽。阿庇安的著作记载了像斯巴达那样的奴隶起义，而且考察了罗马内战的物质基础，揭露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反映了罗马统治阶级对外扩张的种种血腥暴行和各地人民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至今它仍然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3. 哲学

绝大多数的罗马哲学家都是斯多噶学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忙于追求美女、醇酒和美食，无暇搞理论研究。尤儒哲学的行乞鼓吹者遍布整个罗马，他们呼吁人类应过一种单纯枯燥的生活，不必费劲思考。

由于罗马的斯多噶学者是一种实干家而不是冥想家，所以他逃避形而上学，认为那种追求没有希望，宁愿在坚忍主义中追求一种不需超自然的监督与指挥亦能维护人类尊严、社会秩序及家庭团聚的行为哲学。他的行为法则核心是自制，他要使理智驾驭情感，训练他的意志无所欲求，以使他心灵不受外物的牵绊。在政治上，他承认在天父之下的人类有广泛的手足之情；同时，他爱他的国家，随时准备为避免

国家或他本身受辱而死。他永远可以选择生命，当它变成了一种罪恶而不再是一种恩赐时也可以随时抛弃。人的良知超越任何法律。统治广大繁杂的领域不得不用君主政体，但是如果统治者是暴君，杀死他是理所当然的。

同样，伊壁鸠鲁主义也有很多信徒，实际上它也是悲观厌世主义。“过去无我，现在有我，将来重新又无我”，“活着的时候我曾经享乐，现在我已化成灰烬”，这是伊壁鸠鲁派在他们的墓碑上镌刻的字句。他们认为生活是徒劳的，甚至在宴会使用的大杯上都刻有亚历山大和苏格拉底的骷髅，目的是要提醒人们即便在享乐的时候，也要记住光荣和智慧都是无常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

与宗教运动有关的各种新思潮越来越流行，这些运动是在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兴起的。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共和国危机的时代，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已成为一个派别，他们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派的哲学原理加以糅合，创立了神秘的二元论学说，认为神是善的，物质是恶的。在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那里，魔鬼学和巫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亚历山大里亚人斐伦，是尊奉柏拉图学说最著名的哲学家，于公元 1 世纪中叶去世。他出生在一个有名的犹太家庭里，受到的希腊化程度很深，就和许多从巴勒斯坦迁走的富裕家庭一样。

4. 早期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罗马社会广大下层人民在社会矛盾斗争中绝望转而在宗教上寻找出路的结果，是罗马整个社会的产物，而非罗马帝国境内某一单个民族的产物。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基督教最早在犹太下层人民中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古代，犹太就是一个劫难丛生的民族。公元前 18 ~ 前 7 世纪，犹太王国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就先后被亚述和埃及统治。公元前 586 年新巴比伦灭亡了犹太王国，把大批犹太居民掳到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从此犹太国家消失了。公元前 538 年，新巴比伦被波斯灭亡，犹太人得以重返家园，但又成为波斯帝国的臣民。波斯帝国灭亡后，不久塞琉古又统治了犹太人。此后犹太人民又在塞琉古与埃及争霸的长期战争中，饱受痛苦和劫难。公元前 167 年起，犹太人开始起来斗争。公元前 141 年，犹太曾一度获得独立。公元 63 年犹太又被罗马征服。在罗马统治下，犹太人于公元 66、公元 132 年发动大起义，但都被残酷镇压下去。有的犹太人遭到杀戮，有的被迫离乡背景，流落异地。他们，尤其是散居多地的犹太人深深感受到了亡国的苦楚及所受到的沉重压迫，因此极端仇恨罗马的统治。犹太人在民

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这种处境和感受，便反映在宗教意识上，从而推动了新宗教的产生。在死海附近下层居民中流行一种宣扬“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秘密教派，小亚细亚各地的犹太居民中出现许多传教的“先知”。从这种新的教派中形成了基督教。公元 68 年左右的《约翰启示录》是基督教的最早文献，书中仅提及小亚细亚七座城市的宗教公社。由此可以推断，基督教最初在散居小亚细亚的犹太人形成是极有可能的。

奴隶、被释奴隶和贫苦人民是最早的基督徒。他们以十字架为标志，在城镇组织一些规模不大的公社，财产共有，共同生活。《新约·使徒行传》记载：“那信教的人，都是全心全意的，没有一人说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不缺什么东西，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按人所需分给各人。”信徒是这种公社的组织者和传教者，募集捐款供给公社多项开支，信徒们在公社里聚会、听道、祷告、聚餐、互相帮助、人人平等。长老和执事是公社的领导人，后来又增设财务监督。到 2 世纪末，各城市的公社逐渐联合成立了教会。

由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城乡中等阶层的有产居民、商人、富裕农民以及手工业作坊主从公元 2 世纪后半期起，和其他有产者一样纷纷加入基督教。这些人入教的目的，一是因为面临奴隶制危机，他们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感到

前途渺茫；一是因为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已经从公社转向成立教会。在整个罗马，约有 5% 的人口入了教，教会的力量不断壮大。各地的教会使商人、手工业者的营业活动比较便利。这些有产者加入教会，就使早期基督教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基督教的思想组织也就随之变化了。他们向教会捐献财物，加上受过教育，因而在教会内影响较大，并逐步取得了领导权。同时，早期基督教那种同舟共济、平等博爱、仇视富人、反对罗马的精神也逐渐消失，而劝人驯服、希冀来世的教义，则被提到主要地位，甚至宣扬不仅要服从善良的主人，而且也要服从严厉的主人和“把王国给国王，把天国给上帝”等主张。因此，到 2 世纪下半叶，经过不断演化，基督教的主导势力已变成富人和奴隶主。而在北非传教的蒙坦努教派，由于还坚持早期基督教教义，则被看成异端而受到排挤。

因为基督徒不信奉罗马的旧神，不尊崇皇帝，反对罗马统治，所以罗马政府不断镇压他们。公元 64 年，皇帝尼禄对基督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当时许多基督徒被杀死了。到公元前 3 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境内的起义风起云涌，连续不断。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越来越厉害，禁止教徒礼拜，没收他们的财产，屠杀传道者。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因为政治迫害而停止。

早期基督教反对罗马帝国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反对

富人和奴隶主的贪婪残暴，体现了一种斗争精神，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不过，基督教对现实的反抗不是积极的，对未来的理想也是虚幻的。

九、罗马帝国的灭亡

1. 奴隶制度的危机

从公元 2 世纪末到 3 世纪末，罗马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全面爆发了危机，历史上称为“三世纪危机”。

实际上，早在 2 世纪的意大利，罗马奴隶制的危机已露出端倪，到了 3 世纪，由于奴隶制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结果造成农业衰微、商业萧条、财政枯竭、政治混乱、奴隶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罗马社会动荡不安。奴隶制生产关系日趋腐朽，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事实上，在前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中，轮犁、割谷器等先进工具已经出现了，但是，由于奴隶劳动具有强制性，奴隶缺乏劳动积极性，而且经常通过破坏工具、怠工、逃亡甚至发动武装起义等方式进行反抗斗争，所以先进的生产工具得不到推广。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日趋下降，使用奴隶劳动已无利可图。但是，奴隶制的长期统治，对整个罗马社会产生了一个后果，这就是自由人轻视生产劳动，把劳动视为耻辱。另一方面，奴隶主阶级及其统治机构已经日趋腐朽，寄生性越来越强。

大奴隶主阶级在庄园中开辟别庄，将大片土地围成猎场或建池养鱼，以供娱乐。他们奢侈浪费，挥金如土。同时，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流氓无产者人数剧增。公元 1 世纪时，罗马流氓无产者为 20 万 ~ 30 万，到公元 3 ~ 4 世纪已达 80 万人左右。他们靠社会养活，不从事生产，颓废堕落，寄生在奴隶制社会的肌体上。维持罗马庞大的国家机构，对内镇压，对外用兵，统治集团的内讧和混战，以及各种娱乐庆典活动，都需要大量的开支。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纵欲的需要，罗马帝国多次增加娱乐日。1 世纪时，罗马全年娱乐日为 66 天，2 世纪时增加到 123 天，4 世纪则增至 175 天。在娱乐日里，表演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战和骑战等。各种开支大多由国库支出，而财政不足，又要以捐税补充，劳动人民不堪负担的沉重捐税必然会破坏自然经济。这样，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腐朽导致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终于造成全面危机。

这一过程在 3 世纪也扩展到非洲、高卢等地。基于这种原因，以剥削奴隶为基础并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大庄园，便逐渐转变为以剥削隶农为基础，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地产。隶农制在共和国末期萌芽，公元 1 ~ 2 世纪时扩展，公元 3 世纪时就更加盛行了。这时隶农的来源除前述公元 1 ~ 2 世纪的两种人之外，还增加了由罗马政府迁移到荒地上的日耳曼等“蛮族”。“庇护制”逐渐流行，成为贫苦农民向隶农转

化的新途径。由于赋税沉重、官府压榨、社会动荡不安，贫苦农民很难维持独立经济，于是纷纷向大地主求得庇护，把自己的土地“献给”大地主，然后再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变成隶农。在高卢、非洲、埃及等行省中大批隶农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在哈德良时期，日耳曼人已经开始移入罗马境内和向荒地殖民。马可·奥里略时期有所增加，到3世纪末则大量增加。这些日耳曼人在移居的土地上也逐渐沦为隶农。隶农与奴隶有所不同，但是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隶农制依然受到奴隶主生产关系的制约。由于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日益腐朽，隶农所受的剥削日趋沉重，对地主的依附性日益增强，原有的自由身份逐步丧失，因此，隶农制初期对于社会生产的某种积极意义也随之消失。隶农、奴隶、贫苦农民的境遇和地位日益相似，这就形成了奴隶、隶农联合起义的基础。

2. 政权的危机

从政治军事方面来看，3世纪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充分体现出来，政治动乱和经济衰败结伴而行，统治阶层内部纠纷不断，混战无休无止。安托尼乌斯王朝末帝康莫都斯被杀后，仅在6个月之内，近卫军就拥立了两个皇帝，各行省驻军也纷纷各自为政，自立皇帝。罗马内部爆发了一场延续4年之久的争夺王位的混战。后来潘诺尼亚总督谢维鲁斯获得

了胜利，建立了谢维鲁斯王朝（公元 193 ~ 235 年）。他以军队起家，自然非常重视犒赏士兵，培植军事力量。他提高军饷，重用骑士，组建新军团，另组近卫军，优待士兵，任用军人为行政官。同时，他还加强中央集权，把元首顾问会作为国家最高机关，任命骑士出身的代理官对元老任总督的行省进行监督，实行军队的官僚合一。在危机中，谢维鲁斯仍然坚持穷兵黩武，在东方进攻帕提亚的同时，他还在西方攻打不列颠，最终客死在针对不列颠土著部落的战争中。据说他临死时仍没有忘记嘱咐他的儿子们：“让士兵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理会！”

谢维鲁斯的儿子卡拉卡拉继承皇位后，除了增加军饷、贿赂军队以外，在公元 212 年还颁布了一项敕令，宣布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历史上称为卡拉卡拉敕令。这个敕令是帝国时期统治阶级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颁行的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统治；二是为了增加税源，使所有自由民都和罗马公民一样承担遗产税等各项捐税。但是，这些措施在当时已经行不通了，再加上军队的强烈反对，所以也没起多大作用。

3. “三世纪危机”的结束

从某种程度来说，当伽里耶努斯与起义的骑兵长官奥列奥路斯斗争而被杀死之后，在紧接下来的几个继承者当政时

期，这些变化就已经开始了。这些继承者大多数都是多瑙河沿岸各行省的人，既不是贵族，也不富裕，只不过在军队里逐渐被提拔，因此人们通常把他们称为“伊利里亚”皇帝。

极力巩固君主政权，镇压人民群众运动和保卫帝国边疆是“伊利里亚”诸皇帝的特点。继承伽里耶努斯的克劳狄乌斯二世（公元 268 ~ 270 年在位），因为曾经把哥特联盟的各部落打得大败，因此得到“哥特的”这样一个称号。这期间，大批俘虏被变成隶农、军事移民和罗马士兵。克劳狄乌斯二世以后历朝皇帝都坚决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元老院对此非常赞许，因为它巩固了大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军队，使之适合于土地贵族。尽管迁移到罗马领地上的法兰克人不久就发动了起义，长期蹂躏各行省，不过在贵族眼里，“蛮族”隶农还是比本地隶农更为可信。

奥列里亚努斯当政时期（公元 270 ~ 275 年），不仅是高卢，甚至吉诺比娅的王国也重新归属罗马帝国了。一部分东方贵族愿意承认奥列里亚努斯的政权，但很长一段时期内城市的下层社会和商人不肯归附他而求救于波斯。在埃及，罗马派和反罗马派之间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吉诺比娅的军队被击溃，她自己也被俘以后，叙利亚和埃及的起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埃及最富有的商人费尔姆出来与住在埃及以南的半游牧部族布列米人缔结了同盟。在从前的高卢帝国境内，有些贵族惧怕巴伽乌地，又企图反对罗马，所以仍然徘

徊不定。鲁格敦宣布大地主普洛库路斯为皇帝，他实力强大，自己的奴隶就能够武装成 2000 人的队伍。还有一个“僭位者”波诺斯，他企图同占领大部分高卢的法兰克人结成同盟。

“三世纪危机”结束后的帝国“伊利里亚”诸皇帝当政时期，人民起义达到了最高峰。伊苏里亚人被罗马人称为“强盗”，他们侵占了小亚细亚周围的地区；阿非利加的起义者到达了迦太基，他们占领和破坏了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的一些城市。罗马总督只敢向他们和他们的同盟者摩尔人零星出击。巴伽乌地拥立艾里安和阿曼德为他们的皇帝，并且选择在塞纳河和马恩河汇合处的孤岛古堡上设防，以此给高卢和西班牙的地主制造恐怖。在奥列里亚努斯统治时期，罗马又发生了造币工人的起义。罗马贫民的暴动也多次发生，他们要求重新分配供应物，由此导致了对手工业工会的进一步压制。

奥列里亚努斯为了避免土地荒芜，就把埃及强制出租的办法推广到其他各行省，而责令市元老们监督执行，市元老的地位因此恶化了。在士兵这方面，“伊利里亚”诸皇帝一边给他们高额饷银，另一边则对他们进行更加严厉的监督，迫使他们劳动。例如，普洛布斯（公元 276 ~ 282 年在位）要求士兵治理沼泽，开垦森林，还要在高卢、潘诺尼亚和麦西亚栽培葡萄。也有可能他是想把未开垦的荒地分配给士

兵，而不是像他的前辈那样，是为了夺取旧所有者的土地。

在公元 3 世纪后半叶，皇帝政权日益通过加强君主专制来与人民运动作斗争。奥列里亚努斯已经正式称自己为“主人和神”，像波斯王一样，穿着奢华。他也力图实行统一的国教，宣布太阳神是最高的神，皇帝则好似最高神的共治者。不过与埃拉伽巴路斯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依照东方的形式，而是通过如罗马崇拜伏庇特的仪式那样来表达对太阳神的崇拜。

到公元 3 世纪 80 年代，政治危机基本上被克服了，外来的侵犯也被阻止了，瓦解了的帝国重新归于统一。大批的俘虏变成隶农，散居在皇帝和私有者的土地上。帝国和一部分部落缔结了条约，按照条约，他们可以住在边区，同时也应在边防部队里服兵役。这就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暂时得到恢复，其经济地位也稍微稳固了一些。统治阶级因为实行了严酷的压迫手段，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暂时缓解了，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所必需的帝国也得以维持。

4. 君主制的确立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公元 284 ~ 305 年在位）是一个出身于达尔马提亚的被释奴隶的儿子，同他的前辈一样，也是在军队里逐渐提升起来的。他登上皇位之后不久，巴伽乌地起义和阿非利加的起义就开始遭到镇压，他因此也得到行省

贵族的支持。

贵族用夸张的颂辞来称赞新的优庇特和赫拉克勒斯战胜“大地的叛乱子孙”。贵族对强大政权的建立非常高兴，皇帝则完全被尊奉为神，任何获准拜见皇帝的人都必须叩拜。所以宫廷礼节都仿效波斯。皇帝的称号已经不是元首，而是统治者了。所以，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所建立的整套制度，通常称为君主制，以和元首制相区别。

在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统治时期，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加强皇权，加强国家机构和军事机构的管理。他把帝国划分成四个部分，这等于把帝国在“三世纪危机”中所呈现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固定下来了。在表面上，帝国仍然保持统一，但归属于四个统治者：两个奥古斯都，其中之一是马克西米安努斯，他分管意大利、阿非利加、里西亚和诺利克；另一个是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本人，他统治亚洲各行省、埃及和昔兰尼加、色雷斯和下麦西亚。还有两个凯撒，一个是统治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的君士坦提乌斯·克洛路斯，一个是管辖巴尔干半岛其余部分和多瑙河沿岸各行省的伽列里乌斯。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统治时期的统治者全是从出身于多瑙河地区、当过士兵的人里推选出来的。由于旧的行省被分成更小的部分，所以形成了 100 多个行省，同时，最终与帝国的其他各地区处于同等地位的意大利，也与其他地区一样，被划分成行省。10 个 ~ 12 个行省合并成一

个行政区，由行政区长官管辖；军权和民政权分开。这种新的划分有利于保卫和控制行省，并有助于削弱有意僭位的行省总督。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及其共治者，同谢维路斯以后的历代前辈一样，都企图让臣民称他们统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但是事实上，人民群众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军队、廷臣和官吏人数的增加，新的元首邸宅的兴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巨款来支付薪饷、赏赐等。他们通过提高货币价值而进行的币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政府最终改成征实物的主要捐税。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才用货币交税。同谢维路斯一样，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倾向于保护“小人物”，严禁预先对诉讼案作出偏袒贵族的判决，严禁让农民承担额外的义务，严令禁止把自由民和负债自由民的子女卖为奴隶，坚决抨击索取高额利息的债主。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这些社会经济措施中，有一个限价敕令非常著名。它是采用立法调整价格的办法以打击投机倒把，以防止反饥饿暴动，这在以前也曾经实行过。敕令既对贫民不利，又对富人不利，以致触怒了富人，所以他们想方设法以逃避这个敕令。

在即位 21 年之后，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放弃了皇位，在故乡达尔马提亚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在他的坚持之下，马克西米安努斯随后也放弃了政权。在狄奥克列齐亚努斯退位之

后，许多觊觎皇帝政权的人发生激烈的争斗，有前任凯撒、现任奥古斯都及他们的儿子和他们新任的凯撒。这次斗争的最后胜利是君士坦提努斯，他是西方各行省的贵族推举出来的，他的胜利意味着帝国彻底摆脱了元首制的传统。

5. 晚期的罗马帝国

① 东方行省和西方行省的发展特点

与整个帝国危机发展的同时，帝国的各个地区却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奴隶制和因奴隶制而产生的城市组织的兴盛时期，各行省之间的差别曾经消除了一些，但现在又明显地呈现了出来。东方行省和西方行省之间的区别尤其大，但帝国东、西方的每个行省之间也并不是相同的。

在奴隶制还不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地区，比如不列颠、多瑙河沿岸各行省、高卢东北部、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自由农民的作用重大，在许多原因下公社组织还保留着。随着奴隶制生产方式危机的到来，公社瓦解的结果不再是奴隶制的发展，而是使农民遭受大地主更多的奴役和压迫。在这些地区，封建主义因素的形成使自由农民的状况恶化，因此到处可见他们的斗争。

奴隶制呈高度发展的地区，比如高卢的东南部、西班牙、总督领地阿非利加以至意大利，受危机的灾难较大，衰落得比较厉害。虽然奴隶社会的一切制度和帝国本身在这里

已根深蒂固，但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已经逐步衰落，它们已不能作为帝国稳固的基地了。

东方各行省的情况比这更为复杂。

由于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的一些地区所处的地位比较特殊，这里的奴隶制有相当高的发展，同时佃农和手工业者在生产中的作用也很大。城市的土地由隶农耕种，因此城市相对比较稳定。东部各行省的许多城市不仅是对内，而且对外也是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同时，西方各城市的居民同莱茵河及多瑙河彼岸各族人民之间的商业关系基本上已经断绝。但在君主制初期，东方各行省阿拉伯、波斯以及其他邻近地区的商业来往却又重新活跃起来。其商业之所以活跃，原因是东方边界暂时稳定，君士坦提努斯的币制改革比起他先人的改革来说，较有成效。除了较小的城市以外，像安条克、尼科墨太、尼西亚、亚历山大里亚这样一些商业中心的生活都很紧张，对行省的一切制度影响都很大。因为古希腊罗马文化首先是城市文化，所以虽然危机的发展曾对这种文化打击沉重，并使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种文化在东部没有在西部衰落得那么严重。因此，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就逐渐移向东方了。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帝国的首都也迁向了东方。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曾把首都迁到尼科墨太；君士坦提努斯在公元330年又把博斯普鲁斯海峡岸上的古商业城市拜占廷作为首

都，把它称为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屏障。新都成立了新的元老院，与罗马元老院同时并存；依靠从埃及输入的粮食，君士坦丁堡的平民得到和罗马平民一样的分配量。居住于君士坦丁堡的元老们都得到了土地和特权；聚集到这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很快就使这个城市变成东方最大的经济中心；还从帝国各城市运来了最好的艺术纪念物以装饰新都，包括宫殿、竞技场、跑马厅等。皇帝的这个新都君士坦丁堡地位逐渐压倒了古老的罗马。

君士坦丁堡地位的提高，实际上是帝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整体这一事实的外在表现。帝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造成了危机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不同就引起了帝国实际上的分裂，先是分裂成东西两部分，接着再分裂成更小的各个地区。

②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

在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统治时期开始建立，而在君士坦提努斯统治时期最后形成的晚期帝国的国家机构，是与它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帝国被划分成意大利、高卢、伊利里亚和东方四个大行政区。大行政区民政由四个近卫军长官主管，在他们管理之下的有行政区的长官、行政总督和他们的主簿、司库、书吏、法官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有专门派遣的行政长官，所以不隶属于一般民政。军队由四个骑兵长官、

四个步兵长官率领，他们直接管辖军区长官和军团指挥官。在这个庞大的机构中，互相监视、造谣中伤、盗用公款和无耻贿赂的勾当非常流行。人人都在拼命聚敛钱财，以尽快地压倒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历代皇帝都对告密者进行奖赏，在他们看来，告密能使皇帝政权更加巩固。在君士坦提努斯的后继者君士坦提乌统治期间，由于基督教的势力日益增长，而且教徒拒绝服兵役，拒绝崇拜罗马的神，所以在 3 世纪时，统治者仍把它看作是巨大的威胁而加以迫害。其中，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对它进行迫害的规模较大，一部分坚持信仰基督的教徒被处以死刑，教会财产被没收，文献被焚毁，集会也被禁止。但帝国统治者既然无法消灭初创时期的基督教，现在教会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就更不能阻挡其发展了。

公元 306 年，君士坦提努斯成为罗马皇帝后，面对拥有很大力量的基督教的现实，在公元 313 年颁布了米兰敕令。敕令规定教徒有信仰自由，即：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允许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并存。同时还决定归还以前在对其迫害时没收的财产，保护教徒，教会神职人员免服城市徭役，教会有权接受土地等遗产。事实上，在 4 世纪时，基督教已经同帝国政权结合在一起，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6. 公元 4 世纪后半叶的罗马帝国

① 帝国的危机

在君士坦提努斯的诸位继承者统治时期，君士坦提努斯曾留下遗嘱，把帝国分给三个王子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提努斯、君士坦图斯和他的两个王侄。君士坦提努斯的两个侄子和其他亲属在他死后不久，就在君士坦丁堡军事叛变中被杀害了。君士坦提乌斯挑起了这场军事叛变，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一切可能的对手。君士坦图斯从其兄君士坦提努斯手中夺得了多瑙河沿岸地区，统治西方达 13 年，后来在与僭称皇帝的军事长官玛哥南提乌斯斗争时被杀。玛哥南提乌斯接着也被君士坦提乌斯打败了，帝国政权在君士坦提乌斯手中又重新走向统一。

在君士坦提乌斯死后，优里亚努斯和他之间的冲突消除于无形，这样，优里亚努斯名正言顺掌握了整个帝国的政权。

优里亚努斯到了东方之后，就公开宣称自己要与基督教决裂，同时剥夺了神职人员的一切特权，下令重建异教神庙和恢复异教崇拜。为了笼络贫民，优里亚努斯建立了贫民医院和贫民避难所，分配大量供应品，并设法整顿异教祭司团的组织。

优里亚努斯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直接迫害那些基督教

徒，但却解除了那些身居高官的基督教徒的职务，并不允许基督教徒在学校授课，优里安努斯理解圣经非常透彻，因而能对它提出反驳。

帝国的国内形势日益紧张，约维阿努斯在即位后不久就死了，瓦楞提尼亚努斯在高级军事长官和民政长官的共同推举下继承了王位。他任命弟弟瓦楞图斯为东方奥古斯都，再次把帝国一分为二。据 4 世纪的作家记载，在这两个皇帝统治期间，官吏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行为达到顶点。

处罚不准时纳税的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鞭笞，而是要判处死刑了；库里亚议员、手工业者和农民挤满了监牢，大批的居民和士兵外逃，他们有的试图陷身于大城市，有的则逃向森林和荒漠地带，更有甚者，许多人投靠了所谓的“蛮族”。

人民群众和帝国外敌结成的联盟威胁着贵族，这在西方各行省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的人们不得不承认，人民群众像期待解放者那样期待“蛮族”。在不列颠，恰巧在当地居民起义的同时，居住在喀利多尼亚境内的斯克特人、披克特人、日耳曼 - 撒克逊人，勇敢的航海者和海盗一齐来进攻。公元 5 世纪的大侵犯就是“蛮族”运动的最后一幕。在这之前他们是敌人，现在却变成了受欢迎的客人和主人。农民把他们看成反对帝国吸血税吏的保护人，认为主人的更改可能使自己的处境稍好一些。罗尼河流域和里昂的居民故

意让勃艮第人占领了自己的土地，但这些用牛油涂发、满身腥臭的“蛮人”性格善良、直爽，对待没有防御力的行省居民非常公平。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抛弃了帝国，帝国怎么能不灭亡呢？

这个时期的起义，数多瑙河上游的哥特人的起义声势为最大。

普洛科披乌斯是优里亚努斯的亲属，他在优里亚努斯死后曾经长期隐居。瓦楞图斯即位后不久，他就立即揭竿而起，趁着瓦楞图斯不在君士坦丁堡的机会潜入首都，自立为皇帝。后来，他迁居色雷斯，那里的士兵和居民都热烈拥护他。奴隶、隶农和“蛮族”移民也都聚集到他那里。多瑙河对岸的哥特人调给他 3000 人马。这次运动波及到小亚细亚，那里的起义者攻下了大城市库赤库斯。普洛科披乌斯处死了效忠于瓦楞图斯的贵族。或者他的本意不在于此，但站在贵族的立场来看，他已经成了“强盗”和“平民的煽动者”了。

② 罗马帝国的分裂

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的统治虽然缓和了 3 世纪产生危机的某些方面，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日趋没落的奴隶制度。相反，奴隶和其他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因此这一时期，奴隶及接近奴隶的隶农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空前激烈。

帝国后期，各地的社会经济情形不同。帝国西部奴隶制发达的地区，农业、商业、手工业继续衰落，城市萧条，农村荒芜，社会经济呈现出更严重的自然经济特色。与此同时，帝国东部也经历了衰落的过程，但有些行省衰落得比较缓慢，有些地区的经济还稍微有所发展。

公元 337 年，君士坦丁死后，帝国统治集团又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混战，时间长达 16 年，随后也一直不能建立稳固的政权。提奥多西（公元 379 ~ 395 年在位）虽一度恢复统一，但他死后又把帝国分给两个儿子，于是公元 395 年帝国正式分裂为二：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从此以后，统一强大的罗马帝国成了明日黄花，罗马往昔的繁荣景象也一去不复返了。人口锐减，人民贫困，经济衰败，城乡萧条，国家分裂，政局混乱，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罗马帝国的末日来临了。

帝国于公元 395 年最后分裂以后，东西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差别非常大。后来以拜占廷帝国著称于世的东罗马帝国，经过复杂的发展过程变为封建国家，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中叶。

而西罗马帝国则是另一种历史命运。在西罗马帝国版图内，奴隶制的崩溃过程尤其迅猛，同时还发生了政变、人民起义和血腥战争，所有这些彻底摧垮了这个地中海地区的曾经的最强国。

在公元 410 年 8 月 24 日，西哥特人的领袖阿拉里库斯率领军队攻占了罗马，这个事件有决定性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永恒城”被占领以后，哥特人把罗马洗劫了三昼夜，奴隶和隶农都起来反抗自己的主人，有许多人参加了阿拉里库斯的军队。

西哥特人攻入罗马以后，罗马虽然还继续存在，但是它的世界意义已经丧失了。西罗马帝国迁都到意大利北部的拉温那。西罗马帝国在形式上继续存在了几十年。在这一期间内，西罗马帝国遭到了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致命的侵袭，经受了一系列的动荡和变革。同时，在反罗马的斗争中，多次攻入帝国的各部落同奴隶和隶农联合起来了。帝国的版图逐步缩小。到 5 世纪的中期，只剩下意大利和一小部分的高卢地区受西罗马皇帝统治了。

西罗马帝国的帝位后来成为“蛮族”首脑手中的玩物。公元 476 年，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被日耳曼雇佣军指挥官奥多亚凯尔推翻了，好像是命运的捉弄，他与“永恒城”传说中的奠基人罗慕路斯同名。公元 476 年，即罗慕路斯被推翻并且在意大利领土上建立第一个“蛮族”王国的那一年，人们把它看作西罗马帝国最后灭亡的时间。

③西罗马灭亡的历史意义

西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但它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意义不是表现在它的灭亡本身，而是体现在它的灭亡是奴

隶制生产方式、奴隶占有制度崩溃的标志。

罗马社会的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共和国时期还是在帝国的初期，都称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罗马晚期社会的上层建筑，首先是它的政治上层建筑具有保守性。罗马政府在此时已变成一台榨取苛捐杂税的巨型机器。

在公元 4~5 世纪，罗马帝国政府企图在新的土地富豪和旧的奴隶主——库里亚议员之间采取一种均衡政策。罗马政府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支柱。库里亚议员或许也需要罗马国家，但他们本身已日渐衰微，不可能再成为政府可靠的支柱；至于土地富豪，他们越来越脱离中央政权，大约从公元 4 世纪中叶起，政府就逐渐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这时，在思想领域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基督教的胜利。在由古典哲学、道德、法律组成的城邦思想体系发生危机的时期，伴随着奴隶占有关系的瓦解，基督教以群众社会抗议的形式产生，后来被政府利用成为国教。正因为基督教是社会危机的产物，所以它就适应了取代奴隶制社会的新的社会制度的需要。

然而，其萌芽在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封建制度中受到了没有被铲除的奴隶制关系的严重阻碍，没有自由发展的前途。这种情况是完全合乎规律和可以理解的，因为新的制度都是在其文明处于灭亡状态、奴隶制社会陷入绝境的罗马帝国里形成的。

为此，就需要罗马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外来因素的共同配合。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两种历史因素的联合影响，才导致了奴隶制度的彻底崩溃。

第二十章 公元前 3 世纪至 公元 1 世纪的中亚细亚

一、大夏与安息

1. 希腊—大夏王国

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马其顿国家在中亚细亚各郡的统治是依靠征服者与当地贵族之间的联盟以及对重要战略据点的军事占领来维持的。在东伊朗和中亚细亚建立的许多亚历山大里亚城，是他的军事殖民地。亚历山大死亡的消息传到中亚细亚后，那些希腊移民中不愿在遥远的边区承担危险的卫戍职务的人立即发动了兵变，大约有 23000 名希腊移民离开殖民地，逃往西部。马其顿的统帅拍狄卡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全部消灭。但从此以后，东方各郡驻防军的数目就大大地减少了。亚历山大帝国彻底覆灭后，塞流息忒王朝最初的几代国王就中亚细亚各地区统治了一个时期。

实际上，大夏和处在狄奥多洛斯统治下的辽阔疆域内的中亚细亚其他地区，都已完全不为塞流息忒王朝所有了。狄奥多洛斯的儿子狄奥多洛斯二世开始公开称王。粟特总督欧

提德姆也仿效狄奥多洛斯二世称王。狄奥多洛斯和欧提德姆都是希腊人，他们主要依靠希腊军队的支持，但由于他们宁愿受伊朗贵族的统治，也不愿受塞流息忒王朝统治，所以他们可能也得到了伊朗贵族的支持。

安息位于里海东南，希尔加尼亚把它与里海分开。安息的领土从大盐硷滩的东北边缘一直延伸到科佩特山南坡和卡拉库姆沙漠。后来，阿尔沙克王朝强国的全部领土都被称为“安息”。

安息各部落在地方贵族的领导下，大约在公元前 250 年掀起了反对希腊—马其顿统治的起义。安息的一位国王提里塔特是于公元前 247 年称王的；安息属下伊朗的纪年——阿尔沙克历，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塞流卡斯二世退走后，这些新王国势力大大加强了。欧提德姆推翻了狄奥多洛斯二世后，很快就夺取了大夏的政权。在欧提德姆的后继者统治的时代里，希腊—大夏王国的中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欧提德姆之子德米特里征服了阿里亚、阿拉科细亚、德兰癸亚那、帕拉帕米萨德和印度西北部。这是希腊—大夏王国疆域扩张到极致的时代。在欧提德姆统治的时期，塞流息忒王朝曾再次试图恢复已经脱离它的各郡。安条卡斯三世打败了安息人，并迫使安息国王阿尔塔邦一世臣服于塞流息忒王朝，后来又在公元前 208 年打败了欧提德姆的骑兵，包围大夏首都达两年左右。公元前 206

年，安条卡斯与欧提德姆缔结了和约：欧提德姆保持王号，但与安息王一样，臣服于安条卡斯。

这个庞大的强国是由彼此缺乏有机联系的多个地区拼凑成的，所以在德米特里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瓦解了。德米特里派出王子统治各地区，这些统治者都以独立国王的身份铸造钱币。约公元前 175 年，大夏爆发了欧克拉提德起义，欧克拉提德自立为王。粟特不久也脱离大夏，后来归顺于花拉子模。大约在同一时期，安息国王密司立对提一世控制了玛尔吉亚那。印度的领地基本上还是归德米特里所有。欧克拉提德约在公元前 162 年出征在此之前早就由德米特里的后继者统治的印度，并占领了很大一部分领地。在欧克拉提德的继承者统治时代，四分五裂的希腊—大夏王国在游牧民族的打击下灭亡了。

安息人在密司立对提一世统治的时期向邻国发动了进攻。密司立对提经过激烈的斗争占领了米太，征服米太为安息人打通了去往美索布达米亚的道路。

公元前 2 世纪后半叶，安息人占领了西亚细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及联结西亚细亚和东亚细亚的各条主要商路，使安息逐渐巩固和富裕起来。到公元前 2 世纪末，又开辟了中国与地海之间的商业活动。

公元前 2 世纪末，安息人已经巩固了他们的东方国界，把塞人从领地上赶走，甚至迫使他们臣服。然而，很难确定

密司立对提二世的疆域又向东扩展了多远。有一种意见认为，大约在公元前 115 年安息人控制了木鹿绿洲，从那时起就在此地稳固地统治了多年。这样一来，就认为阿姆河应当是安息领地的界限。

密司立对提二世巩固了自己在东方的统治之后，又展开对塞流息咨王国的攻势，而当时这个王国的疆土已缩小得只剩下北叙利亚了。安息人开始干涉塞流息咨王朝的内政，并频繁更换其支持的对象。幼发拉底河成了安息领地的西部界限，安息人甚至进入了帕拉波塔米亚，也就是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

2. 安息的政治、经济状况

安息政治上实行君主制，政权属于阿尔萨息家族。王位按父系继承，但没有定制，既可以传子侄，也可以传兄弟。国王即位必须经过氏族贵族会议和祭司会议的共同选举，权力受到两个贵族会议的限制。卡林、苏林、伊斯帕赫帕特等贵族分别控制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他们甚至在萨珊王朝取代了安息王朝之后仍保留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大主管与王家禁卫军首领也是宫廷官吏。

安息地方行政机构比较复杂，波斯、埃里迈达、埃德萨、米谢那、阿特罗帕特斯米底、赫卡尼亚、塞伽斯坦等都是其附属国，由安息王室或本地世袭王朝统治，各国都不同

程度依附于中央政权。其他地区则划分成 18、19 个或更多个行省，行省的最高官吏称为总督。行省之下划分为区，区之下为“设防的村”，区长和村长都称为基兹帕特。

安息城市分为希腊化城市和古代东方型城市两大类。希腊化城市，如两河流域的塞琉西亚和杜拉欧罗波斯等，这些城市还保留着设议会和人民大会等城市自治权。《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可见最高行政权属于安息国王任命的将军和市长。古代东方型城市，如尼萨和木鹿等，这一类城市直接由中央政府派总督、行政区长官以及其下属控制，无民选官吏和自治机构。但是，这两类城市都必须履行纳税义务。土地税在安息的赋税方面是主要的税种，此外还有人头税、特别税、手工业税、住宅税、港口税、奴隶买卖税、牧场税等。

安息建国之后，生产力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经济有所发展。但它和古代波斯帝国一样，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亚的马尔吉安那木鹿绿洲农业比较发达，农作物有稻、麦和葡萄等。

安息的城市，对外贸易都很繁荣，其商业中心，东部为木鹿，西部为泰西封。安息在公元前 2 世纪末期，掌控了丝绸之路及其中介贸易，从中获利甚丰。

安息钱币以银币为主，分为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此外还有各种大小铜币为辅。钱币是圆形无孔钱，正面中间是

王像，周边是联珠纹图案，铭文是用希腊文或钵罗婆文写的。每逢新王即位或喜庆之日，都要按照国王头像铸造新币。

3. 安息宗教与文化

安息在建国之初曾创制安息历，它是以公元前 247 年为纪元始。

安息各地区的艺术也各具特色：

建筑以当地原来的形式为主，大的建筑物部分采取希腊的形式，然后按照安息的形式加以改造。东部的建筑材料多用土坯，西部却用砖石。安息的建筑遗址比较多。

雕塑的种类繁多。东部的尼萨流行木架粘土的彩色雕塑，同大夏有某种类似，代表中亚风格，也受到希腊化影响。除此之外，还有石雕和银雕，也受到希腊化和中亚风格的影响。

绘画有大型的神庙壁画，是宗教性质的作品。有的城市还盛行装饰壁画，杜拉欧罗波斯的壁画残片留存至今。

铁花技术也比较高超，也很有名，遗物颇多。

宗教方面是一种混合主义，对各种地方神的崇拜盛行一时。太阳神受到普遍奉祀，但各地命名并不相同，其次是奉祀丰产女神。在杜拉欧罗波斯城内，犹太教神庙、基督教教堂、希腊神庙、闪族神庙和祆教神庙并存。木鹿城内有基督

教堂、佛教寺院和祆教神庙。

安息时期祆教的国教地位虽未确立，但安息国王和伊朗人都是祆教徒。公元 1 世纪，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中最早的篇章是在安息编成的。除占主导地位的祆教外，在伊朗东部地区，还流行佛教。早期云游到中国的佛教徒，很多是安息人或操伊朗语的中亚人。

安息文化不仅继承了中亚、巴比伦、波斯和塞琉古文化的传统，而且成为了后来亚美尼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的文化渊源，所以在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4. 罗马人克拉苏斯出征安息

公元前 1 世纪 60 年代末，小亚细亚和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地区除埃及外已尽归罗马统治，离海较远的地区则由罗马各附庸国分别占据。这样一来，沿幼发拉底河与安息直接为邻的不仅有与罗马结盟的阿尔明尼亚、卡帕多客亚和科马基那，而且还有罗马的行省叙利亚。不幸的是，安息王室此时又发生内讧，大约在公元前 58 年，弗拉特三世的几个儿子合力弑父之后，又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内争。罗马人就曾试图利用这个时机铲除安息。

公元前 54 年春，罗马军在克拉苏斯指挥下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境内，并控制了一些城市。但是克拉苏斯没有像安息人所期望的那样沿幼发拉底河前进，而是在宙格马附近渡过

幼发拉底河，穿过美索布达米亚荒无人烟的草原，紧追撤退的苏林军队，企图将他们全部歼灭。公元前 53 年 5 月 6 日，罗马军团在卡雷城近郊同苏林的骑兵遭遇。

对东方各民族来讲，安息人战胜克拉苏斯的意义特别重大。这一胜利遏止了罗马人往幼发拉底河进一步前进，动摇了他们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并在安息和罗马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均势，这种均势一直维持到阿尔沙克朝的灭亡，除了中间有几次短暂的中断以外。

二、阿尔明尼亚

1. 王国的形成

从公元前 4 世纪末叶起，阿尔明尼亚领土上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亚历山大统治的时期及其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小阿尔明尼亚形式上处在马其顿人的统治之下，但在公元前 322 ~ 前 321 年，这里出现了独立的阿尔明尼亚王国。

到公元前 3 世纪末，阿尔明尼亚的领土几乎都处在塞流息咨王朝的统治之下了。

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2 世纪初，阿尔明尼亚的全部地区基本上都是阿尔明尼亚人。从这时起逐渐形成阿尔明尼亚部族，阿尔明尼亚开始与西亚细亚其他各族有了更为密切的

关系，并受到邻近各希腊化国家的影响。

玛革尼西亚附近的会战，加速了塞流息咨王朝强国的瓦解，安条卡斯也由于这场会战，被迫放弃了托鲁斯山以北小亚细亚全部的领地。大阿尔明尼亚和梭非那的塞流息咨王朝的郡守阿尔塔克西和扎里亚大首先乘机宣布独立。这样，最早的完全独立的阿尔明尼亚国家就产生了，当地居民的反希腊化运动对这些国家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公元前 95 年，安息人拥立曾在他们那里做人质的提格拉提斯二世登上了阿尔明尼亚的王位，也趁机占有了那里的许多领土。提格拉提斯二世即位之后，先和安息人保持友好关系，然后开始西征。公元前 95 年，他把梭非那并入了自己王国的版图。随后，提格拉提斯又侵占了东北部阿尔尼亚国境内的许多地区。

公元前 1 世纪 70 年代，提格拉提斯二世的王国的领土从库拉同延伸到约旦河，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里海，成了疆域辽阔的强国。公元前 77 年，提格拉提斯在阿尔明尼亚高原南部，底格里斯河以北 50 公里处的支流尼姆菲河岸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城里住的是被迫迁移到阿尔明尼亚的原住在小亚细亚 12 个希腊化城市的居民。这个城市被命名为提格拉那凯尔特，作为庞大强国的新都。

2. 公元前 1 世纪阿尔明尼亚的经济、政治状况

迅速崛起的阿尔明尼亚强国，也只是存在到公元前 1 世

纪的 60 年代初期。对叙利亚和腓尼基的一些富裕商业城市的短期占领，并没能对阿尔明尼亚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大部分阿尔明尼亚的居民仍然过着农村公社的生活，农民的状况和塞流息咨王朝国家农民的状况非常接近。农民被看成是国王土地上的人，必须承担各种徭役。除农村公社外，属于国王和贵族的大私有农庄也发展起来了。在这些农庄里，有奴隶劳动，有受奴役的公社社员的劳动，也有分收制的佃农，因此剥削的形式各异。虽然农民和公社社员试图捍卫自己的自由，但还是越来越陷于依附贵族的境地。阿尔明尼亚中部地区主要是发展农业。山区的高山草甸是牲畜极好的牧场，养马业依然很发达。阿尔明尼亚的山地和毗邻的各地区，有丰富的铜、铁、银和金等矿产，乌米亚湖沿岸还产盐。

重要商路上的城市一般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阿尔明尼亚各城市的居民成分很复杂：有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和波斯人。阿尔明尼亚人在城市人口中绝对占不到大多数。城市居民除了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之外，还从事农业。提格拉涅斯效仿亚述和乌拉尔图国王，赶走了他所征服的希腊化城市里的大批居民，迫使他们转移到各新旧城市里。

由部落贵族形成的奴隶主贵族构成了提格拉涅斯二世国家的统治阶级。因为阿尔明尼亚部落之间的差异还远未根除，所以各部落领袖在提格拉涅斯宫廷和行政机关里都起着

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些贵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他们原来的部落性质：他们的代表人物获得了国王赏赐的土地。

阿尔明尼亚国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尊奉为神。国王政权的物质基础是他辽阔的土地，国王把土地分封给贵族，作为他们有条件的领地。在阿尔明尼亚也逐渐形成官僚机关。但是，阿尔明尼亚专制国家在提格拉涅斯时代仍然是处在形成阶段。浓厚的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存在、国王仅在阿尔明尼亚内地各部占有土地、软弱无力的官僚机关，这一切都决定了阿尔明尼亚和当时希腊化国家之间的不同。阿尔明尼亚所征服的大部分国家如大米太、阿特罗巴特那等，在内政上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尽管它们也是从属于提格拉涅斯的，并且也有纳贡和出兵的义务。提格拉涅斯强国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错综复杂，又由效率不高的国家机关管理，所以它是个很不巩固的联合。

祭司阶级在国内也起很大作用。各大神庙都拥有大量的地产以及大批在上面劳作的神庙奴隶，这点和附近的小亚细亚各地区以及伊比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相似。其中阿基利塞纳的阿那希塔神庙最有名，有整个地区都属于它。由于祭司的职位是世袭的，最高祭司的权限也扩展到了立法范围，所以祭司阶级的势力渐渐强大起来。因为最高祭司在国家中的地位仅次于国王，所以这一职务常常由国王的兄弟来担任。

3. 王国的衰落

奴隶制阿尔明尼亚国家的强盛时期，出现在提格拉涅斯二世统治的时代。但是，阿尔明尼亚一旦和罗马发生冲突，提格拉涅斯王国内部的不巩固就马上表现出来了。

公元前 70 年，罗马人在对密司立对提的第三次战争中将其打败后，矛头就指向了密司立对提的同盟提格拉涅斯，在公元前 69 年春包围了提格拉那凯尔特。提格拉涅斯曾试图为这座城市解围，结果却是阿尔明尼亚的军队全部被击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格拉那凯尔特的围困还是延续了好几个月。后来因为城里的提格拉涅斯雇佣兵和以前被迫迁移到提格拉那凯尔特的原希腊化城市的居民发动了起义，给罗马人打开城门，阿尔明尼亚的首都才被攻克，并遭到了洗劫。提格拉那凯尔特陷落之后很短的时期内，提格拉涅斯南部所有的征服地除了其兄弟统治的米多尼亚以外，从美索布达米亚到奇里乞亚的土地都纷纷脱离出去。罗马军统帅路库鲁斯在阿尔明尼亚的领地上推行罗马在东方的一贯政策，表现出他是“法制”原则（在有利于罗马人的限度内）的捍卫者，希腊化的保护神，也就是希腊化城市中奴隶主贵族的保护者。他准许曾被迫迁移到阿尔明尼亚的外国人重返故土，而在所有罗马人认为需要的地方，他都把提格拉涅斯曾推翻的王朝恢复了。

路库鲁斯企图彻底征服阿尔明尼亚，于是就在公元前 68 年入侵阿尔塔沙特。但是，当他的军队一开进阿尔明尼亚的腹地，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阿尔明尼亚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罗马的人民战争。

阿尔明尼亚的贵族，此时逐渐尝到了提格拉涅斯专制政权的苦头。由几个急欲篡位的王子不断发动反对提格拉涅斯的阴谋叛乱，后来小王子提格拉涅斯和几个贵族人物在公元前 66 年初逃到了安息。安息王弗拉特三世乘阿尔明尼亚内乱的机会，企图收复曾经被提格拉涅斯二世占领的土地，于是就率军侵入阿尔明尼亚，包围了阿尔塔沙特。

严冬来临，弗拉特不得不撤退，提格拉涅斯二世击败了小提格拉涅斯的军队。于是，小提格拉涅斯转而向庞培求援。当时庞培正追赶密司立对提，已经进入了科尔希斯。随后，罗马军队由法息斯河谷转至阿拉克斯阿谷，出现在阿尔明尼亚的土地上。

最后，提格拉涅斯二世被迫与庞培议和，在公元前 66 年在阿尔塔沙特缔结了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提格拉涅斯只保留了阿尔明尼亚高原和所侵占的安息的一部分地区。

提格拉涅斯二世的西亚细亚强国就这样在内部矛盾和罗马侵略势力的双重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存下来的只是疆域大大缩小的并且还依附于罗马的阿尔明尼亚王国。

4. 阿尔明尼亚的宗教与文化

公元前 3 ~ 前 1 世纪，阿尔明尼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也反映在阿尔明尼亚文化中。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阿尔明尼亚的时代起，阿尔明尼亚的正式宗教就逐渐开始伊朗化。阿拉玛兹德也就是伊朗的阿胡拉玛兹达，被当作主神崇拜。伊朗阿那希塔女神在女神中占首要地位，人们称之为水的保护神。占最主要地位的仍然是最古老的阿尔明尼亚众女神中的阿斯特利克女神。举行宗教仪式权控制在祭司手中，他们极力想把文学也垄断在自己手中。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暗号，用来写宗教经典和编年史。

但是，无论是国王和贵族的希腊化宫廷文化，还是受伊朗文化强烈影响的具有秘密文字的祭司文化都没有深入到人民大众之中。人民大众坚定地信仰本国古代的宗教和仪式，首先是对死而复生的自然神——美丽的阿拉的崇拜。阿尔明尼亚文化除了宫廷的希腊化戏剧之外还有民间戏剧，在民间还形成了反映阿尔明尼亚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史诗故事。

三、中亚细亚的部落和民族

1. 游牧民族概况

中亚细亚的游牧民族从公元前第一千纪后半叶起，开始

在欧亚两洲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地区所居住的各部落的发展却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从多瑙河延伸到黄河的一条草原地带，穿越亚洲内陆缺水的辽阔地区和寸草不生的沙漠，在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下，在除了小片绿洲区域外的土地上，畜牧就成了惟一可能的生活方式。依靠养牲畜为生的游牧民族逐渐适应了周围的自然环境，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驱赶着大批畜群，依靠畜牧生活。

古代中亚细亚各游牧民族在语言所属的系统方面是不一致的，他们分别用印欧语、芬兰—乌果尔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满洲语和西藏—唐古特语来交流。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后半叶，史籍中首次出现有关亚洲的游牧部落的记载时，大多数正处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阶段。一方面，他们还保留有氏族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奴隶制，自由民中开始了财产分化，部落中产生了土地的部落所有制，在游牧生活条件下，首先是冬夏牧场的部落所有制。

①匈奴的崛起

匈奴，先秦史籍称之为昆夷、混夷、獯鬻、淳维，王莽时改匈奴为恭奴。匈奴原来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这从殷周以来汉文史料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来。匈奴在战国后期逐渐崭露头角，最初他们分布在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阴山山脉一带，后来逐渐扩展到外蒙古。

近代的中外研究学者有的认为匈奴是突厥语族，有的认

为是蒙古语族。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似乎前一种说法占优势。因为无论从发源地还是语言来看，后来的蒙古语言都和鲜卑、东胡、宝韦、契丹有一定的渊源。

匈奴的经济属于游牧经济，“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匈奴为了取得絮、缯、酒、米、食物，和黄河流域的汉族农业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汉朝也想得到匈奴的马匹作为耕战之用，匈奴获得汉朝的丝绢并不仅仅满足了牧区的需要，还似乎充当了中西丝绸贸易的中介。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及中亚等地发现的中国丝绸及丝织品，都是由匈奴贩运去的。西伯利亚各地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显然也是因为匈奴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匈奴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黄河流域的汉族地区要落后。当汉族地区步入封建社会时，匈奴还保留着很多氏族社会的残余，奴隶制也并不发达。所谓“匈奴中乐”就是说游牧部落中的劳役和压迫都较轻。有许多汉族农民为了逃避封建主的残酷压迫经常逃入匈奴地区。不但农民，甚至有些汉族封建主及其知识分子也因壮志难酬而归附于匈奴，他们给匈奴首领出谋划策，这对匈奴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可以说，匈奴的强盛及其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汉族的贡献。

匈奴的社会制度为解体阶段的原始公社。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氏族关系的意义很重大，这一点可以通过外婚制的存在得到证明。从“匈奴强国”的社会结构来说，国内 24 个

部落联盟分为东西两部，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土，可以在上面游牧，每年进行一定的迁移。领导部落的是“长”，为满足开会和祭祀的需要每年集会三次，他们通过大会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大计。原来的首领死后再确定新的共同的首领。根据中国音释可以推出，整个联盟的首领被称为“赞吾”，后来只是为了适应中国的象形文字的规律，才开始用史书中称呼匈奴首领所通用的“单于”来发音。

原始公社制度解体最主要的原因是奴隶制度的发展。在战争和侵袭中，大量俘虏成了奴隶，匈奴侵袭中国时，每次都掳走俘虏，有时竟达四万人。部落贵族把俘虏的大部分据为己有，从而有可能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通过这些，他们就逐渐富裕起来，所以就慢慢从同族人中分化出来。除了外部来源以外，奴隶还有内部来源，所有的罪犯及其家庭成员都变成了奴隶。

匈奴崛起时左右都有强邻，直到秦朝时，还是“东胡强而月氏盛”。东胡，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月氏是匈奴西边大国，地处河西走廊。根据近来人们的研究，月氏人的分布范围可能西起阿尔泰山，东到甘肃、宁夏，以至河套地区。还有乌孙部，分布在敦煌一带，是匈奴西边的小国。丁零部在匈奴之北贝加尔湖以西，丁零的西部是叶尼塞河，河上游是坚昆部。乌孙西北为呼揭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则居住着塞人的游牧部落。所有这些部落，都

和匈奴互不隶属。甚至匈奴在强大起来之前，还是屈服于月氏的。匈奴单于冒顿在登位之前还曾被送往月氏作人质，但匈奴的强大是从冒顿即位之后开始的。

根据中国史书的材料，匈奴族勃兴史是这样描写的：大约公元前 209 年，冒顿杀了他的父亲自立为单于，不久之后出兵打败了东胡，然后又向西赶走了月氏，但这仍只是打败了月氏，还没有把它完全消灭，所以匈奴的西边仍然和月氏、氏、羌相接壤。在北边，匈奴又征服了丁零、坚昆等部落，在东边则和汉朝敌对。

但此后，匈奴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汉朝的侵犯，位于中国边境的各个部落都站在匈奴一边。汉朝政权被迫常常贿赂匈奴，但有时候免不了受其侵略。每次匈奴东侵中国，当时的汉朝地区都要遭受严重的破坏。

侵略的结果是从外贝加尔到西藏，从现在的新疆到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都在匈奴单于的统治之下，但由于有些部落时而归服匈奴，时而又从匈奴中脱离出去，所以当时匈奴的疆界并不确定。其中蒙古部落是匈奴部落联盟的核心，不过除了这些部落之外，其他一些游牧部落也包括在内：西方有突厥部落，可能还包括伊朗部落，北方有通古斯—满洲部落。在如今西伯利亚南部的大片森林地带，有许多原始农业和狩猎部落臣服于匈奴，在西还有月氏和乌孙部落同时臣服于匈奴，定居在现在的新疆的居民也向匈奴纳贡。

在公元前 2 世纪 20 年代汉武帝在位时，汉朝对匈奴采取了攻势，多次战胜匈奴，并占领了鄂尔多斯。汉朝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并深入到匈奴的领土之上。

公元前 119 年，匈奴惨败。新疆的居民摆脱了对匈奴的依附，有一部分还承认中国的统治权。公元前 1 世纪初，中国人最终使乌孙也和匈奴决裂。

② 乌孙部落

乌孙最初分布在现今甘肃省一部，同月氏人混杂在一起。在同月氏的一次冲突中，乌孙被击溃，大多数部落因此退往西北。

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之间的地区在公元前 1 世纪时是乌孙的游牧区，这个部落还占据了谢米列契草原和天山山地的牧场。

迁移到谢米列契以后，乌孙就和当地居民杂居在一起，所以在乌孙的文化中除了源于本土的成分之外，还包括居住在谢米列契和塔拉斯河盆地的古代居民塞人所创造的成分，这种继承性在物质文化方面体现得非常突出。

在乌孙部落向谢米列契迁移的时候产生了部落联盟，其首领叫昆莫。氏族联盟的意义仍很重大。乌孙族虽然还存在一定的母权制的残余，妇女地位还比较自由，但是父权制家族仍然占统治地位。

乌孙的部落联盟的政治力量非常强大。在公元前 2 世纪和公元前 1 世纪之交，据中国人统计，可以肯定乌孙的人数当时为 63 万人，而他们的军队人数就达到 188800 人之多。

公元前 115 年，早已出使过西方的中国使者张骞，再次深入到乌孙境内的伊塞克湖附近。他在这里派出许多副使到达安息，为他收集了很多有关西方各国的情况的资料。这时匈奴因丧失东土尔克斯坦而衰弱，乌孙就此摆脱了匈奴的管辖。

乌孙和匈奴关系的破裂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给乌孙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匈奴人在公元前 75 年大败乌孙人，掳去了大批俘虏并占领了乌孙的一部分土地，但当昆莫去世时，乌孙部落联盟也对匈奴展开了进攻，结果乌孙把它的统治延伸到东土尔克斯坦境内，例如叶尔羌河绿洲就归属乌孙了，但是乌孙部落联盟在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就衰落了。

匈奴强国的国势不断衰落下去，到了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又分裂成两个匈奴联盟，和中国接壤的匈奴承认中国对自己的领导。同时，绝大部分的匈奴人都迁移到锡尔河北岸的中哈萨克斯坦地区，造成其与康居部落的频繁接触。再后来，匈奴人又出现在咸海和里海一带地区，并把那里的土著居民阿兰人驱赶到西方，这就是以后引起人类大规模迁徙的第一个推动力，也是所谓民族大迁移的宏伟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改变了中亚和西亚，而且也改变了欧洲

的人种和政治面貌。

③大宛

中国从公元前 2 世纪起开始了对中亚地区首先是大宛的军事远征，没有任何确切的资料可以得知有关希腊一大夏王国存在时期大宛的情况。从中国史书的记载分析，大宛在公元前 2 世纪的后半叶仍然保持独立自主，当地居民和吐火罗居民讲着几乎完全一样的语言，所以两种语言同属于伊朗语系。

大部分的大宛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不过也有从事游牧业的。

从公元前 2 世纪后半叶起，大宛同中国既有和平来往，也存在军事冲突。中国的使节张骞大约在公元前 128 年出使到大宛，然而到了公元前 104 年，中国军队开始远征大宛，不过，这次入侵并没有获得成功。中国人围攻那些设防居住地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几乎全军覆没，被迫撤回国内。公元前 102 年，中国又组织了第二次远征。中国人包围了贵山城，但是这次围攻也没能把它拿下来。最终签订了一项对中国人有利的条约，并立亲汉的人为大宛王。贵山城居民为了解围，交给中国人几十匹“天马”和三千匹其他马作为赎金。

虽然这两次远征并没有使中国人控制大宛，却使他们和

东地中海各国以及中亚各国建立了牢固的贸易往来关系，开辟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有关乌孙西北的康居国的资料在中国的史籍中就有所记载。

2.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交往

当时中国同中亚各国和人民的相互关系，在很多方面都与此后 100 ~ 200 年间罗马帝国同它在中欧、东欧和西亚细亚领土上的邻国的相互关系类似。就奴隶占有关系的发展程度而论，中国已远高于大多数中亚细亚的农业地区，更不用说是游牧民族了。为了避免游牧民族侵袭边疆，中国的统治集团尽力加强边防。除此之外，他们很注意掠夺奴隶、发展同西方各国的贸易，为了达到所有这些目的，就必须维持它在中亚细亚的势力。

中国统治集团利用馈赠、收买和其他方法企图使游牧部落的贵族站在中国一边，为此利用策划宫廷政变、自己的使臣活动、扣押人质等办法影响事态的发展。

但由于帝国内部社会矛盾过于尖锐，所以造成了中国同游牧民族的脆弱关系。但在初期，中国的进攻还算比较顺利，离中国比较近的地区都归属了帝国的统治，即使较远的中亚细亚各国的大部分土地虽只是名义上承认了臣服于中国，但毕竟也是暂时承认了。毋庸置疑，中国的影响推动了邻近中国的地区的奴隶占有关系的发展和文明的提高。

四、安息帝国的解体

安息在公元 1 世纪末和公元 2 世纪初内乱此起彼伏。后来发生的几次大事件表明安息王国的衰落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罗马人利用了安息衰落的时机，罗马皇帝图拉真在公元 114 ~ 116 年大败安息人，征服了阿尔明尼亚，并将其设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美索布达米亚和亚述在公元 116 年也被宣布成为其行省。后来，图拉真侵入巴比伦尼亚，并占领了泰西封，接着率领舰队开进波斯湾。但是，图拉真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

这一切情况可以通过图拉真的东征予以说明。尽管安息人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守住了幼发拉底河流域，为争夺阿尔明尼亚进行了成功的战斗，并且不止一次威胁到罗马人在叙利亚的统治，但遗憾的是没有能够保卫对它而言最重要的南高加索和两河流域地区。罗马人似乎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他们没有能够守住征服的地区，在下一代皇帝阿德里亚努斯统治时代，不得不放弃新的行省。此后，从沃洛盖斯二世和沃洛盖斯三世长久的统治时间和在他们当政期间一次王位争夺纠纷也没发生来看，在安息也出现了一个较太平的时期，虽然此时期不太长久。

公元 2 世纪 60 年代，罗马与安息之间再次爆发了战争。

但是，罗马人获得的还只是表面的胜利，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占领区。与此同时，军队中突然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瘟疫，所有这些地区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安息人也损失惨重，因此任何一方都未能获得决定性的优势。罗马人在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时代、卡拉卡拉时代和玛克里努斯时代又进行过三次远征，结果同样都是毁灭性的，而且都是徒劳无功的。

公元 3 世纪 20 年代，在团结在萨珊王朝周围的新兴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安息王国彻底被击溃了。萨珊王朝是在塔爾西达—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初的核心发迹的。可见，萨珊王朝取得政权不单是一次王朝政变，而且是整个公元 2 到 3 世纪内所发生的社会变动的结果。

祆教的改革开始于沃洛盖斯统治时期，他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收集祆教经文，最终编成了祆教圣经“阿维斯达”中最早的一篇。虽然到萨珊王朝时代祆教才成为国教，但到后来该王朝却成为祆教的坚实堡垒。与祆教相反，佛教在安息传播的范围很小。安息时代，伊朗非常流行所谓的巴拉维文字，即用阿拉美亚文字及个别单词来表达伊朗语原文，用这种文安编写成的安息实用文献有不少留传至今。

安息时期的文学逐渐发展起来，萨珊王朝时代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出自安息文学蓝本。菲尔道西在公元 10 世纪末写成的史诗“列王纪”便得益于安息的史诗。安息的编年史成

了后来历史编纂学的资料。安息人在艺术方面特别是雕刻、建筑术和铁花技艺等方面，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因为萨珊王朝推行了根除安息的政策，致使安息的许多文化古迹都被毁灭了，安息的文化影响了萨珊王朝时期伊朗、阿尔明尼亚、中亚细亚等地的文化，因为毕竟安息人是土库曼民族起源的人种群之一。

五、阿尔明尼亚与伊比利亚

1. 阿尔明尼亚

①阿尔塔舍斯王朝的灭亡

在公元前 1 世纪后半期，阿尔明尼亚国家的地位经常动摇不定。它在 30 年代曾一度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在对安息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再次远征阿尔明尼亚，并在那里肆意践踏和掠夺。但是，在三足鼎立期间，阿尔明尼亚又暂时成了独立国。屋大维战胜安托尼乌斯之后，不敢马上与安息和阿尔明尼亚开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承认了既成的形势。

公元前 1 世纪 20 年代末，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地位已经非常牢固，因此他又实行了对东方的积极的进攻措施。

阿尔明尼亚终于沦为罗马的一个附属王国，不过阿尔明

尼亚仍保存着国家体制，罗马人不干涉其内政，但是对外政策必须完全服从罗马人的利益。阿尔明尼亚到了公元前 1 世纪末已经不再是像提格拉涅斯二世时的强国了。国王有时是由罗马任命，有时则由某个贵族团体推选产生。在公元纪元前后，已不再是阿尔塔舍斯王朝统治阿尔明尼亚了。

②阿尔明尼亚的对外关系

当时阿尔明尼亚的对外地位对贵族势力的增强非常有利。阿尔明尼亚国王在形式上被认为是“罗马人民的朋友和同盟者”，但是实际上阿尔明尼亚却隶属于罗马。

但是，当时企图在阿尔明尼亚树立威信的并不只是罗马。比如前面提到过，从公元前 1 世纪末叶，安息便开始与罗马竞争。在提格拉涅斯二世时代，安息国王为了阿尔明尼亚国王的利益而被迫放弃了“众王之王”的称号，但现在的情况变化了，安息的统治者开始干涉阿尔明尼亚的内政，或者支持这几位国王，或者支持那几位，并且企图把阿尔明尼亚变成安息国体系中的一个附庸。

自阿尔塔舍斯王朝结束之后，阿尔明尼亚所有的国王无一例外都是依附于某一贵族集团的外族人。总之，公元 1 世纪前半期的阿尔明尼亚历史可以称为一部不断叛乱、国王经常更换、不断有人篡夺王位、内讧外患不绝的历史。

公元 52 ~ 53 年，安息阿尔少克王朝的代表人物提里塔

特由于得到安息的支持，取得了在阿尔明尼亚的统治地位，他与罗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公元 54 年克劳狄乌斯死后，尼禄继承皇帝之位，他给当时处在罗马统治下的梭非那委派了一位特别国王。阿尔明尼亚的王位也曾由罗马的傀儡继承，但是，罗马来的傀儡国王在阿尔明尼亚统治的时间不长，安息又起来反对罗马。罗马与安息为了争夺阿尔明尼亚，在公元 1 世纪 50 ~ 60 年代发生了一次非常剧烈的战争。最终，连续不断的战争以相互妥协的方式结束了，罗马承认了提里塔特当阿尔明尼亚国王的事实，但是在名义上，提里塔特必须承认自己归罗马管辖。

公元 66 年，提里塔特到达罗马，接受了尼禄隆重的加冕。

③阿尔沙克王朝统治下的阿尔明尼亚

阿尔明尼亚从公元 66 年起就一直既属于安息人又属于罗马人，处于双重藩属地位。但阿尔明尼亚作为罗马藩属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它是安息的藩属。罗马承认阿尔明尼亚国王是“罗马人民的朋友和同盟者”，而在阿尔沙克王朝强国的体系中，阿尔明尼亚是一个由阿尔沙克王朝的人统治的半独立的国家，并且在那些半独立国家的等级中居第二位或第三位。事实上，阿尔明尼亚国王是由安息国王任命阿尔沙克王族中的某个人担当，然后再由罗马批准他为王位候

补人。

有关提里塔特一世在公元 66 年以后执政的情况，现在了解的不多，只知道他把首都从亲罗马的提格拉那凯尔特迁到了亲安息的阿尔塔沙特，而阿尔塔沙特则是依靠送来的手工工匠的支援而重新建造的。在公元 1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提里塔特时代，阿兰人向阿尔明尼亚大举进攻。阿尔明尼亚在提里塔特一世时代被划分为 120 个政区或省县，这些政区的统治者都是阿尔明尼亚的贵族。

公元 114 年，图拉真开始发动对安息的远征。罗马军队占领了阿尔明尼亚，同年把它改成罗马行省。依照罗马帝国东方其他许多行省的设置，阿尔明尼亚也建立了当地城市的联盟。

不过，阿尔明尼亚作为罗马行省的时间极短。虽然图拉真的军队在公元 115 ~ 116 年间深入安息腹地，但这种胜利非常不稳固。在罗马军队后方，不仅在新占领区，而且在罗马旧有的各行省都发生起义，起义一直蔓延到塞浦路斯岛和昔兰尼加。这个时候，阿尔明尼亚也发动了起义。

这次战争，图拉真实际上是失败了。他的继承人阿德里亚努斯率领罗马驻防军队从占领区退出，而且恢复了根据公元 63 年的和约规定的对东方的传统政策。在公元 2 世纪 60 年代，罗马和安息之间再度发生矛盾，最后罗马获得了胜利。而罗马的傀儡索赫姆则借助于发生的这些事件，当上了

阿尔明尼亚的国王。

公元 2 世纪后半叶，在安息联盟所统属的各个王国的独立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阿尔明尼亚几乎成了完全独立的王国。罗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威胁阿尔明尼亚国王，所以阿尔明尼亚也企图设法摆脱安息阿尔沙克王朝的控制。罗马领土的扩张以及罗马人对阿迪亚别那的征服隔断了阿尔沙克王朝的阿尔明尼亚和阿尔沙克王朝的安息之间的联系。在与罗马的相互关系上，阿尔明尼亚国王瓦拉尔什二世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从此国内撤走了罗马驻军，而代之以阿尔明尼自己的骑兵队驻防，接受罗马皇帝的神助金并有义务参加罗马远征的贵族人物组成了这支骑兵队。

当罗马皇帝卡拉卡拉把藩属王国俄斯罗伊那改成行省，并且也企图把阿尔明尼亚改为行省的时候，情况略微发生了变化。他用欺骗手段逮捕了瓦拉尔什二世的全家，给瓦拉尔什二世戴上镣铐押送到罗马去。但阿尔明尼亚国内爆发了由瓦拉尔什的儿子提里塔特二世领导的起义。此时卡拉卡拉正在远征安息，结果被他的一名战士杀死了，他的继承人玛克里努斯只得马上和安息缔结了和约，承认提里塔特为阿尔明尼亚国王。玛克里努斯被迫接受的和平是安息的最后一次胜利。安息阿尔沙克王朝强国只维持到了公元 226 年，伊朗的统治权转到波斯萨珊王朝手中，这个转变对阿尔明尼亚的影响也很大。

2. 伊比利亚

①伊比利亚和罗马的关系

伊比利亚对罗马的依附，远不如科尔希斯那样巩固，在公元 1 至 2 世纪，伊比利亚的版图扩大并进入了全盛时代。罗马人承认伊比利亚国王为“罗马人民的朋友和同盟者”和“凯撒的朋友”，这实际上是一个平等的同盟。在高加索，罗马主要拥有战略上的利益，对罗马来说，阿尔巴尼亚和伊比利亚王国非常重要，掌握这两国，一方面可以使得阿尔明尼亚和安息的西部地区受到经常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住几条从北高加索通往南高加索地区最重要的山道。

事实上，伊比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许多地方帮助了罗马来对付安息。对伊比利亚贵族来说，参加战争是有利的。伊比利亚支持罗马参加战争就加强了它的对外地位，扩大了在邻近地区的势力，而且士兵还有可能获得大量的奴隶和战利品。在保护高加索山道上，伊比利亚和罗马的利益就更一致了。北高加索的各个游牧部落不断侵袭西亚细亚和南高加索的邻近地区，这种袭击既对罗马帝国东方的各个行省是个威胁，也对伊比利亚是个威胁。由此可见，伊比利亚人保卫山道对罗马有利，所以罗马在这方面对伊比利亚予以极大帮助。

开始，伊比利亚人不愿作罗马的藩属，他们利用凯撒死后罗马国内正进行战争的机会，联合阿尔巴尼亚人发动了反罗马的起义。但在公元前 36 年，罗马人战胜了伊比利亚王法尔那巴兹，并且强迫他与罗马军一道去逼使阿尔巴尼亚投降。但到后来罗马在东方的国境逐渐稳定、罗马势力开始衰弱之后，罗马和伊比利亚的联盟就开始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罗马政府与伊比利亚贵族的互惠利益上。在公元后头两个世纪，伊比利亚王借助与罗马的联盟，大大地巩固了王国的统治。公元 1 世纪，在伊比利亚与安息的过程中，阿尔巴尼亚和阿尔明尼亚的几个边区都处在伊比利亚的势力范围之内。

②伊比利亚的社会矛盾

公元 2 世纪，自罗马皇帝阿德里亚努斯放弃了对东方的征服政策之后，伊比利亚的独立性更强了，其对外地位也更加巩固了。伊比利亚国王法拉斯曼二世在阿德里亚努斯统治时代末期，曾发动了对阿兰人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因为阿兰人曾侵略过阿尔巴尼亚、米太，对阿尔明尼亚和卡帕多客亚也造成威胁。可能就在这时，阿德里亚努斯召请法拉斯曼到罗马去，为了维持伊比利亚和罗马的联盟，罗马政府曾多次赠给伊比利亚的国王及贵族一些礼物。阿德里亚努斯曾赠给法拉斯曼一支 500 人的队伍和一头象。在伊比利亚贵族的家

族公墓里，罗马皇帝赐给他们的各种物品都保存完好，比如带有阿德里亚努斯、安托尼乌斯·披乌斯等皇帝浮雕像的银盘等。罗马在伊比利亚的势力到安托尼乌斯·披乌斯当政时期日益巩固起来。法拉斯曼二世曾携妻带儿到过罗马，罗马扩大了法拉斯曼二世的领地，并允许他去卡庇托里乌姆献祭，这对外国人来说是一种罕有的荣誉，而且罗马还在玛尔斯广场上给他树立了一座骑马像。

在伊比利亚的对外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部分伊比利亚居民是自由农民，即“兵民”。在公元后头几世纪，阶级矛盾开始激化。根据在萨姆塔夫罗的发掘，发现了非常豪华的贵族墓葬、中等阶层人物比较朴素的墓葬以及贫民极其简陋的石棺墓葬。高级官员带有披提阿赫希、下级皮提阿赫希、宫廷管理人等称号，铭文上也有刻“伟大的伊比利亚王的统帅”字样的。这时贵族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方面他们是从古代部落贵族转化来的，另一方面则是兵民阶层财富分化的结果，是兵民当中分化出来的一批因掠夺战争虏获战利品和奴隶而致富的个别家族。

武器的性质也反映了贵族与人民之间的差异。贵族作战时骑着马，满身重甲冑，而农民只能当步兵，只有贵族才能买得起重武装。由于伊比利亚的自由民一部分发了财，一部分日益穷困，所以他们逐渐地分化成“贵族”和“小人”两个阶层，这两个阶层越来越分化。贵族不断发财致富，而农

民逐渐破产而遭受奴役。但与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不同，破产的农民并没有变成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仍然留在乡村，被附近的贵族所奴役。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被奴役的农民仍然没离开生产资料，而是继续住在自己的地段上，但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产品或一部分收获。由此看来，他们并没有变成终身奴隶，而是变成了依附农民。由于生活条件大致相同，所以沦为贵族的依附者的农民以及固定在土地上的奴隶逐渐混合成一个阶层即依附农民阶层。

③伊比利亚的文化

公元 1~3 世纪，伊比利亚地方文化和手工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点可以由墓葬中所发现的艺术制品得到证明。贵族的墓葬里发现有金银装饰品，镶光玉髓、贵榴石等的戒指，艺术镶边的武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所谓带皮提阿赫希肖像的宝石。除了当地制造的物品以外，还发现大量输入品，比如罗马帝国各地制造的艺术品、安息货币及罗马货币等。

在公元后几世纪，伊比利亚根据阿拉美亚字母创造出一种适合于当地语言的特种阿尔马济文字。传到现在的除了在器皿等上面的题词以外，还有两份阿尔马济文字的墙上题词，其中一种还有希腊文译文，另一种则只是用阿尔马济文字写的，现在还未能完全读懂，头一份题词里还提到了法拉

斯曼王的事情。

伊朗对伊比利亚贵族的影响很大，大多数伊比利亚王的名字，比如法尔那巴兹、法拉斯曼、密司立对提等都来源于伊朗的语言。当时伊比利亚人也非常流行崇拜太阳神米特拉。

第二十一章

公元 3 ~ 4 世纪的中亚各国

一、公元 3 ~ 4 世纪的中亚

在中亚细亚历史上，公元 3 ~ 4 世纪这段时期很少有人研究。关于它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记载最为缺乏，地方传说也非常有限并且主要是通过较晚一个时期的阿拉伯语作家的故事流传下来的，文学史料中的资料大多数是接近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细亚那个时期的。因此要评述公元 3 ~ 4 世纪的中亚细亚，就不能不借助较晚时期的资料。在东土尔克斯坦以及在塔吉克斯坦穆格山上出土的公元 7 ~ 9 世纪的莱特人的手稿，是研究中亚细亚思想文化史极为重要的资料。

1. 中亚细亚国家的更迭

在公元 3 世纪，在贵霜帝国的西面，伊朗的安息王朝被新兴的萨珊王朝所取代。萨五册是这一王朝皇族的始祖，传说此人还是阿赫门王朝皇族的后裔，因此，萨珊王朝就被说是直接继承了阿赫门王朝。萨珊王朝时的伊朗控制了中亚细亚的西南地区。历代的贵霜国王丧失了对印度很大一块领

土的控制，印度斯坦贵霜诸王的政权范围只局限于喀布尔河谷的一小块土地上。由此看来，粟特的诸贵霜沙赫也就是札拉夫善河上贵霜的城市的执政者与萨五册王朝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在公元 4 世纪，喀布尔的诸贵霜沙赫开始从与萨五册王朝斗争转变为与它结盟，而且通过联姻巩固这种联盟。新的游牧民族在世纪之交涌入中亚细亚，消灭了贵霜帝国最后的残余势力。

在贵霜帝国崩溃的过程中，中亚细亚又分裂成无数的城市国家。被沙漠、草原和崎岖难行的山脉隔开的各绿洲和盆地都形成了独立的国家。进一步的政治分裂又经常发生，所以有时竟然在同一绿洲上出现了好几个国家。与此相反，有时在一个较大的城市王国的政权下，一些小城市又合并为特殊形式的城市国家联盟。

粟特原来包括从品治肯特到凯尔明涅的札拉夫善河流域，后来在政治上分裂了。札拉夫善河谷西部是以布哈拉为首的各个城市王国的特殊联合。粟特领地的总数相当可观，其中以撒马尔罕以南八九公里的留达德中心的弥末公国势力为最强，之所以最强的原因在于灌溉札拉夫善河以南土地的灌溉体系的主要工程都在弥末境内。

这时，古代的大夏最后被命名为吐火罗。吐火罗在南部和高附王国以兴都库什山为界，北部和粟特以吉沙尔山脉分隔，东达独立游牧民族所定居的帕米尔高原，西滨穆尔伽布

河和盖里路德河流域的绿洲。许多山区公国分布在现在的戈尔诺—巴达克山州的土地上。

在公元 3 ~ 4 世纪，撒马尔罕，也就是古代的玛拉坎达，大概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城市。希腊一大厦王国灭亡以后，中国史书从公元 5 世纪起才第一次提到撒马尔罕。从这时开始，撒马尔罕可能发展为商业文化中心了。贵霜和瑟底两个小国就处在札拉夫善河沿岸撒马尔罕下游地区，贵霜是粟特在贵霜王朝统治时期的首都，是强大的贵霜帝国最后的残余之一。札拉夫善河的发源地即在奥斯鲁沙纳地区。乌浒河左岸则是阿穆耳的一个小领地。

除去俱战提（古代的埃斯哈塔的亚历山大里亚，现在的列宁纳巴德）以外的大宛，是一个以渴塞为中心的城市国家联盟。沙什以柘析城为中心，位于锡尔河下游的奇尔奇克盆地。一些文化昌盛之邦在锡尔河下游的地方存在着。以白水城为中心的白水王国位于阿雷斯河流域，下游就是在阿拉伯人占领前夕包括几个独立王国的法拉巴，也就是讹打刺地区。

根据在花拉子模的发掘，对公元 3 ~ 4 世纪花拉子模的历史比中亚细亚其他各地区的历史了解得多一些。在公元 1 ~ 3 世纪，花拉子模一直受到贵霜帝国的控制，花拉子模的城市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贵霜时期，灌溉工程最为发达。当地的艺术品很明显地表现出受到了健陀罗和古希

腊、印度的影响。花拉子模从公元 3 世纪开始存在一个阿夫里格王朝，它的中心即是后来的柯提。

花拉子模迁到乌浒河右岸的克雅特城，在那里，花拉子模王阿夫里格建筑了壮观的菲尔城堡。阿夫里格所建立的阿夫里格王朝统治花拉子模长达几个世纪，花拉子模这个时期的文化也是根据这个朝代的称号命名为阿夫里格文化。从公元 3 世纪上半叶起，中亚细亚西南部并入了萨珊王朝伊朗的版图。

2. 中亚细亚的社会经济状况

中亚地区在贵霜帝国时期是奴隶制度，曾经非常繁荣，但到公元 3 世纪之后就日趋衰落了，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有关这一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主要是通过一些考古发掘的资料了解的。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在花拉子模地区进行的较多，总的说来，这些成果说明封建关系在该地区逐步产生，比如，城市相对地衰落，一个个庄园的出现表明自然经济加强了，而庄园的周围又都建了设防的围墙，后发展成为城堡。农民渐渐失去自由，附属于庄园主，固着在土地上，这种庄园主也就是土地所有者贵族称为德赫干，德赫干住在城堡里，享有一切政治、经济特权，俨然一位邦君。每个庄园中心都有高高的塔楼，由士兵守卫。围墙外是果园、田地，方圆达二三十公里。城堡之外还有市场，还有由庄园

主控制的广大的人工灌溉网，后来这里在市场上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城镇，和一个独立的国家基本相当。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自给自足，这就导致了这个时期中亚地区政治上的分散及许多小国的各自为政，不管是贵霜还是□哒的统治者，都只满足于征收赋税，而对基层的行政管理则一般不干涉。

中亚地区居民种植稻、小麦、黍、大麦、苜蓿、豆类、葡萄等，可能还种植棉花。

中亚各地区盛产各种矿产，比较出名的有康国的黄金、砾沙，钹汗的朱砂、金、铁，漕国的金、银、镔铁，者至拔国的美铁，迷密国的金、玉，伽色尼的赤盐，呼似密的银，磧宾国的金、银、铜、锡等。我们还可以根据考古发掘了解到忽毡附近山中也出产银和铜，而巴达克山则出产红宝石和青宝石。所以，冶铜、炼铁，制造各种金属工具和兵器，以及纺织、刺绣、雕刻等手工业，这些在当时的中亚都有发展。史书上提到磧宾地方“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磧，有金、银、铜、锡，以为器物”。考古发掘还证明，忽毡地方有制造珠宝与金器的手工业。尤其重要的是，埃及人最早发明的制玻璃之法，这时的中亚人也已经掌握了，而且他们还掌握了制琉璃的方法。

3. 中亚细亚的文化

在古代和中世纪之交，中亚细亚的文化非常繁荣。文字

和著作都明显地发展了，著作有历史的、宗教的、天文学的等，同时有许多种文字存在。

至少在公元 4 世纪之前，根据阿拉美亚字母创造的粟特文字就已经出现了。被确认为是 4 世纪初期产物的一部著名通信集，就是由一位住在撒马尔罕的母亲和住在东土尔克斯坦以东敦煌的粟特移民区的女儿共同写就的，可以确定是公元 4 世纪初期的产物。从这部通信集里，可以大致了解粟特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妇女的识字程度和独立性。它是稀有的，而且是最古老的粟特文献之一。在托普拉克—卡拉发现的档案和阿夫里格王朝早期的钱币是有关古代花拉子模文字最重要的文献，它们都是属于公元 3 ~ 4 世纪的。有几种起源于印度的字母在吐火罗也很明显是通行的。在游牧民族中，也有与粟特文和花拉子模文同样起源于阿拉美亚字母的特殊文字，但可惜的是这个时期的文献保存下来的很少。比鲁尼曾提到被阿拉伯人销毁的花拉子模编年史和宗教论文。

中亚细亚在宗教方面的复杂性并不逊于政治方面的复杂性。当地最古老的宗教是从伊朗东部及中亚细亚领土上起源的祆教。在贵霜王朝时期，佛教曾盛行一时。在贵霜王国瓦解时期，摩尼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入中亚细亚。从新疆传来了许多摩尼教的圣经，既有突厥文的，也有粟特文的。摩尼教教义的主要著作“胡阿斯杜阿尼夫特”就在起源于公元 5 世纪的突厥文摩尼教作品里保存下来了。在古代和中世纪

之交，中亚细亚的艺术水平也已经很高了。可以作为中亚细亚艺术代表作品的有棺槨上的雕饰以及很明显起源于花拉子模的铸有国王、骑士和神的现实主义雕像的银杯以及阿佛拉西阿布的赤陶小立像。建筑业因为要建造城堡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形状简单而严整是这一时期花拉子模民用建筑物的特点，墙面被砌成许多半圆柱形，用半圆形拱顶将它们连接起来，中心塔楼的塔基又大又重，支撑着塔楼高高耸起。

二、公元 3 ~ 4 世纪的阿尔明尼亚

1. 阿尔明尼亚的社会状况

公元 3 ~ 4 世纪是南高加索尤其是阿尔明尼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动最大的时期。未曾得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这时也已经开始瓦解，而且逐渐被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封建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尚未完全崩溃的氏族一部落和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这个时期，在罗马同接替安息强国的伊朗萨珊王朝之间的斗争中，阿尔明尼亚的作用重大。

① 阿尔明尼亚的对外关系

随着伊朗萨珊王朝的崛起，阿尔明尼亚在公元前 3 世纪 20 年代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此之前，阿尔明尼亚曾是阿尔沙克王朝的封邑之一，所以它依附安息，但到了公元 3 世纪

初期，它对安息的关系基本上是徒有虚名了。安息虽然本身已经十分衰弱，不能强迫阿尔明尼亚真正服从它的统治，但阿尔明尼亚和安息的联盟还能保证使阿尔明尼亚不受罗马侵犯。安息灭亡之后，阿尔明尼亚的阿尔沙克王朝自然就成了萨珊王朝的敌人，因为萨珊王朝推翻了阿尔沙克王朝在伊朗的统治。为了同萨珊王朝进行斗争，阿尔明尼亚又与罗马站在一起，对阿尔明尼亚来说，这时候的罗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可怕，因为在 3 世纪，日趋衰弱的罗马帝国已陷于持久的危机。为了反抗伊朗的侵略，除了罗马以外，阿尔明尼亚还与伊比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接近，结果，南高加索民族的联盟形成并力图捍卫自己的独立。

经安息之后，萨珊王朝又与罗马展开斗争，公元 231 年，阿达希尔一世给罗马皇帝塞维鲁致信，要求罗马退出亚洲，这年秋季，双方开始进行战争。公元 243 年，罗马皇帝戈尔迪亚袭击萨珊帝国，在雷塞那附近战败了萨珊军队。公元 244 年，双方军队于泰西封附近再次进行战争，戈尔迪亚阵亡，罗马付出 50 万金第纳尔，双方缔结和约，亚美尼亚并入波斯。公元 259 年，萨珊军队和罗马军队在埃德萨决战，罗马皇帝瓦列里安与大批罗马士兵被波斯军俘虏。公元 286 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扶植亚美尼亚原被萨珊王朝处死的国王的王子复位，后来萨珊军队被赶出亚美尼亚。

一段时期之后，借助于罗马皇帝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力

量，阿尔明尼亚把提里塔特三世拥立为王。萨珊军队在公元 296 年入侵亚美尼亚，最后被罗马军队战败在两河流域的卡雷城。战后双方缔结和约，萨珊王朝割出底格里斯河以西地区和米底的一部分。从此以后，萨珊波斯与罗马之间维持了 40 年的和平。

阿尔明尼亚的西南地区早在公元 2 世纪就出现了基督教。到了公元 3 世纪，基督教已经在阿尔明尼亚广泛传播了。

提里塔特三世在他的统治初期不断地迫害基督教徒，但到了公元 4 世纪初期，他改变了立场，热烈地拥护起基督教来，提里塔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治性的原因。古代的阿尔明尼亚宗教和伊朗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提里塔特被迫和古代宗教断绝了关系而接受了基督教，以便在对伊朗萨珊王朝的斗争中巩固自己的统治。

阿尔明尼亚是最先接纳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之一。国王没收了古代神庙的土地交给阿尔明尼亚教会，规定了主教职位，而且各级主教职位可以世袭。

人民群众和贵族最初仇视基督教，人民群众不愿放弃旧的信仰，不相信国家所规定的东西，贵族早已不堪王权的残暴统治，也认为教会是国王的同盟者。在整个统治时期，提里塔特与纳哈拉尔和残余的异教祭司进行着尖锐的斗争，最后，他被受萨珊王朝的支持的反对者杀死了。

②社会等级制度

阿尔明尼亚的社会分阿札特、僧侣和阿纳札特三个等级。阿札特和阿纳札特是古代伊朗的社会名词，较早传到阿尔明尼亚。这两个名词分别是“自由的”和“不自由的”的意思。这两个名词开始是用来表示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的，但大概还在奴隶制社会的条件下，其使用范围就比较广了，比如其他类别的依附居民也称为阿纳札特。随着封建制度的诞生，狭义说来，阿札特是指小地主即纳哈拉尔的下属而言，广义说来，阿札特就是所有封建主的总称。普通人民又被称为“拉米克”。

阿札特和僧侣都是特权等级，他们不仅占有大片的领地，而且按照惯例不用纳税。阿札特有服兵役的义务，而僧侣则管辖宗教事务、法庭和学校。阿纳札特属于纳税等级，他们必须纳税和服强制的徭役。阿札特和僧侣如果犯了罪，只科以罚金，而如果阿纳札特犯了罪，则科以体罚，如果犯了特别重的罪，还要判处多年的强制劳动。贵族和高级僧侣不归一般法庭审判，而归国王和大主教审判。

统治者内部还存在着严格的官位等级。国王高于一切，四个边疆地区即锡拉千湖、阿尔德兹尼克、佐普克和古加拉克四个地区的执政者即四个“布杰希赫”仅次于国王。再就是纳哈拉尔，他们是国王和布杰希赫的下属，在宫廷的作用非常重要，担任国家最重要的世袭职务。根据特定的“等级

表”，纳哈拉尔在宫廷按严格规定的官阶任职，帽子、衣服和靴鞋都须符合职务等级和世袭等级。

在阿尔明尼亚的社会结构中，教会的地位也很重要。阿尔明尼亚最初的几个基督教国王尤其是提里塔特三世和他的继承者霍斯罗夫二世都保护教会，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领地或者从叛乱的纳哈拉尔那里没收来的土地慷慨地赠给教会。除此之外，纳哈拉尔也经常以追悼或者其他理由为名赠给教会土地和其他财物。因此在公元 4 世纪，教会变成了一种基本上不受国王政权管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在教会内部还存在着严格的教阶制度，大主教是教会的首脑即以后的卡托里科斯，他的权力比任何纳哈拉尔都高。国王领地的主教即是大主教，其他所有主教都归他统属。大主教与主教的关系恰似国王与纳哈拉尔的关系，主教都占有广阔的领地。在每一个纳哈拉尔统治区都逐渐设立了主教的职位，最低的教职是乡村教士，他们与小阿札特的地位相似。

③农民和奴隶的地位

绝大部分阿尔明尼亚居民是“希纳坎”农民，即生活在“希纳赫”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文献中有关他们的生活状况的记载很少。他们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播种大麦、小麦、黍和稻。他们用带铁犁头和木犁耕作在最落后的地区里，仍然属于半游牧式的畜牧部落。但在当

时，这里的园艺业、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都已经很发达了。

开始时，自由农民被称为希纳坎，他们定居在国王的土地上，和沃斯尼克一起作为当时王权与纳哈拉尔斗争中王权的某种支柱。由于国王土地不断地被分配，造成了贵族独占土地的统治形式。这些贵族不仅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变成世袭领地，而且把农民公社的土地占为己有，把公社土地上的希纳坎变成固定在土地上且依附于他们的佃户。自由农民的人数日益减少，这时候，“希纳坎”这个名词开始包含“依附农民”的意思。

农民仍过着公社生活。他们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用长绳丈量，土地是通过抽签分配的，农民份地的大小由家庭人口多少决定。除份地以外，农民还有自己的房屋、牲口和农具。牧场和森林归公社所有。

④城市的发展

城市在公元 3 ~ 4 世纪的阿尔明尼亚比较少。阿尔塔沙特、提格拉那凯尔特、瓦拉尔沙帕特这几个已经较大的城市都在国王的领地上。德芬城在公元 3 ~ 4 世纪建立起来了，后来它被作为阿尔明尼亚的首都。国王霍斯罗夫二世在德芬山丘上离阿尔塔沙特不远的森林里建起了自己的王宫，贵族都开始在王宫周围定居下来。阿尔塔沙特郊区因为阿拉克斯河床改道而变成沼泽，旧都居民开始成批成批地迁往德芬

城。

其他城市大部分都是设防的据点，中间是纳哈拉尔的城市，城堡周围是工商业地带。就职业来说，阿尔明尼亚城市的居民和希纳坎区别不大，他们从事果园业和农业，市民的果园和播种地分布在城墙周围。市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从事手工业，手工业制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不过纺织品和金属制品却被远销到国外。

城市居民在人种和宗教方面是起主要作用的。叙利亚人和犹太人大多数是商人和高利贷者，伊朗人大多数是手工业者。与东方各地一样，外国人都组成种族—宗教公社，在单独的住宅区居住，有他们自己的长老，长老们都受国王的市长管辖。城市和商业从公元 4 世纪后半叶起逐渐衰落，内乱和异族进犯阻碍了商业的往来，各地区之间的隔离现象也增加了。

城市是商业的中心。罗马帝国和伊朗的商队常到阿尔塔沙特城，阿尔明尼亚和伊朗、美索布达米亚、小亚细亚、黑海诸港口、卡特利及其首都姆茨海塔等地都有联系。阿尔明尼亚对缴纳关税的贸易国家予以保护。市场都设在城堡墙下，商人在这里得到保护，远离了迫害和劫掠。然而，商业并没有深入基层民众中，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没有和商业联系起来。

2. 国王帕普时期的阿尔明尼亚

为了巩固王权，帕普继承了其父阿尔沙克二世的政策，增加受国王控制的骑兵，从 10000 人增加到 90000 人。帕普想方设法提高国家的物质福利，加强建设。在穆雪尔·马米科扬和新建军队的支持下，他平定了叛变的纳哈拉尔，使边疆地区重归王权管辖。

对于教会，帕普所采取的措施更加坚决。

帕普为了摧毁大主教的权势，把格里果利家族几乎享受了 70 多年的大主教世袭权剥夺了。帕普还设法切断了阿尔明尼亚教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联系。阿尔明尼亚教会因此开始独立，阿尔明尼亚教会的首脑也从这时候起被叫做“卡托里科斯”。

5/7 的教会土地被没收，农民的繁重地租和徭役被取消，教会的物质福利由于什一税的废除而遭到严重的损失。帕普与僧侣也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比如他封闭了许多修道院，减少僧侣人数，强迫僧侣劳动，帕普的这些措施使阿尔明尼亚的国王政权暂时得到了巩固。

帕普虽然是靠罗马人的帮助取得政权的，但他却和萨波尔二世建立了关系，企图见风使舵，以巩固阿尔明尼亚的独立。

纳哈拉尔对帕普的政策非常不满。公元 374 年，在他们

的协助下，罗马人杀死了帕普。

在帕普死后，波斯和罗马争夺阿尔明尼亚的斗争重新开始了。纳哈拉尔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结果，根据公元 387 年的条约，罗马和波斯把阿尔明尼亚瓜分了。阿尔明尼亚边疆地区都被割给两个参加争夺的强国，剩下的“中心地区”也被瓜分了，因此阿尔明尼亚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罗马分得 $1/5$ ，波斯分得 $4/5$ ，但各部分仍由依靠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藩王治理。在罗马属下的阿尔明尼亚王权继续存在至公元 391 年，在波斯属下的阿尔明尼亚则直到公元 428 年才结束，在此之后，阿尔明尼亚的政权最终落入依靠异族统治的纳哈拉尔手中。

3. 阿尔明尼亚的文化

公元 3 ~ 4 世纪是阿尔明尼亚文化史上的转折时期。尽管在文化变迁中反映出的社会发展比较迟缓，但在这个时期，阿尔明尼亚思想和文化的形成确实受到了基督教传播的很大影响。阿尔明尼亚文字的产生可以说是新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事件。

在公元 4 世纪与 5 世纪之交，阿尔明尼亚字母被创制出来。密斯罗普·马施托茨（公元 361 ~ 440 年）是字母的创制者，他是塔隆一个自由农民的儿子。他按照希腊字母创制了新字母，但他把字母数目增加到 36 个。这种字母是在精通

阿尔明尼亚语音学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马施托茨创造的字母基本上毫无变化地保存到现在。

阿尔明尼亚文字的古典语文即“格拉巴尔”是在阿尔明尼亚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公元 9 世纪之前是阿尔明尼亚文字语言的规范。

阿尔明尼亚早在公元 4 世纪就创办了学校，学校里传授希腊文和叙利亚文，阿尔明尼亚人都到厄德撒和安条克去学习。从公元 5 世纪起，学校里开始用本国语教学，而主要是为僧侣阶层创办的学校也并不是完全不收平民的。

圆雕在使雕刻和偶像崇拜结合在一起的阿尔明尼亚教会的影响下逐渐消失了，但浮雕还继续发展。石工在石头表面上雕出特别精致的装饰品，有几何图形，有植物形象等。除此之外，反映贵族生活的宗教内容及非宗教内容的场面还经常刻在教会建筑物的墙上，如盛大隆重的外出打猎场面等。

如此看来，阿尔明尼亚尽管内部发生了动荡，国家的独立地位丧失，但阿尔明尼亚人民还是继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此后的几百年，是阿尔明尼亚文化发展繁荣的时期。

三、萨珊波斯帝国（公元 3 ~ 4 世纪）

1. 波斯

安息强国因为在公元 3 世纪 20 年代与罗马作战而被削

弱，并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分崩离析，在来自于原来的培尔西达地区的波斯新政治力量的打击下最终灭亡。

尽管安息王朝的首领也属于伊朗语族，并自称是从阿赫门王朝起源，但波斯人并不承认，波斯的历史家家也不承认此点，他们都处心积虑地企图统一全伊朗。所以，阿尔达希尔在继位做了邦君之后，就立即开始对外扩张。他首先向东征服和吞并了克尔曼，杀了他们的王沃洛格斯，以自己的儿子取代他为王，克尔曼的首府被称为阿尔达希尔城。接着打败了苏西亚那、伊斯法罕等地的王公，吞并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安息王阿尔达万率领大军前来袭击阿尔达希尔的老巢法尔斯，不过被打败了，安息王损失惨重。公元 224 年，在阿瓦士东面的霍尔木兹平原会战中，安息国王兵败阵亡。两年之后，阿尔达希尔又夺得安息的首府泰西封，建立伊朗历史上的新王朝即萨珊王朝。这个王朝统治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直到阿拉伯帝国兴起。

2. 萨珊王朝

① 萨珊王朝的兴起

公元 3 世纪初，萨珊显贵氏族获得了军事胜利，成为伊朗领土的统治者。

萨珊王朝建立之后，贵霜王韦苏特婆曾与亚美尼亚结成反对该王朝的同盟。据《亚美尼亚史》记载，在萨珊帝国创

建者阿尔达希尔一世于公元 226 年即位之后，亚美尼亚王霍斯洛一世组织了一个反对萨珊王朝的同盟，一个贵霜王也参加了这个同盟，但两年之后又退出。

又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陀跋里所说，阿尔达希尔曾进攻了萨迦斯坦，随后又进攻古尔干、木鹿、缚喝和花拉子模地区，一直攻到呼罗珊国土的边境，之后又再次回到木鹿。他杀死了许多人，把人头祭献给火神庙。以后他从木鹿回到了法西尔斯卡，驻军于科尔。这时，贵霜王、莫克兰国王、土兰国王的使者都来归顺了他。陀跋里的这段话有可能夸大了一些。

萨珊王朝强国各地区的社会制度并非完全一致。美索布达米亚在这个时期还和前一时期一样，起着国家经济中心的作用，继续保持奴隶制度。但是在伊朗内地，生活方式却还非常古老。在那里，原始公社关系仍然占据优势。

奴隶在各地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除了奴隶之外，城市自由手工业者和乡村的自由公社社员农民是比奴隶人数多得多的其他劳动者。

大家族公社在伊朗还起着重大的作用。“杜达克”这个名词表示公社，“哈姆杜达坎”表示大家族公社成员，“尼尔玛特”则表示财产公有。但是，到了公元 4 世纪末期，大家族公社已经分崩离析，最后和远在公元前 1 世纪就已出现在伊朗的邻里公社融合到一起。因此，“卡塔克—赫瓦塔夫”，

后来称为“刻德—胡达”，这个名词的意义也改变了，最初它表示大家族公社长老，到公元4世纪末期则表示由同村人中间选出的具有一定行政和财政职权的村长。在当时，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某些形式还依然保留着，这从萨珊王朝法律汇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例如，法律汇编中规定放牧人既放牧公有的畜群，也放牧个别公社成员私有的牲畜。

作为萨珊王朝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美索布达米亚的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的农民分为自由的农人“加布拉”和依附隶农“巴拉哈”两种。美索布达米亚在这个时期把奴隶束缚在田地上，把他们变成隶农，同时也奴役着自由农民，从而使得他们和隶农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

②国家制度

萨珊王朝强国是一个典型的等级国家。全国居民在最初分为三个等级，后来又变成四个。前三个等级是军人、僧侣和官吏，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第四个等级是纳税阶层，其中包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但是，如果想从纳税阶层升到高一级的等级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

特权等级又分成多个层次，而且从一个等级上升到另一个等级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总司令是军人的首领，僧侣的首脑则是执掌祆教大权的最高祭司，官吏的首脑是“大司书”。由国王任命的并在行政机关里起重大作用的官吏即纳税等级的首脑属于第四个等级，他的职名是“瓦斯特利奥山撒拉

尔”。虽然国王必须出身萨珊王室，但王室并没有严格的继承制度。国王在世时通常任意指定一位继承王位的王子。在不同时期，世俗的和宗教的最高贵族在选举国王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时大时小。国王就是在这一或那一贵族集团的压力下经过反复挑选才产生的，必须严格遵循的惟一准则就是国王不能有身体上的缺陷。国王的权力在理论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军队由各同盟“蛮族”部落的义勇军和补助部队组成。阿札特的重骑兵是军队的核心，步兵起辅助作用。个别部队对率领他们的当地贵族代表人物的忠诚，要比对中央政权任命的军队首长“埃朗斯帕赫巴达”的忠诚有过之而无不及。

行政机关的首长是被称为“大司事”的官吏。中央政府控制着财务和军队，第四等级的首脑瓦斯特利奥山撒拉尔负责国家的一切财务，其职责主要是征收赋税，“阿玛尔卡拉”是他的属下，即各地区的收税人。

③祆教

萨珊王国的国教祆教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促进了波斯土地显贵政权的巩固。

公元前7世纪产生的祆教，在安息王朝的初期由于希腊文化的影响曾经一度消沉，直到安息王朝后期才逐渐复活。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之后，开始大力振兴伊朗的民族文化，恢复祆教是其重要的举措。祆教的经典《阿维斯塔》就

是在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时期收集整理并编纂成文的。现存的《阿维斯塔》不仅包括琐罗亚斯特传教时期口传的教义，还包括了后来编成的赞美诗和繁琐的礼仪规则。祆教从此成了波斯的国教，随着萨珊王朝影响的不断扩大，祆教也通行于中亚各地。据史书中记载，康国“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可见祆教曾与佛教并存。《梁书》中说滑国“事天神火神”，这表明□哒人也是信仰祆教的。祆教是在北魏时期传入中国的。

祆教到了萨珊王朝时期，已经摆脱了传说中的先知者扎拉图什特拉在祆教徒的圣经《阿维斯达》中最古的几篇里所规定的原始学说的束缚。祆教的理论基础是认为世界上有光明与黑暗相斗争的二元论思想，世人必须终身帮助光明的根源奥尔穆兹德战胜黑暗的根源阿里曼。这种观念使世人把宇宙间的一切生物，甚至连自然现象都分成是奥尔穆兹德创造的和阿里曼创造的，还有许多繁复的仪式和教令与这种概念联系在一起，祆教宣扬信徒执行了这些仪式和教令就可能得到保佑，不致于犯亵渎罪，也不致于在有意无意之中同黑暗势力发生关系。

庙宇占有广阔的土地，享受贵重的赠礼，高级僧侣是统治阶级中最有权威的阶层。此外，僧侣因为替教徒执行非僧职人员不能胜任的繁杂典礼，从而在居民那里得到不少好处。另外，他们为了惩罚那些违背教规和仪式、故意或者无

意亵渎自然和因为接触了不圣洁的人或物而使自己被玷污的人，还实行了一种巧妙的罚金制度。劳动人民终身受到祭司的监视，祭司的这种监视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利益，同时他们还借机勒索财物。教育和法庭也掌握在僧侣手中，由此可见祆教在萨珊王朝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④摩尼教

摩尼教是另一种重要的宗教，也产生于波斯。据阿勒·比鲁尼所说，摩尼生于公元 215 年或公元 216 年。摩尼自称是巴比伦库特哈河地区马尔狄奴村的人，是一个跛子。创教之后，他在公元 241 年，也就是他 25 岁的时候，被允许在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的加冕典礼上宣讲自己的宗教。他所宣讲的宗教主旨是一种禁欲主义，他认为由光明与黑暗混合而产生的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罪恶的，所以应当尽一切努力来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结婚和人类种族的繁衍都是一种罪恶。除此之外，他还主张素食。

摩尼所宣传的宗教的教义，开始对波斯的国王及其宫廷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后来摩尼由于失宠被流放。摩尼到处游荡，据说他到过印度、克什米尔等一些地方。公元 272 年，沙普尔一世死后，他又返回波斯。继承沙普尔一世王位的霍尔穆兹一世对摩尼非常敬重，允许他自由地传教，摩尼教因此获得了大量信徒。但霍尔穆兹仅在位一年，他的后继者巴赫兰一世又改变了对摩尼的态度，巴赫兰国王说：“这

个人是要号召人们起来毁灭这个世界，必须在他的计划实施之前消灭他。”比鲁尼说：“巴赫兰杀了摩尼，将其剥皮，以草实之，悬挂于贡狄萨普尔城门之上，该城门至今仍被称为摩尼门。”

摩尼虽然被杀，但他所创立的宗教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恰恰相反，摩尼教在巴比伦，在中亚的撒马尔罕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在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中传播更广。在西方，摩尼教则传入到欧洲的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埃及、迦太基。

据说，摩尼生前写了许多书。为了献给沙普尔一世，他最早的一部书是用巴列维文写的，而其他的著作则是用叙利亚文写的。摩尼根据阿拉米字母发明了一种文字，他还是一个画家，所写的书都是图文并茂。阿拉伯作者说他在流放期间从突厥人那里得到许多信徒。当时突厥人中既有信佛教的，也有信摩尼教的。后来还发现了许多摩尼教的文书，是用突厥文和粟特文书写的。

3. 萨珊王朝的对外关系

年轻的萨珊王国是在安息强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很多方面还继续执行着安息强国的政策。阿尔达希尔一世曾占领了从前属于安息的几乎全部地区，后来却在米太的阿特罗巴特那和阿尔明尼亚遭到了失败，于是他又回到东

方，东方强盛的贵霜帝国在此时已经衰落下去了。据传说，阿尔达希尔所征服的地区，东北到达花拉子模，东部则到了高附河谷。虽然这些传说明显有些夸大，但萨珊王朝却确实很快在呼罗珊和木鹿绿洲上扎下了稳固的根基，这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成为萨珊王朝在东方的支柱。

阿尔达希尔的儿子和后继者萨波尔一世恢复了早在安息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与罗马的激烈斗争。同过去一样，斗争的焦点还是为了争夺阿尔明尼亚和美索布达米亚以及争夺在西亚细亚的统治地位。波斯在长期斗争中始终占据优势，斗争在公元 260 年以罗马人的彻底溃败和罗马皇帝瓦列里亚努斯的被俘而告终。

萨珊王国在萨波尔二世长时期的统治下曾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复兴。在萨波尔二世当政时期，王国同罗马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基督教在此时出现，因此萨珊王国改变了对待基督教徒的态度。当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受到迫害时，波斯的历代国王都乐意接受他们来波斯避难，希望在罗马人后方的基督教徒中寻求同盟者。当基督教逐渐成为敌国罗马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时候，伊朗则开始对基督教徒即国教信徒进行迫害，相反却对各种对统治教会和罗马帝国持仇视态度的异教的代表人物予以支持。

为了争夺阿尔明尼亚，伊朗萨珊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矛盾又一次激化，激烈复杂的争夺利益的斗争又开始了，双方都

试图把阿尔明尼亚的贵族笼络到自己方面来。公元 359 年，两个敌对的强国由外交上的明争暗斗转入军事行动，军事行动主要发生在美索布达米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东部。波斯人在战争中逐渐获胜，萨波尔二世控制了罗马人防守的几个重要堡垒。到了公元 361 年，形势对罗马越来越不利，罗马皇帝优里亚努斯在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后忽然阵亡了，罗马人被迫退兵，波斯人再次获胜。尽管如此，阿尔明尼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罗马帝国和萨珊王国之间的导火索。最后，这两个强国决定瓜分阿尔明尼亚。

四、黑海北岸地区的状况

1. 经济文化的衰落

黑海北岸各个城市从公元 3 世纪 30 年代起，经济日趋衰退，而且商业也日益萧条，手工业技艺也出现了某种倒退。

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之间在公元 3 世纪时连续不断地发生战争，这使得在黑海北岸各城市经济中起重大作用的贸易受到了大大的破坏，甚至包括希腊—萨尔马泰奴隶主贵族在内的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在下降。通过考古发掘可以发现这一点，前一时期的特有的奢华的坟墓几乎绝迹了。许多小城市，比如尼姆菲、米尔密基等，都变成了空城。除

了用陶轮制造的陶器以外，各种手工业制品都越来越粗糙，同时大量简陋的萨尔马泰式塑造陶器也出现了，这种陶器可能是个别农庄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制造的。

曾经繁荣发展的艺术日趋衰落，简陋的棺槨逐渐取代了用复杂的饰物和浮雕装饰的大理石棺，而陈旧的人物、动物写生画和基本上只用一种红颜料画成的几何图案也取代了综合希腊和当地习俗的现实主义五彩画。

2. 哥特人的入侵

哥特人，也就是日耳曼民族，在公元 3 世纪的头几十年内开始进犯其在黑海沿岸地区的邻邦。他们开始时住在哥特兰岛上，后来又迁居到波罗的海南岸，然后再逐渐往南迁移。哥特联盟的各部落逐渐推进到亚速夫海和黑海沿岸。虽然奥尔比亚有罗马驻军，但在公元 3 世纪 30 年代该城郊区已被哥特人抢掠一空。大概也是在这时，位于顿河河口的塔那伊斯被哥特人占领和毁坏了。公元 237 年的铭文提到了防守塔那伊斯城的准备工作，但是很明显城池没有守住，因为从此以后塔那伊斯城的铭文就不再有了。哥特人逐渐在当地居民中定居下来，对他们的文化也逐渐熟悉，并成为包含了各人种的强大部落联盟的首领。有些专家认为，这个部落联盟也包括斯拉夫人。无论如何，斯拉夫人很明显从公元 3 世纪起就开始深入黑海北岸地区，这可以从斯拉夫的部落名称

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墓碑上这个事实中得到确认。

黑海北岸各个奴隶制城市的军队的战斗力因为王国的全面衰落而削弱了。毋庸置疑，这里同罗马帝国一样，被剥削的居民往往同情甚至积极协助入侵的各部落，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受到敌人四面包围和因内战而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已经没有能力再支持黑海北岸地区的统治阶级了。无论在公元 3 世纪或者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用舰队、武器和粮食援助没有直接遭到哥特人侵犯的赫尔松涅斯。根据晚期的记载可以推断，赫尔松涅斯甚至参加了罗马对哥特人的斗争。

很明显，博斯普鲁王国内部的社会斗争由于哥特人的入侵而急剧尖锐起来，结果，敌视罗马的各居民集团都暂时拥立他们的傀儡为王。属于旧王朝的诸王，包括在公元 254 年废黜法尔桑兹并在公元 267 年以前一直自铸钱币的列斯库波里德五世和在公元 275 年获取政权的萨夫罗马特四世都被迫遵守这个同盟条约，在他们当政时期，哥特联盟曾利用博斯普鲁舰队进行过远征。

从公元 3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被罗马军队击溃，哥特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进攻罗马帝国，而是在黑海北岸的草原上停留了下来。不过，从考古学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哥特人对黑海北岸地区的文化没有多大影响，这里的文化越到后来已越没有任何外来成份，而具有了萨尔马泰文化

的特点。博斯普鲁王国的领土也没有因为哥特人的侵犯而大大缩小，忒奥多西亚和博斯普鲁王国亚洲部分的阿斯普尔吉安人地区也在公元 3 世纪末重新归入王国版图。忒奥多西亚在公元 4 世纪初成为一个边疆城市，这一点可以通过公元 306 年的铭文得到证明。

历代国王由于哥特人停止了侵犯并且旧王朝又得到了巩固，所以仍然强调自己效忠于罗马帝国，保留“凯撒之友和罗马人之友”的称号。相对和平虽然恢复的时间很短，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小亚细亚的贸易重新活跃起来，虽然还没有达到以前那样高的水平。

在公元 4 世纪初，也许博斯普鲁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曾想方设法使自己国家更加紧密地隶属于罗马，所以他们和帝国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就在这时，基督教也传播到了这里。从公元 3 世纪末期开始，在博斯普鲁王国基督教出现了，但基督教在赫尔松涅斯则出现得比较晚。代表博斯普鲁基督教团体的主教卡狄摩斯出席了于公元 325 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一次全世界基督教会代表大会。

3. 博斯普鲁王国的衰亡

但博斯普鲁王国在经济方面出现的新高潮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它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正常往来也逐渐中断了。历史家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在记载博斯普鲁人于公元 362

年向优里亚努斯皇帝求救的情况时已经把他们看成遥远的无足轻重的民族了。

匈奴人在公元 4 世纪 70 年代进犯了波斯普鲁王国的领土，并且很容易地取得了胜利，这导致了王国的衰落。一部分匈奴人来自于阿兰人定居的草原，另一部分是通过塔曼半岛，渡过了启美里亚的波斯普鲁斯海峡过来的，大批涌来的匈奴人极其残酷地蹂躏了波斯普鲁王国。

五、欧洲诸部落对罗马的侵袭

从公元 3 世纪最初几十年起，阿拉伯、欧洲和非洲诸部落开始越来越猛烈地进犯罗马帝国。

同其他奴隶制国家一样，罗马帝国经受了深刻的危机，因而易于成为外来部落入侵的牺牲品。在这个时期，一些前所未有的部落出现了，他们从以往只受到罗马人间接影响的地区向外迁出，成立了许多新的部落联盟。在中世纪建立国家的各部族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1. 日耳曼部落

①日耳曼人部落联盟的形成

罗马内部的动荡和危机，削弱了其对外防备能力。公元 2 世纪末，正在进行民族迁徙的日耳曼人，对罗马边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公元 3 世纪中期，他们从东西两面突破

了罗马帝国的国境线。与此同时，法兰克人摧毁了罗马在莱茵河中上游的堡垒，进入了高卢中心地带，后来就定居在那里。

公元3世纪，日耳曼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相当有钱有势的部落贵族，他们需要精美的纺织品、精致的器具、昂贵的饰物、精良的兵器和金银。

农业和畜牧业的改善使他们有可能培育出良种马匹，并用以组建日耳曼军队的主力骑兵团。

原始公社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瓦解了。在当时，由于经济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人们夺取战利品和新土地的军事远征已经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大批在本土上无法展现自己的能力因而打算到异乡去寻求发展的人们已经出现，为罗马服兵役的日耳曼人越来越多。在公元3世纪内乱不断发生的时期里，罗马的历朝皇帝和僭位者愿意雇佣日耳曼军人尤其是日耳曼骑兵。他们招纳日耳曼人的原因不仅在于日耳曼人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而且在于日耳曼人不像罗马士兵那样和帝国居民有联系。一部分为罗马服兵役的日耳曼人分到了帝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其目的是为了耕种并防守这些土地。由于在军队服役，日耳曼人的指挥官有罗马公民权，假如他们的子孙也参军，他们的土地就可以世袭。罗马政府为了帮助他们发展农业，有时还供给他们牲畜、种子、农具甚至奴隶。

这种制度逐渐发展，后来就把以前的保护国制度取代了，而保护国制度也到公元 3 世纪就彻底地结束了。对马尔可曼尼人的战争经验说明首先是受罗马剥削的民族起来反对帝国，他们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再也不愿意继续自己的依附地位。相反，这时罗马诸皇帝全都被迫用巨款向邻近各部落换取和平，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这种“补助金”过期而没有被支付，部落酋长就带着武器到帝国来催款。

公元 3 世纪，日耳曼人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其中日耳曼内地的各部落起了主要作用。

②斯堪的纳维亚诸部落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诸部落中产生了最早和最强大的部落联盟之一。据塔西佗记载，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居民被称为斯维翁人，塔西佗称斯维翁人是熟练的航海家，他指出他们崇尚财富，他们的“国王政权”比其他日耳曼部落更为强大，在某种意义上，部落酋长的政权就是所谓的“国王政权”。

大量从帝国输入的物品和罗马钱币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部分也被发现了。古代挪威的重量单位和罗马的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和罗马帝国之间贸易的重要性。对公元 3~4 世纪的考古发现证明虽然此时和帝国之间的贸易日渐衰退，但掌握在部落贵族手中的财富却在不断增加，以前罕见的金制品也在数量和重量上都有所增加。特别有价值

的是两个饮酒用的金角，一个长 53 厘米，另一个长 84 厘米，角上饰有人物和动物的图像，刻有卢尼文的题词，上面还刻着工匠的名字。一般说来，卢尼文最早纯粹用于魔法，此时得到了广泛流传，这一点也证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各部落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斯维翁人在公元 3 ~ 4 世纪很可能参加了进攻罗马帝国的远征，他们所掠夺的战利品变成了部落酋长和军队指挥官手中积聚的大量财富。

③ 中欧的日耳曼部落联盟

在中欧，日耳曼东北部的诸部落非常活跃，军事实力也特别强。这些部落和罗马帝国、斯堪的纳维亚和邻近的东欧地区之间的不断发展贸易，加速了原始公社制度的分崩离析。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东部地区，汪达尔和勃艮第的部落联盟就是在此时形成或者巩固起来的。在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战争时期汪达尔人就开始向南推进，其中一部分遵守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的命令移居到达西亚。勃艮第人则在公元 3 世纪初向美因河地区推进。再往西，强大的阿雷曼尼人联盟在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兴起，还有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的伦巴尔德人，居住在日德兰半岛南部曾侵犯不列颠和高卢西岸的勇敢的航海家和海盗盎格罗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居住在莱茵河沿岸，由巴塔维、哈特等部落组成的法兰克部落联盟。所有这些部落联盟都从公元 3 世纪起开始侵犯罗马帝国。

2. 哥特人和斯拉夫人

在公元 3 世纪，日耳曼人并不是罗马在欧洲的惟一敌人。多瑙河畔喀尔巴阡山地区、黑海北岸地区、德聂伯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各个部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同日耳曼部落的一样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部落与帝国各行省以及黑海北岸地区各城市之间的商业往来，加快了当地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军事的发展，也使更多的财富集中到部落贵族手中，财产分配不均的程度更是不断加剧。这里还形成了一些比较强大的新部落联盟，比如自由的达西亚联盟、卡尔普人联盟、阿兰联盟，最后还有许多黑海沿岸部落的强大联盟，古代作家总是将这些部落称为哥特人。

较晚时期的罗马历史学家认为，在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上，公元 4~5 世纪的哥特人曾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哥特人在公元 3 世纪只不过是部落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联盟除了哥特人之外，还包括有革泰人、达西亚人、萨尔马泰人和斯拉夫人的部落。仿效古典时期的希腊作家，公元 3 世纪的古代历史学家们往往把他们称为斯基提亚人。公元 3 世纪中叶，哥特人对罗马帝国毁灭性的袭击开始了。公元 251 年，哥特人占领了色雷斯城市腓力波波利，抢去许多居民，并将城市洗劫一空。他们把出来迎战的皇帝戴克优斯的军队诱入难以逾越的沼泽地，将他们彻底击溃，皇帝本人

也阵亡了。三年后他们再次入侵色雷斯，攻到帖撒罗尼加。最具有毁灭性的哥特人的海上远征从公元 258 年开始，一直持续了 10 年。从古代作家的记载得知，哥特人远征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有 500 只军舰和几十万人。公元 269 年，皇帝克劳狄乌斯在内索斯城附近击溃了哥特人的军队，与此同时，歼灭了在希腊海岸作战的哥特舰队。从此以后，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猛烈势头减弱了，他们开始定居在黑海沿岸的草原上，从此以德涅斯特河为界分成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

他们加强了和黑海北岸地区的联系，黑海北岸最主要的中心此时都处于“蛮族”的控制之下。某些斯拉夫部落同邻近部落尤其是人员众多的萨尔马泰部落之间的往来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斯拉夫人与罗马帝国和帝国多瑙河各省之间的经济联系骤然减少，输入斯拉夫各地区的罗马货物数量不断减少，罗马钱币也极少见。

斯拉夫人跟中欧和东欧的其他民族一样，也参加了对罗马帝国奴隶制世界的斗争。他们先是参加了公元 2 世纪后半叶对马尔可曼尼人的战争，后来也参加了公元 3 ~ 4 世纪的所谓斯奇提亚人的远征。同时，他们还投入了对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斗争。

南方的古代斯拉夫部落在公元 4 世纪末或公元 5 世纪初遭到了匈奴人的袭击。显然斯拉夫人在极度恐慌的情况下放弃了许多居住地，其中包括维斯拉河上游“伊戈隆尼亚”附

近的制陶镇，这些被放弃的居住地和在维斯拉河流域以及沃伦发现的大量埋藏财宝就证明了这一点。匈奴人的这次侵袭使一部分斯拉夫居民放弃了原来的居住地，迁到波列谢的茂密森林和沼泽地带去寻求新的生活，如此说来，这次侵袭也为后来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奠定了基础。

3. 中欧和东欧地区诸部落与罗马帝国的斗争

一开始，中欧和东欧诸部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斗争还不是为了争夺新居住地。“蛮族”在公元3世纪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罗马在军事技术和组织方面仍占有优势，在有计划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大多是罗马军队。因为“蛮族”的攻城技术欠佳，所以不能夺取防御能力相当强的城市，而城墙通常都抵得住长期围攻，因此郊区居民在有军事行动时往往逃进城里去避难。但是，有一点应当着重指出：在这时候，已经不是奴隶制罗马，也不是像黑海北岸的希腊城市那样的一些罗马前哨，而是那些在前几个世纪中作为奴隶制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对象的那些部落成为了进攻的一方。此时，他们给了帝国及其同盟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因而使奴隶制度的危机不断尖锐化和深刻化。斗争从公元3世纪后半叶开始就具备了夺取新居住地的性质。公元267年，哥特人在出征时就随军携带着家属和财产。显然，这类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占领土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夺取战利品。到了公元4世

纪，“蛮族”就已经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上定居了。

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把帝国内受剥削受压迫的居民推向外来入侵者的阵营，这也是入侵帝国的各部落能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迅速更迭的几代皇帝都屡次亲自向“蛮族”求助，为他们开放边疆，让出城市，这种情况更加速了“蛮族”的胜利。在公元3世纪，多瑙河、莱茵河、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和黑海的北岸地区是“蛮族”侵犯帝国的主要基地。